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by* Bill Hayton The

南海

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

比爾·海頓、著

林添貴、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by* Bill Hayton The

南海

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

比爾·海頓、著

林添貴、譯



南中国海，越南人称之为东海，菲律宾人称之为西菲律宾海。

这张南中国海的地图标示出了大到可能「可以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的岛屿。制图者也把这些岛屿的十二海里领海与假想的专属经济区画了出来。专属经济区以最大可能的方式呈现，即位于该岛与最邻近的海岸线之间的中间线上。根据最近国际法院的判决，该线的划定可能会更接近该岛屿一些。本地图同时显示，中国主张的「U形线」如何切入每个海岸国家外海的专属经济区。

本图的绘制参考了印尼日惹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大地测量与空间学系（Department of Geodetic and Geomatic Engineering）讲师I Made Andi Arsana先前绘制的地图。

史普瑞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越南称之为大长沙，而菲律宾称之为卡拉扬群岛。

帕拉塞尔群岛：由中国占领，中国人称之为西沙，但越南也主张有主权，并称之为黄沙群岛。

推荐序（一）　两岸釐清或处理南海U形线问题的思路

宋燕辉

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

二○一四年十月上旬，在出发前往新加坡参加一场有关南海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前几天，一位学术界的好友—国立新加坡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是该校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传来一份电邮，告知比尔．海顿（Bill Hayton）刚出版一本题为*The South China Sea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之新书的信息。他特别建议，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书店有卖，当我入境时可顺便去买一本，因为此书值得一读。

当我抵达机场，由于办理入境手续、提领行李、加上友人已抵达接机，因此没有机会抽空到书店去买这本书。第二天，没想到在会议讨论期间，一位资深新加坡教授特别影印了此书英文版原着的第二百六十五页（本书第三六七与三六八页）给与会学者共讨论之用。这一页主要提到台湾在正确解读南海歷史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海顿认为，「在台湾，更加自由地辩论中国歷史的机会，要比在大陆大得多。台湾已经有一些持异议见解的学者在重新思考二十世纪歷史的各个面向。台湾也是中华民国政府档案储存之所在，而最先划出『U形线』者正是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台湾的统治者，亦即国民党或国民党政府，愿意〔先採取措施去〕（笔者加入）降低南海史料编纂的冲突，北京政府才方便跟进。唯有诚实、批判性地检视过去的歷史，才是未来〔南海〕（笔者加入）和平之锁钥。」

海顿的新书触及几个南海核心问题，此包括：第一，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第二，南海歷史性权利的主张；第三，南海「九段线」或「U形线」的意涵；第四，岛礁在南海海域主张与划界上所扮演的重要地位等。

海顿指出，太平岛将是对南海提出岛屿主权主张的任何国家最核心的一块领土。如果南海声索国全都坚持立场，要求国际法院就全部岛礁做出判决，那么南威岛、中业岛和其他岛礁的所有权恐怕都要归于对太平岛的主张最有力的那个国家。

鉴于太平岛在过去七十年绝大部分时间由中华民国控制，海顿认为赢家极有可能是中华民国。

有关太平岛的法律地位问题，海顿在书中写到：「太平岛只有三百七十公尺宽，但是有自己的淡水，也有天然植栽。它显然能够支持至少最低度的人类居住。」基此，海顿应该是採取支持太平岛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是可以主张两百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和大陆礁层，享有此海域内有关有生与无生资源主权权利的见解。

就南海歷史性权利问题，海顿表示，尽管所有南海声索国都坚持对目前其所占领的岛礁拥有「歷史权利」，但此要在国际法院上提出充分有效证据，进而说服法官接受此主张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越南与菲律宾倾向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去处理南海争端。相对的，北京愈来愈主张「歷史权利」。就台北而言，既强调《公约》规定，但也主张特定的「歷史权利」，例如，传统捕鱼权。

前言与结语不算，这本由耶鲁大学出版，并获选为二○一四年《经济学人》年度选书的专着有九章，总共二百九十八页（平装版）。在书中，长期担任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的比尔．海顿由歷史、地理、考古、文化、外交、法律、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油气资源开发、民族主义、及区域冲突和合作等角度生动的向读者说明几个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和区域外大国如何在此海域争夺权力的过程。

海顿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以号称「拥有」南海。他表示，「从歷史的角度来看，对这些岛屿的权利主张━不论是英国、法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甚至菲律宾所提出━没有一个有完全的说服力。」但台北官方立场一向是：无论就歷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海四大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主权属中华民国，此不容置疑。

海顿以报导、说故事，甚至在有些地方採取加油添醋的方式揭露了一些南海岛屿和开发权益争夺的内幕。他所叙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事、时、地、物的故事，包括了南海声索国和域外国家石油公司如何绞尽脑汁争夺南海石油油气资源开发；菲律宾狂人托玛士．柯洛马（Tomas　Cloma）于一九五六年如何以个人发财致富为目的，宣称发现巴拉望海岸之外一块六角形水域，以及水域内所有大小岛礁沙洲浅滩，并将此区域命名为「自由邦」（亦即目前菲律宾所主张的卡拉扬岛群）；以及为何在二○一二年东协外长会议首度无法发佈联合公报的困境等。一般学术论文不太会提及这些内幕，因为有些可能是道听涂说，衍生查证问题。

全球华人读者对此书第三章一段有关中华民国海军在南沙群岛採取维权作为的叙述可能会特别感到兴趣。海顿写到：「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一大早，菲律宾海事学院船队四号船下锚泊停在双子礁（North

Danger Reef）……被中华民国海军两艘军舰堵上。费勒蒙．柯洛马船长（Captain Filemon Cloma）被『邀请』到其中一艘军舰上谈话。双方在舰上辩了四小时国际法—同一时间，中华民国人员登上四号船，没收所有武器、地图及相关文件。次日，费勒蒙又被邀请过去，要他签署一份声明承认擅闯中国领土，保证绝不再犯。」

海顿的书是在二○一三年完成、二○一四年十月出版，因此书中并未进一步讨论南海仲裁案的新发展；美国如何施压要求台北与北京釐清南海U形线或九段线的意涵；美国如何建构牵制中国大陆在南海佈局的结盟策略；菲越等国如何进行双边战略合作并拉拢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澳洲等国支持其对抗中国大陆；西沙「981事件」越南暴民攻击华商与北京撤回钻井平台之内幕；中国大陆加速进行南海填海造陆工事的主因；以及北京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筹设「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重要发展。尽管如此，海顿在书中有关南海、南亚、以及欧洲海上贸易歷史的论述似乎吻应了习近平主席在二○一三年所提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海顿的书深入解释南海冲突的主要原因，包括各声索国之内部政治考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政府的顾虑、美国的积极介入，以及中国大陆的整体战略军事安全佈署等。有关南海合作面向或和平倡议的讨论主要摆在此书的最后一章。海顿提及一些与南海渔业资源保育与管理、设立海洋生态保护区或海洋和平公园、设立南海「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Zone of Peace, Freedom,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有关的倡议、中国大陆所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议、印尼所主导召开「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非正式研讨会」此架构下的合作项目、成立「共同研究小组」，以及讨论草拟签署一份包括界定「南沙群岛特许区」（a Spratly Island Concession Area）范围的可能区域合作。

海顿在书末特别提到地中海的经验，做为未来南海能有更富饶前景的类比。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海。一九八二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二条将「闭海或半闭海」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海盆或海域。」地中海「分享着共同的歷史，也有休戚与共的现在，其整体大于每一个部分的加总。它将是根据普世原则议定疆界的海域，会依共同责任治理以求最明智地运用其资源，这片海域的渔群将由所有成员以全体利益为宗旨来管理，这里的石油开採和国际航线造成的污染将被减轻，搜索和救援任务也可以顺畅地进行。」海顿认为，地中海沿海国在半闭海内的上述合作都有可能在南海发生，但先决条件是南海的海洋疆界线必须重新划定。

海顿的此一比拟值得南海周边国深思。南海的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二条所界定的半闭海，且依据此公约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南海周边国都有条约义务就南海生物资源的保育、管理、开发及利用、南海海洋环境之保全与保护，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等进行合作。此合作包括可邀请关注南海或自认具有实质利益之区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参加。由于南海也包括沿海国的专属经济海域和小部分公海海域，公约所规范适用于此些海域的合作义务同样适用于南海。

至于是否必须重新划定南海海域疆界后再进行合作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尽然。首先，南海划界涉及复杂的岛屿主权问题。此敏感领土问题要获得解决得旷日费时，在可见的未来很难达成。第二，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三条所规定沿海国在半闭海应履行一般合作义务外，第七十四条与第八十三条也规定在未达成划界协定前可透过临时安排进行合作。

或许南海周边国家解决南海争端的可行方案是先进行划界前阶段性临时安排协商，在达成签署临时合作安排协议后，台北或北京可以进一步与相关国家进行协商阶段性删除U形线的可能。诚如海顿在书中指出，在十三至十六世纪期间，主权之概念与问题与今天截然不同；现代国家领土、主权的概念也因全球化而有所改变。因此，南海周边国家应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将南海资源视为区域人类共同遗产的合作方向去思考。

总的来看，海顿的这本书对有意深入瞭解南海争端之歷史、政治、法律、资源、地缘战略、军事安全、可能合作面向的一般人士、研究人员，以及政府机关涉及南海业务的官员具有高度阅读与参考的价值。二○一四年十月十一日，我与同行出席新加坡会议的另外两名台湾学者办完出境手续后在机场书店，每人各买一本。回国后，我很快的把这本书读完，也曾推荐给国外友人。半年后，很高兴知道麦田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的中文版。透过林添贵先生信、雅、达的中文翻译，相信更多的读者可排除英文阅读与理解的障碍或限制，进一步去理解南海争端的歷史背景和发展现况。我很高兴为比尔．海顿新书的中文版写推荐序，因为这本书的确值得仔细阅读。

推荐序（二）　中华民国应展现维护太平岛主权的决心

林郁方

前立法委员

《南海：21世纪的亚洲火药库与中国称霸的第一步？》是介绍南海问题的佳作，为了撰写本书，作者取材丰富，蒐集了许多国内难得一见的史料，提供不同的观点供读者参考。再加上译者林添贵先生信、达、雅兼具的翻译，使本书可读性极高。对于熟悉南海问题的专家或是初学者，此书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好书。

不过，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本书令人感慨！因为书中对中国大陆、美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南海的纵横捭阖，均有不少讨论；但对一九六○年代后，中华民国在南海的经营，却着墨不多。

这一情形，正好印证了我们长久以来的担忧，即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已逐渐被「边缘化」！这和政府长期以来为避免影响中华民国和美国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刻意保持低调有关。幸而近年来，马英九政府开始积极强化太平岛的防务。例如，虽然目前无法让陆战队回防太平岛，但所有派驻该岛的海巡署人员都必须先在陆战队受训六周。此外，对于我在立法院的各项提案，诸如在太平岛和东沙岛部署120迫砲和40机砲、在太平岛兴建新码头以及中油在该岛进行地质探测等等，若非马政府欣然接受和积极行动，也无法成事。

本书作者在结尾建议中华民国重新检视对南海的主权诉求，并暗示这是让中国大陆在南海不要那么强悍的关键。坦白说，我不能认同作者的看法。第一，影响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作为之因素，除了较抽象的民族情绪以外，还有具体的国家利益，如油气探採和区域战略佈局。即使中华民国调整主权诉求，中共也未必会变得温和。第二，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与其他声索国之间，始终巧妙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中华民国若果在南海主权上退缩，有可能激发中共和区域内其他相关国家，尤其越南，更严重的竞争和冲突。李登辉主政时期，主动撤回太平岛和东沙岛的陆战队，代之以海巡署人员，此区域其他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却因此变得更严重。第三，中华民国在南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维护，若片面放弃既有立场，恐将尽失谈判筹码。

本书的出版对我们的启示很明显，我们必须让全世界更瞭解我们的南海政策以及作为，更重视我们维护太平岛主权的决心。期待有更多国

内学者能发表更多有关南海的着作，为中华民国在国际发声。

序幕

未来的某一天，可能有两艘渔船从菲律宾吕宋岛出发，向西开往大海。它们将把航线定向一个珊瑚礁，它的名字即来自它们出发的港湾巴约．狄．马辛洛克（Bajo de Masingloc）。过去三百年，这个岛礁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西班牙人称它为马罗纳礁（Maroona Shoal），英国人称它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华民国称它为民主礁，共产中国将它改名为黄岩岛，而最近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给它取了一个并不贴切的名字帕纳塔格礁（Panatag Shoal），意即宁静礁（Tranquil Shoal）。当他们抵达时，一行人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从四千公尺底下的海床冒出来的一座山的峰顶。茫茫南中国海中孑然独立的一块岩尖。

如果它再矮个三公尺，除了对过往船只构成危险之外，它就不值一哂了。但是即便是高潮时，几块岩块露出水面，每块大小只够有人站在上头。由于岛屿的正式定义是「自然形成的一片陆地，被水面包围，在高潮时高于水面」，区区这几公尺可就大大有学问。註1受承认拥有一个岛屿，主人就对海洋、四周的鱼，以及海床之下可能出现的矿物拥有权利。近年来，拥有它更有其他意义。对某些国家而言，得之则荣、失之则辱，是大国或龙套地位之别。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未来的这一天，两艘渔船试图前往这个岛礁。

在假设性的这一天，船上载着挥舞国旗的菲律宾人：国会议员、退役军官和资深的街头运动者。在夜色掩护下，他们企图熘过一艘中国海警局的船：它守在这儿就是为了防止有心人士擅闯。它们差一点达阵成功。中国海警船正在岛礁的另一端巡逻时，它们硬闯潟湖入口。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入口有三百五十公尺宽，但是潮水、海浪几乎把渔船推去碰暗礁。就在他们接近岛礁时，他们听到一声枪响，灯火突然大亮。一艘小船快速向它们趋近，有人透过扩声器以英语喊出警告：「这里自古以来即是中国领土。请立刻离开。否则我们将被迫採取行动。」但是菲律宾人继续往前冲：他们已几乎进入潟湖。另一声警告：「如果你们不立刻离开，我们将採取武装行动。请立刻下令船只掉头。」第一艘渔船只距潟湖入口十公尺，中方又开了一枪。这一次它不是照明弹。子弹打在水面上。

菲方渔船上的军人要求船长继续向前冲。他们有过枪林弹雨的经验，可不害怕。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可不能退却了。他们将在这块菲律宾领土插上国旗。另一排枪弹扫射到甲板上。一名船员当场毙命；一位国会议员肩胛中弹，另两名积极分子受了重伤。但是船只已冲

进潟湖──军人掏出武器、还以颜色。中方快艇退走，但是母船现在挡住潟湖唯一出口。菲律宾船只已弹痕累累，众人十分惊慌。一方面对伤者施以急救，国会助理也忙着用卫星电话求救。他们立刻连线接受气喘吁吁的电视新闻主播现场即时访问。马尼拉方面，群众围聚在国防部和中国领事馆外头，要求当局要展现魄力。北京方面，另一批群众向菲律宾大使馆丢掷石头，网路战争爆发，网站遭骇。人人都要求要有所行动。中国政府拒绝准许菲律宾渔船离开潟湖，声称它们非法擅闯中国领土，必须依法处理。菲律宾政府要求中方释放渔船及船上一切人员，并且派它最大的军舰戈里格里欧．狄尔．皮拉号（BRP *Gregorio del Pilar*）驰往现场。

中方不肯退让，因此戈里格里欧号开火警告。没有反应。菲律宾海军特种部队登上中国船只，双方在舰桥上斗殴，有人开了催泪瓦斯，枪声大作。接下来，两架中国喷射机试图扫射戈里格里欧号。它们没有命中，但是这是最后一根稻草：菲方特种部队退走，戈里格里欧号砲打中国船只，打中它的船尾。中方船只仓皇退走，菲律宾积极分子退出潟湖，被移到戈里格里欧号上施救。北京岂能容忍此一挑衅行径。在全世界一片力促冷静、要求节制的声浪中，中方一支特遣部队从海南岛三亚的南海舰队总部出海。

海上保险费率大涨，货柜轮取消航班，民航机改道飞行，半导体供应链断了，「及时物流网」开始瓦解。渔民停止捕鱼、市场架上空了、城市工人买不到食物、积极分子怒火上升、石油价格飞涨、政客喧嚣叫骂、警告愈加严峻；但是情势丝毫不见缓和。中国军队是在南沙群岛最北的北子礁（Parola）□□位于黄岩岛西方约数百公里──登陆。菲律宾薄弱的守军只能象徵性的稍做抵抗。但是三公里之外，据守南子礁（Dao Song Tu Tay）的越南军队，武装较为精良，将中方的举动视为攸关生死的重大威胁。他们以大砲及岸基飞弹攻打中国舰队。双方都召来空军助阵。

战斗蔓延到南沙群岛所有其他岛屿──各国在这片大洋的许多岛礁、沙洲都纷纷派兵抢滩登陆。华府重申海洋自由攸关美国国家重大利益。它调派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本地区；其他国家派出象徵性船舰加入，以示国际决心。中、美船舰的对峙变得日益紧张：海上发生擦撞、潜水艇在水面下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日本军舰奉令护送运油轮船。福岛（Fukushima）核电厂事件之后，日本的发电业需要每六小时有一艘油轮抵达，才能维持稳定供电。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援助其战略伙伴越南，导致赌注越益攀升。接下来，德里有人决定，时机成熟，可藉机收復喜马拉雅山脉一些失土……

以上所述只是一份剧本，而且即使我写到这里，仍有许多善心人士

用心良苦想方设法防止它发生。但是也有一些力量在推动亚洲向反方向发展。经济竞争、超级大国逻辑和民粹的民族主义都在升高冲突的机会。南海是中国的野心与美国的战略意志硬碰硬的第一战线。数十个其他角色，从中型国家到小政客，也想伺机从冲撞之中谋求好处。各方皆在评估利益，不断组建同盟关系：战略伙伴、共同防御条约—种种承诺网络把世界与这个区域的未来结合在一起。如果有人开了一枪、杀了大公爵註2，世局会如何演变？

* * * *

要了解南中国海对广大的世界之重要性，你可以在某个晴空万里的一天，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向底下的水面望去。从最小的渔船、到极大的油轮，数百艘船只塞满了水道。驳船、拖网渔船、货柜轮船、载运汽车运输船，以及大型货轮，载运着现代生活的种种商品。往东去的石油引燃起南中国海另一端的台湾、南韩、中国和日本的巨大经济体的活力。往西去的则是世界工厂的种种产品，硬体、软体、头饰和鞋类。根据最可靠的估计，除了全世界半数液化天然气和三分之一原油之外，还有半数以上的海上贸易通过麻六甲海峡。如果这里的船只不动，不消多久，世界上某个角落的灯光将开始熄灭。

南中国海既是世界贸易的槓桿支点，也是角力的战场。一九七四年和一九八八年，这个区域发生过战争，此后又有数十次规模较小的武力对抗。美国自始就捲入其中，印度则开始对南中国海产生兴趣。这个区域值得我们注意，可是除了一小撮学者、专家及其他狂热分子，外界对它非常不了解。对于争议有许多公认的事实真相，不断反覆出现在媒体报导上，但其实它们并不正确或是未经证实。南中国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没有特别丰富，繫争岛礁上的军事基地并不特具「战略」意义，因为只要发射一颗飞弹，几乎全可把它摧毁；领土争议涉及到六个国家、不是五个国家，因为印尼虽假装不受影响，其实也是其中之一；而且繫争各国所谓的「自古以来即有的权利主张」，也是相当现代的事情。

有关南中国海的许多关键着作—至少是英文着作—可以追溯原始源头到两份西方学术着作：一是德国歷史学者戴耶德．海恩兹（Dieter Heinzig）一九七六年写的论文〈南中国海繫争诸岛〉（Disputed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以及美国地理学者马文．萨缪尔（Marwyn Samuels）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专书《竞逐南中国海》（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它们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开路先锋作品，让各界对此一主题有了迫切需要的了解。但是这两本书叙述的歷史，相当大部分依据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入侵西沙群岛之后，中国共产党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其中之一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七十年代月

刊》，另两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号《明报月刊》。它们很明显不是中立性质的学术作品：它们意在合理化中国的入侵行为。这也怪不得海恩兹和萨缪尔，因为当时能参考的材料本来就有如凤毛麟爪。註3

然而，透过依赖这些早期作品（以及依赖这些作品的其他作品），太多学者和评论员仍然允许这三篇已经出版四十年的中文文章框限有关南中国海的整个辩论。在那之后，我们对于南中国海歷史及当前情势的了解已经更丰富，允许研究者重新检视过去的定论。太多这类新材料躺在学术刊物之中，没人读它们。我希望藉由将这些作品推广、得到更多人注意，让这本书能对改变辩论有所贡献。

除了为几块荒岛礁石争吵之外，其实南中国海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在它四周海岸曾有过神秘的文化兴起与覆灭，外来的侵略者来了、又走了，而数百年来贸易风和战争已经把南中国海和远处的帝国之命运直接连结起来。它的歷史也是全球歷史。它的未来应该得到全球关心。在我们这一代，南中国海发生的事将界定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吗？中国领导人将会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或是挑战它们？美国有意志坚持立场吗？东南亚各国从超级大国的竞争中会得利还是吃亏？争夺碳氢化合物会如何影响冲突？总而言之，我们能做什么来阻止战争爆发？南中国海的资源要如何让居住在它周边的数亿穷人能够雨露均沾呢？请继续读下去。

作者识于二○一三年十二月缅甸仰光

註1：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121.

註2：译注：此处借用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被暗杀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註3：译注：把一九七四年李怡的《七十年代》和查良镛的《明报月刊》称为中国共产党刊物，恐怕不恰当。

第一章　沉船与真相：从史前到一五○○年

四千年前的航海民族

维克多．帕兹（Victor　Paz）倒吸了一口气。在他面前躺着三块石板，全部大约是一个人身长。这得费点手脚。他得稍微屏息、控制住兴奋之情：既充满希望、又告诉自己要小心。在他屏息这一刻，云雀──塔加洛语（Tagalog）叫*hinay　hinay*□□在树林间轻快地掠过，牠们的歌声在洞口迴盪，预示着考古学上一大发现。洞穴上方巨大的艾勒石灰岩柱（Ille　limestone　tower）从水稻田中高耸而出，俯瞰着这片宽广、翠绿的河谷。现在，大家都放下工具、围靠在他四周。中间那块石板似乎最容易移动。维克多伸出双手抓紧它，小心谨慎地扳开它。

石板底下是一根肋骨，虽然已经压扁，但仍可辨出是人类的骨骸。维克多笑了。不错呀！挖掘了一季之后，总算有了收穫。一小群人凑上来挤在洞口，位于维克多蹲踞的地方之上方约一公尺。当石板被移到旁边时，他们看到这具遗骸是经过隆重厚葬的。它的胸口中央有一块锤石：它是新石器时代工匠的重要工具。它头顶上方位置摆放一小堆贝壳，虽然原本盛装贝壳的袋子早已腐烂，贝壳仍然紧密贴在一起。它的两侧各有一个可以盛水的大贝壳。但是后来证明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胸前的一串点缀着圆锥状珠子编成的项鍊──用圆锥形的小贝壳所制作的珠宝。

维克多移走另两块石板，露出整具骨骸。现在他可以看清楚葬仪是多么的隆重。大体四周有更多石块，刻意摆成形状把它围起来。头顶上方，石头形成一个尖顶，最顶端是一块优美的鹅卵石。身为菲律宾大学考古研究计划主任，维克多必须是个专业的怀疑论者。但是他晓得这个发现不仅在科学上重要、在情感上也非常重要。他的前辈──他的恩师──是威廉．索尔海姆（Wilhelm　Solheim）。过去数十年，索尔海姆搜遍巴拉望岛这片地区，拼凑起一套理论证据，要解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但是在南中国海四周投下一生精力研究之后，索尔海姆已经时不我与。高龄八十一，索尔海姆的班底慢慢地散去。二○○五年四月艾勒洞穴（Ille Cave）的发现将是他的勛奖。

维克多站起身来，仔细地再瞧瞧骨骸四周的石块。它们呈现一艘船的形状，朝向洞穴的荫影、指向遥远的来世。优美的石块象徵船首，而戽斗贝壳是驾着易漏水的独木舟进入大海的任何人必备的工具。但是即

使维克多心理上也没准备好会有下一个重大发现。圆锥形珠子送到马尼拉的实验室做检查。由于动物从牠们所摄取的营养品和矿物质制作外壳，这些壳片会显示他们生存及死亡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圆锥贝壳被蒐集起来、加工、变成珠宝，置放在葬礼中，已经至少有四千二百年之久。对维克多．帕兹和威廉．索尔海姆而言，这正是他们多年来寻找的证物。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敲定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一项辩论：现代人类是如何及为何居住在东南亚？他们的发现显然证明了在艾勒洞穴埋葬死者的人，在四千多年之前已是航海民族。这可以击倒东南亚文化纯然从中国南方扩散的主要论述。帕兹承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了解，但是它已经成为愈来愈无法否认的一项论述。」

帕兹、索尔海姆和他们的同僚前往巴拉望岛北端荒野的一座偏僻村落，试图赢得论战。他们的动机有个人因素、也有科学因素。他们费心寻找或许能支持他们已经形成的理论之证据，不过他们的方法是诚实的、他们的团队是开放的，他们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不幸的是，独立追求知识只是南中国海地区考古勘查的诸多动机之一。其他人并不关心大是大非，因为他们已经选定他们的答案：他们的目的在于探寻宝藏或合理化领土主张。而这些意向不是那么高尚的人士却握有极大的资源。

东南亚的考古学者、歷史学者──以及他们的主子──存心互异，并不是新鲜事。数百年来，东南亚地区歷史的作品已经透露对当代的迷恋程度并不下于对过去的眷恋。东南亚除了是外来者进行帝国赛局的舞台之外，还具有什么意义？住在南中国海周边的民族是源自中国，还是来自其他地方？占城（Champa）、吴哥（Angkor）和三佛齐（Srivijaya）的伟大文明是本土萌生的，还是外来移植的？文化和文明是源自一个来源，还是来自许多不同地方？谁控制领土，而它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歷史学家对这些问题各有不同的解答。近年来从语言学、陶器、遗传学、植物学和沉积学而来的新证据，不断绽放异彩。真相揭露得愈多，故事就愈加复杂。

南亚语系的人种起源

东南亚最早的人类遗迹可上溯到大约一百五十万年前。「爪哇人」（或正式称谓「直立人」〔*homo erectus*〕）的残骸出现在爪哇和中国。但是，他、他的妻儿子女似乎在五万年前左右就绝迹，有可能是被他更加聪明的亲戚「智人」（*homo sapiens*）追杀剿灭。现代人类可能在五万年前左右来到澳大利亚，这代表他们在路途中已于东南亚定居。在婆罗洲和菲律宾找到的头骨指出现代人类分别于四万年及两万两千年前来到这两个地方。问题在于我们只有非常少的其他证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和今天非常不一样。一万七千年前海平面比起今天约低了一

百二十公尺左右。现今的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在当时和大陆连在一起，而澳大利亚也和新几内亚连在一起。如果「智人」真的住在海岸附近，那么他们盖的村子和制作的工具现在埋在水面下一百二十公尺深，考古学家接触不了。我们的了解有极大的空隙，而我们很少有证据可缩短空隙。

但是我们若更靠近现代—假设只是数千年前—证据倍增，论据也更多。散居生活的屯垦地区是如何演变为城市中心？只晓得石制工具的人是怎么熟练的鍊铜铸铁？这些创新又是怎么传布开的？头一批解释来自德国学者奥图．邓普渥夫（Otto Dempwolff）的了不起的洞察。大约在二十世纪初，他开始证明东南亚一些不同语言之间的类似性。等到美国语言学家罗伯．布拉斯特（Robert Blust）在二十世纪末发展他的研究时，已经发现彼此相距甚远的台湾、夏威夷、復活岛、纽西兰、马来西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一千多种语言之间有其关联。这里头的意义非常不得了。它们证明被数千英里汪洋大海—涵盖半个世界圆周—阻隔的人类，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布拉斯特认为这些根源全可上溯到大约五千五百年前流通于台湾的单一语言；他把这种语言称为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藉由展示这一语言如何分化、繁衍，他建立起一套理论，把南岛语文在东南亚各岛散布，同人民的迁徙、新地区的垦殖和农业及其他技术的散布，联结起来。它成为所谓的「走出台湾」模式。

但是这些说原始南岛语的人又是从何而来？住在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相信他们是大约八千五百年前在长江流域最先娴熟种稻艺术的农民之后裔。在这段时期，除了原始南岛语之外，「中国」还住了许多不同语言的族群，例如汉藏语系人（Sino-Tibetan，从它衍生汉人、藏人和缅甸人）、南亚语系人（Austroasiatic，从它发展出越南人和高棉人）和泰语系人。除了种植稻米，这些人还养猪和家禽、制陶器、使用石制工具。往后一千年，国内的压力、国外的机会，引起这些族群移往东亚和东南亚。根据贝尔伍德的说法，原始南岛语系人逐渐向东方及南方移动，终于在五千五百年前左右来到中国沿海地区。

到目前为止，人口是在陆地上移动。但是下一阶段南岛语系人的旅程就大为不同。五千年前的海平面已和今天大致相同，使得台湾海峡最窄的部分也有约一百三十公里宽。可是这个障碍显然是被克服了，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台湾大约在这个时期已经有种植稻米的证据。往后一千年，更多南岛语系人到达台湾或在台湾繁衍，甚至掩盖了早先移民的任何遗迹，而且他们的语言开始分裂为各种方言。按照贝尔伍德的模式，下一个阶段是「走出台湾」。

第一步就是跨过吕宋海峡向南迁徙。先跳到最长的间距只有约八十

公里的巴丹群岛（Batanes Islands）。接下来的一跳就把南岛语系人送到菲律宾的主要大岛吕宋，在这儿，他们又遭遇了更早以前即移入本地的人类。新来者藉着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建立屯垦区、繁荣起来，人口也逐渐成长，接着又要往外扩张。贝尔伍德认为，从大约四千年前（即西元前二千年），「走出台湾」的这个族群散布到菲律宾各地，然后往西进入今天的印尼。也有些人向东移动。到了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时，已有人到达离吕宋两千五百公里的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然后持续东行，前往斐济（Fiji）。到了西元前八百年，东加（Tonga）已见人踪，西元三百年到了夏威夷，而西元一千二百年来到纽西兰。

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故事，也有相当多证据支持这个说法，例如，他们讲的语言、考古学的发现和基因研究等等。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些讲不通的问题。巴丹群岛出现比吕宋更新的文物，表示人类由南方移入、而非由北方移入。越南南部出现的殡葬技术比起台湾和吕宋的类似技术更古老。台湾早期种稻的证据稀少，表示大约四千年前当地并不普遍种稻。同时，对稻米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在中国品种从北往南移入之前，不同的品种──来自印度和爪哇──可能已从南往北到了本地区。基因学也显示太平洋猪和太平洋鼠来自印度支那，而非台湾。反对的声浪日益高涨。

因此之故，对于南中国海四周语言和文化如何散布，出现了另一种解释。新理论不再强调人从台湾流出去，而提出有一个持续交通的网络把资讯和技术往许多方向散布。它也认为中国既接收此一文化，也传输此一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源头。这正是索尔海姆欣喜北巴拉望这一座古坟发现的原因。

索尔海姆在五十多年前就开始追寻东南亚文化的起源：在柏克莱和亚利桑那唸书，一九五○年代来到菲律宾进行田野研究。他对陶器的研究使他发展出和贝尔伍德非常不同的模式。他认为他在菲律宾马斯巴特岛（Masbate）卡拉奈（Kalanay）找到的两千五百年前的瓶罐，和越南南部海岸沙萤文化（Sa Huynh）挖出的古瓶罐，两者十分相似，并非巧合。许多瓶罐绘有非常精确的几何模式──三角形、锯齿形、平行线和阴影线──切割或压进黏土里。有些瓶罐有精緻的造型，也有许多漆上鲜明的红色线条。从这里做开端，索尔海姆的视角扩大到包括来自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瓶罐、其他的器物──特别是工具和珠宝──然后推及到其他时期，包括在它之前的时期以及之后的时期。他的许多同僚不贊成，认为「相似性」的定义已经变得太含烟而失去效用。即使如此，索尔海姆还是坚持不懈。他的下一步工作是试图解释这些相似性是怎么来的。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虽然相似的器物可以出现在许多地方，它们

出现的时期并不同。因此，固然石斧（Stepped adze，一种早期的切割工具）大约五千年前在中国东南地区发展，并在往后一千年传布到台湾和越南，骨鏢于四千年前出现在越南和巴拉望，但直到一千年前才出现于吕宋和台湾。同样的，状似圆圈，开口在上方的玉耳环四千年前出现于越南，但是要更晚近才出现在台湾和菲律宾。在索尔海姆看来，这代表器物、知识和文化在不同地方发展，然后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四周横跨广大距离向前后散布，并且在散布过程进一步演化。

因此，他开始发展出一个海洋网络的概念：藉由海洋和河流旅行，靠狩猎、蒐集和贸易为生的半游牧族群。索尔海姆理论的问题出在，这些民族若是真的存在的话，没有留下太多踪迹：没有永久的定居地、没有纪念碑石，也没有文字记录。得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才能相信他们的存在。可是他明白，证据实际上仍然存在。直到一九五○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亚歷山大．史波伊尔（Alexander Spoehr）还在菲律宾民答那峨岛遇见沙玛族（Samal）妇人，他们从来不踏上陆地，而且深信若是踏上陆地，就会遭到恶灵侵袭。即使到了今天，许多「海上吉普赛人」，如菲律宾的巴瑶人（Badjao）、马来西亚的巴夭人（Bajau）、印尼的海上人（Orang Laut）、华南的蜑家和越南的蜑人（Dan），仍然依傍海洋而居住，靠捕鱼和贸易为生。的确，在东南亚地区，从中国到越南和泰国，仍然有些海上族群过着数千年前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索尔海姆从南岛语系指谓「南岛」和「人民」的字造出一个新字，称呼这些人为「南岛民族」（Nusantao）。

要真正了解他们，我们必须颠覆「陆地是安全的地方、海洋是危险的地方」的概念。陆地可能充满敌意、住着危险的生物、盗贼和税吏。海洋有丰富的食物，而且大部分也容易旅行。水果、蔬菜可以取资于河岸的种植或是交易而来，照纽西兰人类学家艾托尔．安德生（Atholl Anderson）的解释，即使淡水的问题也可以克服。註4大量的淡水可以靠竹节装载。它很牢固、方便装运，水若是喝完，竹子可用以修理船只。加上雨水和来自生鱼的体液，在海上航行三、四个星期不会有问题。

索尔海姆把他的模式称为「南岛民族海上贸易及交通网络」（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它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和过去的歷史有重大的断裂，也没有任何单一的大迁徙行动。它没有依赖、也没有排除任何特定的族群。科技和文化自行逐步演化。某些「南岛民族」说南岛语，也有些不说南岛语；有些是半定居，也有些是完全游牧族；有些住在海上，有些住在河口，也有些住在内陆。他们和定居的族群有互动，族群必然产生混合。他们从来不曾有意识地以同一个团队行动，而且他们的技术很单纯，可是透过旅行和贸易的小小动作，南岛民族创造了广大的风帆和船桨的运输网，可以把澳

大利亚北部的海蛞蝓（sea slug）运到华南的餐桌上，把新几内亚丛林的香蕉树送到马达加斯加的庭园里。每一次的旅行都挟带着商品、知识和文化往还交流。

这是一种随兴所至的美妙模式，非常轻松愉快而且人性化。它意味真正发现南中国海诸岛的民族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族群认同，也不附骥于所谓国家这样的东西。政治单位在陆地发展时，南岛民族试图生活在它们管控之外。贸易和走私、海盗和叛乱，其界线相当模糊。挺讽刺的是，现代国家在南中国海提出领土主权主张时，经常以这些人的活动为根据，可是在过去，这些国家却试图限制或甚至消灭这些人。

南岛民族既然不是一个种族群体，就没有什么必要追问他们来自何方。然而，索尔海姆主张，南岛民族网络的中心位置是今天越南中部和香港中间这块沿海地区。从这里，它向西延伸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向东延伸至復活岛（Easter Island），南及澳大利亚、北抵日本。我们晓得，印度的玻璃珠是由中国古籍上所谓的「马来人」在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带到中国；大约两千年前在越南北部所制作的铜器「东山」鼓（Dong Son drum）在东南亚各地及华南的殡葬上经常出现。这是快速发展的时代，繁复的社会和帝国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崛起——而它们靠着海上网络串连起来。

假如真的有海上社群在沿海地区穿梭贸易，又能跨远距离交通，那么要认为这些串连会在我们今天所谓的「东亚」、「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等疆界停止，那才真是可笑。沿海贸易商人会与他们在东、南、西、北各方的同行建立联繫。资讯和商品会透过这些网络流动，某地的人会知道别的地方之思想和物资；民间有关远方来客的记忆将会流传，带有异国风味的传家宝也会代代相传。当然，海路不是唯一的大道。也有人藉陆路通行，但基本上海路更迅捷、更安全。

一九三九年，在义大利庞贝的灰烬中出土了一具印度象牙小雕像，考古学家开始接受在西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之前，罗马和南亚之间的远距离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不仅只雕像来自东方。罗马有一份文件《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年代约是西元六三年，它提到有个地方叫做Thina，丝织品非常有名。看来两千年前有些欧洲人已经知道有海路可通往中国。有人辩论罗马歷史学者普林尼（Pliny）是否真的在西元第一世纪提到丁香，但是大约西元一八○年左右，丁香已经被记载进口到埃及。当时世界上唯有一个地方种植丁香：今天印尼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北部。西元二八四年，东罗马帝国首次派遣使节取道林邑（今天的越南）到中国。

扶南、占城、三齐佛：东南亚古文明考

从越南的占城、柬埔寨的吴哥窟，到印尼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和普兰巴南（Prambanan），整个东南亚各地散布着数十座高塔和庙宇，它们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它们明显具有印度风格，到处是艳丽的处女、又有珠光宝气神祇的祭坛，可是今天皆因印度风退潮而破败，湮灭在丛林中数百年，在欧洲殖民者已经成熟到能够聘请考古学家到帝国深幽地区到处勘察时才被发现。

这些考古学家很快就为是谁盖了这些伟大的结构、为什么要兴建它们下了定论。为了合理化欧洲人在这些异域的统治，他们设想这些庙宇是更早世代的外来人所兴建。正如欧洲人给土着带来文明和进步，这些巍峨宫阙的兴建者早来了几个世纪。他们肯定来自印度，把他们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传授给蒙昧的居民，在过程中把原住民的文明向上拉抬。这意味欧洲的殖民只是延续东南亚长期以来即有的行为模式。

这种思想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四年，法国歷史学者乔治．赛代斯（George　Coedès）还写说：「当印度的婆罗门与佛教文化初次被引进远印度（Further　India）註5时，当地的人民保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换句话说，这个地区困陷在石器时代，直到西元四○○年左右，当它被来自西边的印度人和佛教徒所殖民才获得启蒙。东南亚人民也不在故事之中；歷史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不是他们参与创造的产物。要经歷半个世纪的考古挖掘、翻译和思考，才推翻这样的观点。

所以今天我们才看到这些巨大寺庙的兴建者和数百年来东西奔波往还于大海的南岛民族之间的直接关联。的确，今天看来，在印度文化于东南亚生根之前，东南亚人与印度已经有数百年的贸易往来。货物和知识在整个贸易网络上你来我往。南岛语系民族在西元第一世纪就把他们称呼船只的字词传给印度南方。印度制作玻璃珠的技术则在更早就传遍东南亚各地。

西元一世纪至五世纪之间，东南亚沿岸因为与不同的印度文明交易而有蓬勃的发展，如檀香木、小荳蔻、樟脑、丁香、珠宝和贵重金属。印度文献提到「黄金群岛」（Swarnadvipa）和「黄金国度」（Swarnabhumi）。伴随着贸易，不同文化的元素也在流动：从陶器设计到宗教，再到哲学和政治。证据似乎显示，东南亚不但没有被南亚人统治，反而是东南亚的统治者主动选择採纳南亚人对国王、僧侣和权力的概念，以强化他们对人民的控制，并坚守领土、抵御外寇。

从我们有限的所知来看，西元之初几个世纪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是中国史书所称的扶南国。扶南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版图横跨今天的越南

南部和柬埔寨。透过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上的狡黠，它从扼居欧洲、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通道的关键地位，建立起帝国。罗马人喜爱中国丝绸和东南亚香料，中国人喜爱来自阿拉伯的乳香和没药，玻璃、陶器、金属品、象牙、兽角和珍贵矿石则人人皆爱，扶南国藉着这些流通贸易而致富。

打前锋的是南岛民族，他们迁徙于各地之间，交换商货，从中间赚取利润。中国文献记载马来船只（名为崑崙舶）早在西元前三世纪就来到中国。逐渐地，来自印度及中东沿海的其他人也加入行列。没有考古的证据可资证明，有任何中国船只在十世纪之前跨越南中国海从事贸易活动。这似乎推翻了许多中国人的主张，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网站宣称「东汉年间（西元二三至二二○年）杨孚在他的着作《异物志》就提到南沙群岛」。註6现有的证据显示，杨孚的研究比较像是他向来到中国港口的外国贸易商的访查，而不是自己实际的出海见闻。虽然的确有些中国人坐上其他民族的船只出洋，但是过去住在今天华南地区的居民似乎倾向于让别人冒险出海，只在商品抵达之后处理交易。

扶南的确位居枢纽地位，因为这段时期的贸易属于接力性质。很少有船只走完全程。贸易商可能只在他们最熟悉的路段运载商品：从欧洲到印度、从印度到马来半岛，再取陆路经过马来半岛最狭窄的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经过这段四十公里的陆运，可以免去一千六百公里海运的周折），然后再走水路到扶南，最后再由扶南到华南。若要成功，贸易商必须精通每年风向所定下的旋律，也就是由阿拉伯文字「季节」（mawsim）所衍生出的季风（monsoon）。

北半球的夏天，亚洲大陆气温上升。陆地上的空气升起，从南方海面吸进更多空气，制造强大、持续吹向大陆的风：西南季风。到了秋、冬天，亚洲凉快下来，陆地上空的空气下沉，从大陆往外推：东北季风。从马来半岛扬帆行船到扶南，在十二月和一月最容易，因为风从南亚吹出，但是要等候一段长时间，直到六月，才方便从扶南开往华南。在七月中旬飈风季开始之前，船只需要进港泊靠。反方向而走的话，从中国扬帆航向东南亚最容易的时机是一月和二月，风和潮流都由东北而下。然后又得停驻，等候南亚季风允许船只安全、方便地往西方前进。

每年二月至六月这一段风向、潮流不利航行的时间，为今天越南沿海地区造就了数百年的繁荣。当年，贸易商必须在扶南暂停，从当地来源补给。第三世纪中国有一项记载描述这些「马来」船只的形状：五十多公尺长，最多有四帆，能载七百人和六百吨货品。註7大量的船只，加上它们的旅客和船员，提供本地农民和商品掮客蓬勃的商机，也让统治者和朝廷有源源不绝的税收收入。它也使扶南成为重要商业据点，到了西元第二世纪，它成了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及东南亚各地商人荟萃

的枢纽。虽然中国的势力极大，提供给扶南文化和政治启示的却是印度。扶南的统治者接受印度教，取印度名，向印度汲取政治思想。甚至它的市镇规划显然也走印度路线。

扶南只是南中国海四周在西元头一千年崛起、兴盛，再繁华退尽而没落的许多帝国、酋长国和采邑之一。它们的歷史迄今仍浑沌未明：既有待考古学者的挖掘，也需要从中国及其他文献中去爬梳。通常我们只在回忆录中看到它们，是别人所记录的它们。我们往往从今天心心念念的角度去看它们：想透过古时候国界的变动和人民的迁徙去追踪现代国家的谱系。但是我们现在的疆界和认同意识对于实际生活在当时的人并不具任何意义。譬如，歷史学者麦可．邱哲明（Michael Churchman）提出，汉、唐时期（西元前一一一年至西元九三八年）的文献并没有针对「华」（Chinese）和「越」（Vietnamese）做语言学上的区别。把现代国家认同意识安置到古人身上的是十九、二十世纪的歷史学者。註8法兰西帝国行政官员企图界定清楚他们的领地和「中国」的边界时，法国歷史学者同时把古人分为不同类别，把他们的姓氏写为中式或越式。

今天的中国和两千年前的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文献上的「粤人」或「越人」全住在南方沿海，包括今天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他们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短暂被秦朝征服，但秦朝国祚仅有十五年即溃崩，南方沿海重获独立约一百年。直到西元前一一一年，南方又併入汉朝版图——即使如此，本地区大体上维持约一百年的自治。在西元后初期，汉朝施加比较直接的统治，造成偶有叛变，中央必须出兵惩治。这种含煳的控制状况持续到西元二二○年汉朝覆亡。汉室倾覆，中国分裂为三，孙吴接管了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但是孙吴只维持到二六五年，就亡于北方的晋朝。仅仅八十年，晋朝于三一六年被迫退出华北、南迁，于四二○年灭亡，中国出现一系列南方国家。

这段时期的「中国」究竟在哪里？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说法，中国歷史学者往往「以文明假装是国家」，一个控制东亚大地上千年的悠久文化。註9从南中国海的角度看，这个说法就不成立。几百年来，控制南中国海北岸的王朝和人民，与控制「中国」内陆地区的王朝和人民并不相同。北方王国向内观照，南方王国则把目光投向外。他们直接连结海上贸易网络，透过它们接上扶南及东南亚其他地区。

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扶南具有两样东西，后来证明是东南亚每个成功的贸易中心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与印度及中国南方的统治者维持友善关系。在危机时期，特别是政治变动之后，扶南会派遣使节到中国，设法维持它做为优惠贸易伙伴的地位。扶南使节会「进贡」以利磋商。朝贡关系效用极大。有些民族主义的中国歷史学者主张，它证明东南亚社会是中国皇帝的藩属。中国的古籍往往以这种方式记载。然

而，当代东南亚的记载则不把「朝贡」视为主、僕之间的一种封建关系，认为它只是贸易伙伴关系。中国统治者欢迎这种「朝贡」，视之为外国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利。朝贡既确保在国外有良好关系，又可以象徵性地强化统治者在国内对付潜在敌手的权力。对于「朝贡国」而言，这只是要取得进出中国口岸港埠所需的形式。扶南基于这种「朝贡关系」的地位，成为其势力范围之内富人、以及在远方的富人的守门人。

将近三百年期间，尽管有敌人竞争和攻击，扶南似乎主宰南中国海的贸易。它运用外交和武力维持地位，应对长程海上贸易的起伏兴衰，直到四世纪中叶。大约此时，中国港口徵收高额费用、贪渎横行，伤害到贸易，失业的商人转身成为海盗，而相互竞争的贸易商学会绕开马来半岛，结束了扶南对克拉地峡的控制。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商人开始绕过扶南，直接与更北方的港埠打交道。扶南逐渐被它的对手抢走光彩。等到西元四二○年晋朝覆亡之后，海上贸易復活，其他港埠、尤其是更靠近北边的占城的港口抢走生意。

扶南留下的遗迹不多，占城则不然，许多红砖塔楼散布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各地。它们的印度形象十分明显；甚至「占城」这个名字似乎都借用自印度一个王国。占城的根源可溯及到石器时代的沙萤文化，索尔海姆把它认为是南岛民族网络的一部分，它的繁荣就和在它之前的扶南一样，建立在海上贸易和内陆商品出口的结合这个基础上：象牙和犀牛角是它的森林能够提供的最具异国色彩的两种产品。占城不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比较像是沿着海岸一些河谷的屯垦区的集合体，并共同承认一个统治者。在它歷时一千年的歷史中，权力经常在不同河谷流域之间移动。

占城罕有和平时期。它是在第四世纪末期与中国的合法贸易式微后的海盗乱世中崛起。晋朝灭亡后，华南的新统治者刘宋无法穿越从中国往西方的陆路交通，因此他们必须依赖海上贸易—可是它又受阻于占城的海盗。这个威胁太严重，逼得刘宋于四四六年出兵讨伐占城，夷平其首都。但是刘宋也宣布开放通商，因此占城成为集散地—同时继续宽容、甚至有时亦鼓励海盗行为。大约同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成为华南主要港口，两者之间的贸易—透过每年的季风周期连结—变得大发利市。

但是占城虽然主宰对中国的海上贸易，它并不能垄断一切。其他的贸易口岸也开始发展关系。西爪哇的塔鲁马（Taruma）王国和苏门答腊其他统治者也在西元四六○年派遣使节朝贡。这些地方全有一项共同点：他们全都採纳印度宗教和政治文化的元素：先是印度教、后是佛教。王国以梵语曼达拉（mandala）□□法轮—自称，统治者即是法轮大王（cakravartin）。他们以网络的中心自居，不是具有固定疆界的国家

之君主。他们的正当性比较不是出自实质控制领土，而大多出自其他统治者的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比较弱小的中心可能向不只一个曼达拉效忠。但是这种正当性必须靠军事力量支撑。为了保持中央地位，曼达拉在必要时需要能够强迫从属政体听命行事。

使用「印度」方式统治，以及印度宗教在本地区持续传布，乃是西元第一个千年东南亚和它西方各地有强大贸易关系的证明。香木、树脂、黄金、香料，甚至奴隶，都有极大的需求。证据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这段时期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与印度各王国的商务关系，显然比和中国的往来更加密切。和中国的贸易在六世纪末尤其衰颓不振。不过，唐朝在六一八年建祚，两百年来首次统一南方，南中国海的贸易似乎又再度起飞。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迎接其他曼达拉的崛起。这是「印度化」文明的伟大时期：占城、三佛齐和吴哥，此地兴建的石碑令欧洲殖民者惊嘆不已，直到今天仍然令我们啧啧称奇。

当占城偶尔仍会出现海盗行为之际，更往南方的苏门答腊东南岸出现一个更为可靠的贸易伙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了解的三佛齐几乎全来自中文记载。即使它的地点也很神秘。一直要到一九九三年，法国考古学家皮耶─伊扶士．曼奎恩（Pierre-Yves　Manguin）才能够证实早期的猜测：三佛齐位于今天印尼城市巨港（Palembang）附近穆西河（Musi　River）沿岸。令人哀伤的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其大部分遗址现在被埋在PIHC肥料厂地底下。这家公司旧名PT　Pupuk Sriwijaya，但是即使这个古城的遗迹也不见了，就像这家公司在一九六○年代不知情之下毁坏了其遗址。

三佛齐是个典型的曼达拉──在东西主要贸易路线上一群贸易据点当中最主要的大国。从它的基地出发，它控制了北边麻六甲海峡与南边巽他海峡两者的交通进出。西元六八三年，它有一支两万多人的军事力量──其中许多人或许是游牧性质的南岛民族，他们可以做生意，也能替统治者作战。註10东西海上贸易若不经过三佛齐点头同意，根本就行不通。它的势力强大到中国唐朝在六八三年第一次派遣使节下「南洋」──东南亚诸岛──俾便两国修盟交好。註11三佛齐实质上成为唐朝在本地区的守门人。

开放与锁国：歷来中国的海洋政策

海参（印尼文trepang）做为珍馐和药品从东南亚出口到中国，至少已有两千年之久。因此，一位搜寻海参的潜水伕凑巧有个发现，它大大改变了我们对南中国海贸易史的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一九九八年八月，这位潜水伕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北方海岸约两公里处的海床搜寻滑熘熘的海参时，发现有块奇怪的隆起物。结果它是一艘载了五

万五千多件中国陶器的阿拉伯单桅帆船──这批货最后卖了三千二百万美元，只不过他和印尼政府都分不到一杯羹。陶器的记号显示这艘船在西元八二六年、即唐朝中叶沉没。它成了最早的具体证据，证明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有直接的海路贸易。

所有的歷史学家所要追寻的就是证据；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字记录，东南亚却缺乏歷史记录。很少文件流传下来，靠海边的定居地已被大水冲走，热带气候加上昆虫噬咬，纵使有些文件，也大多毁损。湮灭的大城市固然有些可资参考的碑铭，但是歷史记载仍有许多不足的漏洞。填补漏洞最好的机会是发现实体的文物。最小的细节，从贝壳的分子组成、到造船技术，可以解释人们如何移动、往哪里移动，他们吃些什么，他们居住的社会型态，以及他们彼此的互动关系。因此现代考古学家非常吹毛求疵详细记录他们的挖掘细目：一艘船活动空间的布置可能点出文化及船上众人的阶层关系，载货的安排可能透露它到访港口的顺序。每一片证据都很有用。甚且，唯有将发现确实记录，并且开放供检视及重新诠释，同行才会认为你的诠释有效。勿里洞岛沉船完全没有做到这一切；至少一开始完全没做到。当时有更紧迫的其他优先事项。

在那位海参潜水伕取了几只碗在市场上出售之后，消息很快就传开。一家本地公司「大洋之子」（Sulung Segara Jaya）从印尼国家沉船打捞委员会取得许可捞起沉船。它很快就找来德国营建工程师兼海底探险家提尔曼．华德方（Tilman Walterfang）经营的海床探险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做伙伴。两家公司迅如脱兔。他们从痛苦的经验得知，如果手脚不快，现场很快就会遭别人掠夺。一九九八年八月，印尼正在崩溃中。苏哈托将军已经下台，在动乱中上千人丧生，分裂活动大炽，外侨携带鉅资逃离印尼。华德方留下不走，他的财富仍然躺在海底下。他们在九月、十月拼命搬移船货，直到季风来了、无法安全作业为止。果如他们所担心的，本地的寻宝人几乎立刻抢进。华德方另外委託东主是麦可．佛列克（Michael Flecker）的一家海洋探险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s）在新年打捞其余船货，并进行比较科学化的研究分析。佛列克已在本地区打捞过数十艘沉船，也具有海洋考古学博士学位。

我们现在知道勿里洞岛沉船上的陶器是在中国至少五个不同地方大量产制，它们从中国沿海辗转运到广州，然后装上类似今天阿曼（Oman）仍在使用的一艘船上，它用的是原来生长在中非洲和印度的木材所制造。船员可能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马来人的混合兵团，船货的最终顾客是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王国（Abbasid Caliphate）的权贵及中产阶级。船只从广州顺着季风往西南航行，或许途中停靠、补给食物和清水，却在三佛齐势力范围内触礁沉没。那么，这批船货该合法归

谁所有？在华德方看来，答案再简单不过：非我莫属──以及任何预备出价向他购买的人。在陶器被送去保存、清理，船只遗体接受检查以便判断它原始来自何处之下，争议开始出现了。

到最后，只有新加坡最热切争取，付了华德方所索讨的价钱。抢购这批船货的幕后推手是潘美莉亚．李（Pamelia Lee），时任新加坡观光局长、李光耀总理的弟妹。她回忆说：「我以为该是新加坡关注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时候了。和其他国家经济发达之后一样，你必须注重建立根源。」註12潘美莉亚．李希望将船货陈列在圣淘沙岛正在规划的大型度假村，吸引观光客来欣赏，最后就能赚回投资。二○○五年四月，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所属国有事业圣淘沙公司，宣布同意以三千二百万美元向华德方的公司买下全部船货。东南亚巨富、金融及旅馆业大亨邱德拔认捐一半费用。这笔交易被形容是圣淘沙要兴建一座崭新的的海事博物馆，以陈设沉船文物的计划的关键。

二○一一年初，海事博物馆还在兴建，某些「唐代沉船珍宝」已借给位于新加坡海滨的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ArtScience Museum）公开展出。当时的计划是在次年将展品移到华府史密斯松尼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可是，这时候有一群美国考古学家跳出来干预。他们很愤怒，竟然准许一家私人公司挖掘如此罕见的宝贵场所。有些人甚至指控史密斯松尼博物馆纵容掠夺。这变成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之间的大辩论：前者坚持每个个案都要遵守最严格的考古规范；后者则认为现实世界的掠夺和考古财务问题，需要有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法。二○一一年四月，史密斯松尼退让，取消展出计划。华德方指控批评他的人是「趋炎附势者」，「玩弄另一种政治游戏」。註13双方关系迄今一直没有改善。

更惨的是，圣淘沙的「海事博物馆」（Maritime Experiential Museum）也冷落唐朝宝物。他们馆里已有从其他遗址找到的宝物，但是没有一件来自勿里洞岛沉船。本书写作时，船上打捞出来的宝物只有一小部分公开展出，少数情况是借给原本属于邱德拔先生的新加坡良木园酒店（Goodwood Park Hotel）展出。看来新加坡人对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桩考古学大发现，兴趣缺缺。潘美莉亚．李对于堪可比拟为现代扶南和三佛齐的这个岛国的人民不能了解这批古物的重要，十分失望。她叹息说：「我以为未来有那么一天，当他们有了最好的科技产品时，就会想到要去找些截然不同的稀世珍品。」註14但是这里头或许富饶另一层深义。新加坡人似乎不仅没感到他们「拥有」这批宝物，且尽管全国的生存依赖海上贸易，他们也没有拥有海洋的意识。新加坡是个商贸集散地，靠着经过其海港的东西向潮流发达起来，但是这并没有使它的老百姓对此资源产生休戚与共的意识。

除了它的现代意义之外，勿里洞岛的发现向考古学家证明了在唐朝（西元六一八至九○七年）中叶，南中国海的贸易已成为高度整合的出口产业。中国许多地方的生意人为特定市场设计专属产品（应需求而饰以佛教的符记或是《可兰经》的文字），并且大量生产。地方代理商再把商品经由陆地、内河，运到沿海集散地，接下来由外国商人负责长程运送。国内制造商和对外贸易商彼此的分工十分清楚。

唐朝官方采取特别措施来鼓励这种关系。它早早就下令替抵达广州的外国人准备补给品；还设置正式官职监督贸易。马来贸易商（或许就是南岛民族）偕同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印度人，大量移居到广州。他们带来其母国最精缴的产品：波斯的珍珠、地毯和矿石（包括用在给瓷器上釉的蓝彩）；阿拉伯的乳香、香树脂和枣子；印度的珠宝和玻璃器；以及东南亚的香料和香水。他们以之交换中国的瓷器、丝绸和金属品。从广州到巴格达的海上丝路，中间经过三佛齐和斯里兰卡，成为连通阿拔斯王国与大唐的超级公路，为能够控制它的人创造了巨大财富。

在唐朝，贸易专属朝廷管理，且只有指派的官员可以处理进口事宜：宦官们无所不用其极地索贿并压榨贸易商。贪渎日益严重，直到西元七五八年十月发生暴动。波斯和阿拉伯贸易商洗劫这个城市，弃之而去。今天越南红河三角洲（名义上归唐朝统治，但大体上自治）的统治者逮住机会，他们在龙边（Long Bien）的港口有好几十年成为贸易集散地。但是，勿里洞岛沉船于八二六年由广州出发时，广州肯定已经恢復其地位。但是几十年之后，即八七八年，反唐叛军占领广州。有一份阿拉伯人的记载说，叛军锁定城里头的外国居民，屠杀数千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即使如此，其余外国贸易商似乎仍留驻他们在沿海的据点。

但那场叛变只是冰山一角。西元九○六年，唐朝灭亡，藩镇割据，沿海地区又成了独立状态。影响所及，整个区域彻底变化。西南海岸，广州周围地区自立为南汉国，后来红河三角洲统治者又由它分裂出去，组成大越国。大越日益壮大，与占城相争，最后征服了占城（经过一千年的发展，成为今天的越南）。

东南沿海，即今天的福建省，出现闽南国。由于脱离北方，闽南国拥抱海洋。十世纪时，它成为完全海上贸易的国家。泉州港从默默无闻逐渐兴起成为冒险家蜂拥而至的地方，也吸引了来自中东的商人。经过和外国一千多年的贸易往来，今天我们称为华人的民族，首次坐上自己的船跨海南下。註15这是当地航海传统的开始，福建人一尤其是闽南人和客家人一今天已遍布南中国海及世界各地。

经过六十多年的独立，华南在西元九七○年又纳入宋朝版图，宋朝首都设在北方的开封。宋朝对待海洋的态度起初就和传统的内陆统治者无殊，视之为威胁的源头。海洋是「坏分子」──不论是私枭或政治对手──藏身之地，也是外国思想可以宣传之地。九八五年，朝廷下诏，严禁所有商人出洋旅行。宋朝仿前人之制，由国家垄断贸易。民间交易受到禁止，迫使外商透过官方管道进口货物，朝廷藉此可就船课税、对进口品徵收关税，也可没收部分船货，再靠转卖给国内消费者赚取利润。

可是，不到几年，宋朝就来个政策大转弯。九八七年，朝廷派出四个使节团出国，鼓励外国与中国通商。这还不够。朝廷遭受四面八方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加放松管制：沿海商人希望能赚取利润；消费者想买舶来品；户部需要税收来支撑官僚体系。九八九年，民间船只准许出海通商。最后，经过数百年来只做进口、不做出口贸易之后，中国商人正式获准做出口生意。政府还给予税负优惠。进口货依律被政府徵收一部分，现在减半优惠，后来又更进一步降低抽取成数。造船工匠学会打造能走远洋的船只。他们效法中国内河船只的隔水舱和船尾舵技术，也兼採进出中国港口已有数百年之久的马来船只的长处。甚至他们给这些船只取的名字──舶──也是出自马来语。

西元一○六九年，王安石变法革新，藉由刺激贸易、打算增加政府税收。最初，他实验性地採取了自由经济政策，调降进口税，贸易的管理下放到各个港口。结果成效斐然：二十年内，贸易值倍增。另一项改革也产生长远的效果。朝廷取消不准铜币外流的禁令。铜币迅速在南中国海的通商网络流通，远及苏门答腊和爪哇都以宋朝铜币做为交易媒介。

到了一○九○年，中国船只获准可以从任何港口出航，使得人人都可以从贸易分一杯羹。此举也让福建贸易商打进原本由外国人垄断的生意。他们也和外国商船一样，必须顺着季风走、必须守在外国港口等候风向转变。停留期间，他们开始扎根：兴建保佑出海人的妈祖庙，也闢建雏形的唐人街。纵使如此，政府还是保留若干禁令。譬如，中国船只只准离港九个月，正好是一个季风周期。他们最远只能到达苏门答腊，就得启航回国。再往西行的印度洋贸易仍然由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三佛齐人的船只控制。可是，冒险心更强的中国商人也开始不顾禁令，往印度及波斯湾推进。

但是，宋朝在国内面临愈来愈大的压力。一一二六年，北方领土被来自满洲的女真人占领，宋朝迁都到华东沿海的杭州。在危机中，朝廷禁止船只出海、停止几乎所有奢侈品之进口（因为象牙被用以制作官员的腰带扣，是少数的例外）。但是，这个危机至多也只有六年之长，朝廷旋即又开放贸易。十四年之内，贸易政策差不多全恢復到危机之前的

状况。贸易之需排山倒海而来。到了一一六○年代，泉州外侨侨民人数极多，多到需要特设墓区。这些贸易商大多是穆斯林，伊斯兰此时已在占城生根，他们与中东的穆斯林以及中国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都保持密切关系。

南宋国祚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总括起来，从九○六年大唐灭亡到一二七九年南宋亡国这段期间，可谓是南中国海四周商业的「黄金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变化，以及伊斯兰商业的成长，促成了贸易大兴、财富剧增。註16这时最强大的占族国家佛逝（Vijaya，又称毘阇耶）富甲四方，而原本强大的三佛齐在一○二五年遭到印度南部注辇王国（Chula，又称朱罗）入侵之后国势衰败。这一来，苏门答腊、爪哇、峇里、婆罗洲和东南亚大陆的其他港口纷纷崛起。菲律宾的岛屿（中文书籍称之为武端和麻逸）也开始被记载为贸易实体。一九八一年在菲律宾民答那峨岛东北角的苏里高市（Surigao）发现极大量的黄金宝藏，显示此时已有非常有钱的印度化菁英落脚居住在该地。

新商品相互流通交易，愈来愈多的人和地区加入此一区域贸易体系，也隐然有全球通商之势。但是，到了十三世纪末，繁荣似乎要泡沫化了。一二七五年，三佛齐主要港口詹卑遭到来自爪哇的敌人摧毁。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南下攻进南宋领土。到了一二七九年，蒙古人终于征服福建和广州，似乎引起区域贸易开始式微，不过它还是撑到大约一百年之后元朝覆亡之时。蒙古人的元朝想要扩张势力，可是南中国海却变成冲突频频的战场。元世祖忽必烈派舰队南下十四次，尤其针对占城和爪哇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可是，没了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元朝本身财库空虚，维繫不了国祚。到了一三六八年，蒙古人被扫进歷史的垃圾筒。

明朝登场。它几乎立刻就想废除民间海外贸易、完全恢復国家垄断。贸易关系捨弃公开市场，正式恢復「朝贡」办法，广州被指定为来自东南亚船只的合法通商口岸。但是经过将近四百年来中国民间商人的营运，以及已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建立起的代理商架构与家族网络关系，非官方的贸易一直没有被消灭，特别是福建商人彼此的交易往来。后来，走私十分猖獗，特别是华侨懂得利用「朝贡」贸易做掩护。最后，明朝弃海洋、专注内陆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却有一段为期三十年最壮观的发扬大汉天威的「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壮举。

中国式考古

澳大利亚歷史学者韦德（Geoff Wade）是明史专家，对《明实录》研究尤深。如果你想惹韦德生气，只要跟他提作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和他写的那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就行了。提起这本大谈中国太监郑和丰功伟业的书，韦德不免就要痛批一番。他嘲笑说，孟席斯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就是全书上下没有一个主张有事实根据。他宣称环绕地球的这位太监水师大帅其实行踪从来没有超过非洲；没有任何中文、外文文献可以支持他航行全球的说法；超出亚洲，从来没有过中国沉船遗骸；超出亚洲，也从来没有明人屯垦之地或建物。如此天马行空的虚构之作还能出版，且被当成非小说行销，不但孟席斯先生千不该、万不该，他的出版社更是罪加一等。」註17韦德或许是怒气旺盛，但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孟席斯的着作一般都是这样评价。

孟席斯的叙述或许大部分出于「创作」，但是郑和毫无疑问是个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他是云南的穆斯林，在明朝征伐时被俘，去势之后做了太监，并协助明成祖夺得皇位。郑和现在家喻户晓，因此我们很难相信有很长一段时候他默默无闻。转折点在一九八四年，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发表讲话，以郑和为代表人物来支持他的与西方交往的开放政策。此后，郑和成为北京「和平崛起」政策的样板人物，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典范。二○○四年，负责筹备盛大庆祝郑和首航下西洋六百周年活动的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总结官方对其成就的看法：「这都是友好的外交活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占领一块土地、没有建立任何城堡，也没有夺人财产。在商贸活动中，他秉持多给少取的作法，因此受到沿途各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许。」註18

然而，韦德表示，这样评价郑和其实几乎和孟席斯一样混淆视听。韦德研究《明实录》后发现，从一四○三年至一四三○年期间，不同的宦官总共率舰下西洋二十五次，其中只有五次由郑和率队。大部分航程是到东南亚，但郑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的舰队走得更远，进入印度洋。韦德声称这些航行不是和平出访，而是清楚展示威力。每只远征──出动船舰在五十至两百五十艘之间──载了超过两万名士兵，配备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其目的显然是要威镇四夷。他在一四○五年奉令首次出航，曾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停过，在当地追缉明朝亡命之徒陈祖义，这一役据史书记载死了五千人。在同一趟航程中，郑和舰队在爪哇与一支军队交战；韦德研判这支军队可能是当时与中国争夺南海霸业的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部队。一四一一年另一次航程，郑和攻打斯里兰卡某个城邦，摧毁其军队后册立一个傀儡统治者，并把国王带回中国。一四一五年，他介入苏门答腊一场内战；另外也有记载显示他的部队在阿拉伯半岛有施暴行为。註19

韦德认为有那么多统治者和使节随着郑和舰队到中国，代表他们是被胁迫而去的；而这种威慑使得明朝得以控制港口和航道。一四○五

年，郑和在开埠才三年的麻六甲建立城寨，使得明朝军队控制了麻六甲海峡。他则以册封其统治者为王做为报酬。明朝舰队屡次下西洋的整体目的有二：一是控制贸易路线，一是透过强迫外国统治者朝觐，让僭夺帝位的明成祖在国内取得正当性。这可和北京所宣传的「和平友好的杰出使节」形象相去甚远。这一「砲舰外交」只持续了三十年。朝廷大臣心生嫉妒而抑制了宦官的权力。政策重心转向国内：郑和的海图烧了、船舰听任锈烂。一直要到五百年后美国人送了一条船，中国再也不曾拥有能够开到南海诸岛的军舰。

但是中国共产党深谙神话力量比史实强大之道，只要需要在东南亚畅论「海上合作」、或在东非称颂投资交易，它就把和平使者郑和端出来。「正史」在共产中国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走一趟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晓得了。它强化中共统治的权力，并且抹黑敌人。一旦某个特定的歷史论述成为党的教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西元一九八六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成立一个「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管理。之所以会有这个决定，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深怕远处沉船的文物的「所有权」会输给外国资金雄厚的淘宝人。但是其实它别有用心。该中心第一次出海打捞就跑到中国人占领、但越南人声称它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去。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心主任张威宣布，打捞人员找到一千五百件可上溯至西元九○七年的古物，「证明中国人是〔西沙群岛〕最早的居民」。不受共产党指挥的考古学家闻言捧腹大笑。九○七年时唐朝刚覆灭，沉船是有可能由刚独立的闽南国开出的船只。然而，船只也颇有可能属于马来人或阿拉伯人。当时整个区域、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中国瓷器的买卖交易。任何岛礁出现陶瓷都证明不了中国古时候拥有它，就好比中国安阳某个青铜时代坟墓找到数千个子安贝（cowry shell），也不能就说是河南省该属于菲律宾所有。

不过，中心主任张威又不是被聘来担任歷史证据的公正、独立分析人员。二○○五年，张威在向「国际文化纪念物与歷史场所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介绍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时说明，该中心准备「在南沙群岛进行一两项打捞沉船项目」，「打捞的结果可以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不容争辩的主权」。[註20]该中心和中国外交政策可说是共存共荣。它拥有的预算是本区域其他考古学者做梦都不敢想像的宽裕。[註21]光是它在青岛的「研究基地」就花了两千四百万美元兴建，而它还在湖北、海南和福建分别设置其他研究基地，另外它也拥有一艘全新的研究船。[註22]在珠江口的「南海一号」沉船打捞项目预算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当然要效忠服务国家、肝脑涂地以为报答：努力寻找「证据」以佐证正史，并强化中国对南海拥有不容争议的主权之论述。

其他国家的水下考古学家发现在南中国地区愈来愈难研究不同的论述。二○一二年四月，马尼拉国家博物馆组织的一支法国、菲律宾专家联合小组正在黄岩岛，也就是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西方二百二十公里处调查一艘沉船。他们住在「萨兰甘尼号」（*MV Sarangani*）上，并严守规范：只探勘遗址地点，不做商业用途，且希望将发现结果公诸于世，接受各方批评指教。但是这时候出现一艘中国海监船（Chinese Marine Surveilance），命令他们离开━理由是沉船归中国所有，只有中国考古学者才准到场调查，这样他们才好又找到「证据」证明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尽管阻碍重重，维克多．帕兹、彼得．贝尔伍德、威廉．索尔海姆、皮耶━伊扶士．曼奎恩及其他考古学者已搜集到足够证据，对南中国海可以讲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故事：它是一个多种语言交流与贸易的地方，当时的主权问题与今天有天壤之别。直到十六世纪之初，一连串印度化的曼达拉主宰着海上东南亚。每个权力中心没有清晰的先后继承关系。他们的崛起是渐进的，衰亡也是渐进的，而且有很长一段时期同时共存━有时和平相处，但经常兵戎相见。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国从一世纪到四世纪盛极而衰；占城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从第六世纪到十五世纪国力鼎盛；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则从第七世纪到十二世纪称霸一方；吴哥则由九世纪初到一四三○年代驰骋于湄公河下游；爪哇的满者伯夷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雄踞一方；位于马来半岛的麻六甲崛起于十五世纪初，直到十六世纪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南中国海北岸、即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块地方，其统治势力偶尔会干预其他政治体的事务━但这种情况少有，且为时不长。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以号称「拥有」南海。据说，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告诉越南领导人黎笋说，南岛各岛「自古以来即属于中国所有」。註23这句话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首度公开出现在中国三份刊物上。註24从此以后这句话不知道被重复了多少次，但是检视证据之后，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所有权的意识不是自古有之，而是非常晚近才出现。

註4：Atholl Anderson, ‘Slow Boats from China: Issues in the Prehistory of Indo- Pacific Seafaring’, in Sue O’Connor and Peter Veth (eds), *East of Wallace’s Line: Studies of Past and Present Maritime Cultures of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Rotterdam, 2000) (*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 16), 13–50, plu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註5：译注：旧时指涉今日大约是东南亚地区的名称。

註6：‘Histo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Nansha Is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7 Nov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

註7：Pierre- Yves Manguin, ‘Trading Ship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36, no. 3 (1993), 253–80.

註8：Michael Churchman, ‘Befor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n the Red River Plain: The Han–

Tang Period',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 4 (2010), 25–37.

註9：Pye, Lucian W.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1 Sept. 1990. Web. 17 July 2014. ＜https://www.jstor.org/stable/20044496＞.

註10：Wilhelm Solheim,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Unraveling the Nusantao* (Quezon City 2007), 74.

註11：Derek Heng, *Sino- 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2007).

註12：个人採访。Singapore 1 June 2012.

註13：Kate Taylor, 'Treasures Pose Ethics Issues for Smithsonian', New York Times, 24 April 2011.

註14：个人採访。Singapore 1 June 2012.

註15：「中国」（China）一词的起源有可能来自于东南亚。See Chapter 3 of Anthony Reid,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2011), and Geoff Wade, 'The Polity of Yela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me "China" ', *Sino- Platonic Papers*, no. 188 (May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sino-platonic.org＞.

註16：Geoff Wade, '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900–1300 c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9), 221–65.

註17：个人电子邮件通信。12 December 2013.

註18：Quoted in 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ARI Working Paper*, no. 31 (Octo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s://ari.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10/wps04_031.pdf＞.

註19：Ibid.

註20：Zhang Wei, 'The Problems Encounter [sic] in the Protection of UCH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5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Symposium in Xi'an, China, 17–21 October 2005. Available at ＜http://openarchive.icomos.org/id/eprint/463/1/4-45.pdf＞.

註21：Jeff Adams, 'The Role of Underwater Archaeology in Fram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Strategic Agenda', in Tami Blumenfield and Helaine Silverman (eds), *Cultural 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 (New York, 2013), 261–82.

註22：'China Starts Building Base for Researching Underwater Relics', *Xinhua*, 17 March 2012.

註23：'On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 *Beijing Review*, 24 August 1979, 24.

註24：Chi- Kin Lo, *China's Policy Towa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C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London, 1989), 94.

第二章　地图与航线：一五○○年至一九四八年

地图上的秘密

二○○八年一月，在远离南沙群岛五千五百海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光线、湿度都小心控制的地下室，罗伯特．巴齐乐（Robert　Batchelor）打开将剧烈改变我们对南中国海歷史之了解的一份文件。它是一张地图，一公尺半长、一公尺宽，涵盖今天我们所谓的东亚和东南亚：从东北边的日本、直到南边的苏门答腊和帝汶。它也是一件艺术品。它在图书馆已有三百五十年之久，许多人都夸赞它精雕细琢的「山水」画：淡绿的海点缀着竹、松和檀香木；山川和植物栩栩如生。但是巴齐乐发现的是──数百年来都没有人注意到──从华南的泉州港伸出一组淡淡的线条。这些线条把泉州和本地区几乎每个港口都连结起来：从长崎到马尼拉、麻六甲，甚至更远。更令人意外的是，每一条线都标出航行指示：中国罗盘方位和距离。

巴齐乐是个美国歷史学者，他所重新发现的是亚洲贸易公路指南。它推翻了传统上认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个内观、孤立主义大国的印象。它呈现的中国是和大洋有互动，且透过海洋走向广大世界。它也呈现出这个地区不受正式边界囿限，各个王国和采邑都互相有来往。这幅地图出现的时代，各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和今天划分本地区的疆界，具有南辕北辙的性质。它出现的时代，由于在世界另一端的帝国之间争战不休、思想家之间也爆发辩论，国界的性质正在开始改变中。这些战争和辩论都替现代国际法奠立基础，也赋予疆界新的定义，而它们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南中国海。

这张地图本身的经歷就说明了一切。它显示出早在一六○○年欧洲和亚洲就有紧密的联繫。地图的主人约翰．薛尔登（John Selden）是十七世纪英格兰最为重要的法学界人物之一，一六五九年他过世之后把它赠送给博德利图书馆。薛尔登留下的遗嘱中说，地图得自于「一位英国司令官」，不过他并没有指出其名氏。经过多年研究后，罗伯特．巴齐乐认为他知道是谁。一六二○年夏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伊莉莎白号」在台湾停泊时发现有一艘船──中国人的或是日本人的──乘客当中有个葡萄牙领航员和两位西班牙传教士。伊莉莎白号船长艾德蒙．林迈世（Edmund　Lenmyes）以此做为理由抢占这艘船及其船货，而巴齐乐相信地图也在其中。註25薛尔登在其遗嘱中说，这位英国司令官「受到极大

压力要收下重大赎金并交还它」，但是他坚拒把它还给其主人。这位司令官一定是立刻就认识到它的价值。

我们不知道约翰．薛尔登如何取得这张地图，但是他曾经是国会议员，熟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投资人。註26罗伯特．巴齐乐相信地图在经过相当波折之后于一六二四年来到英格兰。或许是以战利品出售，或是当做礼物呈献给某个大人物。约翰．薛尔登可能是个理想的受赠者。他是英国政治、贸易界的核心人物，又是法学思想先驱。今天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提供了某些最早的法律论据，供各国对其沿岸海域提出领土主张。大家所不清楚的是薛尔登的贡献虽是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基础，却起于对一种小型鱼类的争论。欧洲鲱鱼的命运竟与争夺通往亚洲的管道绑在一起。这是涉及到海上自由、自由贸易和主宰世界经济的争战，而导火线在于一个世纪以前的发现。

发现通往中国之海

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一四九八年五月抵达印度，起先还顺利，但是关系很快就恶化。身为第一个自欧洲远道而来的航海家，起初他颇有名流地位，但是他从葡萄牙带来的礼物，没让卡里卡特（Calicut，明朝古籍称之为古里）国王札莫林（Zamorin）看得上眼。和札莫林习见的丝绸、象牙和黄金一比，达伽马送的红色斗篷、帽子、油和蜂蜜，还真寒酸，几近侮辱。更糟的是，已经经手处理卡里卡特对欧洲贸易事宜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深知达伽马将会构成威胁，所以共谋要排挤他。札莫林请他走人，而达伽马不了解季风，好不容易挺过风浪回到葡萄牙，已折损了三分之二船员。纵使如此，他载回国的香料在支付他的征途费用后还绰绰有余，贊助远征的金主曼纽尔国王（King Manuel）龙心大悦。藉由船只绕过非洲，葡萄牙商人现在可以绕过异教徒阿拉伯人，也可以打破扼守东地中海的威尼斯商人原本享有的垄断贸易地位。

运用一趟船运把香料和其他奢侈品从亚洲运回欧洲，可要比靠着阿拉伯人和威尼斯商人联手、结合多次短程陆路车运的传统路线，来得既便宜、又安全。葡萄牙人设计的兼载货物、砲弹的军舰（carracks）很快就主宰了贸易。短短几年内，他们在果阿（Goa）取得基地，找出从卡里卡特继续向前的航线，进而跨越孟加拉湾、来到麻六甲海峡—进入香料群岛的门户。不幸的是，麻六甲苏丹无意让他们经过，他的统治靠的就是向穿过今天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海峡的船只课税、收钱。麻六甲是新兴的区域商贸集散地，承续扶南和三佛齐的地位，且是满者伯夷的劲敌。这座城市住了许多外籍商人，做起他们祖国和已知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仲介人。它至少有十万名居民和过客熙来攘往，包括马来

人、泰米尔人（Tamils）、古吉拉特人（Gujaratis）、爪哇人、中国人和吕宋人。

葡萄牙派来特使于一五○九年晋见苏丹，送上比达伽马在十年前送的更丰盛的礼物，替葡萄牙人争取到一块据点做生意。可是，其他商人反对—尤其是古吉拉特人—他们说服苏丹以叛变罪名逮捕基督徒。一五一一年六月，葡萄牙砲舰在阿方索．狄．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下抵达。谈判进行期间，他的间谍已经明察暗访搜集城市防务情报，也和华人商人拉拢关系。苏丹拒绝释放被他抓走的人，阿尔布克尔克在圣詹姆士节动手进攻。两星期后，苏丹逃了；麻六甲于一五一一年八月十日落入葡萄牙手中，自此一连一百三十年受它控制。

阿尔布克尔克的舰队里有个三十一岁的青年军官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在战事之后，他可能在城里乱逛，还从吕宋人那里听到一些轶闻。十年之后，麦哲伦改投效西班牙国王，率领舰队试图从东边抵达吕宋及其金矿；一五二一年，他成为第一个横渡太平洋抵达亚洲的欧洲人。和从前的船队一样，起初他们受到热切欢迎：宿雾岛统治者和他的许多臣民改信基督。根据随着麦哲伦而来的学者安东尼欧．皮加斐他（Antonio Pigafetta）的记载，岛民拿出最好的瓷器，可以证明他们早已与中国有贸易往来。麦哲伦带着宗教和火砲抵达，但是他低估了其他岛民反抗基督或西班牙的意志。仅仅一个月之后，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麦哲伦在马克丹岛（Mactan）遇袭身亡。

葡萄牙人也虎视眈眈。他们派出一支舰队拦截麦哲伦，在出产香料的蒂多雷岛（Tidore）附近堵到「千里达号」（*Trinidad*）上的麦哲伦残部，立刻俘虏了他们。歷尽千辛万苦才从西边到达香料群岛（今名摩鹿加群岛）的葡萄牙人，岂能轻易把优势礼让给从另一个方向到达的对手。这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基督徒帝国之间诸多不和之一。为了解决僵局，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把他妹妹嫁给葡萄牙国王[註27]，三年之后亲上加亲，查理五世迎娶了新妹夫的姊姊伊莎贝拉（Isabella）。由于两国王室联姻，出现了一五二九年的《萨拉戈札条约》（Treaty of Zaragoza）。开歷史先例，欧洲帝国自作主张，就在东南亚划界线瓜分势力范围。虽然地图不太精确，大致上就是葡萄牙得到今天成为印尼的香料群岛，西班牙保有今天的菲律宾。五百年之后，对立分化还存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叛变，以及菲律宾不断主张对马来西亚的沙巴拥有主权，导致两国无法就南海边界达成协议，都是从《萨拉戈札条约》遗留下来的结果。

葡萄牙人为了找荳蔻、丁香来麻六甲，没想到瞎闯硬走，竟来到了通往欧洲人当时称为震旦（Cathay）的神秘之地的门口。麻六甲既已落

入掌中，再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阻挡他们东进，明朝中国肯定也挡不了。一个世纪之前，郑和在三十年之内七次下西洋宣扬国威的砲舰外交之后，大明海军已经废了。朝廷只关心北方边境受到的威胁以及国内的财政危机。明朝是歷史上第一个发行纸钞的经济体—也是第一个尝到超级大通膨苦头的国家。不值钱的纸钞养活不了海军。

往后几十年，官方舰队既已废弛，非官方的民间业者崛起以迎合中国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及供应宿雾等地对丝绸、陶瓷之市场需求。这时候中国的贸易照理讲应该是挂着朝贡名义的国有事业。可是华南的福建省却走私猖獗。福建船只载着商品跑遍东南亚，也带走数以千计的福建人在遥远的港埠成立贸易站。他们在南中国海各地成立第一代具体而微的唐人街。註28其中的一些人在麻六甲拔刀相助葡萄牙人—在作战及战后都做其后盾。

受到福建人的鼓励，葡萄牙人继续前进寻找丝绸和瓷器的源头。最早给麻六甲海峡以东水域取名为「中国海」（Mare da China，即the Sea of China）的，就是葡萄牙人。后来他们继续往日本推进，才发现必须称之为「南中国海」以便有别于中国东海岸的一片广大水域。对一般中国人而言，海就是海，但对于文人来说，它叫做南海。

本地的走船人没有欧洲人所讲究的海图这么一回事，只把累积下来的知识写成通航各地的指示。这些指示也包含了相当的神话—特别是有关万里石塘的说法。根据一一七八年中国的一份记载—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靠近大海沉降到无底深渊的附近，水里有一道长堤。葡萄牙探险家接受领航员的劝告，也相信有万里石塘，这道危险的岛礁群散布在今天越南外海。葡萄牙人有文艺復兴科学所能提供的先进工具，但连他们也被骗了。往后三百年本地区的每一幅地图都一再标绘有一个帆状的万里石塘—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勘察才显示，除了在其北端的西沙群岛，根本没有所谓的万里石塘存在。三百年来误信有此一岛礁群岛存在，吓阻了大多数船员不敢冒险进入南中国海中心。

十六世纪之初葡萄牙人所到达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註29，它大部分的南部海岸并非位在北京的明朝皇帝控制得了的。葡萄牙人发现，和福建个别商人来往比起和广州这个官方指定的正式通商口岸的官员沟通容易多了。这时候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特殊商品，而葡萄牙人适得其所。早先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使得商人对纸钞敬谢不敏，要求生意对象以银子付帐。最近的银子来源是距离不远的日本，可是中、日两国关系恶劣，一五四九年明朝还下令严禁两国之间直航。葡萄牙人出现得正是时候，他们成为中间人，穿梭往束于长崎和澳门之间，做起以日本银子换中国丝绸的生意。註30

西元一五六七年，明朝皇帝终于承认无法控制走私，在福建省停止不准民间贸易的禁令。结果是商业的爆炸性勃兴──每次季风起时，会有两百艘船开往南洋。[註31]中国大型民间贸易船队首度在数量上超过在前一千年里控制了「中国贸易」的东南亚贸易商。德国学者安琪拉．萧登汉默（Angela Schottenhammer）告诉我们这个改变如何反映在语言文字上：「海商」（海上商人）这个字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文书记载上，甚至中文对「海」这个字的定义也变了。从前，它暗示是文明与未知世界交会之处。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它失去了神秘的含义，演变成单纯形容地理。[註32]

明朝另一项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一五七○年，政府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下令今后税款必须以银子缴纳。但是中国、日本的银子数量都不足以应付这个需求。银价飙涨到天文数字。天佑大明，这时候远在两万公里之外、西班牙人控制的安地斯山脉的波托西（Potosi）竟然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银矿。

《萨拉戈札条约》允许西班牙人保留他们在菲律宾的据点，一五七一年，麦哲伦的后继者在马尼拉建立贸易基地。他们听说一水之隔的中国银价飞升，遂展开所谓的「阿卡波科交易」（Acapulco Trade）。每年大约一百五十吨的银子坐船横渡太平洋，从墨西哥运到马尼拉，在当地换了从中国来的黄金、丝绸和瓷器。同样地，大量的白银也从波托西往东走，经过欧洲前进。白银在中国的价格──以黄金计价──是欧洲银价的两倍。只要把安地斯山的银子运到中国，换成黄金，把这些黄金在欧洲出售，西班牙帝国就可以赚取暴利──然后就有钱在欧洲打仗了。[註33]与此同时，欧洲菁英快速流行起追求中国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的风气。

面临千载难逢的「白银热」，马尼拉的华人数量暴增，三十年之内激增到十万人。他们大多数来自福建省晋江地区四个城镇。[註34]马尼拉成为南中国海东线贸易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站。除了白银，福建人也带回家未来华南的农业种苗。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来玉米、甜薯和花生，农民发现它们很适宜在华南土壤生长──这下子导致农业革命，人口也为之剧增。

虽然是福是祸还未可知，但那时的中国沿海已和全球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人、马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网络把砲弹和货币的影响传布到全世界各地。到了十六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联合帝国主宰了欧洲对亚洲贸易。但是，帝国从内部开始腐烂。一五八一年，经过二十年的动盪和镇压，荷兰七省统治者宣布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独立。葡萄牙人祭出切断供应亚洲香料为制裁。荷兰人的反制将撼动全世界。他们所缺者就是一份好地图。

信奉喀尔文教派的荷兰人的祈祷，得到让．哈伊根．范．林斯霍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回应。让．哈伊根是个荷兰人，青少年时到了西班牙，然后追随葡萄牙人走船，到过果阿、麻六甲和澳门（这是葡萄牙人能向中国当局租到、最靠近广州的泊船据点）。他夙夜匪懈地抄绘他们的地图和航行指示，直到他的船舱实质上装满了前往亚洲的钥匙。一五九四年，歷经九死一生后他回到荷兰，把它们交给同胞柯内里斯．狄．郝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次年狄．郝特曼组织了荷兰人第一次的东南亚远征军。这是一场灾难。三分之二船员丧生，狄．郝特曼得罪万丹（Banten）苏丹，下令杀人姦淫，然后勉强生还。纵使如此，他证明了荷兰人自己也可以直接与香料群岛做生意。

一五九六年，让．哈伊根把他的知识与全欧洲分享。他的航行日记《旅游记》（Itinerario）和地图很快就译成英文和德文，粉碎了葡萄牙人对如何航行来往香料群岛之知识的垄断。註35对于北部欧洲生意人来讲，这是一箭双鵰的大好机会—既可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又可让个人发财致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授与两百一十六位贵族和商人一道皇家特许状以成立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两年之后，阿姆斯特丹的六家小公司合併，也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荷兰东印度公司既是贸易公司、又是国家的武力表徵—有特许执照与葡萄牙人作战。葡萄牙人岂肯轻易退让。两国之间的竞争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造了东南亚，带给我们一套国际海事法制度，为今日的南海冲突种下了远因。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

到了一六○二年底，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在马来半岛南端建立一个贸易和军事桥头堡。柔佛（Johor）的苏丹是被打败的麻六甲统治者的后裔，也非常不喜欢葡萄牙人。一六○一年九月，十七名荷兰船员企图前往广州、打进对中国贸易，却被葡萄牙人逮捕、处决。现在，他们获悉荷兰人和柔佛结盟，遂下令封锁及砲轰柔佛沿海地区。

一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荷兰、柔佛联手反击。海军司令雅可布．范．黑姆斯克尔克（Jakob van Heemskerk）和他的新盟友获报，有一艘载满了货的葡萄牙船只出现在附近—从澳门开往麻六甲。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圣塔卡塔莉娜号」（*Santa Catarina*）可谓巨船。它载了一千二百担生丝、锦缎和丝绸、七十吨黄金、六十吨瓷器和大量的棉花、亚麻布、糖、香料和木制家具。船上约有一千人，包括七百名士兵、一百名妇孺，加上不少商人以及船员。令人惊讶的是，这样高价值的船只，防卫却少得可怜。葡萄牙人习惯鬻官卖爵、把军官的职位卖给

出价最高的人、而不是最有技能的人；荷兰人则反之，训练精良。註36

日出后不久，范．黑姆斯克尔克的船队（两艘荷兰船和几艘柔佛船）发现圣塔卡塔莉娜号下锚停在柔佛河口（靠近今天新加坡樟宜机场）。他们首先开火撕裂圣塔卡塔莉娜号的大帆使她不能动弹，然后再偶开几砲打她船体（但是又不能太勐烈，以免严重损伤船货）。船只漏水、伤亡加大，船长瑟巴斯提欧．瑟拉奥（Sebastiao Serrao）投降。乘客和船员放弃船只和货物，换取不杀。

当圣塔卡塔莉娜号终于到达荷兰时，贵金属、奢华的织品和精緻的瓷器之数量众多，造成轰动。商人们对东方世界的繁华富庶大为嚮往。船货拍卖后得到三百五十万基尔德（guilder，荷兰钱币单位）—等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半个资本额。但是，这里出现问题。有些股东觉得公司应该集中精力追求获利极大化，别耗费鉅资去打仗。然而，荷兰的政治菁英认为他们的新国家既需要赚钱，也不能不打仗，两者不可偏废。他们需要有个强而有力的说客说服各方。他们向二十一岁的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求教。

格劳秀斯实际上是个名律师。他出生在权贵之家，是公认的神童，十一岁就大学毕业，十五岁觐见法国国王。他做了律师，又奉派担任荷兰的史官（这个职位比较像是今天的政府文宣化妆师、而非学术研究工作）。一六○四年底他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聘来替抢夺圣塔卡塔莉娜号寻求法理根据。他写出的辩护状保护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既是贸易商、又是战士的双重角色，也衍生为奠定国际法基础的两份文件之一。它替荷兰的殖民事业奠定了知识上的基础，也造成欧洲人与东南亚人有关政治权力及领土概念之间的「文明的冲突」。

近年来由于歷史学者马丁．朱利亚．范．伊特桑（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和彼得．博世伯格（Peter Borschberg）两人的研究，推翻了对于格劳秀斯的许多原有认识。他们仔细爬梳格劳秀斯的公私写作，使我们看清楚格劳秀斯绝不是公正无私的政治思想家—他替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说客，且坚决支持荷兰的商业和政治权利。他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点，曲解他人的立场，且理论根据也不牢靠。即使如此，他的着作留下恆久的冲击。

葡萄牙人主张，因为他们「发现」了前往亚洲的航线，因此他们独享和亚洲贸易的权利。在伊比利半岛天主教徒的世界观里，非基督徒的「发现」统统不算数。然而，格劳秀斯提出激进的新路线，即亚洲统治者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自己决定要和谁做贸易。至于葡萄牙统治者主张他们有权决定谁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航行，格劳秀斯辩说，海洋和天空一样，不能被任何国家占领，因此人人可以自由使用它。这些

主张听起来相当现代化且进步开明，但也是出于自我利益考量。它们意在辩护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权与亚洲统治者签订契约。格劳秀斯后来可以主张这些契约合法地排除了其他人，也合理化有权使用武力对付企图阻碍航行或背信毁约的任何人。

格劳秀斯在幕后的游说成功，但是他的论证并未公开，直到一六○九年才以匿名方式发表在一本粗浅的小册《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即*The Free Sea*）中。他这一次还是基于政治目的而写作—试图影响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谈判。荷兰东印度公司吓坏了，深怕两国为了谈和，荷兰政府会牺牲其权利，同意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不让其船只进入亚洲。格劳秀斯又派上用场，这次再度救援成功。一六○九年四月十日签订的《安特卫普条约》（Treaty of Antwerp）赋予荷兰商人有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尚未设立居留地的地方做生意。

但是，格劳秀斯心里头还有别的目标：鲱鱼。依他的见解，比起干预航行更恶劣的就是干预捕鱼。他在《海洋自由论》中曾斥之为「疯狂的愚蠢」。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他亦兼具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的名衔）非常生气荷兰船队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沿海航行，拦捕每年移徙的鲱鱼—当时有数百个村子靠着捕鱼维生。詹姆斯想要阻止荷兰人进入他认为的「他的」海域，可是又不想和他在欧洲少有的盟国荷兰开战。一六○九年五月十六日，也就是《海洋自由论》出版后不久，他禁止外国人未取得官方许可就在英国沿海捕鱼。但是詹姆斯觉得他需要有法律基础来增强他的谕令。法学教授威廉．韦尔伍德（William Welwood）在一六一三年写了一篇论文，援引《圣经》、罗马法和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环保理由的论据，来赞同国王有权限制外国人捕渔。詹姆斯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六一九年又求教于另一位律师约翰．薛尔登。

薛尔登在是年夏天完成论文，送呈国王核示。但是，詹姆斯在最后一刻考量到他的姻亲丹麦国王克里斯汀（King Christian）可能反对英国的海权主张、在整个北大西洋惹出更大风波，遂把论文悄悄束之高阁，暂时搁置法律论战。后来数十年，格劳秀斯和薛尔登分别在荷、英两国积极参与政治，也分别失了宠，甚至都坐了一阵子牢。一六三○年代中期，英格兰新王查理一世对海上争议採取比其前任更强硬的路线，而薛尔登想要争取新君宠信，遂于一六三五年提出一套法律论据来驳斥格劳秀斯的主张。连他的小册子书名取为《封闭的海洋》（*Mare Clausum*，即*The Closed Sea*）都是冲着格劳秀斯直接挑战。

虽然薛尔登同意格劳秀斯的看法，认为船只有「无害通过」他国海域的权利，他也坚持国家有权在某些状况下限制进出它的水域。他主张主权国依据长期使用的理由应该可以主张对特定区域—甚至公海的某区域—享有权利。[註37]他主张，开放的海域可以被「占领」，因此未必对人

人开放：特别是如果它那里有大量鲱鱼的话。註38肯定就是在这段时候——薛尔登又在王廷得宠时——他取得了前文所说的中国地图。

格劳秀斯和薛尔登的争论——海洋究竟该开放或封闭？——延续到今天。薛尔登明白地赞成在水上划下一道想像的界线，而格劳秀斯终究也承认海湾、海峡可以被拥有。纵使他们对于确切界线应该怎么划有歧见，他们也都认为可能，也应该，划出界线以便规范各国的行为。到了十七世纪末，欧洲各国已获致妥协，同意有时候称为「砲弹可及」的规则，允许一国可以控制离其海岸线三至四海里的水域。几个世纪下来，薛尔登显得输掉这场辩论——主要原因是英格兰（一七○七年后称为不列颠）成为海上大国。从此以后，格劳秀斯的论述比薛尔登的主张更能服务伦敦的利益。大英帝国是以各国——其实特别就是一个国家——有权利在全世界自由贸易这个前提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大不列颠不再主张扩大领海以保护鲱鱼，现在它主张限缩领海，它才好统治更大片的海域。这需要极小化其他统治者限制航行的权利。现在它可以靠皇家海军运用自己版本的「砲弹可及」规则，来解决对这一项法律原则的任何重大歧见。

每一个时代，全球霸主——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都主张航行自由，并动用军事力量制止别人挑战此一自由。但是薛尔登的观点还是一直有拥护者，主要当然是受到海上武力压制的国家。沿海国家是否有权、以及如何主张他们的离岸主权这个问题迄今仍困扰着我们，天底下很少有其他地方比起南中国海更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

曼达拉体系与西发利亚体系

抢夺圣塔卡塔莉娜号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了第一枪。十七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间里，荷兰和葡萄牙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到处交战。有一短暂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组成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伊莉莎白号船长林迈世觉得他有权在台湾附近抓一只中国船，理由是它载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乘客；他进而偷了它的船货，或许也因此取得绘制得很精美的那张地图。十七世纪大部分时间，荷兰成为南中国海的霸主——不仅本身是长程贸易商的龙头，也是亚洲不同港口之间彼此通航的中间人。藉助优势火力，他们把葡萄牙人挤出日本的白银交易以及大部分的香料港口，甚至一六二三年在今天印尼安波岛（Ambon）的「安波大屠杀」（Amboyna Massacre）中赶走他们的英国盟友。

到了一六二五年，以及其后五十年内，荷兰共和国主宰全球贸易。鼎盛时期，荷兰的商船队有六千艘船、五万名水手，规模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和日耳曼的船队加总起来还更大。阿姆斯

特丹是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是它的东方据点—负责对台湾及日本的贸易。一六四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在东南亚获得最为关键重大的突破—征服麻六甲，成为麻六甲海峡的霸主。

但是它从来没有完全主宰一切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需要依赖本地盟友如柔佛苏丹的支持。公司愈来愈捲入区域政治，慢慢地也取得领土。它援引格劳秀斯不可违约的论述，用冰冷的船坚砲利执行严峻的合约：欺压甚至屠杀抵抗他们的人。然而，中国当局实力大到够抵挡住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他们必须透过福建商人和中国做生意。巴达维亚成为新的区域辐辏中心，是欧洲与中国帆船会合的地方。

这一整段期间，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似乎都无从餍足；拉丁美洲的银币成为本区域流通的货币。但是，经过七十年的阿卡波科贸易，西班牙人已经载运太多银块到中国，白银开始贬值—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买进那么多的黄金和谷物。中国的经济失衡导致明朝终于在一六四四年覆亡，被从满洲入关的清朝取代。但是影响的余波不止。失去了从阿卡波科交易的盈余，西班牙不再有财力打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结果是一六四八年签署《西发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由它建立起现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结构，开启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体制。

在中国的政权转移中，双方交战血流成河，且旷日持久。面对福建领导人「国姓爷」的抵抗，清廷于一六五六年再度禁止贸易，并在南方沿海地区推出史上最激烈的「焦土政策」，强迫大批人民向内陆迁徙，中文文书里首次出现「海疆」一词。可是这个政策完成适得其反，老百姓为求生存不择手段，进而贸易大兴、人口外流。

激烈的作法终于稳固了清廷对沿海的控制；一六八四年，政府觉得够安全了，下令终止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禁令。整个东南沿海，商人再度扬帆寻找新市场。到了十七世纪末，靠着「主场优势」和成本降低（不需要再斥资作战），他们又把南中国海纳入势力范围，让欧洲人沦为「跑龙套」。葡萄牙人控制住帝汶和澳门，但是仅此而已。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和马尼拉之间生意兴盛，但是没有跨越出线。荷兰人曾经独领风骚数十年，如今被赶出台湾、退出东京（北越）和柬埔寨，也失去和日本的特殊关系。本区域的大英「帝国」仅限于广州的贸易基地。简言之，欧洲人与其他的外国商人受到同等待遇：只要遵守地方习俗，就会受到官方容许。这是南中国海地区「华人世纪」的开端。

现在，移民的禁令已解除，大批中国人又出海寻找新机会。有些人国内外来回奔波，有些人则留在异乡：大部分自营商贸，少数人替地方

统治者充当管理人员。后来，劳工又开始输出。由于国内对辣椒、黄金和锡的需求上升，成千上万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成立农场或进入矿区工作。他们在一些地方成立自治团体，也在一些地方成为欧洲人成立的屯垦区居留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葡萄牙人的澳门、西班牙人的马尼拉，或是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这些殖民地城市若没有华人劳工就无法顺利运作。

欧洲人害怕过度依赖华人，于是采取种族歧视政策边缘化他们。这一点一再加上十分不公平的商业作法一时常引起动乱，甚至造成屠杀。即使如此华侨仍坚此百忍，创业致富之余，还贡献技能与劳力协助侨居地开发。结果就是在环南中国海周边出现所谓的「非正式的帝国」：「非正式」指的是清廷并没有有系统地加以利用。对清廷而言，这里只是收入的来源，不是领土。他们的注意力不及于海岸线之外。

航行于大海之上的中国商人一般都认为它危险又不方便，不敢深入险境，且仍然相信万里石塘—沿着印度支那海岸有一排神秘的万里群岛—挡住直接通路。[註39]中国的记录，如一六一七年出版的《东西洋考》就说得活灵活现。[註40]只有欧洲人才笨得想要找出一条穿过其中心的直接路线。他们的成与败全见诸今天的海图：位于南中国海中央的Macclesfield Bank（即中沙群岛）是英国船「马克雷斯斐德号」（*Macclesfield*）的船长约翰．哈雷（John Harle）于一七○一年发现的。[註41]黄岩岛英文名得自于英国船Scarborough于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在它附近沉船。[註42]这些海难事件对欧洲人来讲是悲剧，但是对于有打捞沉船本事的人而言，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打捞生意非常好，以至于位在今天越南中部的阮朝统治者要发执照给一群海员捞船救货—今天的越南以此为证据，主张它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註43]

西元一七九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了水道测量专家詹姆斯．霍斯伯赫（James Horsburgh），因为他，整个南海地区的交通往来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一八○七至一八一○年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沿南海大部分海岸测绘地图，终于证明万里石塘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一八○九年和一八一一年，霍斯伯赫发表了两册的航海指南《印度指南》（*India Directory*）；又于一八二一年发表南海海图，首次合理、正确地标示出今天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註44]欧洲人此一知识并没有很快移转给中国地理学者。直到一八四三年，作家汪文泰还拿欧洲航海家走的路线和中国航海家走的路线做对比。他的着作《红毛蕃英吉利考略》把今天中国人称为的中沙群岛的地方称为红毛浅滩—意即红髮野蛮人的浅滩—中国人用这个名字来翻译Banc des Anglais（即English Bank），这是法国地图上把它改名Macclesfield Bank之前的旧名。[註45]

霍斯伯赫的海图出版了二十年之久后，汪文泰仍然相信西沙群岛有

一千里（五百公里）长，另外他想必是指南沙群岛，他写说「在七洲大洋里有巨岩，但是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註46

但是霍斯伯赫的确发现某些本地水手不知道如何在岛礁之中航行。他在一八五二年版的《印度指南》中提到西沙群岛时表示：

有许多渔船属于〔海南〕岛，它们用沉重、坚硬的木头打造，不是一般中国船只所用的枞树。它们可以航行快捷。它们有许多每年出海捕鱼两个月，走到离家七、八百英里之处来採集海参、购买干乌龟和鱼翅，他们是在中国海东南部分无数的浅滩和沙洲找到它们。他们的航行始于三月，先来到北堤岸（Northern Banks），留下一、两名船员和几桶淡水，船队继续开往婆罗洲近处某些大岛礁、继续渔捕到六月上旬，才回头接同伴及其收穫。我们在中国海这些岛礁附近遇见许多这些渔船。註47

为什么霍斯伯赫要区分硬木制造的船和「中国」船只呢？或许是因为其船员不是他所了解的「中国人」。他们半游牧性质的生活方式显示他们或许是「海上吉普赛人」—蜑家—南岛民族网络的后裔（详见本书第一章），他们住在越南及华南沿海地区。（今天的海南岛仍可见到住在水上村落的蜑家。）其他人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如菲律宾的巴瑶人、马来西亚的海上人，以及其他海上游牧族都是出了名的全在南海各岛捕鱼的民族。不论他们来自何方，这些海上游牧民族过的生活大多不受陆地当局管辖。他们经常遭到歧视，被当做是土匪、海盗，不被当做是完全的公民。挺讽刺的是，现在各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现代国家主权主张时，纷纷以这些人做为先驱。

英国东印度公司准备花大钱做调查是因为它在中国的贸易太赚钱。从蝇头小利开始，它渐渐得以补贴起整个大英帝国。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往广州的交易量百分之九十是白银。但是，就和一个世纪之前一样，银价巨幅下降。一七七五年之后，白银只占公司出口到中国的百分之七十五。註48一七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突然需要有新的商业模式。英国政府降低中国茶叶的税率，茶叶的需求爆增。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卖别的东西来交换，而它发现答案就长在孟加拉的土地上—鸦片。以印度的麻醉品换中国的提神品的交易快速飙升，到了一八○○年，进口到伦敦的茶叶价值高达二千三百万英镑。茶叶的进口关税有助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将款项用在皇家海军身上，而皇家海军保卫贸易商和帝国。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鸦片上。

英国东印度公司现在迫切需要在麻六甲海峡有个根据地，一个和过

去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所需的港口一样的，并能够和中国的大帆船贸易联繫上。一七八六年，它租下位于麻六甲海峡北端的槟榔屿，但是成效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要到一八一九年取得新加坡，英国才如虎添翼。新加坡地理位置完美，能吞吐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方向的贸易，又没有传统的统治者、专横的宗教和僵化的官僚，它很快就从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发展成为英—中区域中心—更精确的说法或许应说是中—英区域中心。英国在拿破崙战争中击败法国，遂一跃成为全球新霸主，而且也和前人一样，寻求透过麻六甲海峡控制对华贸易。荷兰人虽然抗议，但实为螳臂挡车。

直到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干预已经很彰着，但一般而言只是地区性质，且为时短暂。然而，有了工业革命的力量支撑，情况丕变。贸易帝国将演变为领土帝国，而这些新帝国将划下新疆界、制造新冲突。有两则有关领土争议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十七世纪中叶，越南黎朝皇帝和寮国国王为湄公河上游某一块地段交战。冲突后来解决了，两个统治者协议好，住高脚屋的人（即「寮人」）应向国王效忠，而家住平地的人（即「越南人」）向皇帝效忠。界定清楚的疆界线远不及人民的个人效忠重要。註49英国人和荷兰人就以非常不同的协议解决他们十九世纪在麻六甲海峡的争议。一八二四年英荷条约在海上画一条线—英国人的活动限制在北边、荷兰人的就限定在南边。这代表英国必须放弃他们在苏门答腊岛本古连（Bencoolen）的居留地、荷兰必须退出麻六甲。人际网络不具任何意义；国籍和地点才是一切。它解决了欧洲人的一个问题，却给长久以来在这条想像的界线两边穿梭的本土马来人制造了无数的后遗症。那些想依传统方式过活的人成了「走私客」、那些试图抵抗的人则是「海盗」。註50

到了十九世纪初，欧洲人和东南亚人对于构成「国家」的要素已有非常不同的想法。传统的东南亚政治单位是由中心所界定：亦即由统治者的个人威望所界定。在这个「曼达拉」体系里，统治者的权威随着距离王国中心愈远就愈递减。在欧洲，至少是从《西发利亚条约》之后，政治单位变成由边缘所界定：法律、权利和责任平等地适用于全境，但是到了边界外就完全停止。在亚洲体系里，权威可以逐步过渡，甚至会出现真空状态，没有哪个统治者受到承认。小型单位或许会承认一个以上的主权，也或许可能根本不承认任何人。传统上，东南亚的疆界线变动不居—海上疆界尤其含混不清。这种含混允许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递嬗、边界可以迁移：有时候是和平的，但出于暴力手段更是常见。在欧洲体系，不会有空隙—每个地方应该都归属某一个主权—而且只有一个唯一的主权。如此一来，纷争在所难免。

由于格劳秀斯和薛尔登（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之间的辩论结果，

现在西方统治者对于这些确定的边界如何延伸至海洋有了共识。随着他们帝国的扩张，这个共识传至东方，加诸在对海上疆界有完全不同理解的这个区域身上。从流动疆界过渡到固定疆界，替当前南中国海的冲突种下祸根。

蚕食鲸吞

欧洲的贸易公司以商人和佣兵两种身分闯进东亚，预备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权利作战。他们得到本国政府的特许执照，但是为自身利益而行动。到了十九世纪，最成功的两家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自成一个政府。联结盟友、粉碎敌手、收取关税和杜绝走私的必要性，使得他们往往以最残暴且阴晴不定的方式抢夺土地和治理当地人民。母国政府固然试图控制这些胡作妄为，并整饬公司的财务问题，可是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已经完全交缠在一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八○○年破产，它控制的领地由荷兰政府接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一再出现困难，但是靠着鸦片与茶叶贸易存活下来。清廷要求以白银付帐，可是银价却因拉丁美洲陷入独立战争而飞涨。若非鸦片，英国现金将大量外流出境以支付从中国购买的茶叶和其他进口物品。当清廷试图停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他们暗示收支不平衡将威胁到英国的经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共同的反应就是设法强行打开中国市场—不只是鸦片，所有产品的市场都应该开放—以及恢復贸易平衡。一八四○年和一八六○年两次「鸦片战争」正是因此而爆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皇家海军的砲艇在鸦片创造的财富挹注下，大胜清军。透过这些船舰封锁海岸，英国指挥的部队强迫中国皇帝割让香港、并开放另五个国际通商口岸。《南京条约》首开其端，清朝政府在往后一甲子时间被迫与十个国家签署了二十六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后的光辉。到了一八七四年，破产以及各方厌恶其行为的情绪大涨，导致它被政府强制收归国有。但是这并未终止英国在东南亚商业和殖民动机的混乱。一八四二年，冒险家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rooke）成为砂劳越拉惹（Rajah）。一八八二年，北婆罗洲特许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接管了今天沙巴这块地区。它们被标明为「英属」领土，但其实是逐渐地才正式纳入大英帝国。

另一方面，法国和德国的帝国野心打从一开始就是国家领导的行动。法国以天主教传教士遭到虐待为藉口，一八五八年派出海军砲轰越南中部城市岘港。次年，法军抢占西贡，十年之内「交趾支那」（Cochinchina）沦为法国殖民地。不久，柬埔寨和安南（Annam）成为法国保护国。但是，法国真正追求的是一条独立的通路—河流或铁路

皆可一俾能通往中国内地潜力极大的市场。若要成功，必须控制北部的东京区（Tonkin）□□这个前景让北京清廷大为警惕。中国政府贊助「黑旗军」（依据各人不同的观点，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群土匪，也可以是一个半自主的政治单元）来阻止法国人节节进逼。但是在一八八四至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承认法国控制东京，也同意在东京与清廷领土之间划定国界。

大约同一时期，德意志帝国也在亚洲蚕食鲸吞。为了准备，它想方设法建立一系列海军基地以连结本国和在中国可能的殖民地。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间，德国海军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一系列勘查。德国并没有徵求，自然也没有得到中国或法国准许它进行勘查，而中、法两国政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更不用说发出抗议了。（有些中国作家声称中国确有发表抗议，但明显缺乏证据。）德国当局实际上在一八八五年发表勘查结果，它也成为日后英、法对这些岛屿的参考地图，但是奇怪的是，中国地图没参考它。註51一八九七年，欧洲传教士受虐待又成了帝国干预的藉口。隔不了几个月后，德国人强占华北的青岛。

美国在亚洲的帝国野心始于海军提督培里（Commodore Perry）一八五三年在日本东京湾小试身手、展示砲舰外交：弹药花了不少却没有人伤亡。日本菁英不像清廷那样排外，他们拥抱现代化，在半个世纪之内就加入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美国在日本成功后，野心大炽。一八九○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艾佛瑞德．马汉（Alfred Mahan）发表专书《海权对歷史的影响，从一六六○年至一七八三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分析英国创立全球霸权成功的前因后果。马汉主张，美国若要繁荣，需要在海外取得市场，并透过一个海军基地网络保护贸易通路。他的主张引起新世代政客的喝应。机会在八年之后到来。美西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真正成为纵横太平洋的强权，兼併了菲律宾、夏威夷和关岛。

殖民大国抢夺领土的这一切动作勾勒出了今天南中国海疆界的基础。它们创造出国家，也创造了国家之间的边界，海上疆界要依此来测绘。菲律宾和印尼的界线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一五二九年划定；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国界大致上在一八四二年由英国和荷兰协商而成；越、中边界由法国人在一八八七年迫使中国接受；菲律宾大体上的国界是一八九八年由美国和西班牙所订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边界则是美国和英国在一九三○年敲定。

这是界定和划分各个殖民大国彼此边界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产生极大的仇恨和抗拒。荷兰人花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婆罗洲和其他岛屿去执行它。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它还在和九百个不同的原住民政治单位打交道。註52然而，它们竟成了后殖民国家诞生时的国界，且尽管它

们引发无数纠纷，却成了神圣的国家象徵。现在对这些国界的思维方式又更加根基深厚了。西发利亚体制已经深入人心，以致它的固定边界和领土主权的概念经常被认为存在已有上千年之久。其实它出现在东南亚只有一个多世纪，从那些在曼达拉体系之下已经存在的概念来推演现代政治疆界，其实不具意义、且又危险。

边界和主权之所以会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在它的爱国主义者所谓的「百年国耻」期间所遭遇的经验。清朝面对工业化的欧洲侵略却完全无能抵抗，这个记忆直到今天都还激励着中国领导人。但是与欧洲列强实质占领世界上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的是，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并非觊觎领土：直到一九○○年，被列强占领的土地（香港、以及其他国际租界）面积仍然只占中国领土极小的一部分。所损失的人命也不算特别。当然，在一八四○年和一八六○年的「鸦片战争」中是有两万人丧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之乱死者更多，高达两、三千万人。耻辱感是在意识型态上面。它混合了被「异族」侵犯的意识，以及明知是内部贪腐和衰败才导致它发生的体认。对比之下，日本十分成功地调适接受世界新制度，并且准备好挑战东亚既有的秩序。

百年国耻不可忘

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从满清政府抢走对朝鲜和台湾的控制。紧接着败给日本之后，一九○一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敉平「义和拳之乱」。清朝已深陷危机，对于指控它无法保卫国家的声音非常敏感。「恢復国权会」、「纪念国耻会」和「自治会」等团体鼓动杯葛英、美、日及其他外国商品。註53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九○九年中国政府把南海诸岛主权首次转化为国家荣辱的问题。当年就和今天一样，繫争重点是远离陆地、大海之中几乎无法住人的岛礁块之命运。当时的姿态造成划下今天的「U形线」、做为中国提出海上主权的根据。

早在一九○七年十月就有传闻指出一群日本探险家在东沙岛（Pratas Island）登陆，这个覆盖鸟粪的珊瑚礁位于（日本占领的）台湾西南方四百公里、离中国大陆约两百六十公里。註54传闻未经证实，直到一九○九年三月一艘中国船来到东沙岛，发现西泽吉治和上百同伴在挖鸟粪。受到挑战后，西泽宣称他发现这个原先并无人居住的岛，现在这个岛属于他所有。他的动机很简单。鸟粪很多，非常适合做日本农田的肥料，西泽希望能赚一大笔钱。

消息传抵广州，不少广东人组织发动另一波抵制日货运动，并要求政府有所动作。该会愤怒的中产阶级会员亦收集证据，试图证明东沙岛属于中国。这批民族主义者翻遍古籍，找出古代航海家记录以证明东沙

岛与大陆的关系。在民间抗议声浪下，中国政府决定拿钱解决问题，日本政府也愿意协助。中国人的杯葛已经严重伤害到许多日本公司，而日本不以为占领东沙岛有多大价值。註55东京当局表示，如果中方能证明其主张，可以承认其主权。註56

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元赔偿。註57广东当局希望採纳西泽的商业计划、赚回这笔钱。他们甚至雇用西泽的鸟粪专家当顾问。可嘆的是，到头来是一场空。没有码头供大船上下货，整个计划不符经济效益。到了一九一○年圣诞节，计划取消，东沙岛又成为弃岛。註58

但是对中国海疆的焦虑持续不退，张人骏觉得舞剑比动笔会更有效用，把注意力转向西南方数百公里外的西沙群岛。这时候，中国官方地图（不论是全国、区域或地方）都显示海南岛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一七六○、一七八四、一八六六和一八九七年印行的地图都是如此。註59关于东沙岛的谈判仍在进行之际，张人骏于一九○九年五月派一艘船前往西沙群岛—次月再加派另两艘船去。中国的记载说，船队花了三个星期巡航、进行勘查，间或开了几砲以宣示中国拥有这些岛礁主权。可是，有一家经常来往当地的法国船公司老闆拉皮克（P. A. Lapicque）在二十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不同版本的记载。註60他说远征队（接受大型贸易公司卡洛威蒂公司〔Carlowite & Co.〕两位德国人的指导）在海南岛外下锚停泊两个星期等候好天气，然后在六月六日赶往西沙，次日就掉头回广州。中国现在就靠这趟航行为依据，主张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这次远征之后印行的广东新地图显示西沙群岛是广东省的一部分，这是所有中国地图第一次这么做。註61

这是临危的清朝最后的奋力一搏，它在一九一一年终于被推翻。中华民国新政府第一张地图出现在一九一二年的《年鑑》（Almanac），它根本不显示国境。国家新领导人十分「现代」—它渴望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可是英国地理学家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指出，它无法解决矛盾，一方面中国已是新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曼达拉体系为基础的一系列阶层关系的中心，两者相互牴触。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把这一点显示得淋漓尽致，它说：「中华民国的主权领土（sovereign territory）继续与旧帝国的领域（domain）相同。」旧「领域」等于新「主权领土」这样一个简单等式，就是目前对南中海「国界」起争议的根本。註62

民间绘图师胡晋接预备替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草拟新指南时遇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中华民国地理新图》终于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问世，它是第一份中国地图在南中国海画了一条线显示哪一个岛的确属于

大陆。胡晋接把这份地图标明为「干嘉时期前的中国版图」。[註63]换句话说，这条线代表一七三六年以前中国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很重要的是，唯一在线内的岛屿是东沙岛和西沙群岛。[註64]它没有往南超过北纬十五度。整个一九二○年代动盪不安的「军阀时期」和一九三○年代初，这条线印在中国地图上。又隔了二十年，经过另一次海上国际危机，这条线才成为今天中国主张的这样子。

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压的意识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变得更加强烈，共和政府被迫接受日本新要求割让土地及其他权利。[註65]全国教师协会宣布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一九一六年，上海的中央绘图社发表「国耻地图」，其上标示失给列强的领土。有意思的是，香港、台湾和（越南）东京都明显标示出来，可是完全不提南中国海其他地方。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陷入派系和军阀混战，不过国民党一九二七年掌权后，他们利用「国耻」这个概念号召全国团结。它甚至将「国耻纪念日」列为正式假日。

一九三○年四月十三日，法国军舰「马利赛斯号」（Malicieuse）在南威岛（Spratly Island）□□东沙岛和西沙群岛更往南数百公里—下锚，并发射二十一响礼砲。唯一目击这一幕帝国盛事的是四个饿坏了肚子的渔民，根本不晓得这一幕就是争夺他们渔场的争端—迄今犹未落幕—的开端。马利赛斯号之所以奉派前往是因为交趾支那法国总督接到报告，日本政府即将夺占离他海岸五百公里的这个岛屿。[註66]法国政府公布它的占领，但是很奇怪的是并没有正式兼併它，直到三年后英国政府要求它出示兼併文件。中国政府也没注意到一九三○年的占领，但是当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布兼併时，主张南威岛和其他五个岛礁—安波那岛（Amboyna Cay，也称安波沙洲）、太平岛（Itu Aba）、北危岛（North Danger Reef，即法国人的双子礁群〔Les Dux Iles〕）、南钥岛（Loaita）和中业岛（Thitu）是中国的。它引起爆炸性的反应，但讯息也相当混乱。

公布的当天，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邝光林向美国殖民当局索取这些岛礁的地图。从着名的上海《申报》当时的报导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政府根本搞不清楚哪个岛礁被兼併、或是它们的所在位置。七月二十八日，《申报》报导，中国外交部要求政府派船调查究竟怎么了。两天后，该报驻巴黎记者告诉读者，这些岛礁是无人居住的珊瑚礁，而且与西沙群岛不同。纵使如此，有关这些岛礁座落位置的争辩仍在报上吵了好几个星期。中国政府似乎相信法国人改了这些岛礁名字以混淆视听。它必须向外国政府徵询意见。八月一日，马尼拉美国官员交给邝光林一份地图。据报导，他很惊讶，西沙和南沙竟然是不同的地方。[註67]直到八月十五日这份地图才送回到南京的中央政府。即使街头抗议仍在进行中，中

国政府也继续震惊不已。

反倒是日本率先成为跳出来抗议法国行动的第一个国家。它在八月二十一日辩说，日本拉萨岛磷矿合资公司（Rasa Industries）直到最近还在这些岛礁挖鸟粪。然而，后来发现日本政府也没搞清楚：原来拉萨岛公司是在西沙群岛的珊瑚岛（或称八道罗岛，Pattle Island）作业。《申报》继续报导一连好几个星期当局的荒腔走板。尽管种种恫吓和诟骂，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抗议过法国的行动。註68原因似乎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认为西沙是其最南端的领土，而非南沙群岛。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呈报给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机密报告似乎证实这一点：

我们所有的地理学者专家都说〔位于西沙群岛的〕中建岛（Triton Island，或称土来塘岛）是我们最南端领土。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找出一些证据证明〔南沙〕九个岛屿过去即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和法国人冷静下来，但是让渔民持续作业以保护我国捕鱼权。我国海军仍弱，而那九个岛屿目前尚无用处……我们必须只专注西沙群岛，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主权证据很多，除了日本之外全世界都接受它。註69

既然无法在实质上有所作为，中国政府转向绘图人员。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法国人占领南沙群岛的传闻开始散播时，中国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审议期间，另一位绘图专家陈铎发表他的《中国新地图》，中国海疆延伸到北纬七度──坚实地把法国刚提出主张的那些南沙群岛纳入中国版图。註70此举可能影响到委员会，因为歷经一年半的研究后，它终于回应巴黎的挑衅。没有二十一响礼砲，委员会提出一份清册。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会刊第一期列出南海一百三十二个岛礁沙洲的中文名字，认为它们属于中国所有。二十八个位于西沙群岛、九十六个位于南沙群岛。这张清册没有罗列这些地貌传统的中文名字，只是翻译印在航海图上西方名字。比如，南沙群岛的North Danger直译为「北险」、Antelope意译为「羚羊」，而Spratly Island音译为「斯巴拉图」（Si –ba-la-tuo）。Paracels群岛已经有个岛的英文名字就是西沙（位在宣德群岛〔Amphitrite group〕最西端），因此整个Paracels就叫「西沙群岛」。Macclesfield Bank位于大海中央，遂名之为「南沙岛」，而Spratlys名为湍沙。註71在这个节骨眼上，Macclesfield Bank被认为在「南方」，当然有其重要意义。

很明显，在很多案例上，委员会只是把英文地图上这些地貌的名字译为中文，许多既有的错误照抄不误，自己又添加一些错误。James Shoal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委员会将它依詹姆斯音译为曾母滩。但是中

文的「滩」指的是海滩或沙洲—浮出在水面上的地貌。但是英文航海用词，shoal是水下的地貌—即海床隆起的地方（这个英文字源自古英文的「浅」〔shallow〕字）。James Shoal实际上在水面底下二十二公尺。但是由于委员会不熟悉该地区，把它宣布为陆地地貌。因此，看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在某个程度上可说是以翻译错误为基础。现在被形容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岛礁根本不存在—和八百年前的万里石塘无异。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继续执行它的领土使命。三个月之后的一九三五年四月，它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把中国海上边界推进到北纬四度曾母滩的位置，离婆罗洲海岸只有一百零七公里，而距离中国大陆超过一千五百公里。註72这时候，中国最着名的地理学家之一白眉初又提出他自己的创新。白眉初是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九三○年绘制他自己版本的《中国国耻图》以教育国人丢失了多少领土。註73那一年白眉初出任学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宣称：「学习地理要以爱国为最高优先，建国是学习地理的目标。」註74一九三六年，六十岁的白眉初创造了他永垂不朽的功绩：他在《中华民国建设全图》的一幅地图中提出一条环绕南中国海的U形线，最南直抵曾母滩。然后，它被别人抄袭。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间，这条线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其他二十六张地图上面。有些延伸到曾母滩，不过大多数只包括南沙群岛。註75十年之后，白眉初绘制的这条线得到中国政府採用，据以界定中国自古以来的岛礁领土。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这些名单的整理、地图绘制动作统统叫停。保护国家主权的工作交付给军方，而中国民族主义怒火原先指向的目标—尤其是英国、俄国和美国—成为对抗大敌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南中国海的领土之争。日本已在一八九五年占领台湾，因此当菲律宾境内美军部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向日本投降后，几乎整个南海沿海，从台湾到新加坡，一千年来首度由单一一个国家掌控。南中国海沦为「日本湖」，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日本占领西沙的永兴岛（Woody Island）和南沙的太平岛。太平岛的基地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遭美国飞机投掷燃烧弹、并勐烈扫射后摧毁，旋即弃守一空，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才有美军侦察队登陆。註76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两名澳大利亚突击队由美国潜艇「帕果号」（USS Pargo）送到永兴岛，观察到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欧洲人生活在法国三色旗下。突击队退走后，帕果号炸毁所有建筑物。註77三月八日，美国飞机轰炸永兴岛和珊瑚岛两岛上的无线电台註78，另一艘美军潜艇「凯布里拉号」（*USS Cabrilla*）七月二日再到永兴岛时，法国三色旗仍然飘扬，但这次在它顶上多了一幅白旗。註79

当日军开始节节败退后，盟国开始讨论大战一旦结束，应该如何在地图上划线。早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即瓜达卡纳尔之役（Battle of Guadalcanal）开打后几星期，美国国务院起草一份T-324号文件，协助决定应该如何处理南海诸岛。允许日本保留它们从来不在考虑范围内，但是因为它们「对任何一国或区域都不具重大利益」，美国的立场仍含煳不清。註80后来的文件维持这个调子，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对这些岛礁有清楚的权利主张。CAC-301号文件〈Spratly与其他岛礁（新南群岛〔Shinnan Gunto〕）〉起草于雅尔达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它建议将南沙群岛置于「计划中的国际组织」—即未来的联合国—底下，不过它也指出这会需要法国的同意才行。另一份CAC-308号文件建议西沙群岛可以有三种方案：国际託管，中、法协商，或第三案—「除非法国提出证明，所谓中国已经在一八一六年将西沙群岛移转给安南」—即支持中国的权利主张。註81可是，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务院承认任何岛屿不可能置于联合国控制下，因为这会需要法国有极大程度的弹性，而它显然并无可能。因此，美国还是持含煳立场。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菲律宾脱离美国而独立，不到三星期之后，副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宣布南沙群岛为菲律宾势力范围。法国当局想要重新掌控中南半岛，派了一艘扫雷艇「齐瑞尔号」（FR *Chevreuil*）到南沙群岛。它发现它们不适合人居住，遂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在太平岛留下石碑宣示法国主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华民国海军刚从美国得到几艘军舰、有训练的船员及海图，派了两艘军舰到西沙群岛、另两艘到南沙群岛。註82太平舰（前身为美国海军「戴克号」〔USS *Decker*〕）和中业舰（前身可能是USS *LST-1056*）在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太平岛，另立一块石碑宣示中国主权。接下来，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法军队分别在西沙群岛不同岛屿登陆—再次分别提出权利主张（详情见本书第三章）。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华民国国会通过一项提议，要求政府从法国手中收復整个西沙群岛、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另外要「划定疆界」。动武是谈不上了，但是划定疆界比较容易。内政部地政司替南海诸岛统统取了新名。Itu Aba和Thitu分别以一九四六年远征的两艘军舰之名命名为太平岛和中业岛，另外的地貌也取了同样符合爱国精神的名字，如Spratly Island改为南威岛。或许明白原先犯了错，地政司把曾母滩改为曾母暗沙。四组地貌的名字也做了调整：Pracels还叫西沙群岛，但是Pratas改称东沙群岛。南沙原本指的是Macclesfield Bank，现在往南移去称呼南沙群岛（the Spratlys），Macclesfield Bank改名中沙。

到了一九四七年底，地政司完成南海诸岛新旧名对照表—岛礁总数增加为一百五十九个。註83名单在十二月一日正式公告，同一天全部正式

拨归海南特别行政区管辖。註84大约同一时间，地政司印了新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后来由内政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做为新订《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附件正式发表。所有新名字统统列入—加上十年前白眉初在地图上最早画出的线，也纳入其中。总共十一条线由南海东侧的台湾往下走到婆罗洲海岸附近，再往北折向东京湾，形成一个大U字型。官方并没有解释这些线代表什么意义，但是据报导说，其中一位绘图专家王希光（Wang　Xiguang，音译）说，这些线只代表中国领土—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主张拥有权利的岛礁—与邻国领土之间的中线。註85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中华民国海军、国防部及内政部官员会商决定，政府将对线内一切岛礁提出权利主张，但是愿在日后根据国际法与其他国家谈判确切的海疆。没有一处疆界被划定—这是日后南海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开端。註86可是，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本身已经陷于危急存亡之秋。不到几个月，中枢播迁台湾，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采纳了前政府的地图和画线。不过，一九五三年，被认为是对争取独立的兄弟党之特别优惠，中国绘图专家取消中国和越南之间东京湾上的两条线，从此以后只剩下「九段线」。註87这块水域的边界一直拖到一九九九年才由两国最后界定。二○一三年六月，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表新版全国地图，在台湾东方加了一段线，明白宣示它也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註88

二○○九年五月，中国当局向联合国大陆棚划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提出文件时，附上有「U形线」的一张地图；这是它第一次在国际正式脉络中採用这条线。南海地区各国反应怒不可遏。它显示出对于国界的想法，已经和将近四百年前某位不知名氏的中国绘图专家所画的「薛尔登地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在地图上画下固定界线以分隔政治效忠的想法，当时就是荒谬的，而且海洋是可以被「拥有」的，也被当做是荒谬的想法。这些都是十七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概念，被贸易公司及帝国带到东南亚来。欧洲人画出新地图、画了新界线，并且在过程中散布对两者的新思维。它是从一套思想往另一套思想的过渡、从曼达拉体系向西发利亚体系的过渡，它留下了歷史混乱的遗绪，自从「U形线」公布以来的年代，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就永无宁日。

註25：Robert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vol. 65 (2013), 37–63. For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how the map might have reached England, see Timothy Brook’s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Rotterdam, 2014).

註26：David Sandler Berkowitz, *John Selden’s Formative Year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Cranbury, New Jersey, 1988).

註27：译注：即约翰三世（John III）。

註28：Roderich Ptak, ‘Ming Maritime Trade to Southeast Asia 1368–1567: Visions of a “System” ’, in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Wiesbaden, 1998), 157–92.

註29：Roderich Ptak, ‘Portugal and China: An Anatom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Laura Jarnagi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Luso- Asian World: Tenacities & Plasticities* (Singapore, 2012) (*Portuguese and Luso- Asian Legacies in Southeast Asia, 1511–2011*, vol. 2), 225–44.

註30：Léonard Blussé,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1996), 51–76.

註31：Ibid.

註32：Angela Schottenhammer, ‘The Sea as Barrier and Contact Zone: Maritime Space and Sea Routes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eds), *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Wiesbaden, 2006), 3–13.

註33：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6 (1995), 201–21.

註34：Léonard Blussé, ‘Chinese Centur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China Sea Region’, *Archipel*, vol. 58 (1999), 107–29.

註35：Cornelis Koeman,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Coimbra, 1984).

註36：Peter Borschberg, ‘The Seizure of the *Sta Catarina* Revisited: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VOC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utch–Johor Alliance (1602–c.161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3, no. 1 (2002), 31–62; Peter Borschberg, *Hugo Grotius, the Portuguese and Free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Singapore, 2011);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 *Profit and Principle: Hugo Grotius,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 1595–1615* (Leiden, 2006).

註37：Bardo Fassbend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2012), 369.

註38：Edward Gordon, online notes for the exhibition curated by Edward Gordon and Mike Widener, *Freedom of the Seas, 1609: Grotius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Yale Law School in autumn 2009.

註39：Roderich Ptak, ‘The Sino- European Map (*Shanhai yudi quantu*) in the Encyclopaedia *Sancai Tuhui’*,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eds), *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Wiesbaden, 2006), 191–207.

註40：Léonard Blussé,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1996), 51–76.

註41：Hydrographic Office, The Admiralty,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London, 1889), vol. 2, 108.

註42：David Hancox and Victor Prescott, *Secret Hydrographic Survey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London, 1999). 西班牙制图师已经知道黄岩岛了，并把它称啰作Maroona Shoal，随后改名为Bajo de Masingloc。

註43：Edyta Roszko, ‘Commemoration and the State: Memory and Legitimacy in Vietnam’,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1 (2010), 1–28.

註44：David Hancox and Victor Prescott,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an Account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Amongst those Islands’, *Maritime Briefings*, vol. 1, no. 6 (1995).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research-/research-centres/ibru-centre-for-borders-research/maps-and-databases/publications-database/Maritime-Briefings-(Vol.-1-no.-6).pdf＞.

註45：Wang Wen Tai, *Hong mao fan ying ji li kao lue* [*To Study the Foreigners*], 1843, quoted in Han Zhen Hua, Lin Jin Zhi and Hu Feng Bin (eds), *Wo guo nan hai shi liao hui bian* [*Compilation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our Nanhai Islands*], Dong fang chu ban she, 1988, 163, quoted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13.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46：Ibid.

註47：James Horsburgh, *The India Directory Or, Directions for Sailing to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 China, Australia, and the Interjacent Ports of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6th edn (London, 1852), vol. 2, 346.

註48：Dennis Owen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3 (2002), 391–427.

註49：David P. Chandler *et al.*,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A Modern History*, rev. edn (Honolulu, 1987).

註50：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2007).

註51：Hydrographic Office, The Admiralty,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London, 1889), vol. 2, 103, quoted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52：Eric Tagliacozzo, 'Tropical Spaces, Frozen Frontiers: The Evolution of Border Enforc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sular Southeast Asia',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2005).

註53：Edward J. M. Rhoad,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註54：*Straits Times*, 21 October 1907, 5.

註55：*Straits Times*, 23 July 1909, 3.

註56：*Straits Times*, 29 March 1909, 7.

註57：*Straits Times*, 28 October 1909, 7.

註58：*Straits Times*, 23 December 1910, 7.

註59：Guangdong dong tu [General map of Guangdong Province], 1866, in Wan- Ru Cao and Zheng Xihuang (eds), *An Atlas of Ancient Maps in China* (Beijing, 1997), vol. 3, no. 196; Guangdong Yudi Quantu [Atl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1897, in Ping Yan, *China in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London, 1998), 247.

註60：P. A. Lapicque, *A propos des Iles Paracels* (Saigon, 1929), quoted in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Leiden, 2000), 101.

註61：Guangdong yu di quan tu [New map of Guangdong Province], 1909,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15.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62：William A. Callahan, 'The Cartograph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Geobody', *Public Culture*, vol. 21, no. 1 (2009), 141–73.

註63：Han Zhenhua (ed.), *A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eijing, 1988), quoted in Zou Keyuan, *Law of the Sea in East Asia: Issues and prospects* (Abingdon, 2005), 28.

註64：Han Zhenhua (ed.), *A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eijing, 1988), quoted in Zou Keyu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4, no. 1 (1999), 27–55.

註65：William Callah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mmemora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Day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April 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ac.uk/resources/china.studies/Commemorating%20National%20Humiliation%20Day%20in%20China.pdf＞.

註66：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註67：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15.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68：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24.

註69：*Wai Jiao bu nan hai zhu dao dang an hui bian* [*Compil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all the records concerning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Sea*] (Taipei, 1995), vol. 1, 47–9, quoted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15.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70：Zou Keyu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4, no. 1 (1999), 27–55.

註71：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18.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72：Li Jinming and Li Dexia,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ote',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2003), 287–95.

註73：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2009).

註74：Wu Feng- ming, 'On the New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and Sentiment of High Moral Character of Geographer Bai Meichu in Moder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vol. 30 (2011), 2109–14.

註75：Han Zhen Hua, Lin Jin Zhi and Hu Feng Bin (eds), *Wo guo nan hai shi liao hui bian* [*Compilation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our Nanhai Islands*], Dong fang chu ban she, 1988, 353, quoted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22.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76：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 Patrol Bombing Squadron 128, Action report 3 May 1945, 请至下列网站搜寻https://www.fold3.com/. 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 Commander Submarines, Philippines Sea Frontier War Diary, 11/1–30/45请至下列网站搜寻https://www.fold3.com/.

註77：A.B. Feuer, *Australian Commandos: Their Secret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ennsylvania, 2006), Chapter 6.

註78：US Navy Patrol Bombing Squadron 117 (VPB–117), Aircraft Action Report No. 92, 请至下列网站搜寻https://www.fold3.com/

註79：US Navy, USS Cabrilla Report of 8th War Patrol. 请至下列网站搜寻https://www.fold3.com/

註80：Quoted in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 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bingdon, 2006), 146.

註81：Ibid., 147.

註82：Ulises Granados, 'Chinese Ocean Policies Towards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1946–1952', The China Review, vol. 6, no. 1 (2006), 153–81, esp. 161.

註83：Yann- Huei Song and Peter Kien- hong Yu, 'China's "historic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Analysis from Taiwan*, R.O.C.',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12, no. 4 (1994), 83–101.

註84：Zou Keyu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4, no. 1 (1999), 27–55, esp. 33.

註85：Li Jinming and Li Dexia,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ote',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2003), 287–95, esp. 290.

註86：*Wai Jiao bu nan hai zhu dao dang an hui bian* [*Compil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all the records concerning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Sea*] (Taipei, 1995), vol. 2, 784–88, quoted in François- Xavier Bonnet, 'Geopolitics of Scarborough Shoal', Irasec's Discussion Papers, no. 14 (November 2012), 22. Available at ＜http://www.irasec.com＞.

註87：Zou Keyuan, *Law of the Sea in East Asia: Issues and Prospects* (Abingdon, 2005), 83.

註88：Euan Graham, 'China's New Map: Just Another Dash?', *Newsbrief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3 Sept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chinas-new-map-just-another-dash/＞.

第三章　征战与奇袭：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九五年

一九四六西沙群岛：法国之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西沙和南沙群岛有一年多时间都没有人占领或控制它。五十年之后，它们的大小岛礁几乎无不被人占领或控制。各国从来没有为控制岛礁发生任何一场战事，但是过渡也不平稳；一九四六至四七、一九五六、一九七○年代初期、一九八八和一九九五年都发生紧张冲突，一方的行动往往触发另一方的反应。每一次，起初的占领行动都受到特定目标的驱动—譬如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战略优势或是经济利益—但没有一次实现预期的结果。

蒋介石意在面对共产党势力节节进逼下，利用这些岛屿强化他的领导地位。他觉得面对蹂躏中国的西方列强强硬抗争，可以展现他适合统治中国。一九四六年底，国民政府派出刚从美国接收过来的除役军舰去伸张中国的主权。他的对手是还俗从军的法国海军将领乔治．提尔瑞．达金柳（Georges Thierry d’Argenlieu）。达金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军旅，表现卓越，但是后来他决定到某一天主教派当神父。他在教会的服务也很杰出，晋升为教会在法国的最高领导人。可是，一九三九年法国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达金柳神父挂起法衣、重新投入海军，再为国家效力。

达金柳在自由法兰西部队（Free French forces）高层中崛起，担任戴高乐将军的特别代表，并奉命到法国于非洲、亚洲尚余的殖民地出任务。他渐次擢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被戴高乐委以负责恢復法国在中南半岛殖民控制的重任。这个殖民地此时可说是兵荒马乱：日本已投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接踵而至，胡志明在九月二日自立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统。同一时期，中国部队由北方南下，英国部队则在南部登陆。英国人利用日军部队平定地方叛乱，然后把殖民地移交给达金柳。达金柳绝对不是解放神学家。身着戎装，他的最高信念就是完全地效忠法兰西帝国。註89聪明、但是极端保守，有个批评他的人嚯称他具有「十二世纪最聪明的头脑」。註90

整个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达金柳费尽苦心和越南民族主义者斗争，也要对付主张与越南民族主义者妥协的国内政客。达金柳、法国政府、胡志明领导的民族主义派，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彼此尔虞我诈展开谈判。法国人和越南人都希望中国人撤走，但是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共

识。达金柳甚至不肯用「越南」这个字词，坚持使用殖民时期旧名「安南」。註91达金柳推动他自己的计画，使得政治情势益加恶化。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宣布另立「交趾支那共和国」，粉碎了巴黎与胡志明的「越南」和平妥协的希望。在激烈内斗中，离海岸有数百公里的西沙群岛之命运无人闻问。

和比较着名的南沙群岛不一样，西沙群岛大部分是名符其实的岛屿：干燥到可供人居住。它们位于海南岛南方约三百五十公里，约略和从岘港往东计算的距离相等，数百年来受到来自中国、越南及其他地区渔民、海盗的利用。西沙群岛可分为两组。西北边的宣德群岛（Amphitrite group，名字得自一六九八年「发现」它们的法国船只）註92有以下六个岛：永兴岛（Woody Island）、石岛（或称小林岛，Rocky Island）、树岛（或称赵述岛，Tree Island）、南岛（South Island）、中岛（Middle Island）、北岛（North Island）。最大的永兴岛长将近两公里、宽略超过一公里。第七个岛屿，即东岛（Lincoln Island），有时候也被归纳入这里。第二组永乐群岛（Crescent group）位于宣德群岛西南方六十四公里处，也有七个小岛：珊瑚岛和甘泉岛（Robert Island）最重要；其余五个是中建岛、琛航岛（又称灯擎岛，Duncan Island）、金银岛（Money Island）、晋卿岛（又称杜林门岛，Drummond Island）和盘石屿（又称巴苏奇岛，Passu Keah）。二战期间，法国人、安南人和日本人都占领过它们—有时候是同时有不同国家部队分别占领不同岛屿。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底，它们都是空的。

一年之后，巴黎接到中国计划併吞这些岛屿的传闻，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海外法兰西部长下令达金柳派兵占领西沙群岛。达金柳不理他，反而决定教训越南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竟敢反抗法国的统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法军与越南部队于海防港交战之后，达金柳命令巡洋舰「苏扶仁号」（*Suffren*）及其他四艘船砲轰海防。一阵砲轰之下，好几个区被夷为平地，越南人死了约六千人。不消多久，越南人就展开报復。十二月十九日，法军与越南叛军在河内爆发巷战。第一阶段越战就此开始。如果达金柳服从巴黎的命令派苏扶仁号去西沙群岛，歷史可能就要改写。

达金柳现在忙着他一手掀起来的战争，以天候欠佳为理由不肯接受巴黎方面要他「不得有误、从速占领」西沙群岛的后续命令。歷史学家史坦因．童尼生（Stein Tonnesson）追踪出来后续的发展。天候可没挫折了蒋介石的雄心。国民政府派出新接收的军舰到南海去。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扫雷艇永兴号（原本是美军USS *Embattle*）和中建号（原本是美军USS *LST-716*）送约六十名中国部队登陆永兴岛。这时候，达金柳终于派「东京号」（*Tonkinois*）军舰载运一支部队赶到，但是已比中

国部队慢了两个星期。法国舰长先是收买、不成之后改用武力，甚至对空中开砲，要把中国人退走。註93中方坚守阵地、誓死不退，两国政府展开火爆的外交交涉。法国让步，下令船舰开走，驻军永乐群岛的珊瑚岛。国民党军队得胜，法军徒嘫负负。

固然有关西沙群岛主权的歷史和法律争论可以上溯到比一九四七年更久的从前，达金柳若是听从指示抢在中国之前占领永兴岛，这些岛屿或许有可能今天仍在越南人手中。接下来六个星期之内，达金柳穷兵黩武的策略导致越南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也因西沙群岛的命运让越南人和中国人长年交恶。法国政府非常不痛快，不久即把达金柳免职。他一手掀起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他却回归教会服侍上帝与加尔默罗修道会（Carmelites）。他一直活到一九六七年才在不列塔尼（Brittany）的修道院去世。

一九四七年一月之后，中、法两国分别占领西沙群岛的两半：国军固守永兴岛，法／越军据守珊瑚岛。但蒋介石的胜利恍如一场春梦。他的地位日益衰落，国民政府被迫退到台湾。一九五○年，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国军决定撤出永兴岛以及南沙的太平岛。法国殖民当局在中南半岛的气象局发现这两个小岛的气象报告分别在一九五○年五月四、五两天中止。註94法国晓得两岛已被弃守，但并未出兵占领它们，部分原因是怕会惹起和台北及北京不必要的外交争议，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大陆正在打一场棘手的战争。

一九五○年五月之后的五年，珊瑚岛是南海中唯一一个有任何国家驻军占领的岛礁。美、英、法控制了这片水域，尤其是在一九五○年六月开战后的韩战期间。北京根本没办法抗争他们的霸权。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放弃权利主张。到了一九五五年，解放军进驻永兴岛。毛泽东的部队悄悄地赢了蒋介石。可是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大声喧闹，他们的兴趣很务实：他们志在挖鸟粪送回国当肥料。蒋介石对南海诸岛的宏伟前景到了共产党眼里只剩一堆鸟粪。

一九五六南沙群岛：曾经的自由邦

托玛士．柯洛马（Tomas Cloma）看到的南海诸岛的前景也和鸟粪有关—再加上鱼罐头—但是他的梦以个人为重：他只想发财致富。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五公分，人矮志不低。他离开家乡保和岛（Bohol）到马尼拉当西装师傅助手，半工半读唸完高中，得到一份电报报务员的工作，再改行当船务经纪人，然后在一九三三年成为《马尼拉快讯报》（*Manila Bulletin*）航运版助理编辑。他白天写船运新闻，晚上唸法律系夜间部，后来在一九四一年通过律师考试及格。可是，日本入侵菲律宾毁了他似乎前途无量的法界生涯。为了家人衣食温饱，柯洛马出海走船

三年，运用身为保和人的捕鱼技能穿梭各岛运货、载客。家人熬过了战争，生活开始好转，不料六岁的儿子巴希里欧（Basilio）却在卡兰巴市（Calamba）的一场车祸丧生。托玛士的太太露丝（Luz）伤心欲绝，不再进教堂。托玛士埋首工作希望忘掉痛苦。

一九四七年三月，托玛士和露丝两夫妇，偕同他弟弟费勒蒙（Filemon）和三位朋友成立维萨扬渔业公司（Visayan Fish Company）。拿了巴希里欧身亡所得到的赔偿金，他们把几艘除役的美国军用拖船改装为渔船。他们雇用有经验的船员，监督着船员努力工作。生意很好，但是托玛士总是快人一步，注意到其他机会。一九四八年九月，政府公营的菲律宾航海学校（Philippine Nautical School）因罢工而关闭时，柯洛马成立菲律宾海事学院（Philippine Maritime Institute）和它竞争。学院可谓白手创业，在马尼拉巴石河（Pasig River）河口一艘驳船上课，它开三个月的课程，修业期间只有对手的一半。隔了一阵子，学院迁到一艘渔船上上课，它可以提供实习训练（当然维萨扬渔业公司也有了廉价劳工）。十八个月之内，学院得到政府正式承认，也在陆上租了教室授课。另一个点子来自于一场天灾。一九四七年，费勒蒙在巴拉望外海打鱼时遇上有史以来极为强烈的珍妮飓风，他被迫躲进一群神秘岛礁之中避险。接下来几年，两兄弟计划在那儿开设渔品罐装工厂，也准备开採鸟粪。

日后追记他们的冒险史时，托玛士．柯洛马会说，他遍查各种地图，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些岛屿的记载。即使今天，柯洛马在菲律宾仍经常被形容是「发现」这些岛屿的人。但是柯洛马一定晓得这不是事实。身为一份全国大报航运版助理编辑八年、在此之前又是国际航运经纪人，要说他不晓得菲律宾海岸外有这些岛礁，应该是不可能。

柯洛马或许可以宣称他不晓得有南沙群岛的存在，菲律宾政府可是早就知道了。记得它们曾被日军用来当入侵的跳板，地方报纸已一再要求政府採取行动取得它们。一九四六年七月，菲律宾一脱离美国而独立，当时的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季里诺就在记者会上宣布，这些岛屿攸关菲律宾国家安全，菲律宾将提出对这些岛屿的权利主张。註95一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季里诺已经是总统，他宣布这些岛屿属于菲律宾，但是又说，只要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仍然控制它们，菲律宾就不会强力提出主张。他可能不知道国民党部队其实在十二天前就撤走。他提出警告说，如果共产党进入，情势就会变化。然而，奇怪的是，菲律宾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会上并没有强力提出它的主张。註96我们很难相信柯洛马不晓得种种这些发展。

柯洛马有个重要盟友卡洛斯．贾西亚（Carlos P. Garcia），他们是保和省同乡、且是中学同学。贾西亚一九四六年当选参议员，后于一九

五三年成为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柯洛马与其兄弟为贾西亚的竞选举办募款晚会——而费勒蒙的儿子说，贾西亚以政府採购案及其他好处做回报。註97柯洛马纵横捭阖涉入国际政治的浑水时，这一层人脉关系就更加重要了。

有证据显示柯洛马曾从事走私，而一九五五年费勒蒙因囤积小型武器和炸药被抓去坐牢六个月。他在当年的圣诞节特赦时获释出狱，而阴谋对这些岛屿提出权利主张的计划继续进行着。註98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副总统贾西亚以贵宾身分出席费勒蒙率队出发占领岛屿的欢送会。註99贾西亚未能说服麦格塞塞（Magsaysay）总统政府的其他成员支持柯洛马，但是远征军照计划出发。三月十五日，费勒蒙一伙人高高兴兴在岛上登陆。註100两个月之后的五月十五日，托玛士发函给贾西亚以及各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自称拥有巴拉望海岸之外一块六角形水域（面积六万四千九百七十六平方英里），以及水域内所有大小岛礁沙洲浅滩（南威岛被刻意不列入）。他根据「发现和／或占领的权利」提出主张。接下来，六天之后，他发出第二个照会，宣布将此一地区命名为「自由邦自由地区」（The Free Territory of Freedomland）。

贾西亚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但是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麦格塞塞总统命令「在情况闹得不可收拾之前，制止柯洛马这齣闹剧继续下去」。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只有麦格塞塞一个人。法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代办杰克．波伊济（Jacques Boizet）起先称这起事件是「跳樑小丑的无理取闹」，但是警告说，如果共产中国决定干预麻烦可就大了。幕后究竟发生什么，我们迄今仍不清楚。菲律宾政府的许多纪录后来在火灾中焚毁。法国地理学家法朗索．沙维耶．波奈特（Francois Xavier Bonnet）专门研究这段时期，得出的结论是：贾西亚和麦格塞塞虽然公开上意见分歧，其实是在唱双簧：贾西亚支持柯洛马，而麦格塞塞与台湾政府进行高层协商，试图控制住情势。註101总统府发出正式公报表明，柯洛马是以个人身分动作、菲律宾政府并没有宣称拥有这些岛礁。但是柯洛马的行动固然在某些人看来显得荒唐，它们的确非常刺激另一些人，引起的一系列事件连锁反应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本地区。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宣布绝不容忍任何对这些岛礁的侵犯。这时候法国已退出越南，而越南也「暂时」分裂为共产主义的北越和资本主义的南越。六月一日，南越（越南共和国）谴责柯洛马的行动；次日，法国也加入，重申它本身对这些岛屿自一九三三年即提出权利主张，迄今从未放弃。但是，托玛士．柯洛马不为所动。七月六日，他发布「自由邦宪章」（Freedomland Charter），形容他这个新国家是个独立的实体，寻求菲律宾正式承认，纳为「保护国」。他脑子里的模式是当时的汶莱，具有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托玛士自命为国家元

首，独掌全部行政权力。他的儿子、朋友被任命为内阁部会首长。他也高挂起「自由邦」国旗，从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它挺不吉祥地以一头白色信天翁为记。

次日（七月七日），为了确保讯息实在送达，托玛士．柯洛马率领他儿子杰米（Jaime）和几个海事学院学生来到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把杰米号称从太平岛降下的中华民国国旗奉还（太平岛也被他改名为麦克阿瑟岛）。这个动作挑激起台北的抗议，菲律宾政府亦加以批评。是可忍，孰不可忍！八月二十二日，南越海军派一艘船前往其中之一个南沙岛屿立碑、插国旗。註102中华民国也决定彻底解决柯洛马，派姚汝钰率舰队前往南沙。註103双方在号称「危险」的地方碰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一大早，菲律宾海事学院船队四号船下锚泊停在双子群礁（位于「自由邦」最北端，柯洛马将它改名为Ciriaco Island），被中华民国海军两艘军舰堵上。费勒蒙．柯洛马船长被「邀请」到其中一艘军舰上谈话。双方在舰上辩了四小时国际法──同一时间，中华民国人员登上四号船，没收所有武器、地图及相关文件。註104次日，费勒蒙又被邀请过去，要他签署一份声明承认擅闯中国领土，保证绝不再犯。费勒蒙的儿子说，他老爸是被迫签字的。中华民国海军军舰离开，而费勒蒙的船员检查附近几个岛──发现他们原先盖的一些结构体都被拆了。註105

托玛士．柯洛马哪里是这么好对付的人。因此他在十月份亲自杀到纽约，企图向联合国提出告诉。但是这时候菲律宾政府也已经忍受不了他的胡闹。在华尔道夫旅馆（Waldorf Astoria Hotel）咖啡厅举行记者会后，柯洛马被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瑟拉诺（Felixberto Serrano）拉到一边去，正色告诉他，唯有被承认的政府才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而菲律宾绝不会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贾西亚和国内外交事务协会的盟友还在进行最后一刻的游说，希望说服麦格塞塞总统回心转意，但是没有成功。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贾西亚写了一封措词谨慎的信给柯洛马，信中相当武断的区分公认的「南沙群岛」七岛和其他的地貌，他把后者称为「自由邦」。他说，他代表外交部（不是政府）讲话。他又说，欢迎柯洛马对于自由邦之内未有人占住的任何岛礁提出主张，只要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已获得承认就行。这话说了不等于是白说？一点意义也没有。註106

托玛士．柯洛马和国际政治的瓜葛到此应该可以落幕，可是整齣自由邦大戏还有一个很意想不到的结局。一九五六年以后，柯洛马把精力投入经营事业，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建国大梦。他很喜欢被人称为「海军上将」，每当菲律宾海事学院重大活动，就穿上一身雪白制服亮相。不过，慢慢地，他的远征故事从民众记忆中淡化。然而，一九七○年代

初，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总统却又注意到这个议题。一九七○年，巴拉望外海展开石油探勘，而一九七一年七月，菲律宾部队在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Nanshan Island）、费信岛（Flat Island，又称平岛）三个岛屿登陆（菲律宾名分别为Pagasa、Lawak、Patag）。他们也试图在太平岛登陆，但是被台湾守军赶走。[註107]同月，马可仕下令军方成立「西方司令部」以保护菲律宾在本地区的利益。

就在这段期间，菲律宾政府首度试图就这些岛礁主权订出统一的立场，但是其主张依据的地理和法律基础相当不可靠。首先，它依循贾西亚的思维，声称涵盖在自由邦之内的区域与国际上所称的南沙群岛是不同的。其次，它主张基于托玛士和费勒蒙．柯洛马两兄弟二十五年前的活动，菲律宾拥有自由邦。托玛士．柯洛马一看，机会来了，于一九七四年一月投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吁请政府支持他当年上告国际法庭的举动。马可仕注意到这个消息，次月邀请柯洛马到总统府喝咖啡，说服他承诺让渡这些岛屿。问题关键就是一份合同和讲好售价罢了。柯洛马聘请三名政客做他的法务代表，谈判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已经高龄七十的柯洛马被请到柯拉密营区（Camp　Crame）的全国警察总部。约谈进行好几个钟头，托玛士．柯洛马被送进三号看守所。大约同一时候，政府没收他旗下一艘船「菲律宾海军上将号」（*MS　Philippine　Admiral*），使他的航运公司损伤惨重。隔了几天，柯洛马被告知，将因「不法穿军服、佩军阶」遭到起诉。马可仕的戒严政府拿「海军上将」的闹剧大做文章。柯洛马心知肚明政府项庄舞剑，志在自由邦。他力顶五十七天才认输。最后，他签了一纸契约，索价一披索，把自由邦转让给菲律宾政府。

马可仕把自由邦改名为卡拉扬群岛（Kalayaan　Islands）□□卡拉扬这个塔加洛字义即自由——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又发布一五九六号饬令，把卡拉扬设为巴拉望省辖下的一个县。这个县今天还存在，只不过一年下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巴拉望岛普林塞萨港（Puerto　Princesa，意译公主港）郊区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本书撰稿时，菲律宾军方占领九个岛礁，并虎视眈眈其他岛礁。菲律宾所占领的面积最大的岛是Thitu岛，中文名中业岛，现已被改名派格阿萨岛（Pagasa），即菲律宾语意希望的意思。岛上现在立了一座托玛士．柯洛马的雕像，它位于跑道旁边，哀怨地望着大海，还有那片有几年号称属于他的领土。一九八七年七月，马可仕政府被推翻后，柯洛马和他的副手向民主选举产生的柯拉蓉（Corazon　Aquino）总统政府申请国家赔偿，索价五千万披索。托玛士．柯洛马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去世，并没有得到政府任何回应。他的鸟粪和鱼罐头帝国大梦一直没有实现。

一九七四甘泉、金银，与珊瑚岛：中越西沙海战

在某些人看来是闹剧，托玛士．柯洛马的活动却重新点燃各方对南沙群岛的焦虑。台湾在撤退六年之后，于一九五六年重回太平岛，动机和一九四六年首次派海军远征相同，都是民族主义。下一波夺岛风波是马可仕在一九七一年下令菲律宾部队夺占三座岛屿，其动机是石油。隔了两年，南越也是为了石油加入竞逐。阮文绍总统正在试图打赢反共战争，而且还得同时力挽经济狂澜，军事开销太大、美援迅速减少，已逼得他焦头烂额。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也就是美国国会议决禁止美军在中南半岛再有任何作战活动的一个月后，南越发出第一批石油开发特许。在它南方及东方外海有八个区块批给了美孚（Mobil）、艾克森（Exxon）、一家加拿大财团和壳牌（Shell）的子公司佩克登（Pecten）。一九七三年九月，为了保护探勘，南越正式兼併南沙群岛的十个岛礁，并派出数百名部队进驻南威岛和鸿庥岛（Namyit Island）□□后者隔着潟湖与太平岛相望。台北和马尼拉立即高声抗议，北京则静观其变。[註108]

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权衡某些重大的全球及区域变化的后果。虽然大家名义上都是共产党，北京、莫斯科和河内政府彼此关系绝对不算兄弟同心。中国和苏联的意识型态分歧于一九六○年代已经日益恶化，双方还在一九六九年打了一场边境战争。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威胁比美国还大。同时，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认为在全球抗苏斗争中，中国可以是有用的盟友，遂开始拉拢中国。[註109]他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北京，替尼克森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敲锣打鼓访问铺了路。

北越发现自己陷身在美、中、苏三角关系当中。北越长久以来试图平衡它和莫斯科及北京的关系，以便好好对付华府撑腰的南越。中苏两方都提供武器、援助和顾问意见，但是河内不愿被任何一方綑绑住。越南当代的国家认同意识大体上建立在上千年反抗中国的歷史根基上。河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心绝不再做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而且，中、越之间也有政治歧异。河内决心解放整个越南，而北京则希望河内打长期持久战、牵制住美国。[註110]因此之故，河内开始往莫斯科倾斜。

有两个顾虑让中国担忧。如果河内赢得战争，苏联舰队或许就能进出南中国海的基地，有可能扼住中国供应线的咽喉。其次，如果南海发现石油，别人会抢在中国之先控制它。从北京的角度看，谁控制西沙群岛就能控制华南的进出孔道，并于其周遭水域寻找石油。这时候的西沙群岛仍分属不同国家：宣德群岛归共产中国占有，永乐群岛被南越控制。然而，南越政府关心大陆事务、远胜于这几个海上岛礁。珊瑚岛上

的驻守人员只不过是个气象站、一小撮卫兵，加上一群山羊。可是，宣德群岛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一九七○年开始，中国勘查了所有岛屿，并于永兴岛兴建新港口。它是日后一项让静悄悄的美国人登上新闻版面的作业之起始点。

吉拉德．柯许（Gerald Kosh）相信美国在越南的使命。他高中毕业立刻志愿从军，甘迺迪总统的演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鼓舞着他。他的父亲是二战退伍的伤残军人，并不贊同，但是柯许心意已决。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从伞兵特战学校毕业，结业成绩优秀，立刻被派到越南。他被调到特战部队，积功升为绿扁帽部队上尉。他是长程侦察巡逻作业的老手，可说是美国丛林战士的代表。他在役期期满后留营，派到陆军第十特战群，不时会回到东南亚去训练反共部队。

据他家人说，他退伍后不喜欢平民生活。百无聊赖的他身怀三百美元回到越南，因为美国大使馆答应给他一份工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驻西贡海军武官委派他为十二名驻区联络官之一，负责监督移交给越南政府的美国军事器械使用情形。他的报告一定令人读来甚觉不安，尤其是当年一月正式实施的停火已经瓦解。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阮文绍总统宣布越战重新开打。

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发言人重申北京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西贡几乎没有人注意它。如果说华府对于随后的发展有什么知觉，它可没有表露出来。毛泽东的远见是在中国的南方外海取得战略据点，俾便在西沙群岛附近寻找石油。北京和北越的关系正在快速恶化，而南越已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一九七四年一月是北京可以不虞结果、採取行动的良机。对于季辛吉和尼克森而言，相较于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南越拥有岛屿的命运实在微不足道。美中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对于冷战的重要性，可要比西贡的命运大出太多。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军事行动已经筹备了有一阵子。一九八七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海军官方歷史告诉我们，命令来自最高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九七三年下的命令。他们把任务交付给邓小平。日后邓小平将是中国实质的领导人，但是当时他刚经歷六年的政治流放、被召回北京不久。准备工作列入高度保密，但是我们根据后来由吉拉德．柯许执笔、今已解密的一份美国军事文件获悉，解放军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左右开始接受训练。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广西的港口北海有个暗桩，他报告此时安全戒备提升━不过它和后来发生的事之关联，也是日后才被断定。从十二月中旬起，观察到每天有数百名突击队坐六艘捕鱼拖网船出港，晚间才回来。它持续了十天左右。到了一月初，他们已经做好行动准备。註111

越南人正在准备过农历新年时，消息传到西贡：西沙附近出现不寻

常的船只活动。一艘越南海军军舰奉派前往查明究竟。一月十四日星期一，最高司令部的担心得到证实。两艘中国拖网渔船在甘泉岛外三百公尺处下锚。突然间，南越海军必须改弦更张。它们习惯支援陆军在陆地的作战，或是在湄公河三角洲河道巡逻，现在却可能要展开海上作战。同时，海军指挥官也不能排除中方此举是分散注意力的动作，旨在掩护共产党部队在陆地有所突破。

很显然，南越已提高戒备。一月十五日星期二，阮文绍总统本人亲临岘港的海军总部视察。註112当天某时，岘港美国领事馆的杰瑞．史考特（Jerry Scott）接洽地区海军司令官、老朋友胡文琦话（Ho Van Ky Thoai）少将，提出特别要求。他的部下，即驻区联络官吉拉德．柯许，能不能随即将前往西沙群岛的军舰出海？越方立刻答应，柯许遂坐上HQ-16号。註113美国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送给越南七艘海岸巡逻队快艇，HQ-16号是其中之一。虽然下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船上的五吋砲已经让它们成为越南海军火力最强大的军舰。

次日，HQ-16号要把十四名越南海军突击队员送上甘泉岛。可是当他们抵达晋卿岛和琛航岛时，发现已经来迟了。中国部队已经上岸，支援船只守在附近。情况紧急报回岘港。当天夜里，越南外交部长公开谴责中国占领岛屿，并宣布保留权利採取必要应对措施。註114

幕后则是一片慌乱。南越海军第三号高阶军官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杜剑（Kiem Do）力促迅速、果决採取行动。他回忆说，他向长官陈文真（Tran Van Chon）将军进言：「如果我们现在採取行动，可以夺回这些岛屿。」註115据杜剑的说法，陈文真却吓住了，要求要能证明越南自古即拥有这些岛屿。时间在流逝，杜剑却被迫在海军图书馆和档案柜翻箱倒柜找文件。在此同时，杜剑透过官方的美军联络官，正式要求美军第七舰队组起一道拦阻线阻止中国海军靠近这些岛屿。但是美方没有动作。越南人只能靠自己。

一月十七日星期四，十五名海军突击队员在金银岛上岸。永乐群岛的七个小岛，现在越南部队占了三个，解放军占了两个。南越海军又紧急调三艘船驰往西沙群岛：HQ-5原本也是一艘美国海岸巡逻队快艇、HQ-4原本是美国海军驱逐舰佛斯特号（USS *Forster*），配备三英寸砲，HQ-10原本是美军扫雷艇宁静号（USS *Serene*），改装成巡逻船。到了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四艘船全部赶到现场，就定位。舰队指挥官何文鄂（Ha Van Ngac）上校决定展示力量，试图派突击队登上琛航岛。四艘中国船舰守在一旁，两艘轻型军舰（俄国制，一九五○年代造来驱赶潜水艇用）走在前头。它们用信号灯以英文提出歷史主张：「这些岛屿自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所有。没有人可以否认。」越南人的回答没那么书卷气：「请立即离开我国领海。」双方一来一往僵持搞了几分

钟，然后这两艘中国轻型军舰停止上歷史课，改为冲向越南船只的航道前进之路，较量谁的胆子更大些。何文鄂上校决定不玩了，放弃登陆。第一回合，中方胜利。

那个星期五夜里八点钟，吉拉德．柯许被请到HQ-5号和何文鄂以及一群随船队出发的南越陆军工兵会面。何文鄂告诉他，战火一触即发，非战斗员应该下船、移到岸上去。柯许和工兵们被送到珊瑚岛，和岛上的气象站人员及守军等候战事结束，他们分到一些补给品和十盒Capstan香菸。当天夜里他们在气象站睡下时，岘港发来密电给何文鄂。命令内容矛盾：「和平取回琛航岛。」这支四艘船的船队加上少许突击队员要如何说服比它强大的中国舰队和已经布好阵地的地面部队乖乖离去，指令上可没说清楚。何文鄂决定翌晨登岸。一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点钟，二十名突击队分别坐上两只浮艇驶向岸边，预备和中方交涉，要求他们离去。上午八点二十九分，来到沙滩了。当他们涉水上岸时，中方开火，当场打死一名突击队员，第二名突击队员想救回同袍尸体，也被打死。南越突击队只好撤退。

何文鄂发电报请示上级。杜剑在西贡的海军总部里要找陈文真将军。陈文真不见了。助理告诉他，陈文真将军搭飞机到岘港去。杜剑打电话到岘港找陈文真的副手。他也不见了──前往机场接上司。岛屿的命运悬于一线之间的紧要关头，南越海军最高阶的两位军官都不见了。最后，杜剑下令反击。他又再次要求美军第七舰队援助。美军还是不动如山。

因此，上午十点二十九分，突击队员遇害两个小时后，四艘越南船舰向六艘中国船只开火。双方彼此距离只有一英里。对越方而言，不幸的是，HQ-4的前砲故障，它很快就被中国轻型舰击中。HQ-5严重击伤另一艘轻型舰，但是本身很快也中弹。十五分钟之后，HQ-5误中友军HQ-16。砲弹打到吃水线以下的引擎舱，HQ-16很快就失去电力，呈现二十度倾斜。接下来，HQ-5又中弹，失去砲塔和无线电。最后，四艘中最小的HQ-10也被中方火箭推动榴弹打中，舰桥受损、舰长阵亡。半小时之内，虽然重伤两艘中国船舰，越南舰队完全失去战力。HQ-10沉没，另三艘勉强回到岘港。任何独立的评估都会说在这场遭遇战中，越方一败涂地；但是他们受到英雄凯归的欢迎。越南媒体被告知，他们击沉两艘中国船舰，还驱退比他们强大的中国舰队。其实这是指鹿为马的捷报，赶上庆祝农历新年。

这个时候吉拉德．柯许和越南人控制的三座岛上的众人，只能等候命运之神的决定。位于金银岛和甘泉岛上的两组突击队员都是歷经百战的老兵。但是，珊瑚岛上的气象人员和卫兵可没有见过大阵仗的实枪实弹交锋。只有柯许尝过作战的滋味。他们不用等太久。柯许非常佩服地

观察中国部队抢攻作业的专业表现，特别是和越南守军的进退失据对比时。他观察解放军对两英里外的甘泉岛登陆的准备。上午九点，三艘中国砲艇在外海就定位，一小时之后开始有系统地砲轰甘泉岛。半小时之后，两艘拖网渔船开来。它们船舷号码经核对就是一个月前被观测到在北海受训的那几艘船。

每艘渔船至少有一百名士兵出现在甲板上，他们放下深灰色的橡皮艇。柯许用望远镜遥遥观测，六到八名士兵用绳梯爬降到每只橡皮艇上。三十只橡皮艇旋即形成攻击阵式，划桨向前。它们一过珊瑚礁，有一只橡皮艇发射红色信号弹，船舰即停止砲击，转向珊瑚岛前进。登陆部队继续以密集队形向滩头前进。越南海军突击队开火，但没有造成伤亡。解放军的优势兵力与越军相比是十比一，用不了多久，越军投降。柯许所不知道的是，金银岛上的突击队早已料到大势不妙，在被俘之前即已逃之夭夭。歷经九天，橡皮筏在海上漂流两百英里后，渔民在越南海岸外三十五英里处救起他们。

解放军把注意力转向珊瑚岛，柯许对他们的进攻作业更加尊敬。珊瑚岛同样先遭一阵砲击。砲弹如雨，柯许和越南人必须在气象站附近躲了近一个小时，幸好没人受伤。接下来，来了两艘拖网渔船，另两百多名士兵划着橡皮艇登陆。柯许躲躲藏藏，仍不放弃观察他们如何有系统的搜查全岛—每个单位都专注分派的特定目标。一小时之内，作业完成。共产中国第一场海路入侵战大获全胜。

对柯许而言，情势非常不妙。他要怎么解释他这个老美出现在西沙群岛呢？中国人肯定会认为他是间谍，严加查办。中央情报局两个官员约翰．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费袭（Richard G. Fecteau）一九五二年因为在空投补给中国境内反共叛军时飞机遭击落，足足坐牢关了二十年，最近才获释。他告诉解放军，他是平民、观察员，来岛上是要评估工兵的计划。他们把他送到海南岛，再转到大陆。

这时候，越南人和美国人都乱成一团要找出他的下落。季辛吉明白事态紧急，在一月二十三日邀请中国驻华府代理「副大使」谈话。根据解密的会议纪录，柯许列在议程第一项。季辛吉明白表示美国对西沙争议的是非对错不持任何立场。他也告诉中方准大使，尽快释放柯许，「且就美国来说，此举肯定就会化解紧张局势。」註116

柯许被关了一个星期，季辛吉的交涉产生效果。一月二十九日，柯许和四名越南俘虏跨越边境进入香港（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美国官员花了好大劲才挡住记者发问。记者被告知，他得了肝炎，必须检疫隔离。他被直升机送到机场，立刻后送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Clark Air Force Base），再转送到美国的费城海军医院。他不接受媒体任何访

问，反而把精力投入到替陆军的「特别研究小组」（Special Research Detachment）撰写有关共军进攻作战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隔了二十年才解密。

柯许仍然斗志高昂。住进海军医院的一个月后，他已经又回到越南岗位上。越南任务结束后，他以民间包商身分到西奈半岛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工作；后来又接了几个其他海外任务，咸信他保持撰写报告的活动。可惜天不假年，吉拉德．柯许无法享受长久、快乐的退休生活，和大家分享全世界最精彩的战争故事。把一生奉献给报效国家的他，甚至可说在越战打到最后一刻的他，成为越战伤亡官兵之一员。身为绿扁帽特战部队一员，经常在丛林里执行长程巡逻任务，他吸进了太多橙剂—美军为了破坏丛林植物、让敌人无法藏身其间而洒下的除草剂。橙剂含有戴奥辛，毒性极强。二○○二年，吉拉德．柯许以五十六岁之龄，死于美国飞机三十年前喷洒的化学药剂。

一九八八赤瓜礁：刘华清的「绿水」战略与中越海战

毛泽东对这些岛屿的期望落了空。西沙群岛周围迄未找到石油，而它们的战略价值也有待证明。占领永乐群岛并没能够阻止苏联海军在河内打赢越战后去使用越南的金兰湾，而这正是北京念兹在兹所担心的一点。永兴岛、珊瑚岛上的迷你基地几乎无险可守。英国皇家海军早在一九四○年代就是如此评估，此后美国海军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些疑点并没有停止各方进一步占领。西沙群岛遭侵略之后，南越政府急忙增派部队驻守南沙诸岛。至少派了一百二十名部队占领五个小岛。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进一步动作。事实上，它还降低冲突，隔不到几个星期就释放了从西沙抓来的所有俘虏，也停止了民族主义的骂阵。但是北越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西沙海战保持沉默，私底下却相信北京有意占领更多岛礁。一九七五年四月，也就是西贡沦陷之前三星期，河内夺下南越所控制的六个南沙小岛，以确保它们不被中国窃取。驻守南子礁（Southwest Cay，越南人称之为Dao Song Tu Tay）的南越部队中尉不愿被俘，游了三公里逃到菲律宾人占领的北子礁（Northeast Cay，菲律宾人称之为Parola Island）。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北京和河内为南海诸岛起争议的新闻首度公诸于世，中国的《光明日报》批评越南人的领土主张。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远至南沙群岛进行持久的军事行动。接下来几年，北京巩固它在西沙的阵地，于一九七八年在永兴岛扩建港口、并开闢跑道。十年之后，它就具备不容小觑的实力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军的头三十年一直都是次要军种，专注沿海防御。北京领导人认为任何战争都得靠陆战决胜负，海军的角色就像海上游击战：数百艘小船从四面八方袭扰来犯之敌、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一九七四年的西沙作战非常不寻常，因此需要好几个月的特殊训练。）但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上有邓小平做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下有刘华清主持海军，推动了重大改革。刘华清自幼就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在最敏感的军中政治及反渗透部门，以及国共内战对付国民党的斗争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註117战争使他接触到邓小平，他们的伙伴关系变成相得益彰。引述约翰．贾维尔（John Graver）教授的话来说，接下来十年的故事是「官僚和国家利益的互动」关系註118，或者，套用《第22条军规》（*Catch-22*）中的角色迈洛（Milo Minderbinder）的话：「对刘华清有益，即是对海军有益；对海军有益，即是对中国有益。」邓小平希望中国恢復经济实力──这需要资源与可靠的贸易通路。他也担心国家会有遭遇苏联及其盟国（如越南）包围的危险。刘华清雄心勃勃，和其余的海军领导人都想出名。扩大中国在南海的地位是他们全都乐于追求的目标。

毛泽东追求独立自主，在远离外来威胁的中国内陆发展工业。邓小平和他不一样，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重视贸易，因此偏向沿海。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于一九八○年设在香港附近的深圳，一九八四年在其他沿海城市又设置另十四个经济特区。最早开放给外人投资的产业就是外海石油开发；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头两轮招商开标，就集中在香港和海南岛外海区块。邓小平的政策得依赖保持国际贸易路线的畅通，因此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可能是出于刘华清的建言，他下达第一道要求海军筹备长程任务的指示。

刘华清一接任海军司令员，就制订一项他称为「积极绿水防御」的战略。它指的是控制内陆「褐水」和远洋「蓝水」之间的海域，俾能进行纵深防御，屏障快速增长的沿海城市不受攻击。註119刘华清界定「绿水」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海域。他所谓的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到台湾，再延伸到菲律宾、婆罗洲和新加坡。新船陆续下水服役，华南海岸和西沙这一路的基地扩建，另外亦努力蒐集情报。根据中国海军自己发表的歷史，一九八三年四月，国家海洋局奉命开始勘查南沙群岛以北的情况。五月间，两艘海研船一直跑到曾母暗沙──离海南岛一千五百多公里、距马来西亚海岸仅有一百公里，淹在水面下的珊瑚礁，可是中国宣称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船上有几十个领航员和海军官校教官。註120一九八四年，海研船勘查了南沙绝大部分海域，几乎直抵菲律宾海岸。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支船队航行远达南极洲。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国海军已经准备好进行远征作战。

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它愈来愈要依赖南海，可是又在南沙群岛失去优势。一九八三年六月，马来西亚继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之后也占领岛礁。对于一个要在南海寻求前进基地的海军来讲，中国的选择愈来愈少。而且事不宜迟，应该要採取行动了；何况时机也合适。中国经济成长蒸蒸日上，为海军提供更多资源。戈巴契夫的改革终结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中美关系也进入空前融洽的阶段。中国若是挑激起和越南的冲突，不虞会有损失。自从越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入侵柬埔寨，而中国在两个月后攻打北越以示惩罚以来，中越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太大好转。註121由于一直占领柬埔寨，越南在国际间陷于孤立，除了口头支持之外，它的主要盟友莫斯科恐怕也帮不了它。根据中国事务观察家泰勒．佛瑞维（Taylor Fravel）的说法，北京在一九八七年初决定要占领领土。註122现在所缺者就是藉口。

一九八七年三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观测全球海洋，要求各国设立监测站。没有人一即使是越南人一注意到中国所提议的一个监测站设在南沙群岛。四月四日，中国科学院派出一团人勘查各岛礁。五月间，中国海军派出一支舰队加入他们，沿路还进行补给和作战演练，然后在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放置水泥块，宣布它是中国领土。接下来几个月又进行了许多调研，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北京领导人核准在永暑礁上盖一座观测站。就一个民间研究中心而言，很不寻常的是，营建计划包括一座两层楼的军营、一座码头、一个直升机修护棚和起降台。

任何人要盖研究站，第一个选择都不会是永暑礁。涨潮水位最高的时候，除了西南角冒出一块约一公尺高的岩块外，整个岛礁几乎全沉在水面下。这块尖锐的珊瑚礁长二十五公里、宽七公里。它还没有被占领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几乎没有东西可占领。但是这一点阻挡不了刘华清的海军。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四艘中国船载来工程人员和建材，开工兴建近似于干燥地面的东西。次日，来了一艘越南船查看究竟怎么一回事，但是没发生冲突，它就走了。註123

直到当天之前，越南人可能觉得他们在南沙群岛可以高枕无忧：他们把值得占的全都占了。从永暑礁南方七十二公里的尹庆群礁（London Reefs），到在它东方约九十三公里的九章群礁（Union Bank），只要是冒出水面的，全叫越南人给占领了。永暑礁只不过是回家的路上一个航行障碍罢了。但是他们低估了中国海军的工程能力。九天之内，新来的工程人员证明了他们填海造地的本事，他们从珊瑚礁上炸开水渠，然后挖出足够的珊瑚废石，营造成八千平方公尺的干燥地面。註124

越南人这下子才大梦惊醒，赶紧在一月三十一日派两艘船载了一支部队在永暑礁登陆。但是在恶劣天候和中方人数优势下，任务失败。二

月十八日，中方更进一步派出水兵登陆尹庆群礁上越南人唯一没有占领的地貌：华阳礁（Cuarteron Reef），在水平面上约一公尺半的豌豆状岩块突出物。越南人怒不可抑，河内公开抗议：华阳礁离他们最近的据点只有十九公里。越南媒体提出警告，中国若不退出这两个岛礁，将面临「一切后果」。怒海滔滔，却比不上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大约一个月后，越南人深怕重演华阳礁事件，派兵占领九章群礁上他们尚未占领的地貌。九章群礁是一大片水底礁盘，面积约四百七十平方公里，冒出水面的珊瑚礁大大小小约三十一个。九章群礁中唯一最接近人们所界定的「岛」的地貌，是景宏岛（又称辛科威岛，Sin Cowe Island），一九八八年越南派兵驻守。景宏岛东南方十七公里是赤瓜礁（Johnson Reef，越南人称之为Da Gac Ma），它大部分淹没在水面下，只有几块岩块冒出水面，最高的也只有突出水面一公尺。赤瓜礁往北不到两公里是鬼喊礁（Collins Reef，越南人称孤伶礁，也称北赤瓜礁〔Johnson Reef North〕）、往东北十五公里是琼礁（Lansdowne Reef），两者同样不宜人居，涨潮时也大多淹在水面下。[註125]

三月十三日夜里，越南海军派出三艘军舰分头前往赤瓜礁、鬼喊礁和琼礁。对于船上的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些「生锈的老旧水桶」[註126]被中方侦察到，并派出更大、更重型武装的船只去拦截它们。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天刚破晓，越南人成功抢占鬼喊礁和琼礁（直到今天还控制着它们）。但是赤瓜礁方面就惨了。事情的前后确切经过迄今仍有争议，但是大约是越南人先登陆，小船载来营造机具，并在石礁上竖立国旗。中国部队赶到，想拔掉越南国旗。双方先是互相叫骂，继而动拳头打群架。中方的说法是，越南士兵先开枪、打伤一名中国士兵，后因越南船只以机关枪开火，中方只好撤退。越南人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说中方杀了越南登陆部队副指挥官，然后在他们的船开火前就撤退了。奇怪的是，中国海军二○○九年庆祝建军六十周年发表一份宣传影片，却多所符合越方的说法。这个录影片现在在YouTube上还看得到，它从一艘中国船上拍摄，显示潮水升起覆盖岛礁，而越南士兵站在水中、水位及膝。然后在中国船只开火下，越南部队周围溅起大片海水。几秒钟之内，人完全消失了，六十四人陈尸于水面上。机关枪火来自中方，吃子弹毙命的是越南人。中方赢了赤瓜礁战役。

支援越南部队的三艘船也被摧毁，往后几个星期，中方可以放手作为。他们已经占领永暑礁、华阳礁和赤瓜礁等三个岛礁。到了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中方再占领三个岛礁：一是西门礁（Kennan or McKennan Reef）□□九章群礁的一部分、位于越南人占领的景宏岛东方十九公里；二是渚碧礁（Subi Reef）□□距离菲律宾占领的中业岛只有十五公里；三是南薰礁（Gaven Reef）□□它是郑和群礁（或称堤闸滩，

Tizard Bank）的一部分。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太平岛，即唯一由台湾占领的岛礁，以及越南人占领的鸿庥岛，也都是郑和群礁的一部分。

这份名单显示中国国家为这项作业投入的计划和资源的程度。不畏武装抵抗和恶劣天候，短短两个月内，它占领多半时间淹没在水面下的六个珊瑚礁，继之兴建居住平台、补给设施和防卫阵地。甚且这六个岛礁每一个都扼住战略位置，距离中国对手所控制的大岛只有几公里，而且在一九八八年以前，每一个岛礁都完全没有被人占领过。中国的勘查团做的调研工作十分翔实。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不仅只是取得立足点。

刘华清得意洋洋。现在他的「绿水」战略完全实现。邓小平赏给他海军上将军衔、党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全国人大委员。四年之后，邓小平退休，刘华清更上层楼，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这些职位上，继续推动给予海军更多资源。他要求（也得到）更大的舰队、更好的技术，以及支持他的「蓝水」海军的大梦。但是，中国做为一个整体，得到了什么？它现在在南中国海有了新基地，它还要什么？最多只能说，这些占领已阻止其他国家推进其地位。没有人能在这个区域挖掘石油或垄断捕鱼作业。然而，尽管中国投入种种努力夺取岛礁、打造基地，它也不能独霸南海。

一九九五美济礁：中菲海战

菲律宾总统罗慕斯（Fidel “Eddie” Ramos）打从当选那一天起，就必须和一股强大的反美意识斗争。由于痛恨华府早先支持马可仕的独裁专政，加上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浪潮，菲律宾参议院在一九九一年九月表决通过，把美国赶出它的两个巨大军事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其实已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关闭，皮纳土波火山（Mount Pinatubo）爆发，基地已经被数千吨的火山灰所掩盖。表决只代表它再也不用修理了。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条旗最后一次由苏比克湾海军基地（Subic Bay Naval Base）降下。次日起，菲律宾实质上毫无防卫力量可言。更惨的是，美国每年补助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款项也没了。经费不足多年之下，海、空军根本无从填补美军撤走后留下的真空。这个岛屿星罗棋布的国家，海军只有五十艘左右二次大战美军留下来的老爷巡逻舰和运输舰，空军只有五架一九六六年出厂的F-5喷射机堪用。

经济停滞多年，政治动盪三不五时闹一闹，罗慕斯盼望能利用菲律宾迄未开发的石油潜力拯救人民脱离贫困。一九七○年代初期第一波探勘以来，菲律宾人就满怀期待，盼望外海富藏石油。因此，罗慕斯政府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秘密核准菲律宾「爱尔康石油公司」（Alcorn Petroleum）□□它是美国「瓦阿科能源公司」（Vaalco Energy）的子公司──的申请，准它就巴拉望外海某一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进行书面

评估。虽然它没有涉及到在海上的勘查或钻探工作，恐怕已违反「马尼拉宣言」（Manila　Declaration）。马尼拉宣言是一九九二年当时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六个会员国彼此之间的协议，承诺大家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要节制。一九九二年，中国已把更靠向西边地区的钻探权批给了美国公司「克瑞史东」（Crestone）；越南也把几个区块开採权给了美国「康纳可」公司（Conoco，全名康乃狄克石油公司），而且这些区块还和克瑞史东的区域有些重叠（更多详情见本书第五章）。纵使如此，消息一传出去，中国立即提出抗议，认为菲方此举侵犯中国主权。区域危机的导火线已经点燃。

艾利普斯坦（Joefel Alipustain）船长是第一个尝到苦头的人。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他和渔船「安娜丽塔号」（*Analita*）的船员照常作业，却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眼前赫然是四个大平台靠巨大的高脚架支撑，比水面高出数公尺，平台上各有三、四个八角形碉堡。在船员传统的渔场里，飑风季节涨潮时会被淹没的一个马蹄形岩礁群，现在被占领了。占领者很不高兴竟然被发现。安娜丽塔号船员立刻被对方的船只团团包围。他们大吃一惊，这些人竟然是中国人，比起前几个月，他们往菲律宾又更靠近了一百一十四公里。船员们被扣了一星期，然后被迫切结不把他们发现的情况告诉别人、才得以脱身。当然，安娜丽塔号一回到家，切结书就被丢了，全世界很快就晓得他们在美济礁（Mischief　Reef，菲律宾人称之为Panganiban）遭到扣押。註127美济礁位置在哪里？几乎恰恰就在爱尔康石油公司勘查地区的正中央。註128

菲律宾政府矢口否认发生状况。「真相并非如此，」他们这么坚持。政府这时候忙着处理别的事情。马尼拉正在主办歷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督徒集会：四百万人参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主持的弥撒。（亚洲地区同一个星期也发生神户大地震，转移了新闻的焦点。）直到教宗离开菲律宾，罗慕斯政府才把注意力转到海上事务。海军派了一架飞机去查看，找不到有什么高脚结构上的碉堡的迹象。中国人的否认又不一样：根本没有扣押菲律宾渔船这一回事嘛！而且美济礁上也没有什么基地呀！但是，二月九日，罗慕斯政府掌握到照片证据，出示给全世界媒体看。中方改口了。是的，是有些结构体，他们承认。不过，那是渔业部门盖的，跟海军无关。可是，这个说法解释不了房子为什么会有人造卫星天线、为什么岛礁附近有八艘海军武装运输舰。接下来，他们告诉菲律宾当局，基地是「低阶」海军人员盖的，没经过上级核准。註129但是要让人家相信数百吨的木材、钢铁、预铸房屋、通信器材，以及盖四个基地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可以不经正式批准运到几百公里外的汪洋大海去，那才真是活见鬼。註130

马尼拉方面当然气急败坏，但是更惨的是他们完全无能为力。马可仕总统垮台、冷战结束之后，民众和政客就以为菲律宾不会有任何外来威胁，并据以投票。一九八九年，罗慕斯担任国防部长时曾提出一项为期十五年、投资一百二十六亿美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他在就任总统后，试图把它再列为优先施政项目，但是仍然遭到搁置。一直要到罗慕斯证明中国海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在菲律宾外海两百零九公里处盖了一座基地，又隔了两星期，国会才拨出时间讨论建军计划。註131「现代化法」（Modernization Act）几天之内就获得通过，但是实际要执行它的决议却又拖了快两年才通过。註132（一九九七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大部分经费也统统泡汤了。）一九九五年二月，由于这些延宕，罗慕斯根本无从考虑动武。他被北京唬弄。而美国仍然恼怒基地协定被终止，并且更担心波士尼亚的情势发展，也不来帮忙。他只好找邻国帮忙。

这是个转捩点。直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中国向南海扩张只影响到越南——而此时的越南在国际上仍然孤立。中国所占的地貌全都在西沙群岛、或是沿着南沙群岛的西侧，和其他主张权利的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一占领东侧的美济礁，中国首次侵犯到一个东协会员国所主张的海域。中国这一动，不仅菲律宾，连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全都觉得直接受到威胁。越南，即将在七月份加入东协，也游说大家要立场坚定。即使往往倾向与中国站在同一边的新加坡，也表示关切。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也拿中国的动作做比方：「一只大狗跑到树旁边、抬起脚来撒一泡尿，附近的小狗就会知道有只大狗刚走过去、不久又会回来。」註133

但是，东协也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哪一个会员国敢冒险与中国为敌。制裁，也不可能。因此，它只好在三月十八日发表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吁吁各方「节制不要采取会使区域不稳定、并威胁到南中国海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特别是吁吁「早日解决近来美济礁之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以东协的标准而论，这已经是相当强硬的谈话。但是，无济于事。碉堡还是屹立在高脚架上。中国仍然充耳不闻。四月间，第一届东协—中国论坛，照理讲这是讨论这件事的合适场合，可是北京根本拒绝把这个议题摆进议程。因此只好在论坛之前的非正式会议中讨论，而且据各种记载显示，东协的态度非常清楚。菲律宾政府感谢大家支持——不过岛礁上的建物不动如山。

北京拒绝在罗慕斯盼望的正式区域论坛讨论这个议题。罗慕斯无奈，只好接受中国偏爱的管道——双边对话。八月间，双方协商好「行为准则」以避免日后再发生意外：更多的声明、更多的文件，但实际上就是毫无改变。打从一开始，中国就向菲律宾提议共同开发繫争区域的石

油—实质上就是要求菲律宾承认它在南沙群岛有领土权利。这个策略被人称为「先占再谈判」或「拿了再谈」，是其他国家不预备接受的。

中国为什么要在一九九四年底占领美济礁？最初的导火线或许是菲律宾宣布开採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但是这里头也有中国国内因素。住在新加坡的东南亚区域专家伊安．史托瑞（Ian Storey）认为这是邓小平派系式微后，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权力较劲的结果。註134邓小平钦定的接班人江泽民不是军人，如果他要臻至权力高峰，需要解放军领导人以及更加民族主义的派系之支持。一九九四年，邓小平另一个爱将刘华清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中国政治两大关键机构的要职。看来很有可能他看到占领美济礁是他「绿水」战略的重要一环，而像江泽民如此狡黠的政客会全力支持它。这个举动明显成功。中国部队占领美济礁迄今，反弹非常有限。

菲律宾的邻国从这场危机学到教训。一九九五年四月，印尼政府透露中国已对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附近海域提出权利主张，落在印尼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受到美济礁事件的震撼，雅加达决定上上之策是吓阻。一九九六年八月，印尼、马来西亚和汶莱在南海南缘的婆罗洲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次月，印尼在纳土纳群岛附近举行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二十七艘船舰、五十四架飞机和将近两万人参加，高潮是两栖攻击一座岛屿，因艾克森石油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计划预定在该岛展开。中国海军派了五艘船观察演习。但是为了确保正确的信息会传到北京，印尼邀请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到雅加达和苏哈托总统及其国防首长们会谈。註135中国仍然维持对此一天然气田北半部的权利主张，但截至最近都没有採取行动声张主权。（二○一二年后发生几起事件，使得印尼又惶惶不安，下文将会讨论。）

一连好几个月里，印尼都是说话客气、却挥舞大棒，菲律宾反之，南海局势渐渐缓和下来，正好迎接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年会。凑巧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有二十一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这场盛会在马尼拉举行。江泽民得以成为第一个到菲律宾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结束，他又逗留了三天，接见多位菲律宾政商领袖。第二天上午，罗慕斯总统招待江泽民及中国代表团坐船游马尼拉湾。大家吃着早饭时，菲律宾海军乐队从一本特别编制的歌本《携手航向二十一世记》选了曲子演奏。两位领导人合唱猫王艾维斯．普利斯莱的成名曲〈温柔的爱我〉（Love Me Tender）。在场六十多名宾客鼓掌声中，美济礁的夙怨似乎已经一笑泯恩仇。然而，到了海上，冲突如故。几乎就在高歌一曲之后两年整，中国海军把美济礁上的高脚平台，改建成一排钢筋水泥的房舍，并配上码头和直升机升降台。中国是谈了，但也拿了。

在南海抢夺岛礁的念头始于民族主义的输人不输阵心理，终于争抢潜在的油田及渔业权利。各方的占领迄今尚未兑现盼望已久的报酬。它们反而制造了长年的不安定、阻碍海洋资源的开发，并且迫使政客相互叫骂、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而其实他们或许盼望区域合作。中国相当晚近才加入南沙的派对，但是每当它占领某一地貌，北京的谈判地位就更强大。它究竟得到什么实际好处？只有阻止别人有所收穫的负面效应嘛！北京很清楚看到这是长期策略，最后将使得其他国家和它分享主权。但是它们真的会如此吗？「实力即权利」（might is right）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呢？国际法的规定会不会是另一种选择呢？

註89：Spencer Tucker, ‘D’Argenlieu, Georges Thierry’, in Spencer Tuck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2nd edn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2011).

註90：Quoted in Stein Tønnesson, *Vietnam 1946*: How the War Began (Berkeley, 2010).

註91：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註92：Michael Sullivan,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rev. edn (Berkeley, 1997), 99.

註93：Ulises Granados, ‘Chinese Ocean Policies Towards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1946–1952’, The China Review, vol. 6, no. 1 (2006), 153–81.

註94：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esp. 33.

註95：Ibid., 21.

註96：Daniel J. Dzurek,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 Who’s On First?’, *Maritime Briefings*, vol. 2, no. 1 (1996), 15.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research-/research-centres/ibru-centre-for-borders-research/maps-and-databases/publications-database/Maritime-Briefings-(Vol.-2-no.-1).pdf＞.

註97：对费勒蒙·柯洛马之子Ramir Cloma的个人採访，on 22 July 2012.

註98：Ibid.

註99：A.V.H. Hartendorp, *Histo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The Magsaysay Administration* (Manila, 1958), 209–30; Jose V. Abueva, Arnold P. Alamon and Ma. Oliva Z. Domingo, *Admiral Tomas Cloma: Father of Maritime Education and Discoverer of Freedomland/Kalayaan Islands* (Quezon City,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99), 36–7.

註100：Monique Chemillier- Gendreau,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Leiden, 2000), 42.

註101：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esp. 50.

註102：Monique Chemillier- Gendreau,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Leiden, 2000).

註103：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esp. 50.

註104：Rodolfo Severino,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2010).

註105：A.V.H. Hartendorp, *Histo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The Magsaysay*

Administration (Manila, 1958).

註106：Rodolfo Severino,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2010).

註107：Daniel J. Dzurek,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 Who's On First?', *Maritime Briefings*, vol. 2, no. 1 (1996), 19.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research-/research-centres/ibru-centre-for-borders-research/maps-and-databases/publications-database/Maritime-Briefings-(Vol.-2-no.-1).pdf＞.

註108：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London, 1982).

註109：译注：原文这么说不准确，季辛吉此时担任国家安全会议顾问，要到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才出任国务卿。

註110：Robert S.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1988).

註111：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两栖攻击SRD- SR–44–74. US Army Special Research Detachment, Fort Meade, January 1974. Available from US Arm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註112：US Embassy Saigon, Weekly Roundup January 10–16 1974 US Embassy Saigon. Available at http://aad.archives.gov/aad/createpdf?rid=10696&dt=2474&dl=1345. See also RVN Captain Ha Van Ngac, *The January 19, 1974 Naval Battle for the Paracels agains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Navy In the East Sea* (Austin, Texas, 1999), 40.

註113：Ho Van Ky Thoai, *Valor in Defeat: A Sailor's Journey* [*Can Truong Trong Chien Bai: Hanh Trinh Cua Mot Thuy Thu*] (Centreville, Virginia, 2007, self- published).

註114：US Embassy, Saigon, telegram GVN/PRC DISPUTE OVER PARACEL ISLANDS, 17 January 1974. Available at http://aad.archives.gov/aad/createpdf?rid=4752&dt=2474&dl=1345.

註115：Kiem Do and Julie Kane, *Counterpart: A South Vietnamese Naval Officer's War* (Annapolis, Maryland, 1998).

註11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8, China, 1973–1976, Document 66. Available at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

註117：*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ashington, JPRS Report,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JPRS- CAR–90–005, 22 January 1990).

註118：Garver, John W.,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se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Quarterly* 132 (December 1992) 999–1028.

註119：You J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time Combat Doctrines and Models: 1949–2001', *RSIS Working Papers*, no. 22 (Singapore, May 2002). Available at ＜http://dr.ntu.edu.sg/handle/10220/4422＞.

註120：Yang Guoyu (ed.), *Dangdai Zhongguo Haijun* [*The Modern Chinese Navy*] (Beijing, 1987), cited by John W. Garver,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1992), 999–1028.

註121：针对这个主题，想知道更多的读者请看我的书的第九章：*Vietnam: Rising Dragon*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London, 2010).

註122：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2008), 292.

註123：Chen Hurng- Yu, 'The PRC'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nd Strategies of Occupation in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4 (2000), 95–131.

註124：John W. Garver,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1992), 999–1028.

註125：David Hancox and Victor Prescott,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an Account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Amongst those Islands', *Maritime Briefings*, vol. 1, no. 6 (1995).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ac.uk/ibru/publications/view/?id＝229＞.

註126：这些船中有两艘是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建造的坦克登陆艇，越战后留了下来。HQ–505先前是USS Bulloch County，建造于一九四三年。第三艘是货船。

註127：'Chinese Navy Detains Filipino Fishermen in Spratlys: Report', *Agence France Presse*, Manila, 24 January 1995; *Lianhe zaobao* [*United Morning Post*], Singapore, 25 January 1995, 34, quoted in Chen Hurng- Yu, 'The PRC'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nd Strategies of Occupation in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4 (2000), 95–131.

註128：Liselotte Odgaard, 'Between Deterrence and Cooperation: Eastern Asian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 IBRU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vol. 6, no. 2 (1998), 73 (map). 请关注下列网站资讯：https://www.durham.ac.uk/research/institutes-and-centres/ibru-borders-research/map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s/

註129：'Philippines Orders Forces Strengthened in Spratlys', Reuters News Service, 15 February 1995, quoted in Ian James Storey, 'Creeping Assertiveness: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1 (1999), 95–118.

註130：'Dragon Flexes its Muscles in Islands Disput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9 March 1995, quoted ibid.

註131：'Spratlys Tension Helps Push Forces Upgrade', *Jane's Defence Weekly*, 25 February 1995, quoted ibid.

註132：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Aquino Administration's 2011 Decision to Shift Philippine Defense Policy from Internal Security to Territorial Defense: The Impa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4 (2012), 67–87.

註133：*East Asia Today*, BBC, 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 broadcast 6 June 1995.

註134：Ian James Storey, 'Creeping Assertiveness: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1 (1999), 95–118.

註135：'China Accepts Natunas Drill, Says Indonesia', AFP report, *Straits Times*, 12 September 1996, 21.

第四章　岛与礁：从国际法看南海主权争议

捕鲸奇缘

一八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居鲁士号」（*Cyrus*）三桅帆船船员在南中国海捕鲸取油。对他们来讲很不幸，鲸鱼和他们愈行愈远。五天前，居鲁士号放下它的鱼叉艇逐渐逼近，可是那鲸群却躲掉了，从礁石之间迅速窜逃。捕鲸是很艰险的工作。居鲁士号正在一个不知其名、仅在海图上标明「危险区域」的地方行驶。尽管有了新海图，婆罗洲北岸外海对于捕鲸船──以及鲸群──而言仍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一天天气良好，微风习习，让居鲁士号方便追捕猎物。

从死鲸脂肪萃取油脂是个有毒的过程。诚如小说《白鲸记》渔船「裴廓德号」（*Pequod*）上的以实马利（Ishmael）所抱怨的：「牠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刺鼻的印度味道，有如火葬堆附近隐约可以闻到的气味一样，闻起来像末日审判的左边那股气味；这就是肯定有地狱的一个论据。」但是一旦妥当地装桶之后，鲸油可就价值不菲，两百八十一吨的居鲁士号可以承载好几万加仑的鲸油。这就是居鲁士号船长理查．史普瑞特利（Richard　Spratly）所追求的大赏。他在十六个月前从伦敦出发，还要再十七个月才会回到老家。他需要花将近三年的时间追猎，才能填满足够的鲸油，让船东满意。若是再加上鲸骨、鲸牙和龙涎香，这笔买卖可就利上加利了。理查．史普瑞特利总共四度指挥居鲁士号长征。每一次长征之前，他太太都会给他生个孩子──只是他从来没有机会陪他们庆祝周岁生日，届时他已经又出远门了。

理查．史普瑞特利自幼即与大海结缘。他的父亲是个造船师傅，而他自幼即在伦敦船坞长大，十六岁就上了一艘捕鲸船当学徒。后来他转到监狱当局服务，负责将英国及爱尔兰犯人运送到澳大利亚，三十岁已升任运囚船「约克号」（*York*）船长。两年后的一八三四年，他回到生平第一份行业：在南海追捕鲸群。

身为船队中经验最丰富的船长之一，理查．史普瑞特利比大多数人更擅长应对艰困环境。在甲板上掌舵多年，他非常熟悉这片危险海域，偶尔也会把他发现的危险的海底巨石或暗沙通报给当局。他经常尝到苦头：一八四二年春天他告诉一位同行船长，他在今天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周围海域的无数次航行，「几乎在所有的礁石与暗沙上，都有过搁浅的经验。」即使在十年后他还致函《航海杂志》（*Nautical*

Magazine）抱怨说他「一直找不到稍微可靠的有关此一错综复杂的岛群的海图」。

因此现在这整个纠缠不清的岛群挂着他的名氏，其实也挺讽刺的。一八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的上午九点，居鲁士号桅顶传来一声高叫。瞭望员发现东南方十二英里处有个低矮的沙洲。理查．史普瑞特利船长相信它不曾记载在任何海图上。其他人不同意，认为这块岛礁已经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勘察员霍斯伯赫记录，但是或许是出于尊重他的长年经验，英国皇家海军水道测量局（Hydrographic Office）选择尊崇理查．史普瑞特利，从一八八一年起在海图上就标出「Spratly Island」（即中文所称的南威岛）。对于航海前辈这样的尊崇，谁曰不宜？但是鉴于日后的发展，或许霍斯伯赫给它取的名字「风暴岛」（Storm Island）还比较合适。

理查．史普瑞特利一定只是见到这块「沙岛」的数十个欧洲船长之一，但是获得发现它的盛名的是他。他之能够独揽全功或许是意外，但是由英国人成就这项功业就不是意外。英国是全球霸主，英国绘图员绘制第一流的地图，英国的委员会拟订对地域命名的规则。过去一千年说不定有数千人见到南威岛，或许甚至有人踏上这个岛，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痕迹。这一块只有七百五十公尺长、三百五十公尺宽的土地会「属于」任何人，这个想法在一八七七年以前还真的从来没有人想到。

英国最先针对它提出主权主张，这并不足为奇；但它开启的事端最后导致今天的争议。从此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不断地有人提出主张，各国政府上穷碧落下黄泉，从歷史去爬梳、往深幽的法学理论去挖掘，为的是找寻证据和论证，以便他们的行动吻合国际法。但是在南中国海，不幸的是法律并不清晰。有两套法律存在且相互竞争：旧的一套规范对领土的「歷史权利」，新的一套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规范可以从领土主张去衡量的海上主张。南中国海是两者交匯之处—也是对撞之处。

法律攻防战

国际上有关于领土主张的规则是由那些最积极声张权利的国家所制订。欧洲统治者希望他们的行动在上帝眼里有正当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保障、以免遭到敌人掠夺。十五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需要有位号称代表上帝讲话的人之加持。在一四五五年的一份教宗诏书中，教宗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V）批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King Alfonso）去征服非基督徒的土地和人民，并禁止其他基督徒「干扰」葡萄牙人拥有的财产。后续的一四九三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和一五二九年《萨拉戈札条约》更进而把全世界划分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势力范围。当十七世纪荷兰人打破此一全球二分法，他们重写新规则来合法化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透过后来两百年的战争与征服进一步演化，直到一八八四年的柏林会议，欧洲列强才发展出一套一贯性的原则来合理化在世界各地争抢土地，以及仲裁彼此之间的争议。

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还未成立之前的纷乱岁月里，它们承认取得领土有以下五种方式：征服（以武力取得领土权利）；割让（另一个统治者透过正式条约放弃他们的权利）；先占（对不属于其他任何统治者的领土，即所谓的「无主地」（empty land或terra nullius），不问它是否有「原住民」存在，建立一个行政架构）；时效（prescription，其他统治者逐渐地承认某一统治者的权利）；增长（譬如填海造地，对既有领土增长出新土地）。到了二十世纪，能抢的土地也抢得差不多了，又经歷两次破坏惨烈的世界大战，省悟到现在冲突的代价肯定远远超过利益，这些战胜国决定把征服从名单中剔除。联合国宪章亦明文规定往后不得以武力取得领土。

但是帝国的歷史形塑出一套国际法制度，当领土争议发生时，它认为发现优先于邻近。教宗诏书的声音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有迴响：「找到的人，保有一切；失败的人，到旁边去哭。」由于没有一份至高无上的全球宪法，各国程度不一地同意接受一套因应特殊情况而偶有新进展的习惯和作法的约束。过去几个世纪，国际法融合主要国家的要求，以欧洲民事法庭的法律作法，定出一套合法化他们领土获取的制度。因此它要求可资证明的证据—如文件、条约和海图—而不是朴素的民族诉求—如「这些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南海争端的结果就变得十分荒唐，英国或法国竟然会和南海周边任何一个国家一样，都对这些岛屿具有强大的法律主张。

一八七七年九月，英国殖民地纳闽（Labuan，婆罗洲外海一个小岛）当局发特许状给美国人葛拉姆（Graham）和两个英国人辛普生（Simpson）、詹姆士（James），准予代表大英国王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又称安波那岛，Amboyna Cay）行使权利，在当地挖走他们的船所能载走的一切鸟粪。它还在《政府公报》（*Government Gazette*）上正式公告周知。註136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可能更靠近、其他渔民可能已到过这两座小岛，其他国家海军可能行驶经过它们，但是英国首先在公报上宣示这是它的—这才是法庭重视的证据。从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小开端，帝国声张权利的范围日益扩大。这是任何国家在今天我们所知的史普瑞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的第一个宣示主权行为。英国在一八八九年又发另一纸特许状给中央婆罗洲公司（Central Borneo Company）。

然而，帝国对鸟粪的兴趣从来不及对茶叶、鸦片或橡胶的兴趣来得高，它对这些岛屿的兴趣主要还是在航运方面。纵使如此，英国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的权利主张。

法国当局在一九三○年四月宣布派军舰「马利赛斯号」（Malicieuse）占有南威岛，并对南中国海一大块长方形区域之内的所有其他地貌提出权利主张，不到几星期，英国即小心翼翼地重申其权利主张。两国政府在往后两年内迭有外交文书交涉及法律争论。可是他们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就是，日本帝国向本地区扩张，对他们的殖民地明显构成威胁。面临共同的敌人，英、法两国都不愿放弃本身的权利主张，但是英国人也不希望伤害到法国的主张。一直要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法国政府正式兼併下列六个岛屿：南威岛、安波沙洲、太平岛、双子群礁（即北危岛）、南钥岛和中业岛。这一次法国政府也在它的《官方公报》（*Journal Officiel*）上公告周知。这项公告在中国引起惊慌（见本书第二章），但是中国政府一发现它涉及的是南沙群岛，而非西沙群岛，纷扰就消散了。和今天中国官员的说法相反，当时中国报纸没有出现官方抗议，或对应的兼併公告。法国在书面上维持权利主张，但是并没有实际执行它，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到太平岛设立气象站，註137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岛被日军占领。我们后来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美军轰炸攻击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国海军登陆之间的某个时候，日军弃守太平岛。下一批到达的海员是法国人，他们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乘扫雷艇「齐瑞尔号」来到太平岛。他们立起石碑，重申法国对它的主权，恢復一九三三年的兼併状态。菲律宾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对南沙群岛宣示拥有主权，但是往后数十年都没有实际动作。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海军根本连到达南沙群岛的能力都没有。有了美国人提供船只、海图和训练，中华民国政府才能够进行远征，做出国际法庭会承认的主张动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华民国海军太平舰和中业舰（前身分别是美国海军戴克号和USS *LST 1056*）抵达太平岛。根据中方记载，船上官兵拆掉日本碑石，另立中国碑石。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法国人所立的碑石──要不然就是不觉得值得一提。这是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在南沙群岛所做出的第一个主权行动，且其形式是国际法庭会承认的。中华民国部队断断续续占领太平岛，直到一九五○年五月五日退走。这时候法国已经在忙别的事：胡志明及其民族主义派友人正要从法国人手中抢夺印度支那。

要搞懂接下来的状况，恐怕国际法律师都得大费周章。我们姑且摘要叙述二十年的血腥斗争：越南在一九五四年分裂为共产主义的北越和资本主义的南越，法国人在一九五六年退出越南，然后它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重新统一在共产主义之下。或许有人会觉得合乎逻辑──既然法国

是越南的殖民主━法国在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在越南独立之后自然归越南所有，可是这个论述不太可能让国际法庭满意。法国就和英国一样，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它是为自己提出主张，并不是代表越南提出主张。（这个情况和它早先对西沙群岛提出权利主张不相同，当时它是代表安南的保护国提出主张，而安南后来成为越南的一部分。）一直要到一九五六年，鉴于菲律宾的托玛士．柯洛马动作频频，刚独立不久的越南共和国（南越，Republic of Vietname）才对南沙群岛提出权利主张。中华民国也因为如此又重新占领太平岛。

如果你再研究越南共和国的法律地位，情势就变得更加复杂。有人会说越南共和国是帝国主义者（法国和美国）册立的非法傀儡国家。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e）共产政府领导人肯定是这样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自己是全国的合法政府，暂时受限在一九五四年南北分裂的部分领土之内。另一派主张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和越南共和国（南越）是在一个国土之内两个分裂地区的两个合法国家。北越领导人在某个程度上也顺着这个主张走━他们支持另立「临时革命政府」在南方正式负责革命作战。当共产党一九七五年打败南越政府之后，他们在南方正式成立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共产国家，经过一年之后才在一九七六年把南北两个共产国家合併为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e）。

这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国际法庭谨守法律条文的性质，它要求主张国要出示它曾经对领土正式宣告主张，且主张国有维持此一权利主张，而后在面对其他主张国家的行动时也有所坚持。直到一九七五年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太多动作声张它在南中国海的权利，而越南共和国倒是做了不少。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代表全国的合法政府，那么它原先的不作为会伤害它的立场。如果越南共和国的行动被纳进来━视它为越南全国之内的一个合法政权━那么今天越南的主张就有更坚强的立场。

北越领导人採取的某一特别行动，被用来质疑越南对南海诸岛的权利主张。一九五八年，北越总理范文同发了一封简短信函给北京领导人，宣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并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有关中国领海的决定之宣告」。很可能有人认为，以它来否定越南对岛屿的主张，稍嫌牵强，但是根据国际法的习惯，这可能等同于所谓的「禁止反言」（estoppel）。

「禁止反言」是欧洲民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目的是在制止权利主张人说一套，又另做一套。例如，某甲同意争端已经解决，他日后就不能反悔食言。它的用意是促进透明化和诚实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也是

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承认另一国的领土主张有效，那么在理论上，未来它就不应再争夺另一国的权利。然而，在一九五八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加入国际法院，而且身为共产国家，也都不怎么理睬国际社会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规矩。他们根本还处于国际反帝斗争之中。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向距离中国大陆海岸仅有几公里的金门、马祖之国民党军队发动疯狂砲击。十一天之后，共产中国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主张对离岸十二海里之所有水域具有主权—金门、马祖包括在内。目的主要是制止美国军舰运补或防卫金门、马祖。但是这份宣告也对台湾及其周边岛屿，以及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张。北越为了展现团结一致对抗美帝，九月六日在共产党机关报《劳动报》上登出中国的宣告，范文同又在十四日致函北京领导人。这封信没有明白同意共产中国对各岛屿的权利主张，但是它也没有明白表示反对。北越没有表示异议，或许会被国际法庭视为足够根据，认定越南对各岛屿的权利主张不得再有反言。可是，越南领导人一定会觉得十分冤枉，在他们和北京都还不熟悉国际法的琐细规则之时，对另一个共产国家所表现的兄弟团结的姿势，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用来削弱他们本身的领土主张。

简单地讲，套上国际法幽晦的规则和习惯时，越南人可能认为的对其家门口的南沙群岛「自然的」权利主张，却变成不是那么站得住脚。除非法国政府正式放弃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越南不能援引法兰西帝国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的行动做根据。目前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否是越南共和国及其行动的合法继承人、范文同的信函是否伤害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权利主张，都还有法律上的争辩。

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依赖的是古代文献上有提到这些岛屿。可是，更仔细研读这些文献后又找不到它确切是指哪个岛屿的资讯，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资证明有过征服、割让、占有、时效取得或增长的迹证。国际法庭只好和中国错综复杂的现代史格斗。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二月正式成立，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得到「列强」正式承认。但是在列强承认之前，南方七个省份已经宣告脱离北京政府控制，他们的「二次革命」造成孙中山及其盟友一九一七年在广州另立政府，与北京分庭抗礼。时隔十一年，南方政府才北伐成功、号令全国，成为中国受国际承认的政府。在这段动盪时期，南方政府据说採取了一系列行动，奠定中国对西沙群岛声张主权的根据。

特别是南方政府一九二一年将南海诸岛名义上划归海南岛管辖，并于一九二三年颁发许可挖鸟粪。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七年，他们派出巡逻船检查收集鸟粪者的活动。（歷史学者攸里西斯．葛瑞纳多斯

〔Ulises Granados〕从当时的英国情报报告中找到证据，南方政府确实颁予日本一家人头公司此一许可，据说这家公司承诺提供武器与经费以交换对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开发权利。）註138法国当局（代表保护国安南）没有对这一切提出抗议，现在它的不作为被当做法国默认中国主权的证据。但是，现代法庭会怎么看待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没有得到「列强」承认的政府所採取的行动呢？

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而中华民国退据台湾。北京很明白地不承认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之合法地位，但是共产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权利完全以对太平岛的主张做为依据，可是太平岛的主权是中华民国海军在一九四六年最先确立的。北京的共产政府现在声称太平舰代表全中国到南海确立了主权主张。不过六十年前，他们可不是这么说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时，北京把它视为是美帝国主义的象徵。共产党部队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大陈列岛外海击沉太平舰。这个事件凸显出北京领导人在声张它对南沙群岛具有主权时，在建构法理根据时会碰上问题。如果它是继承中华民国的国家，它可以主张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政之后、中华民国所採取的行动可以强化它的主张吗？譬如，中华民国海军在一九五六年把柯洛马兄弟的船队赶出太平岛和双子群礁。这是中华民国宣示主权的具体行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把它据为己有吗？如果台湾政府决定要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併，这就是它可以叫价的一个重点。

这些问题都不曾在国际法庭上受到检验，而且鉴于法律问题纠缠不清，不仅复杂，又不确定，似乎也根本不会走上国际法庭。我们只能说，从歷史的角度来看，对这些岛屿的权利主张—不论是英国、法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甚至菲律宾所提出—没有一个有完全的说服力。如果英国国旗一直在南威岛上飞扬，如果法国在太平岛也一直驻守，或者两者之一正式把它的权利让渡给另一个主张国，情势或许会比较明朗。可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因此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就在这片「危险地区」自行创造事实。

越、菲对峙

理查．史普瑞特利的「沙洲」今天被其居民命名为大长沙（Truong Sa Lon）。「大」是相对而言。它是越南所控制的南沙诸岛中最大的一块干地—其实一点儿也不大。虽然现在南威岛没有剩下太多天然的东西，它最高的天然点是海拔两公尺半。海滩被圈围在一座意欲挡住波涛和不速之客的钢筋水泥高墙之后。高墙上突出几十个哨所和电塔：太阳能探照灯、发电风车、雷达塔和一支高大的行动电话基地台。房舍的屋

顶超现实地与树交织在一起：千篇一律的越南公家机关建筑物（红砖、赭色土墙、新古典的阳台）经由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从大陆移植过来。

从上空俯瞰，整个岛屿形成一个整齐的等边三角形，像指路标一样指向四百七十公里以外的本土大陆。跨越它的地基、占了整块地区约四分之一面积，是一条水泥跑道—原来是由南越部队兴建，二○○四年再重新修建。网状小径垂直或平行地交错在移植而来的树木之间，在大海中创造出庭园般的小城景象。在这个三角形的底部，有一道七十五公尺的防波堤往海面突出，深度足以让渔船和运补船停靠。其他周边水域则布满防御工事：长钉可以刺穿船体，阻却来犯船只登岸。

这个岛必须看起来像是有人定居、又是经济活动活泼的社区，这对越南的企图攸关重大，因此政府投入极大心血要打造出「正常」的表象。和越南几乎每个村庄相似，岛上有一座佛塔，还有一间小庙奉祠保庇神明（这里拜的是社会主义越南的国父胡志明），另外还有高大的灰色石碑纪念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殉难英雄（「国家会记得你的牺牲」）。岛上住的孩童不多，但有一间大型学校建物。访客可以享受「首都宾馆」的招待，费用由河内人民捐献。

透过如此「自愿」募捐和其他国家补贴，岛上的地方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成为全国人均经费最充裕的单位。它的副主席阮德善（Nguyen Duc Thien）在二○一一年告诉官方的越南通讯社（Vietnam News Agency）说，过去几年花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投资意味岛上有正常的电力供应，储水槽的兴建使它不虞缺水，岛上也有网际网路通讯设施。註139岛上到处看得到鸡鸭。另外也盖了高屏幕，足以挡风、挡沙、挡盐，在它底下闢建菜圃。小径两侧是香蕉树和其他果树。南越农业科学研究所曾推行一项十七万美元的计划，企图提升生产力，但是大长沙岛很难自给自足。註140人口增长太快，以至于食物、淡水，甚至种植作物所需的土壤仍然必须从国内运来。

需要运补的不只是物质需求，岛上居民的精神福祉也必须加以保护。二○一二年四月，官方的越南佛教僧伽（信条是佛法、国家、社会主义）派了五名和尚到大长沙岛上驻锡六个月，任务是提升居民精神生活。越南共产党也关心民心士气。除了例行的军事检查和国定纪念日之外，有两件事的周年庆特别重要，一是一九七五年从南越控制下「解放」大长沙岛，一是一九八八年的赤瓜礁战役。在这些纪念仪式上，青年战士被鼓舞要永远保持警戒，提防「敌人」的「狡诈的阴谋」。註141南威岛不是个「普通」岛屿：它是不沉的城堡。躲在树林里—介于学校、宾馆和佛塔之间—是碉堡、兵营、至少五辆战斗坦克车、二十个砲阵地和一群驻军。註142但是在岛上生活—或是在越南所控制的二十一个岛礁的任何一个过活—都非常艰困。保持部队士气非常重要，党十分努

力培养海上单位和国内居民的情感联繫。

党很擅长组织「草根」的团结活动，近年来因为民族主义情感沸腾，参与为外海驻军募捐活动的人数大增。募来的款项数字不大，中央政府也有能力拨赠，但是动员的力量却不是可以金钱价值去衡量。这是领导人要赢取民众支持的强有力工具。报纸公开承诺「宣传」有关岛礁的消息，各省策划赠礼活动，以珊瑚礁和鹅卵石交换民众捐赠的卡拉OK唱碟、乒乓球桌、发电机和香菸。电视节目上的记者穿着印上爱国口号的T恤，赞扬英勇的青年男女保卫边疆领土。十年前，这恐怕只是沉闷的仪式，但现在却受到观众热切关注。

越南在选择其南沙群岛阵地时并没有享到「先下手为强」的好处。中华民国在一九五六年重新占领面积最大的太平岛。菲律宾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之前占领中业岛（菲律宾名为派格阿萨岛）、马欢岛（菲律宾名为Lawak）、费信岛（菲律宾名为Patag）和双子群礁。（他们也考虑登陆太平岛，但是被台湾船舰挡住。）南越在一九七三年九月派出陆战队时，选择已经不多。南威岛—或称大长沙岛—是明显的候选目标，因为它是最靠近越南大陆的岛屿，也位于菲律宾主张权利的地区之外。他们从菲律宾人犯的错误学到教训，没有尝试占领太平岛；而且此时中华民国也已派兵加强太平岛防务。南越偷偷地转向鸿庥岛—与太平岛同属堤闸滩（又名郑和群礁）的一部分—隔着潟湖，相距约二十公里。註143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们也占领了九章群礁的第七大岛景宏岛，以及更南边的安波沙洲（越南名安邦岛〔Dao An Bang〕）。

越南人借由烈酒和恶劣天候的庇佑得到另一收穫。南沙群岛最北边的两个小岛即是英国人所谓的北危岛。这也是一九五六年十月费勒蒙．柯洛马被台湾海军迫使放弃夺岛闹剧的地方。法国人称呦北危岛为双子礁群，它有两个主要地貌：一是两公里长的北子礁（菲律宾名Parola），一是六百五十公尺长的南子礁（菲律宾名Pugad）。一九七五年初，菲律宾部队占领这两个岛礁，两支守军经常相互往来把酒言欢。有一天晚上，南子礁的官兵受邀到北子礁饮宴。根据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前任司令官沙班将军（Juancho Sabban）的说法，由于天候恶劣，他们回不了南子礁防地。不幸的是，天候并没有恶劣到阻止南越部队乘虚而入。註144从此以后南子礁即为越南人占领，现在越南人将它命名为Dao Song Tu Tay。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知道。事隔不到几个月，就在越战即将结束前几星期，河内发动「东海作战」，抢夺南越所控制的全部岛礁。南子礁是他们第一个目标。北越特战部队在四月十三日登陆。交战不久，部分守军发觉事不可为，弃械投降。但是有个排长想到要在共产党底下坐牢就害怕，把心一横、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同志。他决

心投奔最近他的单位才羞辱过的菲律宾人，游了三公里穿越潟湖，逃到北子礁。幸运的是，菲律宾人不跟他计较前仇，收容了他。同时，北越全力抢攻，在西贡沦陷之前就占领了所有南越所掌握的岛礁。

今天，这两个岛上的守军互相有往来。更妙的是，还举行球赛联谊。二○一二年三月，越南和菲律宾海军司令为了建立互信措施，协议好两军定期举办一系列足球赛和篮球赛。第一次比赛安排在二○一四年六月。看在到访的菲律宾士兵眼里，他们在北子礁的生活环境的简陋和南子礁日进千里的舒适设施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越南人就和在南威岛的建设一样，也在南子礁装设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机、雷达塔，也闢建一座人工港口。岛上有一座四十公尺高的灯塔冒出树梢，当然还有体育设施。

回到北子礁，菲律宾守军过的是荒岛穷农民的生活，自己要种菜、採椰子、捕鱼。在下一班运补船抵达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排遣沉闷无聊和寂寞孤单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忙碌。海滩上一座故障的推土机正是野心未遂的生锈证据。对沙班将军而言，北子礁的景况特别令他伤感。一九八一年有六个月时间，他曾经是岛上驻军指挥官。他还记得当时他的弟兄生活水平远比邻近的越南人高出许多，越南人还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忍飢受寒咧！曾几何时，越南已经自由化其经济，产生资源以开发各个岛屿。而在菲律宾，施政优先不同。军方预算被削减，陆战队必须刻苦自立。

军方预算大肆删减的后果，在菲律宾控制的所有岛礁上呈现无遗。在国际间通称为Second Thomas Shoal的暗沙（菲律宾名Ayungin Shoal，中华民国名之为仁爱暗沙）上，菲律宾在一九九八年故意把要报废的坦克登陆舰「西耶拉马德瑞号」（BRP *Sierra Madre*）搁浅在岛礁上，陆战队就住在腐锈的船上。即使走在船舰主甲板都很危险。多年的海盐和大风已把金属侵蚀得差不多。有好几大块区域，甲板已完全毁损，访客必须走在樑柱上。守护仁爱暗沙的五名陆战队和两名水手，比起北子礁的同僚更缺乏娱乐可言。下士卡斯特罗（Benedicto de Castro）在二○一二年告诉来採访的一个记者说：「这里没树、也没土地，日子相当难过。」他们的三餐几乎全靠捕鱼。二○一三年，他们的日子更苦，因为中国的海监船包围住他们，赶走运补船。

大约每三个月左右，菲律宾海军另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来的坦克登陆舰「拉古纳号」（BRP *Laguna*），就会遍访菲律宾部队所占领的九个据点执行运补任务。它应该是七天的行程，但是经常因为天候欠佳或机械故障会拖延好多天。菲律宾据守的岛屿都没有港湾或甚至防波堤供大型船只泊靠，因此补给品必须先装到小船，再接驳靠岸。潮水高涨的时候，黎刹礁（Rizal Reef，西方海图上是Commodore Reef，中

华民国称之为司令礁）的四人守备队退入高脚屋打牌，等候潮水退去。他们对于行船一小时之外的科塔岛（Kota，国际海图上标为Loaita Island，中华民国取名南钥岛）的同僚能有干土地和苍翠树木会有多么羡慕，你就可以想像。

菲律宾海军执行运补任务外还有另一项任务，即检查菲律宾主张权利、但没有占领的各岛礁有什么动静。近来，他们发现外国活动有增加的迹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不醒目的小东西，如橘色的浮标。浮标可能只是渔船用来定标之用，但是沙班将军说它往往是偷偷地夺岛的第一步。他说，如果不把浮标移走，隔了几个月，它就会演变成钢柱。二○一一年中叶，菲律宾海军在仙滨暗沙（Sabina Shoal）附近发现的浮标，竟然演变成一个大型商用货柜泊靠在岛礁上。他说：「当然啦，那是中国人搞的鬼。」记得一九九五年中国乘菲律宾守军不备抢走美济礁的教训，菲律宾军队奉命只要发现任何不寻常事物，一律拆除。这就好像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方不断测试菲律宾和越南海军的警戒心。

运补任务通常始于或终于菲律宾所占的较大的岛屿中业岛，菲律宾人称之为派格阿萨岛─塔加洛文「希望」的意思。这个名字挺恰当，因为维繫住岛上小小社区的正是希望的信念。中业岛是菲律宾部队最早占领的岛屿之一，面积最大、有三十七公顷。它大到足够设村垦殖，但是还不够设置一千二百六十公尺长的跑道，它的两端必须往外海伸出去。跑道建于一九七○年代中期，但是现在必须十分小心才能使用。用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内部刊物《坎鲁兰》（*Kanluran*）的话来说：「由于海水侵蚀，跑道即将完全断裂。」二○一一年，菲律宾海军派一艘船载运材料来修理跑道，却在附近礁石搁浅。军方宣称他们没有资源或技能完成任务，向政府申请拨经费招聘民间承包商进行修復工程。答应是答应了，但是现在海浪还在继续侵蚀跑道。

二○○一年，菲律宾始开先例，是第一个刻意把平民往南沙群岛移居的国家。但是，要坚持住在中业／派格阿萨岛，需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根据二○一○年的人口普查，中业岛正式设籍人口有两百二十二人。但是事实上，岛上常年居民只有六十人左右。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每年补贴一万四千美元，只够养活这么多人。除了鱼、盐和椰子之外，几乎样样东西都得靠船只送来。菲律宾人和越南人不同，并没有运来土壤以便闢建菜圃。岛上号称有行动电话中继站，但是讯号「断断续续」。

派格阿萨岛的市长，其实应该说是整个「卡拉扬岛群」的市长，是尤金尼奥．毕托翁翁（Eugenio Bito-onon）。他是开路先锋之一，一九九七年即搬到中业／派格阿萨岛居住，是开发兴建新市镇的城市规划师。他到现在还在规划、还怀抱希望。毕托翁翁市长的梦想中，有一条

安全的飞机跑道、有一个能运作的港口，观光客可以飞来享受无限宽阔的泳池和原始的珊瑚礁，码头泊满游艇，渔船可以停靠寻觅补给，本地商业发达，足以照应各方需求。但是只要中央政府不投注资金，说什么都是白说；不幸的是，政府总是有其他优先事项。二○一二年六月，毕托翁翁开设第一所学校，共有老师一员、托儿所幼童三人、幼稚园学童五人。它只有一间教室，家具还是借来的，但是他希望它能说服更多家庭留下来。在此之前，学童必须离家五百公里到最近的大岛巴拉望去上学。他力促政府兴建有厕所及个别教室的学校，但是还在等候必要的十万美元经费才能动工。

中国针对开办学校提出外交抗议，认为它侵犯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容争议的主权」。马尼拉政府迟迟不肯拨款，忌惮中国抗议可能就是主要原因。它的作法—说是政策，恐怕稍嫌强硬—就是避免让中国有任何理由抗议在菲律宾所占岛礁上的行动，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守军很明显只是象徵性的部队，敌人只要有决心，两三下就可以把他们收拾干净。即使在中业岛，守军只有两门四○口径高射砲和陆战队的轻武器。和南沙群岛所有被占领的其他岛屿相反，水中没有反入侵的障碍，岛上也几乎没有防御工事。若想兴建工事，必会招致北京抗议甚至报復。越南人根本不甩中国抗议，可是菲律宾人却是严肃对待。

菲律宾人完成的一个建设是托玛士．柯洛马的小型雕像，纪念这位卡拉扬的先驱。毕托翁翁市长其实有若柯洛马的传人。至少在理论上，他负责南钥岛（Kota）、马欢岛（Lawak）、Likas、中业岛（Pagasa）、黄岩岛（Panata）、北子礁（Parola）和费信岛（Patag）七个岛，以及司令礁（Rizal Reef）、仁爱暗沙（Ayungin Shoal）和数十个无人占住的地貌及其间的广大海域。中业岛有个市公所，但是没有可靠的行动电话讯号，无法在那里办公。因此，大部分时间卡拉扬的地方政府侧身于巴拉望省会普林塞萨港城郊一座商场的小办公室里。

爱国的鲁宾逊

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开始进入南沙群岛时，所有露在海面上的岛礁差不多都已被人占有。只剩下不毛之地的礁石：若不用上数百吨钢筋水泥、以及定期派船供应补给，人类很显然无法在上面过活。在这些孤悬海外的据点，生活条件特别艰辛。虽然中国传媒报导一向描述这些「海上堡垒」的官兵是面色红润的英雄，充满着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精神，有时候它们不经意也会吐露真相。例如，二○○五年三月《解放军报》一则报导，赞扬驻守永暑礁的一群老兵为了鼓舞新到同志陈豪时的别出心裁。陈豪的生日快到了，可是「岛上没有奶油、也没鸡蛋」，他们用豆腐给他做了蛋糕。陈豪对这块蛋糕有什么反应，没

有见诸记载。一九九四年六月，中国广播电台播报在这些外岛的士兵「由于长期缺乏绿色蔬菜、口腔有破洞」━这是坏血症的初期徵兆━并且形容这些士兵已在这个「孤零零的碉堡」驻防超过一年以上。

比较近期的报导虽然赞扬新的发展，但也告诉我们那里的生活仍然餐风露宿。二○一二年六月《解放军报》一则报导描绘运到「防潮、防锈」的厨房器具、「发电机的防音罩」，以及防护紫外线辐射的玻璃。这似乎暗示金属器材易生锈、士兵生活在有巨响的工业机械的近处，而且阳光过于强烈。官方拍摄的岛上工事的每一张照片，几乎全在风和日丽、天空蔚蓝、大海清澈的好天气拍下。但是事实上每年大部分时间气温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湿度高到难以忍受，要不就是季节风频频吹袭。从十月到一月，三不五时会闹飈风━时速两百公里的强风捲起巨浪，有时候甚至会漫过士兵头顶。

本书截稿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南沙群岛下列八个礁石构筑工事：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西南礁、赤瓜礁、西门礁、美济礁和渚碧礁。另外也正在第九个岛礁安达礁（Eldad Reef）上大兴土木。它们在设计时完全不考量美学；它们是求生存的结构，为的是抵挡狂风、巨浪和军事攻击。有些有足够空间装个篮球框或是乒乓球桌，但是肯定会有直升机起降坪，可供打太极拳的场地，但是任何岛礁上休想有足球场。和菲律宾人控制的岛礁不同，菲律宾人还保有天然事物，中国人盖的结构其目的纯然是为了控制四周水域。它们竖立雷达站、人造卫星天线，和砲阵地。

户外没有空间放轻松，中国人就转向室内。卡拉OK唱机和电子游乐器早已有了，但是现在人造卫星让士兵能利用网际网路━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供做线上学习，但大家心知肚明不会永远一本正经。过去几年，各国都在进行后勤运筹战争，要在各自的岛礁提供最好的行动电话讯号。越南一马当先，率先在二○○六年建立基地台。中国旋即认真追赶。它在南沙群岛的第一套系统于二○一一年运作，然后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在二○一三年一月很骄傲地宣布，最大的驻地永暑礁现在已经开通3G行动电话，且它还正忙着将服务延伸到其他驻地。现在南沙群岛的士兵与渔民已经可以挑三拣四，选用不同国家的电话公司。菲律宾远远落于人后，但是至少北子礁上的菲律宾陆战队可以借用南子礁上越南讯号拨打电话回家。

太平岛与中华民国

如果国际法院被要求裁判南沙群岛的合法所有权，它势必要解开一个盘根错节又相互牴触的各种主张。六个国家可能会涉入：法国：依据它在一九三三年的发现和占领，以及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再度占领；菲律

宾：依据副总统季里诺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宣布（可能还有美国做为殖民国家在一九三○年代的活动）；（台湾的）中华民国：依据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占领及此后的活动（虽然因为它不是受承认的联合国会员国，不能向国际法庭直接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主张乃奠定在中华民国的行为的基础上，它必须是合法的「继承国家」（successor state），才享有此权利；越南：依据它是法属印度支那的继承国家及其后续行动提出主张。

国际法院需要决定的第一件事是「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重大事件发生、且争议已经「具体化」（crystallized）的那一刻。选定那一天通常会攸关结果的裁定。例如，如果国际法院在一九四七年被要求裁定太平岛的主权归属，它可能做出有利法国的裁定，根据是法国早在任何国家之前已清楚提出主张、且「占领」（在法律意义上）了它。但是如果今天要裁判，法官或许决定要纳入更多近年事件━尤其是过去六十年法国明显没有维持它的权利主张━而可能有利于中华民国。

「关键日期」还有另一层意义：在这个时点之后，争议当事人所採取的行动在国际法眼里没有效果。由于争议已经「具体化」━各造都已经表明立场━新盖一条跑道、把岛屿纳入某一省市管辖，或是在新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在国际法院法官的裁定上已不具任何份量。以南中国海这个案例来讲，「关键日期」肯定是在几十年前。各个岛屿的主张国似乎不明白这一基本法理，一再地做出不相干的姿势，和抗议别国所做的不相干的姿势，即使它们在国际法上不具任何意义。它们只是他们大赛局中另一些咋唬策略罢了！

如果各造要提诉的话，国际法院或许会被要求裁示，对太平岛的权利主张是否只是针对太平岛本身的合法主张，或是对太平岛紧邻地区的主张，或甚至是对整个南沙群岛的主张。过去是有先例的。例如，一九三三年针对东部格林兰（Greenland）的地位做裁决时，国际法院实质上决定，一个国家未必需要实体占领一个偏远、荒凉岛屿的每一部分才能声张对其全部拥有主权。如果遵循这个先例，对太平岛主权的裁决就有可能适用到它所座落的珊瑚礁━通称堤闸滩（中华民国称之为郑和群礁）━之其他地貌。它们包括越南人占领的鸿庥岛（越南名Dao Nam Yet）、敦谦沙洲（Sandy Cay，越南名为Da Son Ca），和舶兰礁（Petley Reef，Da Nui Thi），以及共产中国占领的南薰礁、西南礁和安达礁，它们彼此相距都不超过四十公里。不过，国际法院也可能裁决这些都是个别的岛礁、各有各自的权利归属。

更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对太平岛的裁决是否适用在南沙群岛其余岛礁。越南和两个中国都以最大框架提出他们的主张，宣布他们的主权及于全部的长沙群岛或南沙群岛。菲律宾也是同样的说法，只是它只包含

它称之为卡拉扬岛群（其中包含太平岛）的一部分南沙岛礁。如果这些国家全都坚持立场，要求国际法院把全部岛屿作为一个整体做裁决，那么南威岛、中业岛和其他岛礁的所有权恐怕都要归于对太平岛的主张最有力的那个国家。鉴于它在过去七十年绝大部分时间由中华民国控制，赢家极有可能是中华民国。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需要主张它有合法权利继承中华民国的权利主张—那又是另一番争议了。

太平岛将是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主张的任何国家最核心的一块领土，共产中国和越南明显都觊觎它。中华民国一直都担心会遭到入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太平岛是在强敌环伺之下汪洋大海中的小小一个据点。天候良好的时候从台湾最近的高雄港也要花三天才能走完一千四百公里的行程，若是遇上飑风，那就不只三天了。台湾政府一直很努力为太平岛寻求一个定位，其意向上是和平的，但是守卫的决心坚毅不拔。和南威岛、中业岛或永兴岛不一样，太平岛没有搞些什么平民生活的虚象，岛上没有小学校或观光旅馆这种东西。

一九九九年，台北政府试图降低南中国海日益上升的紧张，宣布从太平岛撤走陆战队，改由海巡部队进驻。不过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海巡部队：他们配备120釐米榴弹砲、40釐米加农砲，也由军方训练。二○一二年九月，他们举行实弹演习，展现击退来犯敌军的决心。和南沙群岛另两个最大岛屿一样，太平岛的主要地貌也是一条跑道，岛长一千四百公尺，它就占了一千二百公尺。它在两百七十三天之内抢建完成，陈水扁总统还在二○○八年三月总统大选之前一个月亲自飞抵太平岛、主持启用典礼。陈水扁宣布跑道要供人道救援之用—协助拯救受困渔民—但很少人会相信他这套说词。跑道是否兴建讨论了十五年，随着两岸关系冷暖变化而起伏不定。启用它是为了展现陈水扁支持台湾更加独立。不过它并无助于陈水扁所属的政党赢得大选。

太平岛只有三百七十公尺宽，但是有自己的淡水，也有天然植栽。它显然能够支持至少最低度的人类居住，不过岛上一百二十多名守军的补给完全仰赖台湾本岛运补。跑道两侧的条状土地建置宿舍、防御工事、一座太阳能设施（减低岛上发电所需的柴油之耗用），还有一片生态保护区，供濒临绝种的绿蠵龟栖息。

简单地讲，台湾在太平岛的地位是安全的。因此，从法律意义而言，或许越南和菲律宾应该修正他们的立场，不要再争取对大群岛礁的主权，只对特定地貌提出权利主张。届时，透过长期占领与使用的歷史，越南或许能对南威岛（大长沙岛）及其他岛礁提出最坚强的主张，菲律宾也能对中业岛（派格阿萨岛）及其他岛礁提出最坚强的主张。同样情况也可能出现在越南和中国对西沙群岛提出的权利主张—越南对永乐群岛的主张比较有力、而中国对宣德群岛的主张比较有力。然而，在

民族主义高度紧张之下要从全面主张的立场后退，恐怕在政治上必须极其勇敢才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岛屿、岩块、低潮高地的法律地位

民族荣耀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不惜流血及耗费巨资占领岛礁的原因之一，但是打从英国鸟粪挖掘商人一八七○年代最早提出权利主张起，经济动机也一直存在。今天，鸟粪已被挖光去做成肥料，岛礁本身几乎已经不具价值。马来西亚把弹丸礁（Swallow Reef，马来西亚名为Layang-Layang）改建成潜水度假胜地，紧傍着军营、跑道和海军港口，盖了一座旅馆和游泳池，但这是南中国海唯一一个有可能会赚钱的地方。除了有些过度夸张的战略重要性（详见本书第八章），这些岛礁现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周边的水域。这是因为过去半个世纪出现新一套国际法架构的结果。这一次，不像管理抢占土地的规则，没有一个主张国可以说他们是中古世纪教皇和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所拟定的规则之受害人。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联合国会员国在纽约集会，拟定新的《海洋法公约》。这些约翰．薛尔登和雨果．格劳秀斯的继承人花了九年时间辩论海洋属于谁所有。讨论的过程中，国际政坛变化不小：越战进入尾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联合国相当新的会员国；中华民国（台湾）刚失去联合国席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成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冷战的战场，也是贊成海洋自由及主张把别人赶离「他们的」资源这两派国家角力的场合。

在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迟迟没有定论之下，各方针对「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及其界定和主张的方式之概念出现了妥协意见。专属经济区不是「领土」，但是沿岸国家有权开发它，对于飞过其上空、在其中游水、躺在其海床或埋在其底下的资源有权规范。外交官们辩论之际，石油价格上升，各国政府掌握到其中的玄妙。谁拥有岛屿，就拥有在其四周之鱼群、矿藏及碳氢化合物的权利。随着科技发达，政府颁发外海石油租权，开採公司开始越来越远离陆地去勘察和钻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大提高各国对南中国海的权益主张。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谈判终于在牙买加蒙帝戈湾（Montego Bay）完成，全球政府同意沿岸政府可以声张拥有十二海里（二十二公里）的领海（territorial sea），以及二百海里（三百七十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另外或许还有「延伸的大陆棚」。他们也概略订定原则，规定什么可以算是领土、什么不算是领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上

有三种地貌：「岛屿」（islands），可以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岩块」（rocks），包括涨潮时浮出水面的沙洲（sandbanks）和礁（reefs），不能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以及「低潮高地」（low-tide elevation），退潮时才变干的地方。虽然「人类居住」和「经济生活」的确切定义没有明文规定，每一种海上地貌都有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岛屿被视同「陆地」，享有十二海里的领海和两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岩块享有十二海里的领海，但是没有专属经济区。低潮高地什么也没有，除非它们位于某块陆地或岩块的十二海里领海之内，就可以用来做为基础点以它来测量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以海洋资源而论，岛屿与岩块的差异可说是天差地别。岩块最大只能产生四百五十二平方海里的领海。而岛屿可以产生相同面积的领海，外加至少十二万五千六百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菲律宾政府试图改变他们在南中国海争议的立场，放弃自古以来即拥有领土的「歷史权利」论述，改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新论述。现在它不再慷慨激昂地辩论拥有大片水域，改而集中在依据某特定陆地之距离所计算出来的特定水域。它向海牙常设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提出二十页的说帖，明白表示菲律宾不要求裁示对各岛礁的歷史权利，也不要求裁定海上疆界，纯粹只要求裁示哪个地貌构成岛屿与岩块，因此可被归类为「领土」，以及根据它们能合法划定什么样的区域。註145马尼拉政府希望常设仲裁法庭可以裁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有的地貌都不能支持人类居住和经济生活，因此根本不能产生任何专属经济区。

菲律宾希望藉由仲裁这些议题，能破解掉中国号称在U形线（现通称九段线）之内所有水域拥有歷史主权的效力—这是中方对传统国际法模式的诠释。不论哪个国家拥有哪个岩块，对于海域的权利将仅限于—最多—每个地貌方圆十二海里的区域。这一来菲律宾就可以开发在其专属经济区之内的石油及渔获—前提是这些资源不在中国占领的每个地貌十二海里潜在的领海范围之内。所有权属谁可以等待日后由另一个法庭来裁决。

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年代末期参加南沙群岛角力战之时，好位置都给占了，只剩下鸡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的八个地貌，有五个最多只称得上低潮高地（美济礁、西门礁、渚碧礁、南薰礁和西南礁）。其余三个，按菲律宾人的说法，最多只称得上岩块，因此只能产生十二海里的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得很清楚：不管你在低潮高地上面盖了多大的堡垒，只要它底下的天然地貌在涨潮时低于水面之下，它就不能产生任何领海。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到马来西亚所占领的所有地貌（包括弹丸礁）、越南所占领的绝大多数地

貌，以及至少菲律宾所拥有的三个地貌。在低潮高地或岛礁上大兴土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们都不算是岛屿或甚至岩块。

菲律宾、越南和中华民国（台湾）控制的一些地貌，是有可能被归类为岛屿，因此有权划出专属经济区。但是要向法院证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他们就需要确立这些岛屿「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三个国家挖空心思开发民间设施：住家和学校当然是人类居住的表徵，渔港和度假村计划是经济生活的表徵。中业岛／派格阿萨岛的学童背诵九九乘法表，南威岛／大长沙岛的和尚诵经梵唱，都是在帮助他们的国家声张海上主权。

黄岩岛上没有小学童在学东西，但是二○○七年四月来了一群成年人在岛上玩了一个星期。他们是通称「火腿族」的无线电业余玩家，彼此竞赛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发出讯号。他们从香港出发，包租船只载运一切器材需要：无线电台器械、天线等等，固然不在话下，还要带厚木板、三夹板、发电机、遮阳伞和救生衣。这是一九九四年以来的第四届火腿族黄岩岛远征大会，因此他们大体上都很熟悉该带什么器材设备。但是他们到达现场时，发现几乎什么都没有。涨潮时，只有六块岩石突出水面，但是都没有超出两公尺高，且最多只有三、四公尺大小。他们立刻动手施工。为了符合火腿族规范，播报必须在岩块上发讯，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平坦的表面。他们利用厚木板在每块石块上盖了一个小平台──只够放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具发电机、一组无线电台和一顶遮阳伞。他们旋即轮班向全世界各地火腿族播报了五天之久。

对于圈外人来讲，用这种方式度假实在太奇怪，不明白其中奥妙。其实这次能够成行，幕后还涉及到南中国海地缘政治争议的长久角力。火腿族圈内长久以来即在辩论黄岩岛够不够资格列入「新国家地位」──这样那些急着增加新的讯号基地的无线电迷就有了理由。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国「无线电转播协会」（American Radio Relay League）的一个委员会试图对岛屿的最小面积定下规则，以便排除黄岩岛的资格。它呼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字句，宣布「不能支持人类居住的岩块不应列为火腿族国家地位」。可是，广大的火腿族极力争取推翻这个决定──七个月之后，他们翻案成功。但是，诚如火腿族远征军的结果所证明的，黄岩岛完全不能支持人类居住。即使有木板、发电机和遮阳伞，它最多也只能住个几小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种地貌有明确的规定：它只是「岩块」，只能产生十二海里的领海，没有什么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棚可言。

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却中国海事当局费尽心思在二○一二年从菲律宾手中抢夺黄岩岛。四月十号双方开始对峙，菲律宾海巡部队试图阻止八艘中国渔船载走大批珊瑚、巨大的蚌、甚至活鲨鱼。两艘大型中国海

监船现身，阻止其渔民被菲方逮捕。菲律宾派出它最大的军舰戈里格里欧．狄尔．皮拉号（由一九六五年建造的美国海防快艇改装），但是再一想，发觉不妥当，于是改派其他海巡船舰去支援。由于飐风即将来袭，双方政府同意把船舰后撤—但是只有菲方撤退，中方实质上掌控了黄岩岛。

中国对南中国海另一种地貌也提出领土主张，可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文本对它却明显不理会，那就是水下地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对低潮时位于水下的暗沙（shoal）或礁石（bank）提出主权主张：它们是海床的一部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条规定，量度领海的基线是低潮点。按照此定义，水下地貌没有低潮点，因此不能据以宣称有领海。但是中国仍坚持依据「歷史权利」，它对中沙群岛和曾母暗沙这两个水下地貌拥有主权。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谈到，曾母暗沙的最高点在海面下整整二十二公尺，它的「中国领土最南端」的地位可能是中国政府一个委员会一九三五年翻译错误而得致。它距离婆罗洲海岸一百零七公里，距离海南岛超过一千五百公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远远超出中国所能主张的领海范围之外。可是，民族主义的考量凌驾一切，北京政府无法理性地从它不合情理的立场撤退。即使今天，中国海军船舰要到索马利亚外海执行反海盗巡逻任务，都要绕到它附近来展示中国对它拥有主权。但是由于曾母暗沙根本没有干土地，中国人无法竖立正式碑石，只好在船沿垂下。现在它底下的海床已有不少中国人立的石柱。二○一三年三月和二○一四年一月，中国海军军舰在此举行军事演习，益发增添风波。

有趣的是，在另一个海上争议中，北京拒不接受水下地貌可以具有领土地位。大约在中国和韩国海岸中途的黄海，有个国际称为索克特拉岩（Socotra Rock，韩国称为离于岛〔Ieodo〕、中国名称苏岩礁）的石头，在水面底下约五公尺。南韩政府在上面盖了一座海洋研究站，招致北京抗议；但是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和大韩民国已就苏岩礁达成共识，亦即苏岩礁不具领土地位，双方并无领土争议。」然而，这样的共识似乎并不适用于曾母暗沙，或另一个更大的水下地貌：中沙群岛／马克雷斯斐德沙洲。

中沙群岛更接近中国，也比曾母暗沙大出许多：它大约一百四十公里长、六十公里宽。它也比较接近水面：它最浅的地方仅在水面下九公尺。一九四七年正式命名时，马克雷斯斐德礁石被取名为「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列。但是中沙「群岛」是地理上虚构的东西。以中国官方说法，除了马克雷斯斐德礁石之外，它还包括北抵一统暗沙（Helen Shoal）、南至中南暗沙（Dreyer Shoal，亦

称德雷尔暗沙）之间的若干水底地貌。最有争议的是，它包括东边的黄岩岛，这是中沙群岛唯一浮出在水面的岛礁。然而，海床的地图明白显示，没有字义上能接受的「群岛」这么一回事：这里没有岛链、只有各自独立的水下地貌，由地球某些最深海域分隔开来。这些水底地貌没有一个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只有黄岩岛可以最多产生十二海里的领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没有立场主张对曾母暗沙、中沙群岛／马克雷斯斐德礁石，或「U形线」内任何陆地地貌十二海里的水域享有主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根本不提歷史权利，除了「群岛国家」领海之内地区的关系之外──而中国根本不是群岛国家。中国在一九九六年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于放弃了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主张「歷史权利」的权利──至少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不得提出。另一方面，中国某些官员坚持依据传统的国际法，声称中国的航海家和渔民在南中国海海域活动已有数百年之久，这些活动即是它主张U形线内所有陆地──以及所有海域──都归属中国的根据。换句话说，他们企图以旧式的国际法来否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做的任何裁定。推论到最极端，动员这个论据显然是企图重写一份有利中国的国际法，让它对U形线内一切的领土主张都合法化。针对这个题目有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依据歷史的这个论据有瑕疵，法理上似是而非，但是如果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的裁示有利于菲律宾在二○一三年提出的主张，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对南海主张的主要根据。我们将在第九章再深入探讨。

歷史权利说

假如，在预料不到的地缘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之下，歷史权利说被国际法院接受、而各方也都同意尊重其结果，对南中国海整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清楚，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教授的研究或许是对可能的结果最好的参考。他坐在这个城市国家植物园附近的研究室钻研南海争议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得出某些结论。他检视了国际法院过去的判例，发现过去半个世纪有关争夺岛屿的效应可能出奇的小。有些国家依据小岩块或岛屿提出大片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时，若是与大陆海岸或比较大的岛屿之主张有所重叠，国际法院通常是持有疑虑的。用贝克曼的话说：「这不只是单纯在岛屿和大陆领土之间划一条等距线的问题。」例如，二○○九年针对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为黑海巨蛇岛（Serpent’s Island）之争做裁决时，国际法院强调涉及的海岸线的相对长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罗马尼亚大陆海岸线数百公里长，比起巨蛇岛的两公里圆周来得重要。它所裁定的国际疆界，除了给予巨蛇岛标准的十二海里领海之外，不做其他考量。国际法院二○一二年十一月就尼加拉瓜外海哥伦比亚岛

屿类似的争议所做的裁决，也重申海岸线相对长度是裁判海上疆界关键因素的原则。註146

由于涉及的岩块、岛屿和国家数量多，南中国海的情势远比黑海或加勒比海复杂。然而，非常有可能国际法院会採取相似的作法。即使我们假设在东南亚国家眼中最恶劣的情况—南海的每个岛礁都判归中国所有—也不会造成每个国家沿海专属经济区被大块地划给北京。根据贝克曼的研究，从各岛屿所划的专属经济区会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伸向海洋中心，因此「降低或完全消除在南中国海中央的袋状公海」。按照这个「北京全拿」的剧本，将会出现风筝形状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从西南往东北走，四周则是其他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另一个比较小心的裁决，将只把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以及西沙群岛判给「合併的中国」，会有类似、但比较小的效应。

然而，要把争议提到国际法院需要所有繫争当事国的同意，由于没有人有把握会是什么结果，其实大家都没有意愿同意。一个政府若是在国际裁判中「失去」领土，将是正式让渡在当地的资源，肯定会招致民间强烈反弹。政治风险非常大。纵使如此，东南亚主张国之间已有悄悄妥协的迹象。二○○九年五月，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名向联合国表示，他们的「延伸的大陆棚」先搁置哪个岛屿属于哪个国家这个问题，只从各自的海岸线测量起距离。自从二○○九年以来，菲律宾已修正它对南海一大片水域（卡拉扬岛群）的要求，只针对特定岛屿提出主张（这是依据歷史的主张），并且针对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订的规则从这些岛屿量出的特定水域提出主张。但是中国若把它的主张修订为吻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公式，它的损失最大，因为U形线会被切断，变成围绕特定岛屿四周的一系列小块地区。虽然中国政府整体而言对U形线的确实意义仍维持「战略模糊」，但是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解放军、石油公司和华南沿海省份）仍继续以中国对整个南海拥有歷史领土主权为基础运作。

所有的繫争国家都坚持对他们目前占领的岛礁拥有「歷史权利」，其中大多数国家（越南、菲律宾和两个中国—但是并不包含马来西亚和汶莱）也对其他地貌提出主张。这些领土主张根据的是传统的国际法规范：占领、割让、时效取得和土地增长。在任何解决程序能够开始之前，参与者必须先决定：国际法院是否应先听取歷史论据，就哪个岛屿与岩块属于哪个国家做出裁决，还是要搁置这些论据，只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海上区域做出裁决，以后再来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前者的结果是非常的不确定，后者则大体上有利于东南亚国家、而不利于中国。因此之故，北京愈来愈主张「歷史权利」，而东南亚国家则愈来愈提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国际法的规则长久以来偏袒过去数世纪的征服者和冒险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补救，要让沿岸国家对其周遭资源享有更大的控制。但是，地球的地理并不平等。各洲大陆和各国疆界的分布使某些沿岸国家毗邻广大的海域，其他国家邻接的海域则相当有限。譬如说，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往太平洋延伸，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却被日本、以及南方的菲律宾和越南给阻绝。这种地理上不公平的意识，再加上「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愠怒，说明了中国为何拼死也要在南中国海争取「歷史权利」。中国的外交官成了专家，擅长使用含含煳煳的语言以遂行最低度的国际义务，同时又维持未来的选项尽可能的宽广。中国从占领岛礁得到的法律优势有限，但是若不在南沙群岛实质驻军，它的领土主张就沦为空泛的理论。这些据点让北京坐上大桌，在国际论坛上现实政治永远比国际法来得重要。

一百七十年前，理查．史普瑞特利船长可以在他相信会有最大斩获的任何海域自由自在地捕鱼。美国和欧洲的灯火靠他和其他国家捕鲸船带回去的油点亮，鲸油提炼的化妆品成分也抹上仕女的唇上。鲸群为此几乎濒临绝种。追求另一种油，以及深怕会有类似的自由滥捕，促成全球政府协商出如何瓜分全球海洋资源的规则。但是在南中国海追寻油源却一直是动盪不安的源头……请待下文徐徐道来。

註136：Geoffrey Marston, ‘Abandonment of Territorial Claims: the Cases of Bouvet and Spratly Islands’, *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6* (Oxford, 1986), 337–56.

註137：Letter of 16 June 1955 from General Jacquot, General Commissioner of France and Acting Commander- in- Chief in Indochina, quoted in Monique Chemillier- Gendreau,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Leiden, 2000), Annex 40.

註138：Ulises Granados, ‘As China Meets the Southern Sea Frontier: Ocean Identity in the Making, 1902–1937’, *Pacific Affairs*, vol. 78 (2005), 443–61.

註139：‘Truong Sa Lon: Growing Town at Sea’, Vietnam News Agency, 18 May 2011.

註140：‘Spratlys to Become Self- sufficient in Food’, *Viet Nam News*, 19 July 2011.

註141：‘Vietnam Navy Commemorates Soldiers Killed in 1988 Clash with China’, *VoV* [*The Voice of Vietnam*], 8 January 2012.

註142：Rommel C. Banlaoi, *Philippine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Emerging Concerns* (Manila, 2012).

註143：一八六〇年英国海军的一名二副Thomas Henry Tizard探勘过之后，这个环礁就以之命名堤闸滩（Tizard Bank）。David Hancox and Victor Prescott,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an Account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Amongst those Islands’, *Maritime Briefings*, vol. 1, no. 6 (1995).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research-/research-centres/ibru-centre-for-borders-research/maps-and-databases/publications-database/Maritime-Briefings-(Vol.-1-no.-6).pdf＞.

註144：General Juancho Sabban, personal interview on 5 March 2012 in Puerto Princesa, Philippines.

註145：‘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22 Januar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dfa.gov.ph/images/UNCLOS/

Notification%20and%20Statement%20of%20Claim%20on%20West%20Philippine%20Sea.pdf＞.

註146：The full judg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4/17164.pdf＞.

第五章　石油与天然气：南海能源藏量的虚与实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一九九○年八月，东南亚为了「中国回来了」这件事骚动不安。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已经过了一年，许多权势人物觉得也该回头办正经事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是涉及主使屠杀的要角之一，他敲锣打鼓地展开了为期九天的亚洲地区访问旅行。他的第二站是新加坡，在客套寒暄、国宴接待等例行公事之后，他在八月十三日举行了记者会。大部分的发问集中在中、星两国是否即将恢復外交关系，很少记者注意到李鹏明白、友好地宣布：中国「愿暂时搁置南沙主权问题，与东协国家共同开发南沙资源」。註147这可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话。这是对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政策首次公开宣示。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月和日本人谈到东海问题、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与菲律宾领导人私下谈话，都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后这句话成了中国处理东海和南海问题的政策之根本。

一九九○年，中国领导人为能源问题伤透脑筋。拜大庆油田之赐，中国石油自给自足了三十个年头，而今邓小平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需求大增，很快就要供不应求。中国需要新的供应来源。一九八七年四月，中国科学家勘查了南海部分地区，旋即快快宣布在婆罗洲外海的曾母暗沙附近有丰富的油气蕴藏。註148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国日报》报导，官方估计南沙群岛有两百五十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和一千零五十亿桶的石油，而曾母暗沙地区另外还有九百一十亿桶石油。註149邓小平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南海会是迫在眉睫的危机的答案。这个主题受到能源界和军方主要声音的大肆渲染。解放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年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註150，把保卫国家领土的「神圣」重要性和善用南海资源的务实主张结合起来。註151

这些讨论在东南亚并无人闻问。中国太遥远，而且缺乏工具和专业知识可以开发远洋资源。当李鹏提议共同开发南沙群岛时，被诠释为空泛的姿态。这种意见是会改变的。邓小平的政策可不只是搁置歧异。它的完整说法有三个成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中第一项最重要。它实质上的意思就是：其他任何国家若要在「U形线」内开发海洋资源，必须要承认北京的领土主张，或是直接挑战北京实质的

驻军。由于没有人承认中国的主权，李鹏在新加坡的宣告成了目前争议的根本。

直到那一刻，北京的兴趣显然局限在它于一九七四以及一九八七至八八年所占领的岛礁。一九九○年之后，情势显示北京的许多利益团体希望在U形线内整个地区执行「主权属我」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mpany，简称中海油）。但是促使中海油展开第一步的却是个老美。

跨国石油公司的冒险

一九九二年，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男子因为深谙现代炼金术：无中生有、还变出黄金，竟然改变了南中国海的赛局。他改写对东南亚石油前景预测的规则，使两国国家走到冲突边缘，然后带着数百万美元扬长而去。在过程中，中国首次明白表示，它的「U形线」权利主张不只是歷史遗迹，也是对未来意向的声明，而它的邻国也理解到中国追求能源安全会威胁到他们本身的能源安全。但是，东南亚这场资源争夺战的开端却匪夷所思。故事要从一九六九年有个年轻人步行好几英里路，到丹佛乡村俱乐部接受高尔夫桿弟奖学金面谈开始说起。

蓝道尔．汤普生（Randall C. Thompson）的父母离异，两人都穷得养不起汽车，因此汤普生要步行去接受面谈。他搞砸了，但是有位口试委员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勇气，说服同僚送他到科罗拉多大学唸政治系。捐助人是拥有家族事业布林克霍夫钻探公司的桑尼．布林克霍夫（Sonny Brinkerhoff）。次年夏天，布林克霍夫提供五十个奖学金得主到他在怀俄明州油井工读的机会，但只有汤普生一个申请工读。他喜欢这份工作，翌年暑假又去替布林克霍夫工作。毕业后，他去拜会布林克霍夫。谈话结束，汤普生拿到一份工作，到阿莫可公司（Amoco Corporation）上班、负责寻找可能的油源、并谈判开採权。註152

汤普生在这份工作上投注了六年，然后跳槽转到别家公司、被辞退，再换一家公司、又被辞退，最后再辞掉第五份工作。他不喜欢替别人工作，因此在一九八○年回头找桑尼．布林克霍夫。三十一岁的他步出布林克霍夫办公室时，身上揣着一百万美元价值的产油公司的权利：克瑞史东能源公司（Crestone Energy）诞生了！创业维艰啊！当时原油价格每桶才十多美元，克瑞史东勉强损益两平。但是，汤普生在一九八九年接到一通改变了他一生的电话。爱德华．德尔基（Edward Durkee）是个科罗拉多石油业者、克瑞史东三十个原始投资人之一。一九八九年，德尔基受雇于瑞典伦丁石油公司（Lundin Oil），而伦丁石油正想出售它在菲律宾的权益。德尔基告诉汤普生，这件事十拿九稳：「你现在赶快赶过来，否则我就和你绝交。」次日，汤普生带着律师搭

机赶往马尼拉。

德尔基已经把大小事情打点清楚。九天之后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克瑞史东买下伦丁的开採许可，立刻一转身就出售四成权利给由七家菲律宾公司组成的财团。汤普生离开马尼拉时，皮箱已是满满的现金。克瑞史东现在拥有巴拉望岛外海GSEC54区开採权的过半数股权。GSEC54区面积广达一百五十万公顷，从菲律宾现有油田一路延伸到与马来西亚的国界。克瑞史东和伙伴仔细审视原有的地震资料、寻找可开採石油的证据。看来挺不错的。短短七个月之后，即一九九○年四月，他们以几百万美元把这一区块的七成权利卖给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以下简称BP）。克瑞史东这下子又装满了一箱子钞票。一年之后，即一九九一年四月，BP的确找到石油，但数量不足以进行商业开发，又隔了一年，它完全放弃菲律宾，把权利退还给克瑞史东。以石油界的语言来说，就是这儿什么也没有，但是汤普生已经成功地把它化为黄金。

但是对东南亚区域影响至为深远的是，汤普生发现了南海。在和BP签约的当天夜里，在英国驻马尼拉大使的官邸有一场宴会，几杯黄汤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汤普生回忆说：「酒精一下肚，原本应该是机密的消息就跑出来了。人人都在说越南会很火红，而BP的人尤其滔滔不绝讲白了就是南沙群岛的深海。註153第二天我就跑到图书馆去查这南沙群岛究竟在什么地方。」一九九○年越南还是美国石油公司不能去的禁区，因为美国对越南的战时贸易禁运还存在。BP和其他一些欧洲公司已开始在调查研究，但是真正在越南挖油的是俄国人。大家还记得越战进入尾声那段时期有过短暂的石油荣景，就凭着这一点，汤普生就兴致勃勃了。他在英国大使官邸晚宴后，花了三个星期上穷碧落下黄泉蒐集地质纪录和旧勘查资料。最后他锁定了位于越南海岸到越南人占领的南威岛之间、包含西卫滩（Prince Consort Bank）和万安滩（Vanguard Bank）的一块海床。但是他没有跑到越南去，汤普生也查出有关「U形线」的种种消息，他把希望寄託在中国身上。

一九九一年四月，汤普生跑到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去查前几年就喧腾一时的地震调查资料。「他们拿了一些结构给我看，我大为兴奋，又回头做更多研究。」他拼命请客吃饭拉关系，直到一九九二年二月终于在北京最高层多方讨论之后，得到机会向中海油董事会简报克瑞史东的提案。汤普生带了两位顾问明确地界定他希望有权开发的海床地区：他的恩师德尔基，以及美国国务院国界科前任科长丹尼尔．德祖瑞克（Daniel J. Dzurek）。他们划出来的区块形状像一把手枪，枪柄朝南、枪管向东。这个区块包括可能的油由、并触及（但未进入）印尼、马来西亚和汶莱所主张权利的四个地方之界线。汤普生记得：「我

带德尔基去，是从技术角度划出区块，而德祖瑞克则从政治观点界定区块。我们非常小心不进入菲律宾水域、或印尼、马来西亚或汶莱的水域。」如果这个区块形状像把枪，它也只是以越南人为目标。

汤普生向中海油推销他的构想的同一个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以下简称「领海法」）。领海法正式核准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提出的「领海宣言」，因此对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主权主张，并建立能够出租其外海地区以供探勘的法律基础——至少从北京角度看是如此。汤普生有兴趣的区块离越南海岸只有两百五十公里、距离中国海岸则超过一千公里。如此大胆，确实罕见；无论在技术上或政治上，即使中海油都不敢妄想。汤普生说他必须鼓励中海油不办标售就把权利批给他，他警告中海油高层，打草会惊蛇，一旦公开只会惹来越南人找麻烦。註154

这时候克瑞史东只有四名职员：汤普生、秘书、柜檯接待员和兼职的会计。最后，他搞定了！中海油把一大片海域——两万五千一百五十五平方公里，批给了全世界最小的石油公司之一。克瑞史东只花了五万美元权利金。中方把这个区块取名「万安北–21」（Wan An Bei -21，简称WAB-21）。根据合约，中海油将提供既有的地质资料，并保有权利日后有利润时可收购百分之五十一的租权。克瑞史东负责进行地震勘查及开发费用。就中国政治领导层而言，汤普生代表美梦成真。现在冒出一个老美愿意实质地在越南外海替中国领土权利说话。克瑞史东承受所有的砲火，中海油可以静观成效。

汤普生对于油气前景信心十足、对政治风险却满不在乎。当克瑞史东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签署租约时，他告诉记者他相信在区块内有「远超过十五亿桶的石油」，又说：他「宁可在有高潜力、低技术风险，而政治条件恶劣的地方去找寻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反过来的环境下去寻找」。他也很满意中国当局保证，若与越南发生冲突，将以「全部海军力量」保护他的权利主张。美国政府不介入。有个美国外交官在北京出席了签约仪式，但大使馆否认涉及克瑞史东的谈判。汤普生也说，在他签约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来找他想搞清楚究竟他在搞什么名堂。国务院特别关心——警告汤普生别让美国人员和器材进入该区域，因为会有遭越南扣押的风险。註155

由于政治的敏感，汤普生可以好整以暇：克瑞史东可以有七年的时间不必急着开挖。同一时期，越南人大怒，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也在报纸上发表谴责的文章。双方唇枪舌剑叫骂了一年半。同时之间，克瑞史东一直在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汤普生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应邀到河内，与越南国营石油公司「越油」（PetroVietnam）董事长胡士倘（Ho Si Thoang）博士会谈。越方向他提议，可以和他合资开发，但是

条件是他必须取消和中海油既有的协议。汤普生婉拒，越南人更加生气。他们准备推出比克瑞史东不知大出多少倍的盟友。

过去几年，美国公司也忙着到越南争取商机。其中之一是美孚石油公司，它一直很想找回它在一九七五年南越沦亡之前不久认为颇有潜力的一块油田区：这块地区叫「青龙区」，位于现在越南人称为5.1b的区域之内。它虽然没和WAB-21区重叠，却位于「U形线」之内。同一时间，越油公司和另一家大型美国业者康纳可石油公司就133、134、135三个区块谈判，它们就结结实实和WAB-21区重叠。在它们附近，美国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註156和英国瓦斯公司（British Gas）即将在一块越南区块开始钻探，而这个区块中国有提出权利主张。註157可是，没有人显得介意得罪北京之风险。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这些公司翘首以待的日子终于到了：美国正式取消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它们纷纷抢着签订合约。

然而，克瑞史东决心要抢头香。一九九四年四月，汤普生在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友人已经扬帆待发。该研究所从北京取得经费和许可到南海的北部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地震调查工作。汤普生劝说他们改变地点—前往WAB-21区。美孚和它的日本合伙人准备和越油公司正式签署青龙案合约时，汤普生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在海上努力工作。四月十九日星期二，青龙案合约于河内军人宾馆签字时，克瑞史东宣布它已在WAB-21区开始地震调查工作，并且计划「在中国全力支持」下开挖第一口探测井。註158

美孚显然没把克瑞史东的活动看在眼里，至少没有严重到使它和日本合伙人不付出两千七百万美元取得青龙区的权利。然而，根据美孚公司当时的公关经理汤玛士．柯林斯（R. Thomas Collins）的说法，越油公司明确地要求美孚宣布，它正要回到以前和南越政府曾经签约探勘的地区去，俾便强化它的领土主张。註159大海上的局势即将变得很诡谲。

中国船只没能完成调查工作。汤普生说，他们在海上进行了四天的蒐集资料，突然出现三艘越南船只向其船首开火警告。他回忆说：「我在一艘没有人讲英语的中国船上，遭到一艘也没人讲英语的越南船开枪。」经过两天对峙，汤普生和中国船长决定再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掉头回广州。尽管早先保证会全力支持，中国海军没有出现。汤普生替他们开脱：「他们不想正面冲突。」但其实这是北京的缓兵之计。

中方一退走，越油公司立即进入同一片水域伸张权利。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日，越油和俄国人合资的「越苏石油公司」（VietSovPetro）旗下的钻探平台三岛号（*Tam Dao*）开往万安滩。这块地区越南人编为135区，虽然位于克瑞史东WAB-21区西南角，却是康纳可有意承租的区

块。註160现在轮到中方采取行动。他们派出两艘船，但没有要赶走钻井平台。中方把它团团围住，挡住食物等补给品。详情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是平台的人员顶了好几个星期。根据当时在新加坡整合探勘开发服务社（Integrate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rvice）担任顾问师的伊安．克罗斯（Ian Cross）的说法，他们往下挖了约三千公尺，找不到油。而汤普生说：「他们不懂啦，钻井平台位置不对。他们主要目的只是宣示主权。」当然，越苏石油公司从来没有公开宣布它找到什么。

中国一九九二年的领海法、它的石油勘查工作、与克瑞史东签订合约，以及展现北京对「U形线」的权利主张十分认真的动作，使得东南亚各国政府十分忧心。有一段时期，东协六个会员国讨论该不该让越南入会。有许多因素要考量，但是在石油对峙上升的当下，外交交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九九四年四、五月，各国频繁互访、会商之后，导致七月十一日公布，将邀请越南入会—其实越南还未正式申请入会。七月十九日，三岛号对峙的新闻流到外界，这时候东协外长会议正在开会做最后准备，即将正式邀请越南入会。会议之后一个星期，中国军方在海南岛进行大肆宣传的演习，以其官方媒体的说法，展现了「几乎全面性的武器、器械和技术」。註161如此高调只会增加东南亚各国对中国意图的紧张。

可能是东协邀请越南入会触发了北京突然改变战术。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经过一个月的闭门讨论，消息宣布江泽民将访问越南，这将是中国国家主席访越第一人。当月月底，中方亦宣布贷款一亿七千万美元给越南更新老旧的生产工厂。双方努力修復关系。原因之一或许是为了抚平与东协的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正在秘密准备占领美济礁（见本书第三章）。大约这时候，马尼拉传出新闻，爱尔康石油公司已在另一个争议地区、菲律宾外海的礼乐滩（Reed Bank）进行勘查作业。或许与越南降低紧张只是中国的一个诡计，以分化可能对即将进行的行动之反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五年一月美济礁事件发生时，中国当局要克瑞史东放缓它的探勘工作。

情势现在进入僵局。汤普生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把可能的油源开发成商业计划。克瑞史东需要有家公司，对政治风险有同样大胆的态度，而且口袋又深。汤普生需要的是像宾顿石油天然气公司（Benton Oil and Gas）这样的公司，它可是见识过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大风大浪的老手。一九九六年，在石油荣景下，宾顿的股价涨为三倍：它已准备好在南中国海分一杯羹。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宾顿同意以一千五百四十五万美元买下克瑞史东。合约在十二月六日签字时，宾顿表示「克瑞史东的首要资产是和中海油的一纸石油合同」。註162那就是迄今还没开

採出一桶油的WAB-21区。蓝道尔．汤普生再次发挥「空手套白狼」本事，把商业上虚无飘渺的一个机会点石成金。克瑞史东的股东此时已有一百三十人，人人分到一大把钞票。宾顿的命运可没有那么乐观。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油价狂跌到每桶十二美元，宾顿公司被迫打消两亿四百万美元的巨额亏损。它靠变卖资产熬了过来，但是公司创办人艾利克斯．宾顿（Alex Benton）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中旬个人申请破产、九月被迫辞去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职务。

二○○二年五月十四日，宾顿石油天然气公司改名为丰年天然资源公司（Harvest Natural Resources），听起来像是卖杂粮棒的，而不是喜冒政治风险的石油公司。它仍然拥有在中国WAB-21区的权利，只不过现在不值钱多了。二○○二年公司把它的价值打消一千三百四十万美元（几乎是它在一九九六年买进价格的九成）。然而，它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有一天它会带来好运。二○○三至二○○八年期间，它花费六十六万一千美元在WAB-21区的探勘和资料蒐集上，此后想必还继续投下经费，只不过公司已不在年报里分项列举其支出了。蓝道尔．汤普生现在在科罗拉多颐养天年，偶尔带着孙子去钓鱼。他仍然活跃于石油业，在本书撰稿时仍在义大利、摩洛哥、纽西兰和南非寻找新油源。他依然拥有WAB-21区百分之四点五的权利——如果它的确开採成功的话。

马尼拉大转向

中海油第一次进军争议海域未能找到任何石油，而更惨的是竟让东南亚国家统统警觉起来。十三年来李鹏所提议的共同开发被客气地摆到一边去，无人闻问：其他政府不愿搁置主权争议。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汶莱继续把外海水域租给国际石油公司，而克瑞史东的区块依然前景不明。没有需要寻求与北京进行任何共同开发。但是，二○○三年，有一个政府却脱队另起炉灶。令人惊讶的是，在此之前，这个国家最强烈拥护东协联合一致，以对抗中国的侵犯，它就是菲律宾。马尼拉政坛高层一小撮人设计此一政策大转向，几近私人倡议。他们绕过既有的决策结构，把和中国——以及和区域——的关系放到截然不同的路线上。

二○○三年，荷赛．狄．维内西亚（Jose de Venecia Jr.）是菲律宾国会众议院议长、也是执政党拉卡斯—基督徒穆斯林民主联盟（Lakas-Christian Muslim Democrats）主席。年轻时，他靠仲介劳工输出到中东，后来又参与在巴拉望外海的第一波石油探勘热潮而发财。有了钱、家族关系和政治实力，他是菲律宾政坛一股重要势力。他努力透过下述机构与中国发展亲密关系：他在二○○○年发起成立「亚洲政党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Political Parties），并且也担任「亚洲国会追求和平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Parliaments for

Peace）会长。

二○○三年，葛洛莉亚．马加柏皋．雅罗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出任菲律宾总统已经两年，这段期间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出口原料—增为三倍，从二○○一年的十八亿美元，增加为二○○三年的五十三亿美元。由于美国注意力摆在中东「反恐战争」，中国发现有机可乘。二○○一年，北京提供四亿美元贷款给连结马尼拉和前美军克拉克空军基地改闢的克拉克经济特区之「北铁计划」（North Rail Project）。计划终于在二○○四年四月五日动土时，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说、感谢中国政府盛情美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荷赛．狄．维内西亚。註163

艾杜阿多．马纳拉克（Eduardo Manalac）和维内西亚一样，于一九七四年参与了挖掘菲律宾第一口外海油井。但是，马纳拉克和维内西亚不同的是，他留在石油业，替美国菲力浦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服务二十八年，其中七年担任公司的中国探勘经理。二○○○年，他协助发现中国最大的外海油田（位于渤海湾—与任何国际边界纠纷都不相干），获得中国政府颁发「友谊奖」、以及中海油的「模范工人奖」。身为专业人士，马纳拉克很清楚菲律宾石油业的病灶。从菲力浦石油公司退休后，他回国服务，「报答当年以低学费就能唸大学」。二○○三年三月，他被派任为能源部副部长。虽然个性、兴趣迥异，马纳拉克和维内西亚两人携手撮合菲律宾和中国撼动东南亚的一项交易。

马纳拉克非常了解中国，但是他希望菲律宾的石油天然气业能自立自强。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内本身：一小撮本国公司与能源部关系深厚，可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在探勘上。他们也挤走了或许愿意冒个几亿美元的风险、在未试过的海域挖口井试试看的外国业者。二○○三年，马纳拉克筹划一场有史以来菲律宾最透明的招标作业，试图吸引国际大公司来探勘菲律宾外海。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标了苏禄海（Sulu Sea）一块地区的权利，但是没有人对南海有兴趣。马纳拉克认为前景甚佳，但是菲律宾若想逃开几乎全盘依赖进口石油的情势需要有不同的作法，要考量到地缘政治情势。他回忆说：「我的想法是，只要那块地区有许多国家提出主权主张，没有哪一家大公司敢进去的。它是深邃大海，会需要大量资金去开挖。因此我问总统是否肯支持一个构想，即去找也主张有主权的国家共同开发。她点头了！」

同一时间，维内西亚拉拢和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二○○二年四月他筹备了「亚洲国会追求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二○○三年三月他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菲律宾贸易展览会菲方代表团团长。註164二○○三年九月，他做东接待吴邦国；吴邦国不仅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是「亚洲国会追求和平协会」的轮值会长。吴邦国在马尼拉时出

席见证两国中央银行十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的签字（意在保卫菲律宾不会重蹈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并向国会领导人的集会发表演讲。会后，维内西亚向记者们说：「吴先生提议在南沙群岛共同探勘和开发。」维内西亚贊成，他说：「这些地区闲置不用，我们何不让它们繁荣，大家共同分享利润呢！」註165双方协商好会有「一家大型中国石油公司」在十一月派代表团到马尼拉来。二○○三年十一月十日，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Philippine National Oil Company）和中海油签署了意向书，表明将「进行联合计划以检讨、评估和审阅相关的地理、地质和其他技术资料，俾便确认本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註166

马纳拉克和中海油高阶主管悄悄地划定探勘地区的界限。西界必须避开马来西亚水域，而北界和东界则恰好卡在双方中间。最后，它涵盖了巴拉望之北和之西十四万三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包括通称礼乐滩的浅海部分，但还延伸得更远。马纳拉克晓得分享资源这个主张在国内、国外都会引起激烈争议，但是诚如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一位经理日后的解释：「能有百分之三十总比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好得多。」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好协议的结构，以避开菲律宾政界和东协外交所有潜在的风险。马纳拉克要求被调到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去，以便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协议可以被规划成为商业协定，而非政府间的协定。两家公司都是国营事业，因此其实这只是掩耳盗铃。

二○○四年七月，葛洛莉亚．马加柏皋．雅罗育总统（她的朋友和政敌通常都叫她GMA）撤回派到伊拉克的一小支菲律宾特遣队，马尼拉和华府的关系立刻变得冰冷。她转而寻求与中国「广泛交往」，管道就是荷赛．狄．维内西亚。他已经安排中国共产党二○○四年九月在北京主办「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第三届大会，而雅罗育在八月份突然受邀要在大会上发表一场主题演说。八月十八日，雅罗育改组内阁，把艾杜阿多．马纳拉克从能源部副部长调到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担任董事长。五天后，维内西亚告诉记者们，雅罗育访问北京期间将会游说中国进行联合探勘。他发表了有关高油价对菲律宾经济的冲击的演讲后表示说：「我们不应该让区域歧见阻止我们的开发。」註167一星期后的九月一日，已经不再具政府官员身分的马纳拉克和老朋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签署了所谓「海洋地震联合作业」（Joint Marine Seismic Undertaking）。

海洋地震联合作业是雅罗育总统周遭一小撮人搞出来的点子。菲律宾着名的区域专家艾琳．巴维耶拉（Aileen Baviera）教授说，外交部和国家安全会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大多被排除在外」。註168支持海洋地震联合作业的一部分人，如马纳拉克，固然是出于增进国家能源安全、降低对进口能源之依赖的考量，其他人的动机可不是如此崇高。维内西

亚似乎只想藉由做为权力掮客及中国在菲律宾投资的守门人的角色，提升自己的地位。（果然生意源源不绝涌到，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二○○五年四月、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二○○七年一月的到访期间，承诺了多项重大投资案。）另外还有一批企业界人士盼望和中国公司签署价值不菲的商务合约。这些人包括雅罗育总统的夫婿、荷赛．狄．维内西亚的儿子，以及他们圈子里的其他人。这一帮菁英似乎控制了国家外交政策，准备中饱私囊。

在马尼拉的豪宅巨邸外头，各方面都大吃一惊。东协外交官想知道为什么菲律宾破坏多年来所主张的区域团结一致的原则。越南人脸色铁青。一连六个月，他们连连向菲律宾外交官员提出抗议，但最后决定识相一点，加入勘查比不加入要好。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越油公司签署扩大版、为期三年的海洋地震联合作业。中海油负责勘查，越油负责在和美商费尔斐德公司（Fairfield）公司合组的中心处理资料，而菲油公司没什么事可做，就由它来组织分析工作。九月一日，中海油一艘古董调查船「南海五○二号」载了这三家公司的专家从广东省出发。在接下来七十五天里，他们蒐集了一万一千公里的地震资料，涵盖整个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区域。十一月十六日，调查船泊靠到马尼拉南方八打雁市（Batangas）的菲油公司的补给港。马纳拉克宣布「政治紧张已成为歷史」。註169其他人可不这么以为。

到了二○○七年一月，找到几个有可能採到油气的地点，因此就研商要进行第二阶段更详尽的勘查。菲律宾外交部反对，拖到六月总统才批准第二阶段勘查。大约同一时期，雅罗育总统捲入贪渎指控风暴，涉及她本人、夫婿、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以及有些接受中国资助的计画。纵使如此，第二阶段照样推动，针对特定海床地区蒐集更详尽资料。另外第三阶段也蓄势待发，即列出进行探勘挖掘的地点。不料，二○○八年一月，资深记者巴利．魏恩（Barry Wain）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上撰文，指控雅罗育政府在海洋地震联合作业上做了「令人倒抽一口气的让步」，并批评它的秘密条件。註170雅罗育的政敌逮住机会大做文章，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因为与中国有关、现又扯上基础建设项目弊案，惨遭污名化。

弊案风暴扩大、政争加剧，海洋地震联合作业的设计师遭到排挤。马纳拉克继续努力整饬菲律宾石油业的风气，要切断本国能源公司和能源部的人际网络。他不甩雅罗育总统，没把一个与海洋地震联合作业无关的石油合约给总统夫婿拉线的一家公司，反而签给马来西亚的米特拉（Mitra）公司。他忍受不了贪渎盛行，于二○○六年十一月愤而辞职离开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维内西亚的儿子指控雅罗育总统的夫婿涉及中国人出资的宽频网路建置计划的弊案之后，维内西亚在二○○八年二月失

去国会众议院议长宝座。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协定就此死在水里。由于菲律宾政坛频频演出肥皂剧，续约的可能性就此溺毙。它在二○○八年七月一日效期届满，朝中已无人替续约说项。

马纳拉克仍然认为海洋地震联合作业是成功的：它使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找到人来分摊原本就想做的勘查工作之成本，又没有在公海发生冲突的风险。从中国的角度看，成功是成功了，但美中不足。首度有两个东协国家政府「搁置主权争议」，展现出共同开发的一种模式。然而，东南亚的反对再次破坏中海油真正产油的机会。我们并不清楚海洋地震联合作业的第三阶段是否真的会得到核准。

相反的，其他政府继续忽略李鹏的提议，自行把「U形线」内的区块出租给国际业者。但是在海洋地震联合作业期间，中国经济有如坐了火箭般一飞冲天，这开始赋予它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海洋地震联合作业是中国推动在南海共同开发的胡萝蔔，北京现在有了巨棒可以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公司。

英国石油铩羽而归

越南碳氢化合物工业的重心是东南沿海的头顿市（Vung Tau）。头顿在法国殖民时代是个度假胜地，但过去的美景现在已经被工业建设取代。长长的半岛，一边是供挺个啤酒肚、穿着短泳裤的俄国工程师游憩的公园区。另一边，面对海口，迎面就是储油槽和焊接厂。两侧中间有一排貌不惊人的高楼，却志气挺高地自命「宏伟大饭店」。二○○七年六月四日，英国石油公司越南分公司假座宏伟大饭店欢迎新任董事总经理葛瑞琴．卫金斯（Gretchen H. Watkins）到任。卫金斯出身阿莫可石油的工程师，在阿莫可被BP併购后歷任伦敦、荷兰和加拿大各地工作。她年轻、有雄心，现在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在新天地展现长才。她并不知道她的最上级老闆、BP执行长汤尼．海华德（Tony Hayward）已经断送掉她的机会。她将花上一整年时间、跌跌撞撞去学习，要经营从宏伟大饭店的窗户就能看到的那片大海有多困难。

早在一九八九年，BP就进入了越南，花了十年工夫才成为少数在越南能赚大钱的国际公司之一。二○○二年，BP在离海岸三百六十二公里的6.1区的兰西（Lan Tay）平台开始从全世界最长的水下输送管打天然气，送进离宏伟大饭店旁海口的发电厂。二○○六年，BP的天然气供给越南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而且由于BP在另两大区块还有开採权，前景还更看俏。BP坐拥这两个区块不动已经多年，它在等候越南经济会产生足够的需求、使之值得增产电力—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天然气了。二○○七年初，越南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知名投资者纷纷涌入，BP决定该有动作了。三月六日，BP宣布计划在5.2区开

发两个新天然气田，以及若不把它们连结上既有运送管、就是另建一条运送管。岸上将建第二座发电厂，以便将天然气化为电力、供应越南之需，当然BP也会日进斗金。时间表故意含糊，但是BP的伙伴越油公司暗示二○一一年可望供气。

大约同一时间，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也在准备调往伦敦、担任新职。傅莹和BP有一段渊源。二○○○年，BP宣布开发6.1区计划时，她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根据BP高级内圈人士的说法，她向BP驻北京及东南亚的高层强烈反映，要求BP停止此一计划，理由是它侵犯中国的领土主张。当时BP的执行长约翰．布朗尼（John Browne）是个征战多国的老将，没理睬傅莹的反对，照常推动计划。但是，二○○七年五月一日，布朗尼个人涉及丑闻，辞职离开BP，汤尼．海华德接任。

傅莹在四月十日抵达伦敦履新，同一天北京就对BP展开新战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预先套好招的记者会答覆中国国营电视台记者的提问，记者问到BP新的天然气计划，秦刚回答说：「越南的新行动是违法、无效的……不利于南中国海的稳定。」怪的是，北京现在认为不宜的这块区块—5.2区—实际上比BP已经在作业的6.1区，更靠近越南海岸。这不重要。现在它是傅莹报仇的机会。她在伦敦打开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和新上任的汤尼．海华德见面。BP也明白她的来意，把派驻越南的高阶经理人调回伦敦、准备讨论。他们认为BP在越南情势一片大好，把事情交给海华德及其团队去谈判。

二○○七年时，BP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人之一。它四十二亿美元的投资组合包括石化工厂、外海天然气生产、八百个加油站、对中国第一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持股三○%，以及其他若干事业。傅莹对此瞭若指掌，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到BP总部会谈时善为运用。她列举出对BP在争议水域作业的反对，根据一位圈内人的说法，接下来她提出两个明确的警告。首先，如果BP继续在5.2区作业，中国当局将重新考虑已给予BP的一切合同；其次，中国无法保证在争议地区工作的任何BP员工之安全。它明显是悍然威胁BP的商业性命及涉及到探勘及生产的员工之性命。海华德不像他的前任有和强悍政权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下子就被吓倒。他和傅莹达成协议—BP将在6.1区继续作业，但将会中止在5.2区的作业。傅莹扳回一城。

这就是葛瑞琴．卫金斯两个星期后到头顿履新时承继下来的烂摊子。BP已经和（代表越南政府的）越油公司签订合约，而美商康纳可菲力浦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也承诺要在5.2区进行调查和探勘作业。从维基解密（Wikileaks）发表的美国外交电文看来，BP直到六月八日取消了公司二○○七年工作计划时，才把海华德对傅莹的承诺告诉它的合作伙伴。康纳可菲力浦和越油公司岂肯善罢甘休、让BP毁约。卫金

斯发现自己身陷一场法律和地缘政治风暴当中。六月十三日，BP停止其计划中的地震调查的消息传了出去。后来两天，英国驻河内大使罗伯．高登（Robert　Gordon）和康纳可菲力浦公司代表都来拜访美国大使麦可．马林（Michael　Marine）。马林对会面的记载（维基解密所发表）显示，康纳可菲力浦公司抱怨说，尽管BP停止调查工作，越油公司却要求它履行工作合约。高登大使告诉他，英国将派外交部高级官员来和越南政府谈判。註171

既然BP已经向中国压力屈服，康纳可菲力浦公司没有办法，只好跟进也低头。它在中国的投资虽比BP小，仍然十分庞大，包括在香港南方的西江油田，以及在渤海湾的蓬莱开发案。北京食髓知味，扩大进击。同一个月，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指日商出光兴产（Idemitsu）註172、日本石油（Nippon　Oil）和帝国石油（Teikoku　Oil）参加的一个财团，计划在5.1b和5.1c区（位于BP作业区隔壁）进行地震调查工作。根据维基解密揭露的美国驻东京大使的报告，日本政府选择不和北京在这个议题上伤和气，这个日本财团在七月间停止其计划。註173二○○七年八月初，雪佛龙石油公司（Chevron）的高阶经理人被请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谈话，要求该公司停止在越南122区的探勘工作。下个星期在北京另一次会谈中，中国以更强硬的态度重申它的要求。这个要求实在很过分。122区就在越南外海边，而且在它的大陆棚上。可是，雪佛龙才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就四川省天然气签了一项十分大的协议，可经不起损失。当月月底，它停止了在122区的作业。註174九月八日，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发函给另一家石油公司帕果石油公司（Pogo），要求它停止在124区（位于122区南方五十公里）的作业。

傅莹显然非常高兴BP的知所进退，因为她在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特别跑到BP在英格兰西南角蔚奇园（Wytch　Farm）的岸上石油生产基地参访，还表示「双方可以多交流和合作」。对于她的到访，BP也不寻常地由亚太部门最高主管约翰．休斯（John　Hughes）亲自接待。休斯特别提到BP希望与「中国大型石油公司进行策略合作」。註175但是北京还未完全放过BP。其下一步是试图利用BP来威逼利诱越南政府在主权问题上面让步。根据BP一位高阶内圈人士的说法，中国政府「建议」BP协助中海油和越油谈判关于5.2区及其隔壁的5.3区的共同开发事宜。中海油兼具利润及政治的动机：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素以雄心勃勃着名。中海油在北京的总部隔着朝阳门大街十字路口就和傅莹的顶头上司外交部相望。二○○七年和二○○八年，双傅联手显然就是同一政策的阴阳两面。

实际上这是中海油第二次强迫BP当牵线红娘：过去在二○○三年就试过一次。当时，BP把中海油介绍给越油就不管了。越油客客气气地以几

个月时间和中海油大致交换意见，然后明白表示：欢迎中海油做商业伙伴，但是它不可能成为越南油区的共同管理人。二○○七年中海油旧调重弹时，傅成玉脑子里的目标相当明确：他看中了5.2区和5.3区。就和蓝道尔．汤普生十五年前代表克瑞史东的提议相似，它将是打着「共同开发」旗号掩饰的工作协议，等于暗示承认中国对于争议地区之内的资源享有主权。而且这一次他可不准BP在讨论过程落跑。实质上，要利用它做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武器。

在BP的伦敦总部，自汤尼．海华德以下一干高干显然盲目无知它今天所处的情势之歷史和地缘政治。公司的作法持续按这是另一项合资项目来办，认为中海油会以商业协议为满足，主权争议可以交由政府去处理。它没有理解到重点就是主权争议。一年多来，葛瑞琴．卫金斯和其他高阶主管穿梭往来河内和北京，在两大国营石油公司之间传话递信。BP提议换个新区块开发，可以让双方都赚钱的计划，也自信握有胜算。BP甚至把卫金斯的职衔改为「越南及中国探勘与生产董事总经理」。不用意外，这么做不会有进展。越南不会在主权上面让步，而中海油志不在商业协议。海华德及其团队隔了好几个月才恍然大悟。他们现在对墨西哥湾出现的巨大新油田更感兴趣，对他们来讲，东南亚沦为次要。

卫金斯和BP的亚洲主管想方设法停损。他们晓得已无法达成合约所要求的在二○○八年底完成地震调查的责任。因此，当年年初BP和康纳可菲力浦悄悄地把5.2区和5.3区的管理权移转给越油。他们继续拥有对此区块的权利，但是这样的安排代表他们可以避免派自己的船只进入争议水域。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卫金斯向新到任的美国驻河内大使麦可．米恰拉克（Michael Michalak）简报此一安排，也告诉他，BP和康纳可菲力浦不打算告诉中国政府管理人换了。註176两个星期之后，越南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前往北京访问三天。团员之一是越油董事长，他和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也进行私下对话。傅成玉不久即到河内访问，并与越油谈判，但是依然不能突破。越油接管调查的新闻在七月间传出来，但是中方似乎忙着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而无暇就此採取任何行动。註177

卫金斯已经受够了。天然气田开发案已经搁浅，她的本事可不包括地缘政治谈判。她在BP越南再待下去，只会蹉跎岁月，因此她在二○○八年七月辞职，捨巨型公司中阶主管的职位、到相对较小的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担任要职，职衔是国际生产事业部副总裁，至少这家公司少涉及主权争议。接替她职位的是美国人路克．凯勒（Luke Keller）。凯勒是BP子公司大西洋富田公司前任总裁，有丰富的经验与立场强硬的政府官僚，如德克萨斯州和亚塞拜然共和国，斡旋。但是这时候BP高层已经醒悟他们没搞头了，二○○八年十一月底他们告诉越油不

玩了，BP要退出。它悄悄地把它在5.2区和5.3区的权利无偿让渡给越油，全面冲销投下的两亿美元投资。这个决定逼得康纳可菲力浦也在十二月跟进，完全退出。傅莹大获全胜。

BP能够另有不同应对招数吗？另一家石油公司—全球最大石油公司—的经验显示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招数。艾克森美孚也遭到中国当局威胁—可是不理睬它们。多年来，艾克森美孚在打入中国市场方面没有BP成功。它唯一一个大型投资是在福建的一家炼油及石化工厂持股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当地的美国领事馆认为，这个计划的主要意义在于「他们给予中国政府的关系和潜在的政治资本」，而不是艾克森美孚能有什么重大贡献。即使这个计划的地点—与台湾隔海相望—也被认为是中国在一旦两岸发生危机时可用以在外交上牵制美国的一着棋子。註178艾克森美孚也有其他的牌可打。中国迫切需要增加天然气的供给，而艾克森美孚正在中国东北边境外、俄罗斯的库页岛（Sakhalin）开发巨型计划。它的俄罗斯伙伴「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Gazprom）希望天然气供应国内需求，可是艾克森美孚主张出口外销。北京不能太冒犯艾克森美孚。同样重要的是，与英、日业者截然不同，艾克森美孚有美国政府在背后撑腰。

二○○八年一月，新任探勘主管罗素．柏柯本（Russel Berkoben）到越南就职。他在艾克森美孚服务已歷三十二年之久，曾经一度在中国主管探勘业务。隔没多久，艾克森美孚即与越油公司签署备忘录，预备开发156区至159区这片地带。这些区块是迄今为止越南所签字出租者离越南海岸最遥远的区块。159区的东南角离越南海岸超过五百公里—深入到争议水域。艾克森美孚也认真谈判包租就在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117、118、119区。二○○八年七月二十日，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葛瑞格．托罗德（Greg Torode）报导，中国驻华府外交官向艾克森美孚提出警告，指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前景堪忧。註179托罗德的消息来源是欧巴马政府的某位资深官员，他则是从艾克森美孚一名高阶主管的简报获悉此事。

到了八月底，中国似乎要翻脸了。艾克森美孚计划中的一项合资工程要在香港兴建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厂，突如其来地被取消。公司经营层告诉美国外交官，他们不认为越南开发案是原因—地方环保人士强烈反对此一计划—但是看起来很像是中国在兑现它的威胁。接下来，挺讽刺的是，艾克森美孚被越南人惩罚，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它被中方惩罚。艾克森美孚已经和越油为四个区块（129至132区，位于156至159区和海岸中间的地带）谈判了一年多，但是二○○八年十月，越油把它们批给了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柏柯本告诉米恰拉克大使说，越油怕艾克森美孚届时会在北京施压下抽腿，因此不和艾克森美孚签约。註180二

○○八年七月，俄罗斯外交官告诉美国外交官，中国对俄罗斯公司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想必越南当局也会知道才是。註181

艾克森美孚不是无畏中国恫吓的唯一一家公司。印度的ONGC Videsh能源公司（它是BP在6.1区的合伙人，另外也承租了127区和128区）、韩国的韩国国营石油公司（Korean National Oil Company），以及在中国没有太大投资的小型公司—如英国的首相石油（Premier Oil）、加拿大的塔里斯曼能源（Talisman Energy）□□也都不甩中国的压力。北京也用别的方法施压。二○○七年十月，新加坡珍珠能源公司（Pearl Energy）财务长麦克．布鲁士（Mike Bruce）接到中国大使馆来电。这位中国外交官告诉布鲁士：「贵公司疑涉在中国海域不法探勘，请你拨冗到大使馆一谈。」布鲁士不肯去，反而邀请中国方面来访问他。隔了几天，中方来了几位代表，告诉珍珠能源的高阶主管，他们晓得该公司有一艘调查船在6.94区（它几乎包围住BP的6.1区）作业。根据布鲁士的说法，他们「威胁要对新加坡政府施压，因为珍珠能源是在新加坡证交所挂牌上市公司」。但是布鲁士告诉他们，珍珠能源已经不在新加坡上市，一年前就被阿布达比的阿巴能源公司（Aabar Energy）併购。他们的脸垮了。带队的那位女士讷讷地说：「喔！这样子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珍珠能源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

到了二○○九年初，唯一一家在中国有投资，且在越南外海探勘的公司就是艾克森美孚。六月三十日，它和越油公司签署一份两组区块（东南方的156区至159区，以及岘港外海的117、118、119区）的生产分享合约，使它成为越南外海油气田租地面积最大的公司。一个星期前，柏柯本就到河内美国大使馆去解释，签字仪式要「悄悄」举行以免惹恼中国人。他承认不确定中方会有何反应，但是也说如果中国有所反应，艾克森美孚「已有准备」。一年半以后，柏柯本有了收穫，公司二○一一年十月在118区发现潜在巨大的天然气储存。其他区块的探勘工作仍在继续中。

除了艾克森美孚以外，每家石油公司都必须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主张主权之海域营运之间做选择。康纳可菲力浦在二○○八年十二月退出5.2区和5.3区，但仍保留紧邻着越南海岸的两个区块之权利，换句话说，远离会和中国有纠纷的是非之地。二○一二年二月，它完全退出越南，集中精力在其他更赚钱的项目上。雪佛龙保留它在122区的百分之二十的权利，但停止在区内一切活动；到了二○一三年初终于全部出清。北京显然很欣慰雪佛龙的识趣，因为它在二○一○年把南海北部地区海南岛附近三个区块的权利赏给了雪佛龙。註182二○一四年夏天本书截稿时，据报导称，雪佛龙要出脱它在越南还剩的投资—越南西南海岸之外、邻近印尼及马来西亚海上疆界的两个区块。

BP继续在越南营运，经营它原本自6.1区将天然气转化为电力的作业。可是，二○一○年七月，汤尼．海华德在墨西哥湾的摇钱树出了大纰漏。在「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爆炸、漏油事件之后，BP突然急需三百亿美元支付赔偿。二○一○年十月十八日，BP把它在越南和委内瑞拉的权益做价十八亿美元，出售给合资事业TNK-BP的俄国伙伴。或许它觉得俄国人顶挡得住中国的压力吧。BP还有棘手的任务要借重路克．凯勒。他被任命为BP墨西哥湾海岸復原组织（Gulf Coast Restoration Organization）执行副总裁──协助清理烂摊子。在出售给俄国人之前几週，即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汤尼．海华德再度拜会傅莹。她在伦敦表现优异，被擢升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海华德带他的接班人鲍布．杜德雷（Bob Dudley）去拜会。这是海华德在BP的最后几件公事之一。九天之后，他再也不是BP执行长。

傅成玉则不升、也不贬。尽管费尽心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还是得不到南海远处的潜在的石油资源。它这位野心勃勃的负责人得不到政治奖赏。二○一一年四月他得到的安慰奖是调到和中海油竞争、可又绩效不佳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简称中国石化）──亚洲最大的炼油企业。傅成玉的生意长才是受肯定的：在他主持期间，中海油的获利翻了两番；中国共产党觉得他比较适合在业界发挥长才，不要让他搞地缘政治了。

闯关

到了二○一○年底，北京的努力已迫使BP和康纳可菲力浦停止在「U形线」内的探勘活动，而海洋地震联合作业也建立起中国喜爱的替代方案之先例。然而，菲律宾的新政府，以及越南、汶莱和马来西亚原有的政府却不肯在主权问题上退让，而潜在获利的诱惑仍很强大、大到足以吸引不畏中国压力的其他公司，到这片是非之地一试身手。北京已经祭不出商业招数，现在要伸张主权必须採取更强硬的手法。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三，地震调查船「真理航海家号」（MV *Veritas Voyager*）（船主是法国地球物理学业者CGG Veritas公司）发射强大的气枪飞越礼乐滩，这是离巴拉望大约一百六十公里的一块浅海地区。四条两千七百公尺长的水下监听器电缆拖在船后方，搜集数千公尺底下海床岩石层所传回来的音波。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司令部司令沙班中将坐在巴拉望省会普林塞萨港的作战指挥中心中，心怀忐忑等着会发生状况。真理航海家号进行调查工作已超过两个月，海巡部网站早已贴文警告它的活动。船员在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一艘中国船只，次日来了不速之客。中国海监总队一艘船舰来到距真理航海家号不到一百公尺之处，命令它立刻离开。

真理航海家号受雇于一家在英国註册的「论坛能源公司」（Forum Engery，其实是菲律宾人的公司）。二○○五年，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即将开始之时，论坛能源公司刚从另一家英国公司史特林能源公司（Sterling Energy）手中接管一块探勘区—正好位于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区域的正中央。艾杜阿多．马纳拉克向中方保证，论坛能源公司的探勘租期已届满，不会让它续约。可是，菲律宾政府里其他官员被论坛能源公司的游说所影响，二○一○年二月十日，它的租约升级为全套的服务合约SC-72号文件。马纳拉克气炸了，论坛能源公司则欢欣鼓舞。初期勘查认为区块内的桑帕吉塔（Sampaguita）附近有三兆四千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现在只需要搞定确切在哪里开凿。

真理航海家号进行调查期间，论坛能源公司总裁雷．阿波斯托尔（Ray Apostol）每天都和沙班将军联繫。三月二日，他很惊慌地打电话给沙班。中国海监七十一及七十五号这两艘海监船穿越真理航海家号船首，命令它离开。他告诉沙班说：「我们要打包闪人了！」沙班告诉他指示船员原地不动，并紧急调派两架无武装的OV-10侦察机飞过去。等到它们两小时后飞到现场，中国海监船已经开走了。接下来，他派「黎剎号」（BRP *Rizal*，一九四四年建造的扫雷艇）和「拉加胡马蓬号」（BRP *Rajah Humabo*，一九四三年下水）两艘军舰前往护航。两艘船虽老，却足以让中国海监船在未来七天不敢欺近真理航海家号，让它能够进度提前、完成调查。

十二个星期之后，中国海监船在南海的另一边用上比较有侵略性的战术。越南石油公司和CGG Veritas合资事业旗下的海研船「平明二号」（*Binh Minh 02*），正在越南港口芽庄之东一百二十公里的148区作业。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十二、十七和八十四号三艘海监船出现在地平线、围了上来。有两艘拖网渔船护着平明二号，但是它们保护不了它背后拉着的一万七千公尺长的缆线。海监84号故意驶过缆线、把它割断。对越方而言，万幸的是，这条数百万美元的水下监听器电缆配备着紧急浮出设施，使它能浮上水面修復。损害经修復后，平明二号下个星期就又出海作业，这次有八艘船护卫。

两个星期后，另一艘研究船—这次是由越油和加拿大塔里斯曼能源公司共同委包—又在136-03区，即越南声称的专属经济区最东南角，遭到拦截。这个区块正好位于康纳可菲力浦公司二○○八年所放弃的那三个区块南方，并且包括了一部分蓝道尔．汤普生的WAB-21区。这艘研究船「真理维京二号」（*Veritas Viking 2*）也是CGG Veritas旗下的船只。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中国海监总队，而是渔政指挥中心的船只。这一次中方大费唇舌来合理化它切断缆线的行为。中国一小支渔船队出现在勘查地区，虽然遭到一艘越南海巡船要求离去却不甩警告、依旧逗留

不去。次日、即六月九日，渔政303号和311号驶过真理维京二号船首，拖网渔船62226号驶过它背后的水下监听器电缆。渔船缠上它的缆线，被倒拉着走。渔政船冲过来救渔船、砍断水下监听器电缆，中方日后辩称这是自保行为。

二○一一年上半年这三起事件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引爆各方抨击中国的「霸凌」行为。后来又发生四起事件：二○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平明二号缆线在113区（靠近西沙群岛、出租给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第二度遭切断；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婆罗洲外海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的两起事件，和二○一三年一月十九日的又一起，都是中国政府船只拦阻石油调查工作。註183有些人以中国海上执法机关的行动，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敌意意向的证明。他们也提供更多的证据说，中国的中海油、中国海监总队、渔政指挥中心等机构视「U形线」为中国对百分之八十的南海提出主权主张。所有事件均发生在远离任何中国主张的地貌，因此不能拿来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主张相提并论。批评声浪大炽之下，北京领导人似乎体认到海监、渔政指挥中心做得太过火。二○一三年三月，中国政府宣布计划把林林总总的海事机构统合为一，不再政出多门。这些单位包括国土资源部的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的中国海监；公安部下的中国海警；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农业部的渔政指挥中心；以及海关总署。此后，至少直到本书截稿时，再也没有发生事故。

这个策略是否成功呢？在越南，它是失败的。切断缆线并不能阻止继续探勘，塔里斯曼能源公司预料将在二○一四年底在136-03区钻孔。可是，在菲律宾，它就相当有效。论坛能源公司一直未能在礼乐滩探钻，而且菲律宾军舰老旧无力实质保卫其主权主张，中国现在实质上已对此一地区之开发建立否决权。论坛能源公司的经营层与中海油交涉良久，迄至本书截稿时仍无突破的迹象。菲律宾政客现在面临的选择是：在主权立场上退让以便增进能源安全？或是坚持领土主张、以便日后取得百分之百的资源，还是现在就妥协、希望更快取得一部分资源？

骑虎难下

中海油和北京的其他机关费尽苦心想要取得南海地区碳氢化合物资源。但是如此的努力，他们可能得到什么收穫？想得到对南海石油及天然气潜能真正不偏不倚评估的最好地方，或许是新加坡旧堤岸的黑便尼酒吧（Penny Black Pub）。这是一个嘈杂、喧闹的啤酒屋，客人的话题一直是各式各样的体育竞赛。但是喧闹中却另有一番对地质结构的深刻知识。黑便尼酒吧的常客是一小撮研究东南亚海域歷数十年之久的地质学专家和地球物理学专业顾问。他们大半是四、五十岁的英国人、「东

南亚石油探勘学会」（Southeast Asia Petroleum Exploration Society）的会员；这些人的雇主大概无一不曾试图在南海地区寻找石油或天然气。他们看过数十家公司兴冲冲一头栽进来，可是大多数鎩羽而归。他们帮过一些公司赚了钱，也帮助其他公司理解到天底下不会有天降横财这一回事。他们靠的就是维持住商业信心来过活，且由于动辄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话不能说得太白，但是你从他们闪烁的眼神、紧皱的眉头之间总能挖到一点玄机。

这些专家的集体智慧令人惊讶。他们相信南海争议地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南海绝大多数的资源不在「U形线」之内。在中国主张的区域内是有一些优质油田及值得一试的地点，但是黑便尼酒吧的地质学家们认为这些可能性并不值得各国大动肝火、兵戎相见。若想要正确掌握这个问题，必须有地质学上的专业知识，但是灌了几杯黄汤后的速成教育告诉你，地震学调查的重点是寻找三样东西：含有碳氢化合物的源岩（rource rock）、供它们聚集的储油岩（reservoir），以及确保它们不会流失的顶盖岩（seal rock）。南沙群岛只有少数地方具备这三样东西。在地质学上所谓的「中新世」时期，即三千万年以前，大型礁岩在海底形成，且当地壳移动、海平面下降，这些礁岩愈长愈高，形成厚厚的碳酸岩（carbonate rock）层。这些碳酸岩有孔隙，早期或许形成的油与气有可能已经蒸发或流失。当碳酸岩层厚达三千公尺时，很难正确勘探它底下有什么东西。若没有确切的勘探，谁肯冒险投注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巨资去挖一口井？

在争议地区中心甚至有雪上加霜的新闻。在大陆棚末端，海床突然从水下两百公尺急降到两千公尺，有些地方甚至深达六千公尺。经常在黑便尼酒吧厮混的琼．沙瓦吉（Jon Savage）对南海瞭若指掌，他多年来参与数十个项目，其中包括论坛能源公司在二○一一年被迫中断的调查。他对海底的状况做了什么样的裁判呢？它大多是海洋地壳、没有含油气的源岩、也没有足够的储油岩、更没有可以防止它漏失的顶盖岩。二○一三年十一月他在胡志明市一场会议上宣称：「没有潜藏的碳氢化合物。」註184业界几乎人人都同意这个定论。那么为什么中方人士一再高唱相反论调呢？

答案似乎是教条思想和投机主义两者的恶性循环。在一九八○年代中国初步调查引起的大肆渲染，以及重要党政机关奉命替国家取得新能源供应之后，许多人的仕途已和证明南海是能源宝库绑在一块了。例如，一九九四年九月，国家地矿部部长宋瑞祥宣布，南沙群岛「石油潜力上看三百亿吨」（约等于两千两百亿桶）。註185一旦这些官方人物宣布此一数字为真—而且它是国家危机的解决之道—其他官员就很难指正他们胡言乱语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奉命开发这些巨大的石油储藏，

成为在体系内扩大宣称南海潜力的强大声音。储存量显得愈大，它向国家争取愈多经费预算也更加振振有词。

但是，「资源」和「储存」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前者是躺在地底下的东西，后者是可以开採的部分。通常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资源」技术上可被汲取到水面上，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具有商业价值。对于南海碳氢化合物潜力最近最权威、最透明的评估，来自二○一○年六月的美国地质学调查（US Geological Survey），以及二○一三年二月美国能源情报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研究。能源情报局估计，南海只有一百一十亿桶石油和一百九十兆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是商业上可行的储存量。它的数量大约等于墨西哥的石油，以及等于俄罗斯以外的欧洲的天然气。註186根据对该地区地质的了解，美国地质学调查估计尚待发现的资源约为一百一十亿桶石油（估计最低值是五十亿桶、最高值是两百二十亿桶），以及四十亿桶「液态天然气」—合计是一百五十亿桶。美国地质学调查估计，未发现的天然气资源可能更大—大约在七十兆至两百九十兆立方英尺之间。换句话说，未发现的资源数量可能相当于目前的储存量。註187

可是这些数字指的是整个南海地区，包括明确位于各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只有一小部分位于争议地区之内，也只有其中之一可以商业开採。这些藏量可以对菲律宾或越南这类小而穷的经济体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鉴于中国每年耗用约三十亿桶石油、以及约五兆立方英尺天然气，南海的储存及资源根本不值得花这么大的劲在它们身上。即使每一滴油、每一气泡天然气全送到中国去，它们最多也只能支撑中国的经济区区几年。南海的地质很艰难，它又经常颱颱风，支援的基础建设开发的也不够。汤尼．雷根（Tony Regan）原本是壳牌石油公司高阶主管，现在住在新加坡担任能源顾问。他对南中国海能源的商业前景有很率直的评语：「对于大型石油公司而言，这个区域从来就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它们现在也不认为它会是下一个宝地。还有别的更有吸引力的地区—例如西澳大利亚和东非洲，当然还有煤层和页岩等非传统天然气。註188换句话说，除了把南海搞得天翻地覆，中国还有更便宜、更可靠的方法缓和对能源安全的恐惧。

本地区所有的国家都很关切它们的能源安全。需求在上升，但产量却在下降。外海开发已因领土争议延宕下来，东南亚没有发现足够的新油田以取代产量下降的旧油田。结果就是从区域之外大量的进口能源。南中国海现在对于哪些经过它运送的碳氢化合物的重要性，恐怕远超过躺在它海床下的能源。二○一三年，美国能源情报局估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和二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要经过麻六甲海峡，运到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平均而言，每天必须有两艘非常大型原油货轮（每艘

载运量两百万桶石油），和两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货轮（每艘载运量二十万立方公尺）抵达日本，才只够日本点灯之用。註189东亚和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经受不起供应受到干扰。二○○八年，石油占中国全部耗用能源的百分之二十二，这些石油有半数由国外进口，而进口石油的百分之八十五要经过麻六甲海峡。换句话说，几乎百分之十的中国能源供应要跨越南中国海。自从二○○八年以来，这些数字还在上升，估计也还会继续攀升。註190

自从李鹏在新加坡发表谈话以来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领导人对其能源问题的对策是假定中国必须实质控制住资源，以便依赖它们。从授权克瑞史东、到海洋地震联合作业、到在「U形线」内作战，都是根据这个模式。其实还有别的方法。降低对海上主权主张的紧张可以让各国政府有更大的信心去相信自由航行权将受到保护。对于本区域能源供应采取比较合作的方法，或许可以使所有国家在它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开发资源，然后让能源公司把能源销售到任何需求最大的地方。然后各国政府会更愿意信赖他国保障其能源供应安全送达，而不是透过武力来垄断它们。但是南海周边各国的怒火已被激起，折衷妥协显得愈来愈不可能。

註147：Nayan Chanda and Tai Ming Cheung, ‘Reef Knots: China Seeks ASEAN Support for Spratly Pl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90, 11.

註148：‘Oil Discovered on Nansha Islands’, *Xinhua*, 24 July 1987.

註149：China Daily, 24 December 1989.

註150：John W. Garver,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1992), 999–1028.

註151：Knut Snildal, *Petroleu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a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slo, 2000.

註152：译注：Amoco前身为印第安那州标准石油公司，二十世纪初併购美国石油公司（American Oil Company），是世界大型石油公司之一，但是一九九八年被英国石油公司合併，在美国已经看不到Amoco招牌的加油站。

註153：个人电话採访。2 December 2013.

註154：‘Benton, Successful in 2 International Ventures, Plunges into Disputed China Play’, *Oilgram News*, 13 December 1996. See also John R. Engen, ‘Where Hope and Risk Go Hand in Hand’, *World Trade Magazine*, February 1996.

註155：*World Trade Magazine*, February 1996.

註156：译注：美国通称ARCO。

註157：‘British Gas, Arco Begin Drilling in Area Claimed by Vietnam’, *The Oil Daily*, 7 June 1994.

註158：‘Crestone Begins Project in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Dispute over Sovereignty of Area’, *The Oil Daily*, 20 April 1994.

註159：R. Thomas Collins, *Blue Dragon: Recko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ienna, Virginia, 2002), 116.

註160：‘Heat Builds and Vietnam and China Begin to Drill’, *Offshore*, August 1994.

註161：Chan Wai- fong, ‘PLA Flexes its Muscles for Vietnam’s Benefi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August 1994.

註162：‘Benton Oil And Gas Company Completes Acquisition of Crestone Energy Corporation’, PR Newswire, 5 December 1996.

註163：‘North Rail Project Launched; RP, China Start Building Rail Project from Manila to Ilocos’, *Manila Bulletin*, 6 April 2004.

註164：See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english/2010–07/12/c_13395670.htm＞.

註165：‘RP, China to Push Formation of Asian Anti- Terror Alliance’, *Philippines Star*, 1 September 2003.

註166：‘Oil Giants to tap Ocean Resources’, *Xinhua*, 13 November 2003.

註167：Maria Eloise Calderon, ‘Government Mulls Oil Search at Spratlys with China’, *Business World*, 24 August 2004.

註168：Aileen S.P. Baviera,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 since 2004’, *RSIS Working Papers*, no. 241 (Singapore, June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rsis-pubs/WP241.pdf＞.

註169：‘China, Philippines, Vietnam Get Seismic Data from South China Sea’, *Xinhua,* 19 November 2005.

註170：Barry Wain, ‘Manila’s Bung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8.

註171：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7HANOI1119, ‘Conoco Phillips and BP Concerns About Proje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5 June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7HANOI1119_a.html＞.

註172：译注：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

註173：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8TOKYO544, ‘Japan Plans No Action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29 February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8TOKYO544_a.html＞.

註174：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7HANOI1599, ‘Sino- Vietnam Territorial Dispute Entangles Multiple Multinational Energy Firms’, 7 September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7HANOI1599_a.html＞.

註175：‘Fu Ying Visits Wytch Farm Oilfield of the [sic] British Petroleum’, Chinese Embassy, London, 25 September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EmbassyNews/2007/t377632.htm＞.

註176：US Embassy Cable 08 HANOI579, ‘BP Transfers Operatorship of South China Sea Blocks to Petrovietnam; Exploration Work Resumes’, 16 May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8HANOI579_a.html＞.

註177：‘Petrovietnam Surveying Oil Block Eyed by China- BP’, Reuters, 22 July 2008.

註178：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7GUANGZHOU317, ‘The Tiger Sprints Ahead: Exxonmobil First Western Oil Major to Launch Fully Integrated Joint Venture in China’, 9 March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7GUANGZHOU317_a.html＞.

註179：Greg Torode, ‘Oil Giant Is Warned over Vietnam De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July 2008.

註180：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8HANOI1241, ‘Vietnam Negotiates Deal with Gazprom, Bypasses ExxonMobil’, 6 Nov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

cables/08HANOI1241_a.html＞.

註181：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08HANOI897, ‘Russian Concern about Chinese Pressure on ExxonMobil’, 4 August 2008. Available at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8/08/08HANOI897.html＞.

註182：Chevron Corporation, *2010 Supplement to the Annual Report*, March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annualreports.com/HostedData/AnnualReportArchive/c/NYSE_CVX_2010.pdf＞.

註183：Buku Bertemu Ruas, ‘The RMN Against China Maritime Surveillance Agency’, Malaysia Flying Herald blog, 16 Apr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malaysiaflyingherald.wordpress.com/2013/04/16/buku-bertemu-ruas-the-rmn-against-china-maritime-surveillance-agency/＞.

註184：Jon Savage, ‘Oil and Gas Potential of the Area, Seismic Activities to Date and the Delays to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Caused by Disputes’. Copy of presentation available at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1/06/Session-1-Jon-Savage-South-China-Sea-Conference-June-20111-pdf.pdf＞.

註185：‘Minister Reveals Spratly Islands’ Oil Potential’, Xinhua, 5 September 1994.

註186：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Sea Energy Brief’, 7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ia.gov/countries/regions-topics.cfm?fips=scs＞.

註187：US Geological Survey, ‘Assessment of Undiscovered Oil and Gas Resources of Southeast Asia’, Fact Sheet 2010–3015,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s://pubs.usgs.gov/fs/2010/3015/＞.

註188：个人採访。Singapore 4 June 2013.

註189：Japanese energy imports, 2012 figures: liquefied natural gas: 108.87m3 / 365 days / average LNG carrier size of 200,000 m3; oil: 3.65 million barrels a day / average VLCC of 2-million- barrel capacity. Se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lng-gas-japan-idUSL5N0CR3XZ20130404＞.

註190：Jian Zha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rosp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orking Papers by CEAP Visiting Fellows*,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for East Asia Policy Studies, no. 54, July 2011.

第六章　殖民与民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想像的共同体

聚集在河内歌剧院附近的民众人数不多，但怒气冲天。但是它能集合起来，可就非常不简单了。前几天，脸书上已经群情激昂，不过越南政府也忙着部署。一个星期前，中国船只第二度弄断平明二号海研船的监听缆线；一个月前，北京推出新护照，上面有一张主张南海主权的「U形线」地图。但是在越南要公开表达抗议仍有许多限制。邻里长监视着后街小巷、总编辑紧盯着他们的报纸，而「监督机关」也密切注视所有的公民团体。人民会窃窃私议、人民会发牢骚，但人民大体上不会走上街头挑战共产党的统治。註191

网路却是另一个世界。尤其是脸书会让冤屈加倍扩散。党也紧盯着这个世界，但是它在逞口舌之快与付诸行动之间画了一条明显的界线。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这条线被跨过了。部落客、乡民都认为必须要有公开行动才行。距越南第一次公开为南海问题爆发抗议几乎正好五年之后，他们决定再度走上街头。他们希望在法国人盖的旧歌剧院的台阶举行抗议，但是共青团以超快速度申请在同一地点举办活动。广场已经搭了舞台，他们无奈也只能移到边上的林荫大道长前街去举行。在十二月微凉的气温下，行经小店、小咖啡馆，行经还剑湖岸，行经奠边府大街的大型旧豪宅，一路走到中国大使馆，其实也是满舒适的散步。

这支队伍虽然龙蛇杂处、三教九流都有，但基本上秩序井然。两百人，以越南任何一种抗议活动来讲，规模都不算小了。他们抬起大型专业制作的旗帜，上有越南文和英文标语，许多人穿的恤衫是在「U形线」地图上打个大X，而且齐声喲口号。有些人是「No U FC」社团成员；这个反中组织因为怕遭到当局骚扰，组个足球俱乐部做掩护，以方便合法集会。俱乐部名字即是「反U形线」，FC可以是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的英文缩写，但也可以是「去你的中国」（Fuck China）的缩写。有人敲锣打鼓，但是队伍里有位七十四岁的小提琴家谢智海（Ta Tri Hai），则以高唱爱国歌曲鼓励群众。然而，有些知名人士却无法到场声援。比如，鼓吹反贪腐的黎贤德（Le Hien Duc）当天一大早就有公共部人员登门拜访她，于是只好乖乖留在家接待不速之客。

许多公安人员沿长前街戒备，以防爆发反社会活动。许多人穿着鲜

绿制服，也有不少便衣人员散布其间。有一辆警车想穿过群众，但是群众坚持不让。他们高喊反对中国侵略，宣称「西沙、南沙，属于越南」，坚持政府应该誓死保护国家领土。一小群外国记者到场采访，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但是情势很明显，政府并不允许抗议群众完成他们的星期日散步。

警方坚持游行民众解散。游行民众则反呛警方应该离开，但警方调集更多人员。制服警员守住，便衣人员则强押约二十名游行民众上了一辆徵用的市营巴士、把他们载到首都市郊十五公里外的禄何（Loc Ha）看守所。其他游行者识趣退走。中国大使馆再也没受到民族主义者喧闹包围。这场抗议活动、以及南方胡志明市类似的一项活动，其新闻和影像传遍全世界。编辑或许会说，这是一则很有看头的「图片故事」。

在接下来的星期二上午，媒体总编辑例行性和新闻部官员举行每週一次的会议，却被斥责在处理越、中关系新闻上显有不当。他们被骂在报导平明二号事件时，注入「反中情绪」，忽略了原先要他们「坚守事实」的指示。群众情绪被挑拨起来，完全是他们的过错。越南当局相当苦恼的问题是，不论他们把多少家传媒「消音」、抓了多少异议分子，反中情绪有增无减。外界无法公开或确切衡量这些事情在越南的严重程度，但是自从二○○七年以来，南海问题至少已有十多次让河内和胡志明市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如果说只有少数人愿意冒被逮捕、惩罚的风险，可以肯定的是更多人有反中情绪、只是没有勇气参加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东海」—越南人给南中国海取的名字—的命运，以及有关中国阴谋颠覆越南的指控，经常在网路上引爆仇中的民族主义怒火。

三十多年前，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歷史学者班纳迪克．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对十九、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崛起提出一个解释。他谈到「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即新崛起、有意识的国家公民开始觉得和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同胞有一种情感结合，这种情感结合强烈到他们愿意为了保护它而杀人或殉道。他把这种想像的共同体之兴起，归因于经济开发和它所建立的自我定义的可能性，归因于全国性媒体传媒的创造，以及与说不同语言、循不同风俗的其他人的确有别的感受愈来愈清晰明确。

二十一世纪初，东南亚沿岸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正在创造新的想像的共同体。经济开发、新的媒体技术、希望自我表达的新愿望—这些都是和上个世纪推动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相同的力量—正在推动崭新的民族主义。然而，这一次这些共同体在自我界定时所要反抗的「他者」，并不是远方来的帝国主义者，而是自从上古以来即紧密相连的邻居。网路乡民宣称他们愿意为国家的光荣、为少数几块几乎无法住人的岩礁而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在东南亚有千百万人相信，唯有他们自认他们所从属

的想像的共同体比对手来得强，他们做为人类的认同意识才算圆满。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十分强烈—但是它是否是驱动南海主权争议的实际力量？对于这些民粹主义激情的语言细加检视之后，我们发现真相更加复杂。

越共与中共

现代越南民族主义或多或少以反中来定义自我。越南大小城镇主要街道大多以反抗中国人的人物（不论是真人或神话人物）命名：例如，二徵夫人是西元前四十年领军叛变的徵氏姊妹徵侧、徵贰；吴权是越南人公认在西元九三八年，第一位领导国家脱离中国的统治者；李常杰在一○七六年与宋朝作战；陈兴道于一二八四年击败蒙古人；黎利即黎太祖，一四二八年击败明朝；阮惠即光中皇帝，一七八九年击败清朝。这些大多是时代错置的神话。两国以今天越南和中国边界首次交战是一九七九年。早先的冲突是地区性统治者、叛乱、军阀、傀儡和豪族彼此之间的交锋。他们所讲的语言既不同于今天的越南话，也未必就和敌人的语言不同。可是在今天的越南，所有这些伟大的战争都被用来证明他们有成功抵抗北方的「中国」（Trung Quoc）帝国主义野心的长久光荣歷史。

从建筑到烹饪，两国之间的文化关联相当明显；可是在草根对于依然被称为「曹」（tau）□□这是一个贬义字，在英文里可翻译为「清国奴」（Chink）□□的人之疑忌仍很强烈。偏见来自恐惧。越南人自认为比华人有创意、有文化，但是无法与打不进去的华人商业圈竞争。这个似乎封闭的社群、触鬚遍布整个东亚，似乎註定要接管越南以及整个区域。

比较客观的越南史观或许就会承认与中国关联的重要性，从第一批南岛民族的时期，福建海商的到来，乃至一九八○年代越南开始要抛弃史达林主义、而东南亚各地华侨涌入投资皆为其例证。越南共产党政权能够存在，是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给予它庇护和援助。意识型态的灌输、火箭，与稻米从北京源源不断运入越南。中国的补给供应帮助河内在一九七五年战胜西贡奠立基础。

对北京的政治债务很微妙地成了许多越南人「反华」的源头，因为它其实隐含了「反党」的成分。在河内市中心公然表态反对共产党，肯定会被抓去吃长期牢饭。然而，透过批评北京的行动，抗议者可以既显得爱国、同时又间接质疑共产党的正当性，因为越南共产党是透过中共的支持才上台掌握政权，而且迄今仍与北京的老大哥有许多强大的意识型态和实务上的联结。但是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其实也强烈批评中国的影响力。对某些人而言，这纯粹是爱国，但是打「中国牌」也可以箝制

政敌。藉由批评中国，他们也批评了党内其他派系，因为这些人与北京有最强大的意识型态联结，这些人也贊成加紧社会控制、继续以国有企业主宰经济，并且对西方有更加敌视的态度。

一九六八年，越南共产党爆发激烈的一场内斗，日后他们把它称为国家应倾中、或倾苏的大辩论。数十名高阶干部遭到整肃、甚至入狱。其实地缘政治之争只是为了掩护其他的辩论：争的是战争的策略、社会主义改革的步伐，以及其他一堆内部问题。从此以后，大凡有关越南未来的辩论，中国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许多权力斗争打着它的招牌而打。在河内坦克车开进西贡总统府草坪之前，北京和河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失和。在中国人眼里，越南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在越南领导人来看，他们才把国家从外国侵略下解放出来，中国的态度充满了帝国的傲慢，他们可不希望又成为藩属国家。双方关系恶化到无以復加，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得到美国的政治与情报支援）决定「惩戒」越南，派兵进攻。解放军损失惨重，但也摧毁好几个越南边境城市。两国政府直到一九九一年才修好。

这些战斗之中的战斗延烧到今天—在长前街示威之后几天，它就又爆发了。原本应该是秘密讲话的纪录竟然上了YouTube。这段一小时训话的主角是越南国防部政治学院南海问题教官陈登城（Tran Dang Thanh）上校。听众是河内各大学高级行政人员，他们全是共产党员。（在越南，不是党员休想担任高阶职务。）陈上校的信息很直率：示威活动太多了，必须制止。他训诫这些校长、院长和教授：「党期待你们管好年轻人。如果我们发现你们学校的学生参加示威活动，我敢保证你们的纪录会有污点。」註192

我们从谈话中清楚看到越南情治机关的内心思维，平常这些东西在媒体上根本看不见。他开宗明义就提出警告：如果共产党政权垮了，你们休想会有好日子过。陈上校告诉各位教授说：「保卫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型态，涵盖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件非常实际的事，那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我们后人的退休金。」诉求基本的自我利益之后，他又直率表明为何不宜和中国敌对。他说，「他们」有十三亿人，「我们」只有九千万人。他又说，固然我们绝对不应该忘掉在歷史上他们一再地侵略我们，「我们也不能让人觉得忘恩负义」，因为中国在近代也为越南做出重大牺牲。他责备中国近来的行动是邓小平政策遗绪，中国有「熊熊的野心」要主宰南海、要建立海上防线，又受到石油和天然气的引诱。他说，越南现在的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但也要兼顾和平与安定。他主张，唯一的方法是避免冲突，巩固越、中人民的团结感情。

对于每年必须把创造一百万个新就业机会、以满足人口成长与不断

升高的就业期待做为首要目标的领导层而言，主权争议只会添乱子。越南共产党煞费苦心避免刺激对北京的敌意。陈上校讲话之后几个星期，二○一三年一月六日，有个民族英雄重新下葬在位在河内正南方的故乡清化省。全国媒体详尽地报导这则消息，但是，奇怪的是，怎么就是没人说他是怎么殉国的；杀害他的人只被说是「流氓」—没有交代其国籍。事实上，黎庭征（Le Dinh Chinh）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被中国边境守卫杀害的，当时中、越两国正处于越战结束后双方紧张关系上升的敏感阶段。越南正在驱逐数万名华人出境，于边界地名挺讽刺的「友谊关」附近产生冲突。双方民兵以棒棍、长刀爆发殴斗，死了四名中国人、两名越南人，十八岁的黎庭征即是死者之一。

接下来十年，两国关系没有好转，黎庭征在越南被塑造为民间英雄。冲突过后四个月，国家出版社发行一本专书追悼他英勇的一生及为国殉难。学校和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学童被鼓励要效仿他的模范。可是，一九九○年后河内和北京关系改善，黎庭征的故事失去了动员民众的效用，进而成为河内政府尴尬不好再提的事。杀害他的人之国籍就从官方歷史上消除掉。

在越南，死者重新安葬是很寻常的事。初次下葬后几年，捡骨、清理，放进骨灰罈，在适当的仪式下重新安葬。可是，时隔三十五年才重新安葬是很少见的事。由于媒体明白受到指示在报导中不得提到「中国」，网路开始流传为什么黎庭征要重新安葬的谣言和阴谋论。它们特别援引十八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流传的故事来申论。越中边境的谅山省庆嵊市有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碑，碑文记载三三七师士兵在一九七九年「坚定地」阻挡了中国的入侵，可是碑文文字被刨掉了。

二○一一年八月，网路乡民传布一张纪念碑的照片，它显示碑文中「中国侵略」的字眼被刨掉了。可是，其实这张照片被动了手脚。全景是该纪念碑位于一项土木工程建设的正中央，它附近正在盖新桥和公路。很有可能碑石是在施工过程中受损。但是由于当局不出面公开澄清，网民就一口咬定怯懦的越南政府为了向北京示好，下令刨去原有碑文文字。

黎庭征归葬故里，从边境重新安葬到数百公里之南的老家，导致越南最着名的一个「博客」阮友荣（Nguyen Huu Vinh）□□情报人员出身、化名为谗道哥（Anh Ba Sam）□□指控政府正在把所有可能象徵越南民族主义抗争的事物，从边界地区移走。事实上，或许的确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也不无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越南政府的难言之隐是，一碰到越中关系，很少人相信它。他们下令媒体和教授制止讨论这个议题，只会增进阴谋论四处流窜。不管政府的动机如何，他们的一言一行全遭到恶意解读。

越南共产党虽然在许多方面精明能干，除了祭出陈年老办法之外还真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它通过新法令控制部落格（只是和旧法令一样，根本没有效用），也取缔和海外反共组织互通声气的抗议分子。过去几年搞过数十场公审。情治机关似乎很乐于承受无可避免的国际批评—用审判来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也有人说，党内的「亲中」势力其实很高兴有这种批评，因为它阻止了西方政府太接近越南，也有助于他们掌控住国家。

全世界在二○一四年五月都清楚看到，当抗议中国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附近作业上升为暴动时，越南民族主义式的反中情绪肯定给共产党领导人带来麻烦。然而，它们没有迫使它转向和中国对抗。反倒是迫使越南共产党与一部分自己的人民对抗。越共害怕抗议活动，因为它隐含着反党的讯号，也有可能加剧甚而动摇其统治基础。党的首要目标是国内及国际事务的稳定，而不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赞成在国内享有表达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人士，往往也是主张强硬对抗国外势力最力的人。一边主张和平，另一边主张自由，两者并无交集。

菲律宾的三角习题

场景搬到另一个城市，但是这一次有两个团体，同样愤慨，但谴责对象不同。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一的一大早，一场「闪电集会」袭向马尼拉的海边徒步区中，以菲律宾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之名命名的罗哈斯大道（Roxas Boulevard）。大约七十名菲律宾学生联盟（League of Filipino Students）冲向美国大使馆的高墙。大使馆很牢固地盖在马尼拉湾的海埔新生地上：一八九八年美国在这片海域击败西班牙海军，一跃而为世界大国。青年学生发现应该在使馆外值勤的警员竟然在巡逻车里呼呼大睡；掌握这个天赐良机，他们动手破坏帝国主义的象征。他们向墙上投掷红漆弹、蓝漆弹，在墙面上喷洒口号，也进行了焚烧美国国旗的传统仪式。少数激进分子跳进围墙、动手拆卸大使馆的铜字。等到镇暴警察赶到，招牌已经变成残破的：「*m*as** of the *ni*ed S*ates of *merica」。抗议民众没受到警方阻挡就逃跑了，酣睡的警员还没醒过来。事情闹完了，他也开车走了，显然是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註193事后他和他的上级都被指控怠忽职守。

六小时之后、七公里之外，在五光十色、车水马龙的马卡蒂（Makati）商业区，有一群同样喧闹、但守规矩的群众围聚在中国领事馆外。这里的警察没睡觉，事先已掌握线报，因此抗议人士被引导到离开墙壁、招牌和帷幕玻璃的安全地带。这里比较有组织，或者说经费比较充裕。这几十个示威者手上拿的不是自制旗帜或铁橇，而是高举着精心设计的牌子—像交通号志STOP的形状，要求「中国人滚回去！」、

「不要侵犯菲国领海！」还有更大的不同：没有吹胡子、瞪眼睛叫叫嚷嚷的革命分子，摄影记者拍下的正妹可以让第二天的版面增添亮点。

当天上午的马尼拉，两组菲律宾民族主义分子呛声表态。参加的人数微不足道，在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大都会里只需几辆大巴士就载走了。对于敲锣打鼓、拆大使馆招牌的人而言，这个动作是在国家展现慑人实力之下，彰显了十分宝贵的民族意识。攻打美国大使馆的学生们刻意挑在美菲一年一度的「巴力卡淡」（Balikatan）联合军事演习—塔加洛语意即「肩并肩」—开始的这一天动手。在刻意展现团结之下，美、菲两国六千多名陆、海、空军和陆战队健儿将在全国各地海滩和军事基地操练武艺和人道救援任务。另一方面，挥舞STOP招牌的正妹，却是因为中国当局企图併吞离吕宋海岸只有二百三十公里的黄岩岛而义愤填膺。八天前，八艘中国渔船疑涉非法捕鱼，菲律宾方面试图拘押它们，却爆发事件。中国海监船出现，阻止菲律宾海军和海巡採取任何行动对付这些违反保育规定载了数百只大蚌和大量珊瑚的渔船。马尼拉政府在面对北京的力量时，一筹莫展的窝囊相暴露无遗。

但是在破坏美国大使馆的示威者看来，马尼拉的无能是他们被美国人宰制了一百年的结果。「拜扬」（Bayan）是一群激进左翼团体的同盟，菲律宾学生联盟也是其中一员。在他们眼里，美国的宰制对菲律宾国家前途构成的威胁，更甚于中国船只的侵扰。拜扬这个塔加洛字，意即「国家」（nation）。当被要求传达该组织的宗旨时，它的秘书长瑞纳托．里亚士（Renato Reyes）说得很清楚：「左倾、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我和里亚士约在马尼拉海滨充满美国风情的小黄披萨酒馆（Yellow Cab Pizza Parlour）会面。地点是他选的，它位于大使馆附近，方便另一次示威活动，可又离医院不远，因为他稍后要去医院支持其员工的罢工。

透过谈话，我逐渐清楚就里亚士而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交织在一起。他感嘆菲律宾人活得没有尊严，只要国家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就不能真正地作自己的主人，而且每个菲律宾人都应该以这种二等地位为个人的奇耻大辱。「有位参议员很久以前把这形容为『托钵僧的外交政策』。你老是乞讨剩饭残羹、老是向老大哥美国求助，而过去半个世纪就因为这样，我们没有真正的开发或现代化。」里亚士一边吃着义式美国风味菲律宾披萨，一边阐释他的观点：这种依赖实为殖民策略的延续，要让菲律宾持续沦为美国商品的市场，而菲律宾菁英就从维持着经济和政治的现况中捞取回报。註194「我们反对中国侵门踏户，但是我们认为那是短期的。长期的、更大的威胁是美国。如果你要评比本地区的恶霸，美国才是更大尾的恶霸。」

另一方面，反中抗议的策划者却是个难以驾驭的民族主义者。数十

年来，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一直是个着名的反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人士，但是现在他领导的「阿克拜扬」党（Akbayan）经常走上街头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共产党领导人。（阿克拜扬是从拜扬这个字衍生出来，但是Akbay的原义是把手臂圈在另一人肩膀上，以示交情或团结。）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鉴于民族主义的立场经常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我不很确定你是否可以说我们的立场是民族主义。」贝洛否认他的立场变了。「不，我认为只是情势更加复杂了。我认为此时此刻在本地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的确是美国重返亚洲。但是在此同时，美国也利用中国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行为来让它显得像个平衡者。」

这两个人是政治上的死对头。里亚士的政党认为贝洛是「艾奎诺政府的特务」，而贝洛则说亚里士仍停留在一九六○年代的政治里。不过，两人对美国在世界政治的角色倒是观点相似。里亚士解释说：「我们并不真的认为中国在现阶段有和美国一样的帝国主义意图。当然它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它可能希望扩张其经济、军事势力和影响力，但它还没到达美国的地步；美国可是已准备发动战争以殖民及占领其他国家，以便强化他们的经济利益。」註195贝洛鼓吹「反中」立场，但也试图不让美国干预菲律宾事务：「如果你引进一个超级大国来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届时超级大国的动力就开始推动议题，边缘化了和平解决方式。我认为玩大国政治平衡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经常导致人们失控，产生武装竞赛，发生像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状况。」表面上看来在菲律宾很清楚的「反美」和「反中」立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对大国的态度，反而有所不同，这和菲律宾混种的歷史有关。

十九世纪末，有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挑战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一个来自菁英，一个来自中产阶级。数百年来，西班牙统治者歧视华侨及其后裔，丑陋的细节罄竹难书，但是大体而言，华侨可以做一个选择。改信天主教的人可以永久居留、娶妻及在菲律宾各地自由往来──但是不准回中国。不肯改信天主教的人虽可以自由往来中国，但是他们在菲律宾只准住在马尼拉的贫民区（Parian）。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在菲律宾永久定居。直到一八八○年代末期，西班人正式把改信天主教者结婚所生的子女列为「混血种」（mestizo）。混血种改姓西班牙姓氏、说西班牙话（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不说西班牙话）註196，也採取西班牙生活方式，但不论他们受过多么高的教育或是多么富裕，他们绝不能晋身到社会的顶端。从这群人衍生出「启蒙人」（Ilustrados）。写下传颂后世的民族主义小说《别践踏我》（*Noli Me Tángere*）的作家荷西．黎刹（Jose　Rizal）就是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他们开始自称「菲律宾人」（Filipino）──这个名词原来只属于「纯种」西班牙人──并要求平等权利。

城市中产阶级则出现不一样的运动，它有一部分是出于针对西班牙残暴对待启蒙人的反抗，例如，黎剎就在一八九六年遭处决。通称为「卡提普南」（Katipunan）的「最高最尊贵的人民之子社」（The Highest and Most Respectable Society of the Sons of People）之领导人出身办公室上班族、小店舖老闆，绝大部分是原住民（indio），而不是「混血种」。启蒙人希望被西班牙人接纳为平等阶级，可是卡提普南强烈排斥西班牙人统治，明确主张要另创民族认同。可是，他们还是建构在文化沙文主义之上。卡提普南主要来自马尼拉，大力提升吕宋文化，特别是塔加洛语文，把它们提升到全国文化的地位，并计划推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它在许多地方仍受到抗拒，视为对本地生活的外来侵入。

一八九六年，卡提普南起兵叛变西班牙人时，许多启蒙人和他们并肩对抗共同敌人。他们争取另一个也曾挣脱殖民之枷锁的国家的支持。可是，美国赢得马尼拉湾之役后，美军司令官发动恶毒的平乱作战，扼杀了这个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许多启蒙人忌惮卡提普南和其他好战团体的崛起，放弃原有的「国家」利益、转而追求本身的利益：他们和新来的殖民者建立起共生关系。註197这些启蒙人虽不全是、但大多是混血种的后裔，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被拔擢到重要职位以协助美国人，在天主教会的「教会财产」被徵收、再分配时，他们也因为处于有利地位而拿到好处。选举法也明显偏袒有财产、唸过书的人。註198一连半个世纪，美国行政官员治理菲律宾，压制反对势力，建立起菁英的权力。菲律宾一小撮不超过百分之五的人，主宰了整个社会。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例如，第三任总统劳瑞尔（José P. Laurel）、第五任总统罗哈斯（Manuel Acuña Roxas）、第六任季里诺（Elpidio Rivera Quirino）、第七任麦格塞塞（Ramon Magsaysay）、第十任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十一任柯拉蓉．艾奎诺（Cory Aquino）、十五任贝尼格诺．艾奎诺（Benigno Aquino）等都是混血种后裔。菲律宾巨富，如阿亚拉斯（Ayalas）、阿波伊提兹（Aboitiz）和拉钟斯（Razons）等家族也都是。

但是，启蒙人的后裔受到许多自命是卡提普南政治后裔的团体之强烈反对。这些团体跨越政治光谱：从共产主义革命派到失意的军官，无所不有。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都坚信把国家「出卖」给美国、以换取个人利益的菁英成员，没有权利自称为国家领导人。农村地区长久以来即有一种尚武的传统，反抗地主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国家，这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和一九四○、五○年代的虎克党（Hukbalahap）註199游击运动。一九六○年代菲律宾教育的快速扩张有助于把这股愤怒传播到城市地区。农村人口移入城市，他们的子女却在周遭种种不公不义下接受政治洗

礼，眼看着巨大的社会鸿沟、猖獗的贪渎腐败和无情的政治暴力天天上演。

在左翼思想家如歷史学者提欧多罗．阿贡希洛（Teodoro Agoncillo）等人的启示下，这个激进世代声称唯有群众，而且是在底层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菲律宾人。註200那些在高位的人━和美国殖民者组成同盟而取得权位的菁英分子━不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菲律宾直到一九四六年才独立，而且是由一堆各不相同的岛屿硬凑在一起、没有「民族」文化而成立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其实是苦难把菲律宾人民结合在一起。这些激进左派，也就是拜扬和阿克拜扬的前辈，向群众诉求的基础论据是，社会大众受苦是因为遭到外国势力支持、堪称是外来菁英的虐待。从本质上，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讯息。他们试图从「贫穷」这个经济认同里去建立菲律宾人的民族认同。对他们而言，身为菲律宾人就要反美。这个民粹的论述深入到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农场中。但是，阿克拜扬的政治前辈追求的是透过政治夺取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拜扬的前辈则认为不能和由菁英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妥协，因而必须揭竿而起反抗它━最后成立了毛派新人民军（Maoist New People's Army）。

因此，菲律宾菁英的各派人马对南海问题持的立场不同，其实只是他们过去诸多争论中的最新一项罢了。这些团体不时也能形成论述联合起来、也争取到更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反美或反华言论的力道并不能一贯。某些时候它可以把大量民众带上街头，可是一般而言，菲律宾的普罗大众更热衷的是宗教庆典和逃避现实的肥皂剧。耶稣基督蒙难的故事，要比国家被现代庞提乌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s）註201钉上十字架的论述，更能引起菲律宾人民的共鸣。二○一二年四月事件之前三个月，在马尼拉市郊奎阿波大殿（Basilica of Quiapo）的黑色拿撒勒人（Black Nazarene）大游行，吸引的群众估计在六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这可是左派做梦也不敢想像的数字。

对于大多数菲律宾人而言，他们关心个人的受难和救赎，更胜于国家的压迫及解放。它还受到学校课程的强化，因为学校教的菲律宾歷史始于一五二一年麦哲伦来到菲律宾，而且又灌输给学生美国是菲律宾必须力图追上的理想模范。从这一点去观察，也就难怪虽有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不平等关系，歷次民意调查一再显示菲律宾人是全世界最亲美的人民。美国皮优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调查（BBC/Globalscan），从二○○二年至二○一三年歷次调查持续发现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持正面态度。二○一三年的皮优调查也发现，百分之八十五的菲律宾人相信美国在制订其政策时，把菲律宾的利益列入考量。註202一般都以为未来菲律宾若有需要，美国都会伸出援手。

菲律宾人一般对南中国海—自二○一二年九月五日起，菲律宾已将南中国海正式改称西菲律宾海—态度消极，背后的原因或许就是如此。註203虽然二○一三年的皮优调查指出，百分之九十的菲律宾人觉得和中国的纠纷是个「大问题」，但很少有人要求应该採取行动。荷西．桑多士．阿迪维拉（Jose Santos Ardivilla）是《马尼拉星辰报》（*Manila Star*）的漫画家，笔名为Sic N Tyred，也是菲律宾大学人文学讲师。他对这个趋势提出观察：「并不是说菲律宾人不关心西菲律宾海，而是因为他们晓得它属于我们。它就这么近嘛！他们没有立即受到它影响，他们还有其他急迫的问题要处理。但是他们的确关心主权和所有权，因为我们已经听说了，这些岛礁有相当丰富的矿物。」註204黄岩岛事件之后，菲律宾和中国的骇客开始在网路上交战要遮盖对方的网站。迹象显示，为了岛礁之争的确激起民粹的民族主义，但是没几天就又烟消云散。简而言之，从底层没有出现太多压力要求菁英就领土争议採取行动。压力只来自一小部分政治活跃分子和评论员，可是效果不大：菁英们几乎无法达成共识，哪里还谈得上协调一致的行动。

菲律宾政治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徵，就是对「国家利益」几乎谈不上有共识。固然大家口唱国家、民族，尤其是选举季节，但是通常「区域认同」比较强。这个国家由许许多多大小岛屿组成，岛上内部又经常有崇山峻岭阻绝交通，也就难怪人们只重地方治理者，不去企求远在天边的首都政客能干些什么事。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者都发现透过这些地方豪族统治最方便，而他们也只顾巩固自己家族及个人的权力。对菲律宾整体而言，就是地方强、而中央弱。马尼拉软弱，地方治理者经常就为所欲为，甚至在全国层级，豪门巨室也可以纯依自身利益推动个人政策。由于他们控制经济和政治制高点，个人的影响力可以无远弗届且不顾大局。关于北方铁路和海洋地震联合作业的丑闻（详见本书第五章），暴露了中央人物如何一再利用国家利益与外国政府交涉，图谋个人利益。

在很少有的情况下，菁英的民族主义会在国际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一九九一年，菲律宾国会参议院让华府大为错愕，它竟然表决反对一九四七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续约，迫使美国关闭设在苏比克湾的大型海军基地。但是这是很特殊的状况。十二名有异议的参议员当中有几位是老派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觉得菲律宾的发展已经因为过度依赖美国而受到阻滞。可是他们的声势大振是因为民间积怨甚深，痛恨华府早先支持马可仕的独裁专制（不过，马可仕至少在执政初期曾试图降低旧菁英家庭的权力）。也有人是因为不希望美国的核武器存放在菲律宾境内。另有人是痛恨美军在菲律宾亵玩本地女子。

可是一九九一年乃是例外状况。菲律宾菁英和美国的关系太紧密

了，有共同的语言、歷史和观点。可是菲律宾的菁英却基于一种假设，以为美国人跟他们情意相投，遂陷入没有根据的安逸感。这一小撮人几个世代以来对华府提供极大服务，竟相信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刻，美国人「将会回来」，有如麦克阿瑟将军一九四四年重返菲律宾一样，而且很自然地会在任何争议中站在菲律宾这一边。这种过度认定本身重要性的意识使决策者瞎了眼，看不到区域的现实已有变化：现在华府与北京的关系远比它和马尼拉的义务关系来得重要。结果会对菲律宾相当危险：它会误判而陷入外交政策危机，有如二○一二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马尼拉大言皇皇，却没有实力支撑自己的叫嚣。一心信赖美国却得不到支持，在未来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菁英或许觉得向北京靠拢才好保住本身利益，也有可能他们坚守与美国的关系，可是华府若是在迭次危机都不能替马尼拉出声，菁英又会在民众心目中失去正当性。

另一方面，菲律宾还有另一股民族主义牵繫到另一种厌憎──针对更明显的「华人」少数民族的憎恶。混血菁英极力掩饰他们的华人血缘，但二十世纪的移民和他们不同，躲也躲不过，只好公开被认定是华人。数百年来，福建人被排斥在菲律宾人社会之外。西班牙人先把他们归类为「纯种华人」（Sangleys），后又改称为「华裔」（Chinos）；美国人来了，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限制他们移民，且一九四七年的一项条约把他们划归中华民国管辖──直到一九七五年因为马尼拉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裔才得以成为菲律宾公民。华侨社群相当出类拔萃。二○一三年《富比世》杂志的菲律宾四十大首富名单当中有十九人明显是华人姓氏：施至成（Henry Sy）拥有购物中心；陈永栽（Lucio Tan）拥有啤酒和菸草事业；吴奕辉（John Gokongwei）拥有民航公司和不动产；郑少坚（George Ty）拥有财务金融事业。[註205]这些财富有些是因为与旧的混血种世家大族合作而大为加强，譬如施至成与阿亚拉斯结合、吴奕辉与罗培士家族（the Lopezes）联手。[註206]但是针对「姓氏短」的人之歧视一直消抹不去。经常可以听到菲律宾人称华人为「虫」（intsiks），不过今天也有些华人以这个字来嘲讽自己。他们把新从中国来的人称为「真正的虫」。今天的华裔菲律宾人通称为「华菲」（Tsinoy）□□这是从塔加洛语菲律宾人（Pinoy）这个字演化而来。

华裔菲律宾人在马尼拉的宾诺多（Binondo）区最明显，这块地原本是拨给改信天主教的华人及其子嗣──第一代混血种──居住的地区。[註207]十八世纪末，原本限定给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居住的贫民区──位于城楼上的西班牙大砲火力范围之内──毁于大火之后，宾诺多成为更多的华人定居地区。宾诺多距离旧城同样也在大砲射程之内，但是今天住在这里，不虞砲火之危，却必须担心注入巴石河（Pasig River）的水道

污秽不堪，以及狭窄街巷里的废气乌烟瘴气。乍看之下，它已破败不堪，可是繁华虽褪色，它还是全国经济的一个重心。区内的小店舖貌不惊人，往往却是相当大型的贸易或配销生意的前沿店面。大型的高楼慢慢地兴建起来。

一部分出于传统，一部分出于行政命令，宾诺多保持着鲜明的混种特色。一九七○年代初期，马尼拉市长觉得它的中华色彩不足，下令宾诺多市区重建。为了吸引观光客，进入本区的主要街道路口盖起城楼，社区商家被规定要挂出中文招牌。註208天主教神坛上点了中国香柱、香港和好莱坞DVD在架上并列，英语夹杂着闽南话处处可闻。当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上升时，华裔菲律宾人的忠诚度又成了焦点话题。这些人会比其他民众更加反美、反中、亲美或亲中吗？

宾诺多区的店家绝大多数不希望捲入是非。很少人愿意被提名道姓採访，但有位影印店老闆说的话最经典：「生意归生意，政治归政治。」不过，他也不是不会担心。「中间阶层跟中国人不会有问题，怕的是那些没多少知识的人，以及有固定利益的人。」他责备都是媒体惹的祸，煽动了仇视意识。另一条街上的吴凯（Ka Wilson Ng）是个成功的面包店老闆、本地狮子会前任会长，他就是华裔菲律宾人混种的典型代表。「如果他们攻打我们，我会起而保卫这个国家。但如果是我们攻打他们，我可要站在中国那一边。」他明白地认同「我们」──菲律宾人──但是依然心繫另一个国家。吴凯家庭三代之前就由福建移居到此。他娶了菲律宾女子为妻，在家讲闽南话，但是他很怀疑自己的孙儿女还能讲几句中国话。这是抵抗不了的融和的故事。

以全体菲律宾人来计算，虽然比不上对美国人的好感度，多年来对中国的态度大体仍属正面。二○○四年，百分之五十四的菲律宾人对中国抱持正面观感，百分之三十抱持负面观感。到了二○一一年，由于两国之间贸易窜升，持正面观感者上升至百分之六十二，持负面观察者仍为百分之三十一。可是，根据皮优全球态度调查，二○一三年黄岩岛事件后，持正面观感者急降至百分之四十八，认为中国是敌、大于是友者上升为百分之三十九。然而，看来这还不至于导致民众要求政府应有所行动。尽管中国的意向令人日益担心、网路网军也不时交锋、马尼拉街头偶尔也上演抗议戏码，菲律宾政坛主要人物还没有人把主权与外海能源之争，拿来和群众日常的生存竞争联繫到一起。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辩论还是以国家主权的浮夸语言在进行，可是其实在菲律宾，唇枪舌战远远不及餵饱肚皮这个老百姓天天得面临的挣扎来得重要。

同床异梦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

南中国海沿岸其他「华人」社区，大多是福建移民后裔，最困扰的

一件事就是经常被质疑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处境在印尼最为危险。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九九八年五月暴动期间，华裔印尼被特别明白锁定为目标——一部分是军方特务煽动者为了寻找发动政变的藉口盯上他们，一部分是街头暴民觊觎他们的财物。数百名华裔人士在暴乱中丧生，另有数千人逃亡出国—带走了约两百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往后数年，留下来没逃、也幸而不死的华裔，地位大幅改善。中华文化又被提倡、歧视减低、生意恢復繁荣。尽管中国对印尼宣示的专属经济区、即纳土纳群岛附近也宣称拥有主权，南海争端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质影响。自从印尼一九九六年夏天展现其海上军事实力（见本书第三章）以来，北京对于公开处理此一议题相当谨慎。因此之故，这个议题在印尼根本没有激起激烈反应。二○一三年皮优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印尼人对中国有好感，相形之下，对美国有好感的仅有百分之六十一。只有百分之三认为中国是敌人。

在地图上，或者说有时候在海上，马来西亚人或许更有理由要关心南海争议。马来西亚对南沙群岛十二个地貌提出主权主张，并占领了其中五个岛礁—而且全在「U形线」内。註209在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内有个James Shoal□□中方文献称曾母暗沙、马来西亚人称之为Bating Serupai□□北京正式宣称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而它其实离中国「本土」有一千五百公里，且低于海平面二十二公尺。二○一二年八月有两次、二○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又一次，中国船只打断砂劳越外海、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之内的石油调查工作。但是即使中国海军船舰二○一三年三月在曾母暗沙停靠以试图强化它的主张，此事件并未在马来西亚惹得群情激昂。这是发生在竞争激烈的大选之前一个月的事，理论上它很可能被用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可是却风平浪静。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讲师郭清水（Cheng-Chwee Kuik）也是研究对中关系的专家。他说：「马来西亚人更关心『面包与奶油』的问题，如社会公义、贪渎、治理、问责、认同政治以及公共安全等问题。」近年来，公民团体声势愈来愈大，屡次走上街头要求在全国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南海问题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嘴上或招牌上。事实上，马来西亚人对政府在二○一二年六月签字同意支付天价两千万令吉（Ringgit，约六百万美元），向中国租一对猫熊—凤仪和福娃—来庆祝两国建交四十周年，倒是砲声隆隆。但是他们砲轰的是马来西亚总理，不是北京。

对华关系的问题非常不可能出现在选战之中，原因很简单：钞票。自从二○○九年起，中国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註210双边贸易总额在二○一一年达九百亿美元，而马来西亚享有三百亿美元的顺差。註211朝野政党都无意乱了这个局面。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马来西亚统治菁英

即努力在经济上、外交上交好中国—建立起相互提携的关系。中国向马来西亚厂商开放门户，而马来西亚厂商也回报以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尽管就人均GDP而言，马来西亚远比中国富裕，中国还提供开发援助款给它。在马来西亚的联邦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当然就希望悄悄处理和北京的关系，避免有民间的压力。在政府之外，也没有人希望撩起反中情绪：抨击国家出口获利的主要来源不会赢得选票。没有必要上街头敲锣打鼓抗议那无形无影的侵犯国家主权的举动嘛，反正也没丢了一寸国土、也没有人流血呀！二○一三年的皮优调查显示，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最亲中国的国家，百分之八十一的人民对中国有正面观感（对美国有正面观感的仅有百分之五十五）。

对于马来西亚的华裔社群来讲，这当然是好消息。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数十年，马来菁英一直把华人看做经济上过度垄断、或甚至具有颠覆国家的共产主义倾向。身为少数民族的华人痛恨依然把他们囿限为二等公民的法规和作法，而二○一三年大选，在野党赢得了每个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之议席后，执政党有人称此一险胜结果是「华人海啸」（Chinese tsunami），造成族群关系紧张。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在野的「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在这些选区每一不同族群得票率都超过执政党。虽然在某些地方仍存在敌意，华人现在一般都被认为是马来西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通往南海另一端的巨大市场之文化桥梁。

新加坡因为华裔占其国民四分之三，在东南亚非常独特。一九六五年它会退出马来西亚联邦（Malaysian Federation），这是主要因素。从此之后，新加坡执政党拼命要打造它自己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个由英国的自由贸易和华人的创业精神交融而生的城市国家，有其公民可以引以为傲的共同意识。它果真就创造出来迷你型的共同体。印尼前总统哈比比（B. J. Habibie）曾说新加坡是个「小红点」，也有人说它是挤在两个庞大的以穆斯林为主的邻国之间的「胡桃钳上的坚果」。它使得新加坡全国上下有两大之下难为小的体认，求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它和以色列的处境十分近似，也难怪打从独立以来，两国就分享军事专技，而它们的军事理论也以全民皆有服兵役义务为根本。

新加坡究竟有多么的「中华」呢？过去几年国际上召开了好多场关于南海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在一场会议中和一位非常资深的前任新加坡外交官员谈起来，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由华人治理的其他国家。」他对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要迫使争议以法律解决的努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中国对这一套不感兴趣。」与会的青年外交官则很坚定地认为这是老一代的想法，贬抑他的想法跟不上时代。但是另一位新加坡前任外交官吉索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现在是个学者、也力主我们目前处于「亚洲世纪」—则认为这个说

法掌握到新加坡的根本真相。马布巴尼是印度裔，印度裔在新加坡这个小国更是少数族群，他明白它所产生的两难困局。虽然已深深植根在新加坡，他承认在这个混种社会依然存在想像的共同体。「假如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新加坡绝对不可能加入对付中国的一方—老百姓不会支持的。但是与此同时，就外交折冲而言，新加坡肯定会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细微。我们不亲美、也不亲中。我们亲新加坡。」在另一个豪华大饭店的另一场会议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中心（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席戴尚志提出他新倡的一个字词来形容他认为新加坡应该站稳的政治位置：对中国和美国保持「等距离」（equiproximate）。

解放军鹰派的作用

拜扬和阿克拜扬各自号召支持者在马尼拉街头示威之后三个星期，另一批抗议民众也聚集在北京的菲律宾大使馆门口。中国着名的「愤青」集合起来要维护中国在黄岩礁的权利。二○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六的这场抗议活动相当热烈，但是立刻遭到当局取缔。当局没费太大劲，因为在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北京，全部抗议民众也不过区区五个人。註212尽管出席人数少得可怜，新华社觉得事件值得报导，不但发文字稿新闻，还上了它的电视网。但是，为什么抗议者在马尼拉事件过了那么多天之后才走上菲律宾大使馆门口？这是纯粹自发性的民族主义怒火吗？

抗议之前的星期二，中国外交部才发表对菲律宾大使驳斥的全文，指责菲律宾政府「犯了严重错误……提高升高紧张的作法」。註213同一天夜里，外交部警告菲律宾境内中国公民留在家里、不要外出，避免「反中抗议」。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播报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出的警告，预期那个週末马尼拉街头会有大规模的反华游行。中国民族主义者喜爱的《环球时报》当天晚间亦发表社论，指称两国之间「若不发生冲突，才是奇蹟」。星期三，五大网路新闻有四个以马尼拉可能会出事故的消息做为头条新闻，而且微博也以它为头条要闻。註214以当局动辄封杀微博上它不喜欢的内容来研判，现在这样处理肯定是得到官方核可。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导致国内外中国群众的强烈反应和关注」。

要怎么解释如此刻意地挑激民族主义怒火呢，我们从证据中找到两个解答。首先，这些动作出现的同一时期，中国盲眼人权斗士陈光诚正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之内寻求庇护。这一尴尬事件之前一个多月，身陷丑闻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刚被公开免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和黄岩岛对峙事件相反，陈光诚事件和薄熙来事件的消息在中国传

媒和社群网站上都遭到封杀。传媒批评马尼拉，有一部分原因或许是要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不过这样说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切。

鉴于民粹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或许这件事让人最讶异的是，民众的反应几近无感。尽管又有两天的高调报导—星期四，有个电视台记者获准穿过中国封锁线，踏上黄岩岛立起国旗；星期五，新华社转发外国媒体报导，指中国的南方军区已动员备战—星期六却只有五个人出现在菲律宾大使馆门口。网路上群情激愤，可是社会上却风平浪静。过去好几次的国际紧张时期，中国当局允许、甚至鼓励街头抗议。比如一九九八年印尼华人受到攻击、一九九九年美国军机轰炸贝尔格勒中国大使馆、二○○五年日本修订歷史教科书、二○○八年在欧洲传递奥运圣火时发生声援西藏人的抗议，以及二○一○年和二○一二年为钓鱼台／尖阁群岛和日本对峙，凡此种种事件之后都有街头示威活动。可是，二○一二年四月，北京街头相当平静。

街头没有示威抗议并不代表这个议题不受关心。二○一三年底，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的澳大利亚专家安德鲁．查布（Andrew Chubb），受委託就中国民众对南海的态度进行商业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国民众表示「密切」或「很密切」注意南海局势发展，另有略低于百分之六十的民众表示「密切」或「很密切」关心东海争议—前一年因钓鱼台争议，中国爆发严重动乱。同样的人民很有可能因南海争议闹上街头。可是，他们却没有动静。查布认为在刻意遏制黄岩岛引起的怒火之后，立刻铁腕取缔街头抗议，显示民族主义的感情受到政府刻意的操纵。

这段期间，一小群解放军现役或退役将校经常在中国传媒上发表鹰派、甚至威胁性的评论。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罗援少将在一篇谈论黄岩岛事件的文章中宣布菲律宾已在战略上「发出第一枪」。它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不能让它立下先例，挑衅了我们之后又通过谈判重修旧好。註215光是这篇文章就吸引了数十万微博和网民的热切讨论。空军上校戴旭也是知名的电视评论员。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环球时报》发表戴旭一篇文章，痛骂越南、菲律宾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三只走狗」。他宣称：「我们只需要宰上一条，其他两条马上就老实。」註216戴旭还化名龙韬，发表了更加嗜血、露骨的文章。他曾经不点名针对在「U形线」内开凿油气的一个东南亚国家提出警告：「这些钻井平台变成火炬时，谁的损失最大？」註217

这些军官终其事业歷程都在军事院校里，以确保解放军遵守党的路线。二○一二年四月，罗援接受《南方周末报》专访，提到他的工作是：「我军是由共产党创建，我们出生后每个人都应该晓得我们为谁而活、为何存在。」註218罗援是中共的官二代，他父亲罗青长曾任共产党

对外情报单位首长。戴旭也有很有趣的背景关系。当他以笔名龙韬撰文时，经常自称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智库「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战略分析家。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叶简明。二○○三年至二○○五年期间，叶简明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事务观察家，如华府的智库「二○四九年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认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外围组织。註219安德鲁．查布研判叶简明有可能是解放军海军前任司令员叶飞的孙子，或者甚至是总政治部联络部前任部长叶选宁註220的儿子。註221

换句话说，至少中国两个最知名的「鹰派军人」和中国军事情报及宣传部门的核心有直接的个人关系。他们自己也承认，註222这些「鹰派」是在解放军与共产党的纪律内运作，而且鉴于他们与传媒关系深厚，他们的角色显然是要渲染中国是个威胁的形象。为什么北京领导人要放大「鹰派」的声音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它们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国内的及国外的。他们鼓吹人民的爱国精神，也鼓励「愤青」在网路上发洩情绪。领导人可以藉此声称因为国内压力，只好採取强硬路线—这一来它就方便和其他国家谈判了。他们也创造出一种印象，即「鹰派」代表军中一股真正的声音，军方是会想要夺取决策权的。如果其他政府，尤其是马尼拉和华府，变得害怕刺激这些「鹰派」的不理性行为，他们的政治决心或许就会减损。换句话说，传媒上出现的「鹰派」的一个功能即是恫吓区域内的对手，并且靠着虚张声势以弥补中国军事力量的不足。他们也让中国的整体战略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更难对付。因此之故，媒体上的强悍表态未必是北京领导人拼命要控制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迹象，而是细腻运用民族主义情绪做为外交工具。如果它要允许街头抗议，党的领导人也会面临越共碰上的相同问题：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网路上的激越评论比较容易关掉。北京宁可显得受到民众的指责，也不愿真正有公然失序的威胁。

和在越南一样，中国也有一大批民众对南中国海有强烈的感受，但是中国的政策不会受此驱动。中、越两国群众都不可能促使政府去对峙抗争，反而是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遂行政策目标。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在追求两种正当性：物质方面的正当性和心理方面的正当性。两党领导人都需要促成人民生活水平上升，也要证明他们在「道德上」适合统治。两党面临相同的生存威胁—如果他们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民众的支持就会退潮；另外还有别人虎视眈眈觊觎他们的权位。他们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将有助于他们取得当地的资源，以提振国内发展，并且也展现他们比批评者更加高明。为了增强他们统治的权利，两党都力推官方版的歷史，把自己形塑成民族英雄。

一九九一年，即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之后两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颁订「爱国教育」运动，以「提振国家精神，强化团结，培养民族自尊，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到最大极限，指导与号召群众爱国热情，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路线」。註223再隔二十年，二○一一年三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全新的永久展览「到復兴之路」。博物馆北端的两层楼，以高画质的全景投影叙述着中国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革命胜利的百年屈辱歷史。展览的主办官员曹欣欣告诉记者们，展览的目的是要「让参观者看到歷史的真实现场」。註224再隔十八个月，新上台的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选择这个展场揭橥他的大理想—「中国梦」。

从各地学校教室到国家博物馆，领导人努力灌输一个观念：中国现代史充满了羞辱，直到党掌握了政权才改观。固然讯息的重点是以国家当前的成就为傲，但是它的调子是中国国土遭列强瓜分、中国人民遭外夷欺凌的奇耻大辱。这个说法现在支撑着对领土问题的主流论述。对它稍有质疑即会招致严厉批判。二○○六年，共青团的週刊杂志《冰点》因为登了退休哲学教授袁伟时一篇文章遭到停刊两个月的处分。他在文章中指出，学校里教的歷史有如「喝狼奶」：「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甚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党不同意他的观点，直到它同意另登一篇长文驳斥袁伟时才准它復刊。註225

结果就是，有关南海的讨论，不论是菁英或庶民、民族主义者或自由派，现在都落在从南海诸岛天生就是「我们的」—自古以来即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国人不当地从「我们」这儿抢走的论述开始。这成为网路愤青和菁英决策的共识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一个全国论述，于是导致把统治菁英的正当性押注在他们于这些小岛礁的表现之上。当挪威研究者勒妮．史丹瑟丝（Leni　Stenseth）一九九八年完成她对这个议题的研究时，她可以说，「南沙冲突只在有限度范围内出现在官方民族主义的讨论中」，因为在官方传媒中的文章相当稀少。註226十六年过去，情势大为改变：每天报纸、网路和广电上都会有许多文章侃侃而谈。在台湾海峡两岸对谁掌法理正统仍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北京在面对台北时不可能在南海立场上稍有退却，以免伤及到本身的正当性。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查道炯是个温文儒雅但治学严谨的老师，也强调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不是受群众民族主义的驱动，而是应该北京领导人需要可信度—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他告诉我说：「这里涉及到立场坚定与否，不是光跺脚、挥拳却毫无动作就行。」他认为关键的转捩点出现在二○○八年九月，即北京奥运盛大落幕之后一个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垮台，香港四万名投资人集体

损失高达二十五亿美元。虽然这些钱在三年后几乎全数获赔，这股震撼已经让中国菁英对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方法之信心造成无可修復的伤害。根据查道炯教授的说法，在此之前，中国决策者乐于採用美国的词汇和思维。在此之后，他们得再想想了。

在这段期间，另起一套「中国模式」的思想开始出现。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大卫．班杜斯基（David Bandurski）估计，这个字词二○○七年出现在网路标题中约五百次，在二○○八年约八百次，但是在官方新华社稍一推动之下，二○○九年暴增为三千次。註227这个词汇旋即退烧—现在换成习近平的「中国梦」—但是一股与众不同的特殊意识仍然余音绕樑。班度斯基称之为「盛世话语」。当年言论贾祸的袁伟时教授把根源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勃兴，认为「这种自命正确的意识被当做精神上的天生权利代代相传」。註228

从某个关键面向来看，中国言论上如此发展恰恰是延续着美国的轨迹：现在中、美两国都有一种半官方的论点、一种「卓异主义」（exceptionalism）的国家意识型态。美国的菁英和一般民意都自认美国有「明显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要向全世界散播自由，而现在中国官方也逐渐认为它在国际事务上义无反顾、当仁不让。这股理所当然的姿态—结合受害者意识和优越意识—让小国家在和它打交道时愈来愈觉得北京傲慢骄纵。这种不知检点的自我观点到头来可能伤害到它的整体目标。它可能刺激本地区其他国家抗拒北京的扩张。

现在，南海周边各国的「愤青」们在英文新闻网站的评论版隔空交火。当海上风云紧张时，网路上也杀声价响。新的想像共同体正在你来我往的贴文、论战中强化，而新的鸿沟也在加深。战鼓隆隆、旌旗蔽天，耸动的口号给了编辑下标题的灵感，好把争端兜售给还搞不清楚状况的读者，但其实误导了大家对真相的理解。中国和越南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很少受到民意影响。在菲律宾，出现团结一致且有影响力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还遥不可及，而本区域其他地方民众对争议也漠不关心。然而，所有这些政府都会因看来像受到鲁莽的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而得到好处，即使可能被迫要採取似乎鲁莽的动作，只要在对付敌手时能占到上风就行。如此展现力量其实有一步错棋就会引爆冲突的风险。但是在目前对南海和平与安全最大的威胁，不是火爆的街头民族主义，而是这些区域争议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本地区两个大国之间日益升高的对抗。

註191：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完整地探讨越南的政治与社会概况：*Vietnam: Rising Dragon*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London, 2010).

註192：David Brown, 'State Secrets Revealed in Vietnam', *Asia Times*, 22 December 2012.

註193：‘Police Caught Napping while Vandals Attack US Embassy’,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7 April 2012.

註194：关于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政策，请参考David Joel Steinberg’s *The Philippines: A Singular and a Plural Place*, 4th edn (Boulder, Colorado, 2000), 22.

註195：个人採访。Manila 23 February 2012.

註196：Benedict Anderson, ‘Cacique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Origins and Dreams’, *New Left Review*, 169 (May–June 1988), 3–31.

註197：Michael Cullinane, *Ilustrado Politics: Filipino Elite Responses to American Rule, 1898–1908* (Manila, 2003), 53.

註198：Caroline Sy Hau, ‘ “Patria é interes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Changing Meanings of Ilustrado’, *Philippine Studies*, vol. 59 (2011), 3–54.

註199：译注：一九四二年成立于吕宋岛的共产党游击队，以农民为主体。

註200：Lisandro E. Claudio, ‘Postcolonial Fissures and the Contingent Nation: An Antinationalist Critique of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61 (2013), 45–75.

註201：译注：即审判并下令处死耶稣的罗马总督。

註202：‘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 Pew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18 July 2013.

註203：‘ “West PH Sea” Now Official: So What?’, 12 September 2012, ＜http://www.rappler.com/nation/12277-west-ph-sea-now-official-so-what＞.

註204：个人採访。Manila 24 February 2012.

註205：See ＜http://www.forbes.com/philippines-billionaires/list/＞.

註206：Caroline S. Hau, ‘Conditions of Visibility: Resignifying the “Chinese”/“Filipino” in *Mano Po and Crying Ladies’, Philippine Studies*, vol. 53 (2005), 491–531.

註207：Caroline S. Hau, ‘Blood, Land, and Conversion: “Chinese” Mestizo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in Jose Angliongto’s The Sultanate’, Philippine Studies, vol. 57 (2009), 3–48.

註208：Ibid.

註209：马来西亚在一九八三年占领了弹丸礁（Swallow Reef），一九八六年占领了南海礁（Mariveles Bank）与光星仔礁（Ardasier Reef），一九九九年占领了榆亚暗沙（Investigator Shoal）与簸箕礁（Erica Reef）。马国至今还没有占领南通礁（Louisa Reef），汶莱也主张对它的主权。

註210：‘China–Malaysia Trade to Touch US$100b’, *The Star*, 16 March 2012.

註211：Cheng- Chwee Kuik,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2013), 429–67.

註212：See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2-05/12/content_25367605.htm＞.

註213：＜http://www.fmprc.gov.cn/eng/wjb/zzjg/yzs/gjlb/2762/2764/t929748.shtml＞.

註214：Bill Bishop, ‘Today’s China Readings May 10, 2012’, *The Sinocism China Newsletter*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sinocism.com/?p＝4684.

註215：See ＜http://news.sohu.com/20120426/n341700751.shtml＞ (in Chinese).

註216：David Lague, ‘Special Report: China’s Military Hawks Take the Offensive’, 17 January 20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hawks-idUSBRE90G00C20130117＞.

註217：Long Tao, ‘The Present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Use Force in the South Sea’, Global Times (Chinese edition), 27 September 2011. Note that the phrase was changed to, ‘Everything will be burned to the ground should a military conflict break out. Who’ll suffer

most when Western oil giants withdraw?' when the republished article was re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edition on 29 September 2011 as 'Time to teach those around South China Sea a lesson',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677717.shtml.

註218：Zhang Jianfeng, 'Luo Yuan the "Hawk" ', *Southern Weekend*, 9 April 2012. Translation at ＜http://southseaconversations.wordpress.com/2012/05/03/luo-yuan-a-profile/＞.

註219：Mark Stokes and Russell Hsia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Political Warf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14 Octo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project2049.net/2013/10/14/the-peoples-liberation-army-general-political-department-political-warfa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註220：译注：叶选宁则为中共元老叶剑英之次子。

註221：See ＜https://southseaconversations.wordpress.com/2013/06/07/the-enigma-of-cefcs-chairman-ye/＞.

註222：Andrew Chubb, 'Propaganda, Not Policy: Explaining the PLA's "Hawkish Faction" (Part One)',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13, issue 15, 26 July 2013.

註223：＜https://academic.oup.com/isq/article/52/4/783/1797043＞. Translation in Zheng Wa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2008), 783–806.

註224：http://cctv.cntv.cn/lm/cultureexpress/video/index.shtml

註225：译注：二○○六年一月十一日，共青团之下的《冰点》週刊刊出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歷史教科书〉，遭到停刊，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去职三月一日復刊，刊登张海鹏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歷史的主题〉，驳斥袁文观点。

註226：Leni Stenseth,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s Nansha Rhetoric*,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slo (1998), 92.

註227：David Bandurski, 'How Should We Read China's "Discourse of Greatness"?', 23 February 2010. Available at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10/02/23/reading-the-political-climate-in-chinas-discourse-of-greatness/＞.

註228：Yuan Weishi, 'Nationalism in a Transforming China', *Global Asia*, vol. 2, no. 1 (2007), 21–7.

第七章　中美对峙：两强争霸难为小

左右逢源的柬埔寨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薄暮时分的金边。来自中国的二十个维吾尔族民在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提供的一户公寓休息。七月间，在穆斯林维族和汉人发生的冲突导致至少两百多人丧生之后，他们就逃出新疆。歷尽波折通过越南和寮国之后，这些维族难民或许稍觉安全了。前一天，柬埔寨总理洪森（Hun Sen）刚签署一道法令，承诺依循国际标准处理难民和寻求庇护事件。这件事来得相当突兀：这道法令已经延宕多年、未被签署公告，外交官们也不预期它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签署生效。为什么它会仓促推出呢？

两星期前，世界维吾尔人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向《华盛顿邮报》公布他们的噩运之后，他们出现在金边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尽管认定维族积极分子是「分裂分子」、是宗教上的极端分子，中国政府却出奇地不对此事公开评论。十二月八日被问到这群人时，中国外交部女性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强调中国与柬埔寨一向关系友好，啰吁两国要「加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她的评论却从官方文本中略去。註229十二月十五日，她也只说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成员涉及犯罪，中国政府正在调查。她提出警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不应用来庇护歹徒、帮助他们逃避法律制裁。」除此之外，她倒不多加着墨。註230

私底下，北京却是话很多。十二月十四日，柬埔寨外交部承认接到中国大使馆外交照会关心这个议题。但是，根据「维基解密」发布的美方电文，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驻金边办事处主任在同一天告诉美国大使，和柬埔寨政府就这批维吾尔难民的交涉相当正面，问题可望在几个星期内得到解决。註231然而，就在接下来三天，情势急转直下、猪羊变色。洪森总理所签署的难民及政治庇护法也终结了他和难民专员公署的协议。墨渖方干，柬埔寨内政部代理部长艾松安下令将这些维吾尔人递解出境，声称他们触犯柬埔寨的移民法。

十二月十八日晚间，警方突袭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安全屋」，在枪尖下押走屋子里众人，其中有一个母亲和两个小孩。次日晚间，他们被送上刚由中国飞来的一架民用专机，在黑夜中飞走。註232国际间针对中、柬政府以及难民专员公署的批评纷至沓来，却一点也不起作用。后来的报导指出，这批人当中有四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四人二十年、四人十七年、四人十六年。那名妇人和她的两个小孩获得释放。註233

押送维族人的专机起飞后的次日，另一架专机到达金边。它载来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此做为他亚洲四国访问旅行的最后一站。两天之后，媒体头条新闻报导，习近平此行成果丰硕：根据柬方说法，双方签定十四项协议，中方承诺援助十二亿美元，兴建水坝、建设公路、修復古庙。柬埔寨外交官员坚称双方谈判完全不涉及维族人议题，註234但是多数外界观察家心知肚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根据美国大使馆的另一份电文报告，柬埔寨副总理苏庆告诉难民专员公署驻区代表，他的政府「由于外来势力施压，处境困难」。

这番私底下承认的说法推翻了洪森在公开场合对柬、中关系的描述。九月间，在中国捐钱建造的八座「柬中友谊大桥」的第三座之工地，洪森盛赞北京领导人无条件提供援助：「他们默不作声，但同时也修桥、造路，而且不附带复杂的条件。」註235—例如，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等等。註236

人权团体揪着递解维族人出境事件不放，一直批评金边政府，结果在四个月之后，即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交运两百辆剩余军用卡车及拖车给柬埔寨。註237华府意在向洪森打脸，不料却给北京送上机会。仅隔一个月，北京宣布奉送两百五十六辆卡车—全新的、不是二手货—外加五万件制服，统统免费。六月底，卡车交接仪式上，高头大马、状若体育健将的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将军把钥匙交到小个子、胖敦敦、满心期盼的柬埔寨副总理蒙森潘（Moeung Samphan）手中。第三座柬中友谊大桥正式通车还不到一个月，中方就送来这份大礼，似乎象徵着未来两国外交关系前途大好。

但是，美国岂甘被几把汽车钥匙、几座大桥击败。中方送了卡车三星期之后，华府特使带着礼物也赶到金边：一箱古董器物。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特地携来在洛杉矶海关没收的七件柬埔寨被盗古文物做为美、柬建交六十周年纪念的大礼。一艘美国海军医疗船负责运送古文物，还在抵达后兼施免费医疗服务以招揽人心。至于在柬埔寨其他地方则以恢復军事关系做为争取民心之举—其实两军关系才刚在两个月前中止。

这一厢交还古文物，另一厢则由美、柬部队开风气之先首次在柬埔寨境内举行多边维和训练演习。代号「吴哥哨兵十号」（Angkor Sentinel 10）的这项演习是美国国务院出资、自二○○六年以来在各国举行的「全球和平行动计画」（Global Peace Operations Initiative）、以促进美军与其他许多军队合作的计划之一部分。可是人权团体还是批评挑选柬埔寨做为二○一○年演习地点，一部分原因是递解维吾尔人出境事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参与演习的若干柬埔寨部队涉及驱赶农民、刑求拷打、滥肆枪决的罪行。美国大使馆否认此一说法，坚称参与演习的几

百名柬埔寨军人都经由馆员「严加查证」。挺不寻常的是，这项维和行动演习竟涉及柬埔寨空降部队和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联合跳伞演习。註238如果说美国政府在几星期前还对支持柬埔寨部队有疑虑，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事实上，柬埔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远比区区两百辆二手货卡车来得深厚。东南亚军事事务专家卡尔．赛尔（Carl Thayer）估计，二○一三年，美国一年给予柬埔寨的军事援助价值超过一千八百万美元。註239吴哥哨兵演习现在成为每年必举行的项目之一。「海上战备及训练合作」（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的海军演习也是每年的盛事。除了维和与军事训练之外，美国军援的第三个支柱是反恐。柬埔寨没有恐怖主义的问题，但是本书撰稿时它的反恐部队指挥官是总理洪森的长子洪曼奈特（Hun Manet）中将。他和他的单位直接接受不驻在美国大使馆内的一小支美国特种部队顾问的指导。事实上，虽然谈的是加强柬埔寨参与国际维和作业的能力，其实美国军援似乎锁定在可以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地方。洪森的三个儿子都在美国接受军事训练。长子曼奈特于一九九九年进入西点军校、次子曼尼士（Manith）二○一○年前往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进修，幼子曼尼（Many）二○一一年进入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註240本书撰写时，曼尼士官拜准将，是柬埔寨情报次长，三十岁的曼尼是他父亲的内阁副秘书长兼党的青年团团长註241，并且自二○一三年七月选举之后，成为国会议员。

我们不清楚洪森王朝对美国如此提携照顾铭感五内的程度如何，但是我们晓得中国当局准备撒大把银子争取洪森父子的欢心。北京有一个关键优势：它在国内可没有人权团体说三道四、批评它的军援政策。二○一○年，即送了军用卡车一年之后，中国贷款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元给柬埔寨，供它购买十二架全新的中国制造直-9（Zhi-9）型军用直升机。二○一二年五月，两国国防部长又签署一项一千七百万美元的训练计划；二○一三年一月又补强，再承诺提供某些训练与装备。註242中国大使馆不必伤脑筋在承诺提供援助之前还需要调查受惠单位是否曾经干了凌虐农民的勾当。

金边方面不是没有疑虑，美国政策圈内也有疑虑究竟能把柬埔寨收买到何种地步。报导指出现在中国出了极大价码要援助柬埔寨，譬如，习近平到访后传诵一时的十二亿美元天价。可是，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夸张。中方根本讳莫如深，柬方也提不出这个数字的详细分类项目—只知道有十四项协议，主要涉及放款兴建道路和其他基础建设。不久之后，柬埔寨驻华大使凯．西索达（Kheh Caimealy Sysoda）告诉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这笔数字是百分之六十贷款、百分之四十赠

与，项目包含兴建水力发电厂。註243这笔钱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花完。总而言之，十二亿美元包括了原先已达成的协议，刻意押到习近平到访时一併宣布，它包含不是援助的商业投资，而且承诺也得花几年时间才能兑现。註244在媒体上广为宣传，只是为了造势，好让美国观察家坐立不安罢了。

一九六四年，当时的柬埔寨元首施亚努（Norodom Sihanouk）告诉《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汤玛士．艾伯克隆贝（Thomas S. Abercrombie）说：「两头大象打架时，蚂蚁最好躲得远远的。」註245十年之后，施亚努的国家夹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苏不同版本的共产主义中间的冲突，不幸生灵涂炭。现在，柬埔寨政府、尤其是军方，认为玩弄两头大象互斗在政治上、商业上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他们的优先目标是保住权力、继续图利自己和党羽伙伴，本地人嚯称这是「富棉」（Khmer Riche）上台，取代了「赤棉」（Khmer Rouge）当家。有两个阔佬对手竞相出资补助他们的政治野心和个人财富，岂非是天下美事。窍门在于要让两者永远焦虑不安，不知是否输给了对手。洪森是玩弄外交手腕以吊人胃口的一流高手。

但是，柬埔寨的外交周旋不是只在两大之间操纵、玩弄而已。它和泰国、越南两大强邻之间的关系一向不睦。柬埔寨和泰、越两国的边境争议一直没有解决。比如，它和泰国之间常因谁拥有极具象徵性地位的柏威夏神庙（Preah Vihear）周边的土地主权，引爆民族主义怒火。越南固然在一九七九年推翻中国人支持、大搞种族屠杀的赤色高棉还册立了洪森，但是民间对越南人的仇恨却十分普遍、炽热。柬埔寨人认为越南人（Yuon）不法侵占湄公河三角洲的高棉人土地，带来两百年的不义暴政是「国耻」。这里头谈不到区域团结的意识，绝大部分柬埔寨人若有机会报復偷窃他们国土的外夷，绝不手软。

中美竞相争取小小柬埔寨的效忠，反映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争取影响力的大斗争。和季节风一样，压力和说服会交互从不同方向吹来。和季节雨相似，这些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的潮流会带来利与弊：援助、贸易和投资之外，贪渎腐败和军事对抗也都来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代表团以及地方菁英，试图驾驭号称代表国家（或只是本身）利益的势力。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而中国也担心美国的包围，加上长期以来地方上的冤苦和区域的权力斗争，创造出危机与机会。

东南亚的「蚂蚁们」仍然害怕丛林巨兽打架会祸延无辜。他们都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美国是本区域最大的投资者，中国则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政府明白，他们经济能快速成长靠的就是美国军力独霸所创造出来的安定，而且他们大多与美国有某种形式的防务安排。他们也很清楚，中国近在咫尺，而且愈来愈近。他们之间的敌对替

蚂蚁们创造了机会。自从施亚努拿蚂蚁与大象做比喻以来已有半个世纪，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善加利用大象，合于本身利益就拉拢牠，如果牠变得太蛮横就得抵抗牠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避免不了陷入大国之间的交锋。南中国海的争议已使得地方、区域和全球的战线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九七五年越战结束以来所不曾有的现象。

发明「东南亚」

「东南亚」是世界上相对较新的一块地理区域：它在二十世纪中叶才因德国学者和日本战略家的鼓励，从「远东」脱离出来。但是，当罗伯．海恩—吉尔德恩（Robert Heine-Geldern）等人类学者讨论着Südostasien註246的文化、日本将领计划着要入侵它之际，世界上其他地方—包括「东南亚」本身—大多还不知道它的存在。日本政府创造出「南洋」一字形容在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内，从台湾延伸到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一大片区域。但是，一直要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战时同盟国成立「东南亚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对抗日军，这个字词才进入英文词汇。註247但是「东南亚司令部」只主司印度、缅甸、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战争。菲律宾、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其他地区及巴布亚纽几内亚，仍然拨归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管辖，而法属印度支那的地位不明，直到盟国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峰会才做出定夺。在波茨坦会议中，现今的「东南亚」的形状才固定下来：婆罗洲和爪哇划入东南亚司令部指挥，而且，彷佛成了后来歷史的诡异预兆，印度支那被划分为两块，南部归东南亚司令部管辖、北部由中国战区统帅部指挥。东南亚司令部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撤销，但是这个名词、或者说是有个号称为「东南亚」的完整区块的概念，被保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种战争中成为武器。

再一次地，这是一种军事观点，而且是由外人强加的观点。一九五四年九月「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在马尼拉成立的时候，来自这个区域的国家只有两个，即菲律宾与泰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巴基斯坦和纽西兰各因其他理由也加入这个组织。英国在今天的汶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仍有殖民地；法国虽已退出越南北部，在越南南部、寮国和柬埔寨仍有军队。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反共同盟，但东约组织不够可靠。它逐渐凋零，直到一九七七年继共产党在柬埔寨、寮国和越南得胜后寿终正寝。它的影响力迄今犹在美国和泰国、菲律宾的安保条约中隐见身影。

到了一九五八年，由于深惧国内共产党颠覆、又忌惮华人在本地区势力庞大，催生了一些本地主导的倡议；比如，马来亚推动成立《东南亚友好及经济条约》（South East Asia Friendship and Economic

Treaty）。这个组织的残余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蜕变成为「东南亚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本地区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体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都纳入其中。东南亚协会表面上不是政治性质组织，但是在冷战的脉络中，它明显具有反共的宗旨。

东南亚协会会员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说服怀疑人士，证明这个区域组织的确有明确的宗旨、功能。印尼的民族主义者政府认为它是美国政府的外围组织；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Subandrio）告诉访客，整个构想「没有实质内涵」、「毫无用处」。註248当个别国家无法就彼此国土疆界线达成协议时，也很难出现一致的区域认同意识。东南亚协会成立四个月之后，新任菲律宾总统马嘉柏皋（Diosdado Macapagal）重提菲律宾拥有北婆罗洲的主权—北婆罗洲即将成为新独立的马来西亚联邦的沙巴邦。经过这番主权争议，东南亚协会也行将就木。

同时，印尼也对沙巴及北婆罗洲其余地方提出主权主张。一九六三年，苏卡诺政府发起大对抗（Konfrontasi），试图强迫马来西亚放弃这块领地。直到印尼发生军事政变，东南亚的概念才又重现生机。苏哈托将军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推翻苏卡诺，隔了几个月，印尼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同意结束大对抗。这是一个大转折点。两天之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美国现在在越战中打得如火如荼，中国撑腰的共产党在国内又兴风作浪，东南亚的菁英们终于体认到各国之间保持更紧密关系可强化他们的统治能力。彼此团结起来，可以推动贸易和经济成长、满足人口成长后的各种需求，也让别人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事务和外交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在曼谷成立「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Nations，简称ASEAN，以下简称东协），除了东南亚协会原有三国之外，再加上印尼和新加坡。东南亚终于有了名实相符的区域组织。

东协起步维艰。成立头一年，它差点就挂了，因为菲律宾又再度对沙巴提出主权主张，彼此不信任的情绪挥之不去。一直要到共产党一九七五年在中南半岛取得胜利，才刺激东协行动起来。它的领导人（苏哈托、马可仕和李光耀等反共强人）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峇里岛首次举行高峰会议，签署「亲善合作条约」，其中保证「自我节制不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武力……透过友好谈判解决彼此争议」。他们首倡「东协方式」：承诺採取「共识决」、互不干预各国内政。往后二十年，亚洲四小龙经济成长虎虎生风，但是东南亚的裙带资本主义却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没顶。此后，要在全球化经济中力争上游的意念—以及与大国保持距离的决心—促使区域统治菁英形成更紧密的关系。东协规模加倍（会员国由五国增为十国），期望则再加倍。东协效法欧盟成为「共同体」，它以政治与安全、经济，以及社会与文化三个支柱做为基

础。东协从邻国之间叫嚣恫吓，走了很长的路才有今天的局面。

美国表态

二○○八年初，米德伟（Derek J. Mitchell）在募款上碰到困难。他服务的机关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华府地区经费最充裕的智库之一，但是它的常态捐助人对东南亚事务不感兴趣。米德伟只好向泰国大使馆争取贊助他研究计划的核心经费。二○○八年九月，米德伟筹办了一场论「美国与东南亚」会议，由泰国几个贊助单位及少许其他捐助人资助。与会者都表达了相同的心声：东南亚觉得被美国冷落了。国立马来西亚大学教授楠森（K. S. Nathan）抱怨说，东协十国加起来得到的注意，只有日本得到注意的十分之一。越南外交学院院长吆吁美国要多为区域安全尽一点心力，新加坡大使表示西方的金融危机更强化一般人认为美国是个「心有旁骛的国家」的印象。泰国国防部顾问潘尼坦（Panitan Wattanayagorn）谈到东南亚普遍有种感觉，觉得「中国太近、美国又太远」。

与会代表抱怨，在亚洲几乎看不到小布希政府的身影。米德伟回忆说：「大家在谈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午餐。」小布希总统没有出席二○○七年东协—美国高峰会议，他的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 Rice）在三次东协区域论坛会议中，有两次缺席。这个批评未尽公允。固然小布希政府大部分精力投入「反恐战争」，部分官员已经开始思考其他施政重点。有位五角大厦前任决策官员解释说：「工作在二○○七至○八年间就已经着手做了。最大的转捩点是二○○七年一月的「反人造卫星测试」（anti-satellite missile test，简称ASAT）。所谓「反人造卫星测试」是中国事先没有公告周知就发射一枚飞弹，摧毁在轨道中已经失去作用的一颗人造卫星，此举让美国军方大为震惊。五角大厦开始改变方针。二○○八年五月，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香格里拉对话提醒大家，美国还是「亚洲的常驻大国」（a resident power in Asia），他是美国资深官员中第一个提到南中国海以及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註249美国外交官依然在东南亚地区十分活跃，美国在亚洲各地仍驻有数十万大军，只是因为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大家不察而已。

米德伟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同盟及新兴伙伴」提出报告，副标题十分惊悚：「走出阴影」（Out of the Shadows）。它提出四大建议：美国应该重振其同盟的活力，培养与新兴伙伴的关系，开发与区域多边组织的关系，并在经济事务上与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密切合作。报告在二○○九年中发表时，米德伟

已被欧巴马新政府延揽到国防部担任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另一位智库人士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辞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职务，出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两人在一九九○年代柯林顿政府的国防部，曾在亚洲事务小组中同事过。他们在遇上数十年未曾有的极端经济危机之际、十分悲观的时刻，担起艰鉅的工作。据坎贝尔说：「我们的评估大部分都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普遍觉得美国陷于深沉、无可逆转的衰退，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就会退出亚洲。」註250米德伟借用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一句话形容他的策略：「把九成以上的性命都端出来了。」美国在亚洲要增加能见度。

新任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充分听取简报、做足准备工作。她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选在二○○九年二月，走访日本、南韩、中国和印尼。她在雅加达宣布，美国将签署东协的亲善合作条约。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催促美国采取此一策略行动已有相当时日。它让美国成为东亚高峰会的成员；东协领袖们藉由东亚高峰会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国家领袖同席议事。希拉蕊在七月二十二日签署了条约。在此之前的五月七日，中国政府让整个区域都警戒起来，它在提交给联合国大陆棚划界委员会的文件中，将一份U形线地图做为附件。这是它首次在正式的国际脉络中采用U形线，这么做等于是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提出权利主张。整个赛局为之丕变。

直到这一刻，以及远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持续拒绝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中选边。但是在希拉蕊主事下，区域内各国之间的领土冲突，与美、中之间更大的矛盾，两者开始彼此牵动。根据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接替米德伟职位的厄尼．鲍尔（Ernie Bower）的说法，欧巴马政府在这一刻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确仔细盯着（华府的）新闻发布，真正觉得时机到了。他们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审时待势』的理论，准备顺势回应国内的政治推力，以便有所作为」。註251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这里头又因欧巴马总统二○○九年十一月访问中国出师不利而使得情势治丝益棼。鲍尔回忆说：「欧巴马尝试新作法，提议在未来世界事务上美国和中国要更加合作，可是北京却认为这是美国软弱的迹象。这时候坎贝尔和米德伟跳了出来，表示『我们必须要扩大棋局』，明确表态要重返亚洲，由于东协是区域平衡的重要连结，利用东协的架构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上。」

希拉蕊因而频频在东协场合亮相，更加深入介入区域政治。东协几个会员国忧心中国转为强势作风，现在也努力想打「美国牌」。结果是双方阵营在河内的东协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上叫阵。东协区域论坛是东协与其邻国及世界大国对话的另一个场合，希拉蕊二

○一○年七月在年会内表示：

美国支持所有主张国不用恫吓、透过合作的外交程序解决所有的领土纷争。我们反对任何主张国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武力。美国对于南中国海陆地地貌所起的相互竞争的领土争议不选边站。我们相信主张国应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追求其领土主张及相关海域空间权利。吻合传统的国际法，对南中国海域空间的正当主张应纯依对陆地地貌之正当主张而得出。註252

上述部分说法只是重申美国一九九五年首次公布的立场，但强调「合作的外交程序」是新的说法，它也是公开声明支持东协主张国的策略。她有关威胁动用武力、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纯因陆地地貌提出主张的评论，明显是在驳斥中方立场。她说完话后，十一个国家相继发言畅谈南海领土争议。这是他们首次在东协区域论坛畅所欲言：美国开了第一枪，让东协会员国及其他国家得到大鸣大放所必要的政治掩护。中国政府指控华府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但是米德伟认为希拉蕊只是应区域的要求、讲出大家的心声。「没有疑问，重点是东南亚促使我们发言。中国人喜欢自称遭人迫害，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然而，东协也不希望表现得太过强硬。两个月之后，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美国–东协高峰会，最后公报就只字不提南中国海。註253「蚂蚁群」已经说出心声，现在希望风平浪静不去惹恼区域内的另一头大象。

二○一○年之后，美国主张「东协团结」和「东协中心论」的声音十分响亮。措词用字听起来善意，但是放在南中国海脉络中，它并不中立：它试图把东协十个会员国统统整合起来，以支持各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的领土争议。但是东协前任秘书长、菲律宾籍的鲁多夫．席维里诺（Rodolfo　Severino）对于美国能够成功的机率，向我提出悲观的评估：「我不认为东协能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只考量国家利益—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很少有领导人愿意对此採取长期观点，因为离下次大选只有两、三年时间呀！」中国人对此深为了解，因此竭尽全力阻碍东协对争议有任何团结一致的活动。有些东协国家在南海不涉及任何利益，对于主张国没有义务，因此好好享用中国的投资和大方餽赠。东协已经被各国往不同方向拉扯。

失控的金边会议

时间拉回到维吾尔人遭递解出境之后的两年半，同样是在金边的某

个夜晚。场景更加富丽堂皇，议题还是一样：柬埔寨随着谁的曲调起舞？这次问问题的不是难民与人道团体，而是东协的外交部长们。自从他们的前人签署成立东协的「曼谷宣言」迄今差不多整整四十五年了，东协已经走了一段长路。金边会议打着「同国同命」（One Country, One Destiny）的口号召开。可是，在取名甚为乐观的「和平宫」一间宏伟的会议室里，东协因南中国海陷入危机。

故事的开端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起点：一九九二年七月，东协发表「马尼拉宣言」，首次对南海採取联合一致的立场；或者是首次尝试起草一份可行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那是一九九五年三月，紧接着中国占领美济礁之后（见本书第三章）；或者是二○○二年十一月，东协和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简称DOC）；也或者是二○一一年七月，大家协商好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执行准则」（Guidelines to Implement the DOC）。将近二十年来，问题一直不变：东协某些会员国希望将中国拘束在一套规则上，限制它在南海的行动，特别是防止它再占领更多的陆地地貌。它显然会有助于越南和菲律宾；如果能取得东协全体十个会员国支持的话，对汶莱、马来西亚和印尼也会略有帮助。中国若是能和各国个别谈判，当然会更有利。双方交手已经缠斗多年。

二○一二年三月，我採访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迭尔．罗沙里欧（Albert del Rosario）。从外交部他那巨大办公室的大窗子望出去，马尼拉湾及外海的宏伟景色跃于眼前。罗沙里欧很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他在就任外交部长之前，是第一太平洋公司及菲列克斯石油公司（Philex）的董事：这两家公司拥有论坛能源公司的控制股权。就在他调动职位之间，也就是我採访他之前一年，「真理航海家号」受雇于论坛能源公司调查礼乐滩天然气储量，却被中国海监总队派船阻挡（见本书第五章）。中国似乎吃了秤铊铁了心，打定主意要制止论坛能源公司开发天然气田。罗沙里欧说，菲律宾要的是一套规则、一套行为准则，来解决问题：「我们理解当地的碳氢化合物储存量攸关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这些资源来尽快搞好经济开发。对我们来讲，它可能改变我们的未来。」

推动行为准则还有另一个象徵性的原因。二○一二年十一月将是「行为宣言」签署十周年。这个问题拖延不决已经有了十年之久。东协此时由柬埔寨轮值主席，它指派菲律宾起草另一份行为准则，但是罗沙里欧透露他正在筹划更有雄心的一套东西。他告诉我说：「你来的这一刻，我们正在试图启动一个我们觉得大有可为的计画。东协有四个国家提出权利主张。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而且也已经启动的程序是，结合

对如何解决问题与我们看法最接近的国家（越南）。我们将在双边基础上与这个国家悄悄合作解决问题。然后我们两国去找第三个国家（马来西亚），问它是否愿意和我们合作；果真搞定了，我们三国再去找第四个国家（汶莱）……然后再回过头找柬埔寨说：『看，我们自己已经搞定了这些，但是身为主席，功劳可以归你，你可以说这是东协的倡议。』我们实际上已经发动了这个倡议。」

换句话说，罗沙里欧希望在短短九个月之内协商好一份行为准则草案，草案将包含一个可以解决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汶莱之间（最后亦及于中国）所有海上争议的机制。它看来像是一个虚幻的空中阁楼──这套时间表在企业界或许办得到，国与国之间的谈判恐怕就难了。号称「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Zone of Peace, Freedom,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的这套机制，所有各方要先协议好哪个地区有争议，然后据以集中力量解决之。这套机制放在书面上还挺不错（详见本书第九章）。问题在于菲律宾的外交没有能力促其实现。东协的办事规则是全体十个会员国都要同意才能推行，可是没有迹象显示菲律宾已在幕后投入必要的折冲来争取其他国家赞同。即使罗沙里欧也承认，一月间他在东协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此一计划时，迴响并不热烈，「基本上是因为东协没有太多时间去消化这个概念。」

菲律宾这个方案有两大根本缺陷。第一、它是向正式会议提出已经完全成型的计划，未经过必须的准备工作；第二、马尼拉想拿一套可执行的规则──「行为准则」──来约束北京当局，可是在东协全体十个会员国都同意之前，它又不准备邀中国参加谈判。中国可以争辩说，打从一开始，就该邀它参加谈判，而且有好几个东协会员国会同意这个说法。北京已经努力策划其反制策略：集中全力向它最容易影响的国家下功夫。三月底，即东协领袖高峰会开会前四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柬埔寨进行国是访问、会见洪森，宣布一批七千万美元的新援助，也承诺五年之内两国贸易额倍增为五十亿美元。註254胡韩会之后，洪森的顾问史里．坦隆（Sri Thamrong）告诉媒体记者说，胡锦涛表示，中国对订定南海行为准则乐观其成，但又不要「太快」。洪森回答说，他认同中国的想法，即南海问题不应「国际化」。註255柬埔寨果真不把南海议题列入东协高峰会正式议程，经菲律宾等国家抗议后才又排进议程。五月底，中国又给柬埔寨二千万美元军事援助，註256六月中旬再追加一笔高达四亿三千万美元的贷款。註257当然还是跟过去一样，双方都坚称没有交换条件。

二○一二年七月九日星期一，罗沙里欧又来到金边，试图说服东协同僚对北京采取强硬路线。自从他向我概述其策略以来的四个月期间，中国船只已经控制了黄岩岛，中海油已将越南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田的

开採权招标。五月底，菲律宾和越南要求东协同僚发表声明谴责他们认为的违犯行为宣言之精神的行为。但是，柬埔寨外交部说，会员国对这件事没有共识。

对马尼拉来讲，在行为准则方面终于传来差堪告慰的好消息。罗沙里欧的草案在东协讨论时被删掉一部分精髓──决定哪个地区有争议的微妙机制已经删掉──但是解决争议的程序保留住。註258这算是还不坏的结果，尤其是外长们当天上午正式通过文字版本，同意把它交给中方做下一阶段的谈判。外长会议结束，大家移到比较不那么正式的讨论──所谓的「避静讨论」（retreat）。但是，这实际上一点都不是悄悄的闲话天下，这次的避静讨论使东协陷入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东协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纽西兰、俄罗斯、南韩和美国在一个星期之内，个别地、或以不同组合的方式讨论，然后合起来以东协区域论坛的名义发表一份公报。避静讨论负责协议好这份公报。起草公报的任务交付给罗沙里欧，以及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外交部长，这些国家都直接涉及到南海利益。他们起草的文本有一百三十二段。第十四段至第十七段涉及到南海，而其中的第十六段更明确提到黄岩岛以及越南的抱怨。联合公报是这一类集会的重要表徵。通常它们事先就拟好，正式议事完毕就发表，也几乎立刻就被忘掉。但是，这次金边会议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由于某个代表团的笔记外洩给了驻澳大利亚的学者卡尔．赛尔，我们得知接下来发生的某些状况。註259罗沙里欧慷慨激昂吆吁支持，追问东协同僚，菲律宾失去了对黄岩岛的控制，为什么大家还默不作声？中国的行为难道不违反行为宣言所宣示的「需要推动和平、友好、和谐环境」吗？他列举多年来中国「扩张及侵略」的其他事例，指控北京「失信」、没有从岛礁撤走它的船只。然后，罗沙里欧引述神学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反纳粹的名言：「起先他们（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默不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然后他们追杀工会分子，我默不作声，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当他们追杀我，再也没有人替我说话了。」由于东协大多数会员国（包括菲律宾）过去曾经大力整肃共产党，而其他会员国迄今仍取缔独立自主的工会分子，这个比方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人觉得在菲律宾之后，中国会来找他们麻烦。事实上，还有人责备菲律宾处置不当，才一对峙就派出海军旗舰戈里格里欧．狄尔．皮拉号，升高了黄岩岛争议。其他人则关切马尼拉公开诉请美国支持，此举违背东协珍视的中立性。

其他部长逐一发言。泰国外长苏拉蓬（Surapong Tovichakchaikul）口若悬河，但是只说必须维持东协团结一致。越南外长范平明（Pham Binh Minh）要求大家支持，反对中国「严重侵犯主

权」的行径。印尼外长马提．纳塔列加瓦（Marty Natalegawa）坚持东协应该团结，并提及南海最新的发展。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阿曼（Anifah Aman）也是如此。汶莱外长莫哈默德．波奇亚亲王（Prince Mohamed Bolkiah）话不多，但表示他会支持联合公报。跟在他后面的是寮国和缅甸的外交部长，并没有发言反对公报的文字；然后是新加坡外长尚穆根（K. Shanmugam），他说「最近的发展特别引人关注」。

根据我们掌握的说法，直到这一刻，每位外交部长都发言了，不是表示支持文本、就是没有表示反对。可是，柬埔寨外交部长贺南洪（Hor Namhong）拿起麦克风就宣布「没有共识」，还说第十四段到第十七段，尤其是第十六段，应该暂时搁置、不应该立即通过。四位负责起草的外长大吃一惊，立刻要求当下、当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贺南洪坚称「现在，或近期内，我们不能预期会解决这些争议。在东协，不行啦！」当下有人就起疑柬埔寨是不是被收买了？它是否预备撕裂东协，以便讨好北京？

印尼外长马提．纳塔列加瓦旋即宣读第十六段折衷版本──它提到「受影响的岛礁／争议地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棚」──但是贺南洪坚持没有必要提到任何特定事件，然后就扯到另一边去，大谈有可能分辨得清楚「礁」与「岛」的差别吗？能够辨别它属于谁的吗？他最后提议，把第十六段全文删掉。罗沙里欧指出，文本根本没提谁拥有岛礁。

接下来，辩论转到是否可以改用「争议地区」这个字词。纳塔列加瓦和马来西亚外长阿曼提出这个建议，但是范平明坚持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不能被说是「争议地区」，罗沙里欧对黄岩岛也持相同立场。范平明建议暂时休会──我们的纪录到此为止。但是关于联合公报对最近南海事件究竟要精准到什么地步的辩论又持续了四天，其他预定的双边和多边会议也照旧进行了四天。

次日（二○一二年七月十日星期二），在北京和金边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官继续警告，这个会议不是「讨论南海问题合适的地方」，又说：「中方感谢柬埔寨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坚定支持。」註260虽然记者们被隔离在特设的媒体中心，安全地看不到部长们、官员们在起迴声的走廊里奔忙或交头接耳的盛况，和平宫内议事不顺的迹象还是纸包不住火。星期三上午召开的部长紧急会议被描述为「尖锐」、「紧张」。泰国籍的东协秘书长苏林．皮祖望（Surin Pitsuwan）却不忘为大家打气，告诉记者们会议进行顺利。

到了星期四，苏林准备承认会议进行中出现了「波折」。同一时候，纳塔列加瓦努力挽救──同时也宣称某些同僚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他对第十六段提出十八个版本的修正，却一点用也没有。这一天

又召开紧急会议。有个柬埔寨外交官抱怨他的国家遭到「霸凌」。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告诉记者，贺南洪一再拿着公报文稿走出会议室与未现身的顾问商量。传说，中方官员获知这些文稿内容。註261虽然后来柬埔寨外交官员批评这种指控（譬如，向《金边时报》投书），但从来没有真正否认过。註262

现在轮到希拉蕊．柯林顿出场。这位美国国务卿抵达金边时，笑逐颜开，但也承认讨论相当「紧张」。她提醒大家，美国的政策是不在南海争议中选边站—不过她倒不吝批评发生在黄岩岛的「对抗行为」、「令人担心的经济恫吓」，以及「制造摩擦的国家措施」。註263大家都不会听不懂她指桑骂槐在影射谁。她吆吁东协「要以一个声音讲话」。听起来她似乎在鼓励东协的公报要显示立场一致。

星期五上午，苏林还在谈和平宫的「波折」。尚穆根准备要登机回新加坡，却接到贺南洪急电要他回头：菲律宾和越南已经同意折衷的措词。大家又开一次紧急会议。可是，讨论进行中，苏林话还没说完，贺南洪就切断他的麦克风。註264尽管有人争取再协商，贺南洪拿起文件、冲出会议室。註265这不是好兆头。东协四十五年史上，首次出现外长会议结束竟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纳塔列加瓦表示「沉痛的失望」。苏林改口把「波折」升级为「大波折」。与会其他部长也各自议论纷纷。各方问题在星期五纷纷涌现，柬埔寨外交部长却提出一个怪异的解释。他说：「东协外长会议不是法庭，不是裁判争议的地方。」註266可是，并没有人要求外长会议做裁决啊！

柬埔寨会吆应中国立场行事，没有人会觉得惊讶，但是它会如此厚颜无耻地做，而且不惜伤害东协蛮干，倒是令大多数人吓了一跳。柬埔寨政府可不在乎。毕竟，柬埔寨有什么理由要依东协整体利益行事？洪森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洪森自己的未来。封杀联合公报，他既讨好北京、又让河内生气，不是一箭双鵰吗？而且他也有恃无恐。美国不会跟他翻脸，事实上还会加码讨好他，以免他往中国阵营倾斜。这更是一箭三鵰了！

但是就重视区域团结的人而言，金边会议后果不堪设想。只有纳塔列加瓦主动积极设法弥补伤害。峰会之后五天，他从雅加达出发，拜会马尼拉、河内、金边、曼谷和新加坡当局。虽然他唯一的成就是促成东协重申不知已说过多少次的六点立场：东协支持行为宣言、支持执行准则、支持行为准则、支持国际法、自我节制与和平解决争端，他的努力还是被称赞为十分成功。「黄岩岛」和「专属经济区」从头到尾不见踪影。可是，金边会议失败之后，大家所介意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有一纸文件、让所有外交部长的名字都出现在上面。

但是问题并没有平息下来，外交官们不顾外交礼仪在报纸上写文章互骂。罗沙里欧的资深助理厄林达．巴西里欧（Erlinda Basilio）开第一枪，在两家菲律宾报纸上发表长文揭露峰会秘辛。柬埔寨外交官情绪激动地反驳《曼谷邮报》（*Bangkok Post*）、《民族报》（*The Nation*）、《金边邮报》（*Phnom Penh Post*）、《柬埔寨日报》（*Cambodia Daily*）、《日本时报》（*Japan Times*）和《菲律宾星辰报》（*Philippines Star*）刊出的报导。在反驳《菲律宾星辰报》的报导时，柬埔寨驻马尼拉大使贺斯．瑟瑞东恩（Hos Sereythonh）指控菲律宾玩「骯脏的政治」。罗沙里欧的办公室在大使馆门口贴公告、在报纸头版发新闻召见他。贺斯．瑟瑞东恩称病不出，派副手代表出席。十天之后，柬埔寨驻菲大使馆说是为了修补双方关系，贺斯．瑟瑞东恩奉召回国，大使易人。后来，事情稍微安静，但并没有完全止歇。十二月，厄林达．巴西里欧奉派出任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马尼拉将坚持强硬立场的迹象。要怎么收拾呢？截至本书截稿时间，金边摊牌已经过了许久，行为准则还没有取得协议的迹象，「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的构想还摆在档案柜里。

重返亚洲

二○一一年，美国国务院的亚洲团队，套句厄尼．鲍尔的话来说，「非常惊慌北京会把即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解读为更加软弱」。註267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此一发展描绘成正面意义。起先他们选择的口号是「回到亚洲」（Return to Asia）。但是，主司战略沟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宾．罗德士（Ben Rhodes）另有高明意见。二○一一年十一月，希拉蕊．柯林顿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篇幅发表美国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淖之后的新方略。它不是撤退、它也不是「转向」哪里，而是「转轴」（pivot）。她的文章列举六个「关键行动路线」，其中四个取材自米德伟二○○九年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撰写的报告（復兴同盟关系、培养与新兴国家关系、开发与区域多边机构的关系、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议题上密切合作），再加上另两项：美国将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之基础，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

做为策略性的行销，「转轴」非常的成功。现在没有人可以说美国不重视亚洲。仔细推敲过的字眼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问题是它只和宣示的六大「行动路线」之一扯得上边。转轴的第一个实际动作发生在希拉蕊文章刊出之后几天。欧巴马总统飞往澳大利亚，宣布美、澳协议好两千五百名美军陆战队将半永久性地驻在达尔文（Darwin）。然后他才飞往峇里岛，成为第一位出席东亚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刚离开国防部职务的米德伟也认为「初步讯息没有推出得很好」。註268转轴变得太侧重军

事部署。「转轴」听起来也不像永久性质。如果美国今天可以转轴转向亚洲，来日不无可能轻易转向别处。华府需要有听起来更具持久性的东西。不到六个月，「转轴」被替换为「再平衡」（rebalance）。

东南亚大部分政府都欢迎美国的「再平衡」。这使得他们可以平衡与北京的关系，并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有些国家，如柬埔寨，周旋于两大之间而左右逢源。其他国家，主要是海洋国家，试图利用再平衡强化他们的地位，特别是在南海的地位。美国也利用争议增强和相关国家的关系。两个议题形成共生关系：区域内各国对中国愈来愈强悍感到相当焦虑，美国则关切它的全球战略角色。慢慢地，这两套议题—区域性的领土争议，以及美、中两国的「全球」歧异—变成相互纠结。它使得南海变成潜在危险的地方。用米德伟的话说，出现了「尾巴摇狗」的危险。

米德伟和其他美国外交官每次提到「再平衡」都必须强调「这不是只针对中国」。这话没错—它关系到的是重新活化、提振与日本、韩国、东协及南亚的关系。但是上述这些地方构成一个弧，而这个弧包围着中国。希拉蕊的六条行动路线也环绕着中国形成言论的弧。每一条行动路线都有一个关键词语凸显它的重点。当她写到结交新兴国家时，她要求他们「加入我们一起打造并参与一个遵守规则的区域及全球秩序」。「遵守规则的秩序」是透过下列传统支持美国全球霸业的国际体系：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布列敦森林体制、美元独霸、自由贸易与自由航行的原则。未来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要靠新的全球大国遵守现今国际体系的规范。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的霸业特别要依赖自由进出全世界海域。用美国「二○一一年全国军事战略」的话来说，「确保进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和网路空间，构成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部分……全球公域与全球联通的网路世界构成了一个连绵的肌理，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要依赖它」。

南海是「全球公域」里一个关键重大的连结，将太平洋与印度洋、波斯湾和欧洲连结起来。现在，南海和东海成为全世界争执闹得最兇的海域，也是大家对中国的动向感到焦虑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位前任五角大厦决策官员解释说：「我们很高兴有许多国家在附近出入。要不得的是独占的行为，无论是以霸道武断的方式，或是以慢性窒息的方式，将别人驱赶出去，都是不可取的。」註269当美国人说中国应在国际体系内运作时，他们指的一件事是中国必须同意把南海开放给美国海军。

目前美方煞费苦心鼓励中国放下「独占的行为」，全面参与现有体系，亦即，按照西方规则玩游戏。从国是访问到军事会谈、植物检疫工作会议，北京受到外交官和谋士们殷切的关爱。坎贝尔二○一三年在澳

大利亚演讲时说：「我们追求的是把中国整合进全球社会，让我们一起合作来界定共同的规范、价值和程序，而且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註270他们的努力付出是因为这些外交官和战略家认为，北京领导人还未被说服接受目前国际体系的好处，会在往后数十年内挑战其游戏规则。

希拉蕊对同盟的重视给了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转轴」向全世界引介一个新的地理区：「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虽然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使用这个名词已经许多年，支持「再平衡」的人士却赋予它新的意思：一个关切中国崛起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印度–太平洋」现在是个战略区域，就和二次大战和冷战期间的「东南亚」一样。它形成一个巨大的四边关系，从印度经由日本和澳大利亚延伸到美国—澳大利亚的海滩兼有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冲刷，这个字词正好起源于此。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自二○○五年以来即有「三边安全对话」。二○○六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邀请印度加入组成「四边安全对话」，但是由于当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态度模棱两可，这个主张旋即被搁置。在这件事之后，于陆克文之前担任工党领袖的金．贝兹雷（Kim Beazley）在二○○九年十一月发表文章提醒未来中、美会较劲争雄，他在文章中介绍「印度–太平洋」这个概念。註271雪梨罗威国际政策研究中心（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罗利．梅德卡夫（Rory Medcalf）也极力推动这个概念，直到希拉蕊于二○一○年十月在夏威夷演讲时宣示了美国的贊同。印度–太平洋四边关系的政治中心就是南海。

这个词语描述的是一个战略场景—把印度纳入原本习称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希拉蕊在她揭示「转轴」的文章中宣称：「美国正将其战略押宝在印度的未来，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将有助于和平与安全。」用坎贝尔的话来说，「印度是这个体系的锁钥，将在东亚扮演巨大又关键的角色」。註272印度长久以来迴避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连线中有任何角色，但是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它在二○○九年同意定期举行「印、美战略对话」（India-U.S. Dialogue）。从此以后，印度已经採购一百三十亿美元左右的美国军事器械，包括直升机、运输机和大砲，这些武器大部分将用在支援其为了保卫喜马拉雅山区中和中国的边界而新建的山地作战部队。

澳大利亚一直积极要把「印度」嵌入「太平洋」。两国在二○○九年协议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而二○一三年六月的交涉产生一份协议，将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并定期商讨区域安全议题。註273印度也正在积极开拓其他关系：与越南有「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有「防务政策对话」，也和日本、韩国有「三边对话」。它提供给越南一亿美元的低利贷款，俾能购买巡

逻艇以保护印度公司在越南外海所营运的油田；它还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日本举行联合演习。註274可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仍然鼓吹「战略自主」，因此它不太可能加入和美国有关的任何正式同盟。

在这个四边形之内，澳大利亚、纽西兰、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和泰国，过去数十年都曾有过防御条约或协定。近年来，东协七个会员国已同意和华府有某种形式的军事伙伴关系（缅甸、越南和内陆国寮国为例外—前两国正在小心翼翼地调整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友人名单就短得多，只有北朝鲜、柬埔寨、寮国、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他们没有一个称得上盟国，除了北朝鲜之外，全都在两大之间企求渔翁之利。缅甸目前向西方开放，主要是它想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寮国是为了以中国制衡越南，柬埔寨是只为自己、谁都想耍，斯里兰卡也一样。如果说中、美两大出现战略竞争，美国起跑点有一面倒的优势。但是在东南亚，问题在于它是否能维持此一优势。

二○一三年，美国光是花在情报上面的费用就超过五百亿美元—比东协全体会员国加总起来的军事费用还高。註275除此之外，美国二○一四年预定的正式军事预算还有六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註276国防占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五分之一以上，二○一四年占率为百分之二十二。本书截稿时，美国国债高达十七兆美元註277，削减开销是势在必行。大家担心美国对本区域的承诺还能维繫多久，因此为了避险，纷纷与中国攀交情，进而替美国制造恶性循环：必须增加支出来扭转此一印象；国内要求裁减预算的压力又告上升；因此增加了它实际上必须降低驻军的可能性；这一来在四边形之内的国家更有理由要追随北京的路线。这就是北京一直汲汲营营想要渲染的讯息—美国愈是显得拼命努力支持对亚洲的承诺，亚洲国家就愈可能向别的地方寻求支援。

于是就出现第三个关键词「分摊负担」（burden sharing），它和转轴强调区域多边体制相互呼应。华府积极鼓励「关切中国」的国家建立自己的同侪军事关系。日本提供菲律宾十艘海岸巡逻队船只，每艘价值约一千一百万美元，也负责训练越南的海巡人员。南韩捐了一艘军舰给菲律宾，澳大利亚提供器械和训练。澳大利亚在二○一二年也和邻国印尼签订防务合作安排。澳大利亚亦开始与日本更紧密合作，譬如，二○一二年六月举行代号Nichi Gou Trident的联合军演。註278一九七一年协议妥当的「五国防务安排」迄今还串连起澳大利亚、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英国。

但是凡此种种活动加总起来会有效果吗？韩国和日本仍然为竹岛／独岛主权争吵；越南不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防务安排，以免招致中国的重大威胁。东协其他国家乐于躲在美国军事保护伞的庇护下—也的确利用它来压住东协内部某些争端—但是他们毫无兴趣重建任何类似东南亚

公约组织的东西。这不是同盟、联合或甚至伙伴关系。或许可以从物理学借个字词来尽可能接近地形容：这是一种「流动」（flux）□□一系列的粒子和力量持续地重新排列组合。但是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五角大厦决策官员的话，这未必是坏事。「就外交意义而言，我们胜过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船坚砲利。而是中国人还没搞清楚如何玩多边的游戏。我们晓得箇中诀窍。既然我们比以前弱，我们就必须把已经熟悉的事做得更好。我们刚重新找回我们许久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常做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当地有许多国家都希望我们留在当地。不是军容壮盛留在那里、不是霸道专横地留在那里，而是在战术层面留在那里。」註279

因此，这些粒子要如何被说服奉华府为轴心而结合起来？简单地说，透过第四条行动路线：扩大贸易与投资。这里的关键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这个转轴背后的一个主要动机是美国担心会被挤出东亚的市场。二○○四年，美国是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二○一○年已沦为第四大，逊于中国、日本和欧盟。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在这一年生效，中国还要推动更大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纳入日本和南韩，它对东北亚和东南亚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根据厄尼．鲍尔的话：「关于亚洲经济整合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人即将席捲一切。他们已经开始主导『东协加三』结果，彷佛他们就是决定议程的人。如果你和日本人、韩国人谈话，你会发现他们忧心忡忡，而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人也惶惶不安，因为亚洲整合已经不等他们就开动了。因此，各方对美国人提出种种的警告。」

二○○八年一月，小布希还当家做总统时，他的政府凑合了四个怎么看都格格不入的国家—汶莱、智利、纽西兰和新加坡—自称为TPP，把它推到美国在亚洲经济规划的前端。欧巴马政府起先不是那么热衷。二○○九年十一月，欧巴马坐上空军一号专机，首次前往亚洲进行正式访问时，他并没有计划要就贸易事项做任何声明。但是在旅途中和希拉蕊、坎贝尔长谈后，他被说服了，而在众人大为意外之下，于日本宣布美国将加入推动TPP。此后，TPP成长为十二个国家，包括另两个东协会员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南韩也可能会加入。华府希望TPP将扩大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不过各方普遍怀疑TPP是否能够达成它的第一批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对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智慧财产权和政府合同等订定规定—这些是富国的议题，在亚洲根本排不上优先议程。

东协在推它自己的计划，即「区域广泛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它是一个标准低得多的框架，主要集中在统合东协会员国既有的自由贸易区，包括与中

国的自由贸易区。传说美国支持的TPP和包括中国的RCEP两者互相角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协刻意选择推动RCEP（而不是东亚自由贸易区），因为它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及日本和南韩—使它比较不会太侧重中国。但是其实全都一样，东协以脚投票，向它最重要的市场整合。

然而，除了有个计划协助东协国家走向吻合TPP的标准—即「扩大经济交往」（Expanded Economic Engagement）倡议—之外，华府没有提出太多的正式经济激励来把「印度–太平洋」往它的方向拉。这反映出国内游说团体的力量，他们比较担心来自亚洲制造业者的不公平竞争，而不是那么重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民间部门因而被告知要和它善为相处。二○一二年，美国–东协商业理事会（US-ASEAN Business Council）和美国总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在柬埔寨共同主办「美国–东协商业论坛」，这时候也是东协各国外长为联合公报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可是，二○一三年，论坛没办了。看来转轴还是比较着重枪砲、而不是奶油。

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枪砲呢？中国官员曾经提出对国际法的诠释，这种诠释有潜在可能把美国海军拒之于南海大门外。中国同时在发展可以「拒止」美国舰队进入南海的武器。华府视此发展为根本性的威胁，不仅威胁它的海军、更威胁到它的全球地位。希拉蕊所宣布的转轴的第五个元素是「扩大军事存在之基础」，但是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它成为和「空、海作战」一词连结在一起。会发生战争吗？当然不必然。美国海军过去有礼让空间给新兴国家的实例，未来也可以。一九六二年后几十年，苏联发展出「蓝水」海军，它的远东舰队从海参崴航行到许多地方。但是当时的美、苏两大超强都是格劳秀斯的信徒。能够随意航经南海及各地，他们已经满意。今天所不同的是，北京明显盼望推翻好几百年的习俗，不让军舰有此一权利。

转轴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在「普世价值」的大标题下「促进民主和人权」。这是开发得最不足的元素。本书撰写时，米德伟已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缅甸号称在民主与人权上很成功，但是对于人权的歧见却阻碍了它与越南的关系。最后它们成了界定美、中歧见的因素，北京领导人认为宣扬个人自由会颠覆其政治制度，导致另一回合的帝国主义主宰。颇有可能人权考量将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扮演相对较小的角色。

南中国海成了两套战略原则与许多区域利益碰撞的战线。争议十分危险，因为它具体呈现出两个大国对自身的认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奠基在强大的使命意识上，他们的菁英也深具这种强大的使命意识。就中国共产党统治者而言，正当性来自于他们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歷史，以及持续不懈要收復殖民者及汉奸从中国夺走的领土之努

力。且不论这个说法有违史实，这些领土包括了南中国海。美国的菁英也对它的「明显的命运」有个绝对的信念：美国是个与众不同的「卓异的国家」（exceptional country），全世界「最后的最佳希望」，是个「不可缺少的大国」，维护国际体系规范和规则的国家。南海是这些规范和规则受到挑衅的第一个地方。如果美国失去自由进出这些水域的权利，它将丧失其全球地位，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次等国家。对美国的身分认同、繁荣、与安全来说，这样的改变将会是可怕且毁灭性的。美国会为了保卫它而不惜一战。我们即将看到，有人已经拟定了计画。

註229：US Embassy, Beijing, Cable 09BEIJING3276, ‘MFA Press Briefing’, 8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12/09BEIJING3276.html＞.

註230：US Embassy, Beijing, Cable 09BEIJING3338, ‘MFA Press Briefing’, 15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12/09BEIJING3338.html＞.

註231：US Embassy, Phnom Penh, cable 09PHNOMPENH925_a, ‘Update On Uighur Asylum-Seekers in Cambodia’, 16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PHNOMPENH925_a.html＞.

註232：US Embassy, Phnom Penh, Cable 09PHNOMPENH954, ‘Corrected Copy – Deportation Scenario For 20 Uighur Asylum- Seekers’, 21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scoop.co.nz/stories/WL0912/S01540.htm＞.

註233：‘Two More Uyghurs Get Life Sentences’, *Radio Free Asia*, 27 Januar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ife-01272012201754.html＞.

註234：US Embassy, Beijing, Cable 09BEIJING3507, ‘PRC: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Strengthens Relations with Cambodia during December 20–22 Visit’, 31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12/09BEIJING3507.html＞.

註235：‘Selected Comments during the Visit to New Bridge Prek Kadam’, Cambodian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4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cnv.org.kh/en/?p=1438＞.

註236：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当时同样也为维族的人权问题缠身。二十二名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被逮捕的维族男性被错误地指控为恐怖份子，并被囚禁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被「释放」后被强迫驱逐出境。

註237：‘U.S. Suspends Some Aid to Cambodia over Uighur Case’, Reuters, 1 April 2010.

註238：See ＜http://www.army.mil/article/42598/soldiers-jump-into-history-with-cambodians-during-angkor-sentinel-2010/＞.

註239：Carlyle A. Thayer, ‘The Tug of War Over Cambodia’, USNI News, 19 February 2013.

註240：Craig Whitlock, ‘U.S. expands counterterrorism assistance in Cambodia in spite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Washington Post*, 15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expands-counterterrorism-assistance-in-cambodia-in-spite-of-human-rights-concerns/2012/11/15/f2df3de8-2e59-11e2-abff-7d780620a97a_story.html＞.

註241：Saing Soenthrith and Paul Vrieze, ‘Hun Sen’s Second Son in Meteoric Rise Through RCAF Ranks’, *Cambodia Daily*, 30 January 2012.

註242：Vong Sokheng, ‘China Steps up Military Aid’, *Phnom Penh Post*, 24 January 2013.

註243：US Embassy, Beijing, Cable 09BEIJING3507, ‘PRC: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Strengthens Relations with Cambodia during December 20–22 Visit’, 31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12/09BEIJING3507.html＞.

註244：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in Cambodia: How Much?’, *China in Africa: The Real Story*, 17 M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2010/05/chinese-aid-in-cambodia-how-much.html＞.

註245：‘Cambodia: An Ant Dodging Elephants’, Eugene Register- Guard, 22 October 1964.

註246：译注：德文，即东南亚的意思。

註247：Donald K. Emmerson, ‘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5 (1984), 1–21.

註248：Nicholas Tarling, ‘From SEAFET and ASA: Precursors of AS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3, no. 1 (2007), 1–14.

註249：Robert Gates, ‘Challenges to St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Shangri- La Dialogue 2008, 31 May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08-2906/first-plenary-session-1921/dr-robert-m-gates-bce8＞.

註250：Kurt M.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ustralia’, Address to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s Alliance 21 project, Emerging Asia, Customs House, Sydney, 14 March 2013.

註251：个人电话採访。6 November 2013.

註252：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Hanoi, 23 July 2010. Available at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註253：Ian Storey, ‘China’s Missteps in Southeast Asia: Less Charm, More Offensive’,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10, issue 25 (17 Decem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missteps-in-southeast-asia-less-charm-more-offensive/＞.

註254：‘China Pledges US$ 70m Aid to Cambodia’, 1 April 2012. Available at ＜https://sg.news.yahoo.com/china-pledges-us-70m-aid-cambodia-075004737.html＞.

註255：‘Hu Wants Cambodia Help on China Sea Dispute, Pledges Aid’, Reuters, 31 March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ambodia-china-idUSBRE82U04Y20120331＞.

註256：‘China Offers $20 Million in Military Aid Ahead of Asean Meeting’, *Voice of America, Khmer Service*, 29 Ma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voacambodia.com/content/china-offers-20-million-in-military-aid-ahead-of-asean-meeting-155432515/1356122.html＞.

註257：‘Cambodia Takes $430m China Loan’, *Phnom Penh Post*, 14 June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cambodia-takes-430m-china-loan＞.

註258：Carlyle Thayer, ‘Securing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rms, Legal Regimes and Realpolitik’,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San Francisco, 6 April 2013.

註259：Carlyle A. Thayer, ‘ASEAN’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Litmus Test for Community- Building?’,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 10, issue 34, no. 4 (20 August 2012).

註260：‘Cambodian Prime Minister Hun Sen Meets Yang Jiechi’, *Xinhua*, 10 July 2012.

註261：Ernest Z. Bower,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Corner of 18th and K Streets: China Reveals Its Hand on ASEAN in Phnom Penh’, *CSIS Newsletter*, vol. 3, no. 14 (19 July 2012). Available at ＜http://csis.org/publication/southeast-asia-corner-18th-and-k-streets-china-reveals-its-hand-asean-phnom-penh＞.

註262：‘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letter from Koy Kuong, Cambodian government spokesperson), *Phnom Penh Post*, 25 July 2012.

註263：‘US, China Square off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ssociated Press*, 12 July 2012.

註264：‘Cambodia Rejects ASEAN Ministers’ Plea to Issue Joint Communiqué’, *Japan Economic*

Newswire, 13 July 2012.

註265：Jane Perlez, ‘Asian Leaders at Regional Meeting Fail to Resolve Disputes Over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Times*, 12 July 2012.

註266：‘South China Sea: ASEAN Talks Fail; No Joint Statement’, *Zeenews*, 13 July 2012.

註267：个人电话採访。6 November 2013.

註268：个人採访。Yangon 20 November 2013.

註269：个人电话採访。4 August 2013.

註270：Kurt M.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ustralia’, Address to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s Alliance 21 project, Emerging Asia, Customs House, Sydney, 14 March 2013.

註271：Kim Beazley, ‘A Shift in Thinking Is Needed to Clear Indo- Pacific Hurdles’, Special Issue: In the Zone: Crisis, Opportunit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Australian,* 7–8 November 2009.

註272：Kurt Campbell and Brian Andrews, ‘Explaining the US “Pivot” to Asia’, Programme paper, Chatham House, August 2013, available at ＜https://kritisches-netzwerk.de/sites/default/files/explaining_the_us_pivot_to_asia_-_kurt_campbell_and_brian_andrews_-_the_asia_group_-_august_2013_-_9_pages_0.pdf＞.

註273：Vinay Kumar, ‘India, Australia Raise the Pitch on Maritime Cooperation’, *The Times of India,* 5 June 2013.

註274：Sandeep Dikshit, ‘India Offers Vietnam Credit for Military Ware’, *The Hindu*, 28 July 2013.

註275：Barton Gellman and Greg Miller, ‘U.S. Spy Network’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Objectives Detailed in “Black Budget” Summary’, *Washington Post*, 29 August 2013.

註276：Bill Carey, ‘Congress Passes 2014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Aviation International News*, 3 January 2014.

註277：相关资讯请至下列网站查询：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

註278：Christian Le Mière, ‘Rebalancing the Burden in East Asia’,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5, no. 2 (April–May 2013), 31–41.

註279：个人电话採访。4 August 2013.

第八章　包围与突破：方兴未艾的军备竞赛

无瑕号风波

它长得像个巨型灰色箱子，时速只有十节，而且像个一流的间谍，躲在一个枯燥无味的名称底下。做为一艘「探测船」，「无瑕号」（USNS Impeccable）通常很低调、躲开聚光灯。它深入海洋单独作业，游走在国际法的边缘。它虽然是美国政府所有、归国防部管控，却委由知名的航运公司丹麦快桅集团（Maersk）底下名号响亮的「特殊任务部」（Special Mission Division）营运。「无瑕号」的工作，以及它为何是箱型的原因，即是在怒海中拖曳价值昂贵的缆线。它的「特殊任务」是用它拖在船尾的一千五百公尺长「拖曳传感器阵列监视系统」（Surveillance Towed Array Sensor System）侦测中国的潜水艇。二○○九年三月五日星期四，无瑕号在海南岛榆林潜水艇基地东南方约一百四十公里处默默地作业，突然一艘中国护卫舰从它船首驶过。两小时之后，一架中国侦察机十一次低飞经过它，而护卫舰再次驶过它的船首。三月七日、星期六，另一艘中国「辅助综合情报」舰（Auxiliary-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AGI，即间谍船的委婉称呼）命令「无瑕号」离开，否则「后果自行负责」。「无瑕号」没离开，次日后果就来了。

我们稍微知道经过，是因为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无瑕号」船员「巴比」（Bobby）拍的一段录影。我们看到的现场是晴空万里、水波不兴。「无瑕号」已经被一群船队包围。两艘民间拖网渔船凑近「无瑕号」船尾。另有一艘渔政船、一艘海监船和原本那艘间谍船跟在一旁。两艘拖网渔船都没有拖着渔网，但是它们船上插满中国国旗。其中一艘船身已旧、但新漆了红色油漆，它已经近到可以看到其船桥窗户上贴着几张脸在观察。有两个人站在船首，其中一人挥舞着旗子。然后这艘渔船突然有了行动：它的烟囱冒出黑烟，它想要冲过「无瑕号」的船尾，显然有意切断「拖曳传感器阵列监视系统」。「无瑕号」船员已经准备好，如果有人企图抢登船，要把他们驱退。不过，他们大体上把它当做中方在闹笑话。巴比形容说：「卢和威尔森已经备好水管，但是老中让我们笑得眼泪都掉下来。」

没有办法用船身撞断缆线，红色渔船船首那两个人之一拿出一根长竹竿，伸向水中企图勾绊缆线。由于「拖曳传感器阵列监视系统」重达

一百五十五吨，「无瑕号」船员更是笑歪了。有个船员说：「如果他勾到了，在甲板上就站不住了，他会跌到海里灌水去。」影片上没出现，但是卢和威尔森一度奉令打开「无瑕号」的消防栓，企图利用水柱把两名「渔民」冲走。但是他们不放弃，干脆脱得只剩内裤，继续勾绊缆线。试了一阵子没有结果，渔船船长改变战术。渔船加足马力，抢过「无瑕号」右舷、停在它前方。蓝色船身的另一艘渔船也从左舷抢进。政府的船只还留在附近、保持一段距离，但是想必准备在渔船遭到「无瑕号」「威胁」时就要伸出援手。人人都静止不动下，两艘渔船逐渐相互靠拢—完全挡住「无瑕号」前进之路。这时候白色的渔政船靠上来，停在蓝色渔船后面。「无瑕号」是前进不得，且船尾还拖着「拖曳传感器阵列监视系统」，也转身不得，船长只好向上级请示。

甲板上原本嘻嘻哈哈的船员现在全闭上嘴了。在影片的最后几秒钟，清楚传出某人对同僚说：「我们奉命进行紧急销毁。」五角大厦承担不了「无瑕号」极其精密的情报蒐集设施落到中国人手中的风险。如果中方企图抢登「无瑕号」，标准作业程序就是销毁文件和器材。但是美方暂且按兵不动。「无瑕号」船长透过无线电宣称他要离开，要求中方让出安全通路。中方也不再为难它，「无瑕号」慢慢地撤退。

事后双方政府激烈舌枪唇战，都大声指控对方违反国际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称美国「在南中国海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未经中国允许的活动」，他要求美国「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行为」。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也很强硬地宣称：「我们将继续在这些国际海域作业，我们期望中方在该地区遵守国际法。」但是吉布斯不够严谨地用到「国际海域」一词，正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它可能很幽晦，但是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在别的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做些什么的这项法律辩论，已经使美国和中国走到冲突边缘。这是美国要求可以自由进出的「全球公域」，以及中国追求的安全，这两者之间的争战。这个斗争将会界定亚洲、甚至可能更大地区的未来前途。

自由航行权

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载明于一九八二年各国议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详见本书第四章）联合国一百六十三个会员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其中之一。三十个会员国没有签署它（其中十六个是内陆国家），而美国是其中之一。美国参议院不肯批准公约是因为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有损美国主权—尽管美国政府任何相关部门都认为不会。美国没批准它，因此每当华府力促其他国家要遵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是缺乏说服力的。纵使如此，美国歷任政府还是主张所有国家遵守公约，理由是它现在已构成「国际

习惯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也说，尽管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的作业一向都吻合公约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数百条款内，有几项条款规定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中国当局特别逮住其中三项，藉此主张「无瑕号」的行为不合法：第五十六条—它赋予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有管辖权；第五十八条—它规定其他国家「顾及沿岸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岸国所通过的法律与规章」；以及第二四六条—它规定「专属经济区内及大陆棚之海洋科学研究，应经沿海国同意」。根据北京的说法，美国没有徵求同意、也没获得允许，它的研究活动肯定不合法。

然而，根据华府的说法，这一切说法完全没道理。「无瑕号」及其姊妹船并没有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它们是在执行间谍任务。如果「无瑕号」是从事和平研究—例如调查石油开採的可行性—那么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它的活动就不合法。但是由于它的工作不涉商业性质或科学性质，「无瑕号」可以享有既定的权利：任何船只可以通过十二海里领海线之外的海域。而且由于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对超过十二海里领海以外海域并无主权，中国所通过的有关于其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能做什么的规定，在华府看来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沿岸国家（coastal states）和海上国家（maritime states）经过九年的法律辩论之结果。前者希望控制在它们外海发生的一切事，而后者希望有航行的自由。主持终结辩论的新加坡官员许通美（Tommy Koh）后来归纳出折衷方案：「公约文本的解决方法相当复杂。它一点儿也没有明白表示第三国是否可以或不可以在一个沿岸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但一般的理解是我们谈判、协议达成的文本允许进行类似活动。」註280但是若干国家不同意这个「一般的理解」，积极寻求改变它。中国最着名，但是巴西、印度、马来西亚、马尔地夫、越南和少数其他国家都要求外国军舰要经过其专属经济区之前，必须先徵求许可。对中国与全世界而言，问题在于以这种方法改变专属经济区的性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制度的规则。它也会因为切断了美国在太平洋和中东之间的直接通路，而对美国的军事霸业构成全面挑战。

在美国西岸和亚洲之间移动军舰和部队，需要有通行太平洋、南中国海、麻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自由航行权。通过印尼的国内水域、或印尼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水域，在航行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大的挑战，而再往南，绕过澳大利亚要到波斯湾去，还得再加上好几个星期的行程，对一支大舰队而言又得加上数千万美元的燃料费用。如果专属经济区不准军舰通行，美国就无法通往其亚洲基地及和盟国接触。美国海军若是袖

手，台湾的防御地位将严重减弱。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觉得同样受到威胁。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会流失。在五角大厦眼里，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不能保证军力往来东亚及东南亚也等于不能保证民间往来该地区。一个有敌意的国家可以切断美国经济所依赖的商品、货物和能源的流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就推行外人不太知道的「自由航行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以积极对付任何企图关闭专属经济区的企图。註281「自由航行计划」结合了外交谈判和赤裸裸的武力。有时候美国国务院只发一封抗议信。然而，美国海军三不五时就直接出现在别的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示它可以自由进出。这就是现代版的砲舰外交，但是华府说，由于美国努力维持海洋开放给全球贸易和安全，人人都会受惠。

华府同样极力贬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一条的效力；条文说：「缔约国……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华府主张，只是蒐集资料不足以称为以武力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也很强硬。它认为蒐集资料是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做准备，而美国的军事活动贴近到离其海岸只有十二海里是一种实质威胁。

从海南岛看出去，中国的两难很棘手。自从邓小平下令一九八○年在深圳设立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以来，中国的繁荣就建立在沿海城市的发达之上，以及支撑它们的进出口活动。中国自二○○七年起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并且从二○一三年九月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而此时页岩油却开始引导美国走向能源自给自足的方向。註282对外贸易占中国GDP总值一半以上（仅占美国GDP不到三分之一），可是，中国要通往公海却不容易。地球物理学的造化使中国沿海出现许多岛屿，可是地缘政治的力量又使它们全都成为潜在的敌国。从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南海立场的首要考量是，在有战略需求时，确保中国能通过它通往世界海洋。而严肃看待维持此一通路的国家—同时还担心美国的意向—肯定需要培养保护它的能力。这样的逻辑难免会导致南海未来会发生冲突。

二○一三年四月，北京的国防部发表白皮书表明它的目标。它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註283这里头的矛盾会影响到亚洲的未来：如果中国选择以军事手段保护它的沿海城市和漫长的供应线，它无可避免将发展能力以对抗目前的海上霸主。但是，美国这位海上霸主担心的是中国的政策不是出于自卫，而是图谋成为区域霸主，因此势必出手制衡。在美国看来，「介入」

（access）是一切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华府智库和军事总部投入偌大努力与预算，以确保美国能持续通往全球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南中国海。

空海整体战

二○一二年一月，美国国防部发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直率地表明它的任务是：「身为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美国必须维持众所信服的能力以投送军事力量到世界任何地区，俾能支持这些利益。」註284「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居于战略文件层级的中间。在它底下是更详尽的计划，订定如何赢得「介入」，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空海整体战概念」（Air-Sea Battle Concept）。而「空海整体战概念」实际上早于其他计划就订定：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大体上以其为中心。

「空海整体战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机」期间，柯林顿总统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驰往台湾海峡附近，迫使中国军方停止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发动的一系列恫吓演习。美军此一部署触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开始研拟对策以防再次重演。在一九九六年之后，中国军事经费大幅转投向海军、空军和二砲部队，而「杀手锏」这个字词也开始出现在军方文件。「杀手锏」指的是以相对廉价的武器突袭、摧毁敌人更尖端的武器系统的战略。註285在解放军海军能力大增之下，它获得一项新使命。二○○一年，江泽民要求海军强化其「远洋防御」能力，次年，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后又重申此一指示。註286后来中国军方在二○○七年进行一次成功的试射，以一枚飞弹摧毁在轨道上运作的人造卫星。美国军方有那么多需要仰赖人造卫星的通讯系统和导引武器，对箇中意涵心知肚明。

简单来讲，「杀手锏」就是制止位在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启动飞机、飞弹对付中国目标的一种能力。西方分析家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遏止或延缓未来美军介入支持台湾。如果台湾未来的政府做出任何踏向独立的动作，中国海军将会发动某种封锁或入侵行动，并设法阻拦美国海军。「杀手锏」未必要宝刀出鞘，它只要在美国海军将领心目中建立足够的不确定心理，以制止他们派出最强大的武备即可。美国军方对此战术有个更平淡无奇的名字「反介入」（Anti–Access，简称A2）。当同样方法用在比较靠近目标区时，它称为「区域拒止」（Area Denial），两者合起来就是「A2/AD」。中国的A2/AD战术或许会使用水雷、或配备鱼雷和巡弋飞弹的潜艇、或网路攻击，但目前大部分注意力都聚焦在一种新武器—东风21D反舰弹道飞弹上。东风21D射程超过一千五百公里，在目标上空落下时还有能力做最后的机

动调整，至少理论上可从大陆基地袭击大型船舰。

二○○七年中，这一新型飞弹的研发消息开始流出，到了二○○八年十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已经兵棋推演如何对付它：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言人爱德华．汤玛士（Edward Thomas）中校形容它是「对水面船舰和陆上基地之长程传统威胁的一种作战概念」。註287两个桌上电脑模拟演习，名为「太平洋远景一号」（Pacific Vision 1）和「太平洋远景二号」，测试美国在二○二八年如何回应亚太地区某个未指名的「近乎同侪的竞争者」所发动的挑战。演习结束时，美方把兵棋推演过程所做的应对计画称之为「空海整体战」。

「太平洋远景」的部分经费来自五角大厦内部研究单位「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s）。打从它在一九七三年成立以来，净评估办公室的职责就是想像美国会遭遇什么最恶劣的状况，然后设想以什么方法避免它们。这个单位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主管：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本书截稿时，他高龄九十有二。註288马歇尔活在一个非常神秘的世界，里头充满着对美国安全种种潜在的威胁：有些威胁是具体、迫切的，有些则是未雨绸缪、且尚属假设性质。但是他和绝大多数恐怖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每年拥有一千三百万美元以上的预算向华府的国防专家宣扬他的恐惧。註289马歇尔一再被决策圈及评论界形容为「非常有影响力」。他像圣人般的宣示导致别人称誉他是「绝地大师」。

美国退役海军上校詹．范．托尔（Jan van Tol）参与了此一演习。他曾在净评估办公室工作了几年，然后转到他喜好的智库「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任职。他说，模拟演习戏剧性地显示中国的新科技会如何彻底扭转东亚的权力平衡：「太平洋远景所提出的重点是，如果中方朝向研发射程更远的弹道飞弹，那么西太平洋的既有基地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我们要如何作战的战略又全是依据这些基地而拟定的。这令人如坐针毡，相当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註290

太平洋远景演习过后几星期，透过军方指挥系统，其结果呈报到空军参谋长（Air Force Chief of Staff）诺顿．史华泽（Norton Schwartz）和海军作战部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葛瑞．劳黑德（Gary Roughead）办公室。同时，这个智库也把它的建议送呈华府决策官员。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海事当局选择围堵「无瑕号」，立下威胁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一个教科书范例。既然华府所有的国防思想家现在都警觉到这个议题，净评估办公室和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更是借助这个事件顺利推广他们的主张。空海整体战的概念送到五角大厦时，得到排山倒海的支持。二○○九年七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指示海军

和空军要针对挑战提出对策；九月间，史华泽和劳黑德签署了一份迄今仍保密的备忘录，要把空海整体战发展为可运作的概念。

讨论延续到二○一○年十二月，从核动力潜舰退下来的海军作战部部长特别助理布莱安．克拉克（Bryan Clark），奉令将种种想法整理为完整的文件。他说：「整个构想就是要指导各军种的发展活动。我们所採购的、我们所训练的、我们所採行的理论，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些训练好的部队交给各军种底下的作战指挥官。」根据克拉克的说法，他所主笔的概念直接受惠于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的研究：「范．托尔和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其他人所做的研究非常有用，我把相当大部分纳入国防部的机密概念中。」克拉克四十四页的文件完成于二○一一年二月，四月间就获得各军种首长的肯定。套用克拉克的话，到了当年秋天，国防部「有意将此一概念运用到美军的建设……运用它来导引预算案、演习、日常训练和准则的建立。」

可是，在五角大厦之外，空海整体战概念却变得相当有争议。对它唯一的公开说明是由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在二○一○年五月所发表。尽管原先强调美国并不寻求对抗或围堵中国，整份文件却直率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的「杀手锏」构成威胁。它说：「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被阻挡在过去六十年歷届政府都宣称攸关重大安全利益的区域之外。」第三章描述美国可能如何反击。它主张针对内陆的指挥中心、雷达系统及情报蒐集设施发动「动能」及「非动能」（kinetic与non-kinetic，也就是轰炸或电子作战）的攻击，针对飞弹制造及储存设施攻击，「弄瞎」中国的人造卫星。它也表示要「切断中国的海上贸易流通，旨在对中国经济施加强大压力，甚至造成其国内压力」。该文件希望能掀起讨论，不料它的成绩远超过其作者预期──北京大为震怒。

一直要到二○一三年五月，美国政府才公布一份非机密的空海整体战概念摘要，克拉克原本的四十四页文件只有十六页准予发表。空海整体战的精髓得到一个很笨拙的代号：NIA/D3──「能扰乱、消灭和击败敌军的联网、统合、深入打击力量」（Networked, Intergrated forces capable of Attack-in-depth to Disrupt, Destroy, and Defeat adversary forces）。这里的「深入打击」引起各方关切。文件中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字眼，但是范．托尔文件的其他关键部分跃然纸上：为了克服A2/AD威胁──中国「杀手锏」或其反舰弹道飞弹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术──美国必须攻击离战场相当遥远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依照克拉克的解说：「你必须进去做外科手术，摧毁A2/AD网络的特定元素。」但是他也强调「攻击」并不必然代表死亡或毁灭：「它或许是电子作战（non-kinetic）的打击，让某一器材设备失灵，或使它看不到我，或使他的通讯失去作用，这都是相当深层的打击。」

克拉克坚称这不是针对中国。克拉克在任职五角大厦的最后几个星期，与来华府访问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谈论到空海整体战。「我们说明这比较适合于伊朗式的情况……或叙利亚的情况。这不光只是针对中国；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些能力的展现。其他国家都希望可以制止这些阻碍世界运作的国家干坏事。」但是这些话中国人听不进去。中国军方领导人听到的所有有关空海整体战的概念都证实他们最坏的恐惧，对美国的意图疑惧更加深切。

南中国海地区的问题癥结在于两大强国的重大决定都立基在恐惧和偏见之上。彼此都互不信任。净评估办公室和它喜爱的智库里的预言家都很尽责，想像未来对美国全球霸业的威胁。他们不在意这些威胁是否有可能成真，重点是它有可能。詹．范．托尔在他二○一○年五月的文件中写说：「对于那些声称中、美冲突是『不可想像』的人，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从不可想像去思考』的目的是在于找出方法维持及强化西太平洋稳定的军事平衡，因而把冲突囿限在『不可想像』的范围。」换句话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及其周遭的军事优势必须维持超级强大，以至于别的国家不敢来挑战它。一旦出现可能威胁美国的优势，政治上唯一可接受的回应，就是找出新战略和武器系统去击败它。

「中国威胁」的虚与实

中国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等地域的进出构成的威胁有多么真实呢？光从数字上看就很惊人。中国现在有全世界第二大的海军舰队，以及第二大的军事预算。（美国当然在这两方面都是第一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估计中国二○一二年的国防预算为一千六百六十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幅百分之十二。註291刘华清所开始的海军现代化计划，（详见本书第三章）从一九九○年代初期由进口俄制潜艇和驱逐舰着手，现在已进入中国可以自行设计和建造军舰及武器系统的阶段。根据五角大厦每年必须提交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到了二○一四年，中国海军将拥有「七十七艘主力水面作战舰，六十多艘潜水艇，五十五艘中型及大型两栖作战舰，以及约八十五艘配备飞弹的小型作战舰」，加上二○一二年九月下水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註292

拿军舰数量与美国海军相比，更让人咋舌：美国有九十六艘大型作战舰、七十二艘潜艇、三十艘大型两栖作战舰、二十六艘小型作战舰，以及十艘航空母舰。註293中国海军舰艇集中在一个地区，美国海军则不同，其舰艇分布在全球各地。但是光从这个数字，我们看不出两军相对力量的强弱虚实。盖瑞．李（Gary Li）是最熟悉中国海军的独立观察家之一。他原本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现在是IHS Maritime註

294这家航运情报服务公司的驻北京代表。他密切检视了目前在解放军海军服役的船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他说：「相较于美国人，中国人落后了两、三个世代。美国的勃克级（Arleigh Burke）神盾驱逐舰註295凭自己就可以对付一小支海军。是的，中国人现在疯狂般的造舰，但是他们勉强才赶上美军在一九九○年代的水平。它的海军力量可能落后美国二十年之久，而美国虽然大幅削减预算，它还是向前慢慢前进。」註296

即使是话题性十足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并没有弹射器可以帮助飞机起飞、必须以滑跳甲板离舰。这代表舰上的歼15喷射机当它满载燃料起飞时只能携带较轻、较短程的飞弹，也不能吊挂电战荚舱。註297二○一三年中国媒体上罕见地出现一篇批评文章，警告辽宁号及其舰载机恐怕连越南部队的攻击都挡不了。盖瑞．李说：「海军每添了些新装备都让它看起来更接近于现代海军。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一支现代化海军。」中国海军舰队一直无法彻底解除它的根本问题。二○一三年十二月，《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文章，它指出参与最近一次海军演习的四艘军舰彼此间通过通信系统沟通没有问题，但无法建立战术资料链连线，原因是它们的资料链并不相容。註298海军舰队也缺乏无法吸引目光但攸关生死的后勤船只，以致阻碍了航母及其他舰艇远离母港作业。

实际要操作这些器械设备时又有其他问题。大部分士兵入伍时教育程度不高，基层士兵主要来自农民家庭，罕有小学以上学歷；不到三分之一军官具备大学学歷。註299新兵仍然来自徵兵制，而充员兵服役年限只有两年，使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先进技能。二○一三年五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讲话特别提到军事院校非常必要「培养实际作战人才，这是战场和作战之所需」，这显然是暗示直到讲话的当下，它们还做不到这一点。註300解放军海军缺乏现代化作战每一方面的经验。盖瑞．李说：「他们最后一次主要海战是一九七四年的西沙群岛战役。英国和美国有将近一个世纪的航舰操作经验。中方只有一年的经验。他们根本没有反潜作战或长程飞弹进攻的经验，他们甚至缺乏足够的扫雷舰。美国人只要在渤海湾布雷就可以封锁住整个北海舰队。」甚且，万一两者爆发任何直接冲突，美军很可能得到相当精悍的日本、南韩、台湾及其他国家的海军之支持。

即使是「空海整体战概念」之起草人布莱安．克拉克也承认中国海军目前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不大：「目前美国可以──透过电子战或直接攻击，或其他方式击败在当地的一切A2/AD能力。」註301截至本书截稿时，东风──21D反舰弹道飞弹尚未测试对付移动中的海上目标之能力，有人怀疑解放军是否有能力部署及整合非常复杂的声纳和导引系统──这是它需要依赖的「狙杀链」。註302五角大厦很有信心它已经可以对付这些系统。时任美国空军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赫伯特．卡利赛尔（Herbert

Carlisle）中将二○一一年九月告诉《航空週刊》（*Aviation Week*）所属的《每日航太与防务报告电子报》（*Aerospace Daily & Defense Report*）说：「我们已经以最大程度把中国的击杀链给支解掉。」註303二○一四年一月消息传出，中国二○○七年将此一飞弹的另一型号出售给沙乌地阿拉伯时，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把它全拆了，彻底地检查了一遍。註304

因此当外国首都聚焦在谈论中国军事实力日益上升时，中国军方内部的讨论却是它的相对虚弱。有位接近决策者的中国学者在北京告诉我：「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堵住它的海上交通线，但是它没有清楚的战略要如何回应。它不知道能怎么办。」然而，中国领导人心知肚明他们太幸运了。他们准备不足的军队不须面临致命威胁，中国还有时间去建设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面对未来的挑战。它享有其教条主义者所谓的「战略机遇期」—目前世界相对和平、安定和繁荣的时期。

在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文职或军人—眼里，中国整个发展全繫于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延伸得愈久愈好。北京不时会出现这一类的蛛丝马迹。二○一三年二月四日，中、日双方为了钓鱼台／尖阁群岛剑拔弩张之际，这个讯息在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白纸黑字公开亮相。《环球时报》通常对美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不假辞色大肆抨击，要求要对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採取强硬行动。因此当刘源将军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要求主战派闭嘴时，引起各方譁然。他写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已经两度因对日战争而粉碎……绝对不能再因某些意外事件中断。」他在电视上接受访问时也同样强调这个重点。

刘源可不是鸽派。他是中国前任国家主席、革命英雄（也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头号受害人）刘少奇的儿子。大家都知道他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近，即将被擢升至中国最高军事机关—中央军委。某个西方通讯社报导，他最着名的是「发表讲话和文章以鼓吹某种形式的好战的中国民族主义，摒斥西方的政治开放和公民自由的概念」。换句话说，他显然代表共产党军方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如此明显鹰派立场的将领却主张如此鸽派的作法呢？线索就在《环球日报》上这篇文章的标题：「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刘源的论据是，中国的敌人包藏祸心，想要引诱它发生冲突，以阻其坐大。在中国军事领导人心中，他们很清楚，如果中国在未来十或二十年与美国作战，它的武装部队一定会蒙羞受辱、它的经济会被围堵和扼杀。即使是小败也会给亟需正当性的政府带来大麻烦。依北京学界的看法「中国政府经不起在冲突中有小失败」。

可是这又给中国带来个大麻烦。如果南海周边邻国认为北京绝不会打仗，它的战略影响力势必大为降低。一定得让那些也主张有领土主权的对手相信中国有可能发动战争—不论它显得有多么不理性。这就是中

国「媒体鹰派」所扮演的战略角色。除了提振国内民族主义（详见本书第六章），他们在中国的战略操纵上也担任非常细腻、但十分重要的功能。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安德鲁．查布曾经深刻分析中国最着名的军事分析家—如陆军少将罗援、海军少将张召忠、空军大校戴旭—的好战言论及发言时机。他相信他们有助于培养人民的「国防警觉」（二○○一年以来法律就规定必须这么做），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对中国的对手施加压力。藉由创造出「强硬派」要求文人领导人要有强硬行动的印象，他们协助这些领导人强化谈判地位。同时，他们的好战言论能夸大中国的能力，给人中国已经准备好进攻的印象。整体思维来自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结果就出现一个互蒙其利的三角关系：一方是中国鹰派，张牙舞爪讲些动刀动枪的话，成为解放军政治作战的一环；另一方是国际新闻机构，它们晓得穷兵黩武的强硬立场可以吸引读者和观众；再者是美国鹰派，他们抓住「中国威胁」的每一片新证据来争取增加经费投入建设军备及防备中国。这一来解放军鹰派又有证据可指控美国居心叵测，遂用以强化他们在国内听众心目中的地位。北京有位学者微笑地对我说：「中国有许多人相信阴谋论，我们就假设他们故意要诱我们进陷阱吧。」另一位中国学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查道炯告诉我，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军方相信美国的话，发动军备竞赛，步上苏联后尘。我试图劝阻他们。危险的是军方会变得尾大不掉、拿到太多预算、在中国境内有太大权力。」争取航行于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之争攸关到全球权力平衡。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安危的，可能是美、中政治圈中最鹰派的两群人，他们为了争取名垂千古、万世基业的斗争，可能导致世界的毁灭。

在目前来讲，中国不太可能故意寻求公开的军事冲突：对它来讲，后果的代价会高得无法承担。败给美国会使领导人的威信荡然无存。中国可能有野心要赶走美国，但没有军事能力做得到—至少目前是如此。然而，逐渐地，双方的差距会缩小，而冲突的机会会增长。与此同时，中、美两军都藉对方之威胁享有争取预算之利。危险在于发生在南中国海的两种冲突—一个是中、美为自由进出之权利起冲突、一个是中国及其邻国为领土之争起冲突—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交互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太可能会与一个东南亚军队公开作战。即使中方打赢了，中国的外交正当性却会毁了：它所宣示的和平共处政策将被证明是谎言。但是，除了冲突之外的所有的选项都还在檯面上。某些事件，如菲律宾失去黄岩岛，或二○一四年中期中国的钻井平台进到西沙群岛附近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都成为瞩目焦点。其他事件，比如涉及到印尼和马来西亚者，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每个个案中国都动用

力量，但不是直接的军事力量。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底下的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二○一三年告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中国现在的作法是，双手放在背后、用它的大肚子把你顶走，看你敢不敢先动手。」註305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东南亚不预备信任北京的甜言蜜语。他们在做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

金色眼镜蛇

一连的美军陆战队员蜷曲在树林里，一则是为掩护，一则是为躲到树荫下。干季的气温正在上升，能够卸下一身装备，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稍微喘息。泰国陆战队比较习惯东南亚此一地区的气温和尘土，则在附近休息。从上空看下来，河谷青绿，但是底下的地理景观其实已经相当干枯。少许几棵大树掩饰了这片干枯景象。在它们树干下，上一季的青草已变得极易起火。稻田已经龟裂，苦候甘霖，农民早已离去。即使鸟儿也因为地面上有士兵在移动而躲开。一片寂静。

两架泰国F-16战机呼啸飞过陆战队员头顶。它们的目标就在前方悬崖的底下。前进空中管制员指引它们进入，用雷射锁定目标，然后等候五百磅的炸弹从机翼落下。河谷里的每个人即将亲身体会「冲击」这个字词的真正意思。短促的一道橘色火焰，头几秒钟大家也不晓得投弹是否成功，但是爆炸声一传出，那可是惊天动地，即使在安全距离之外的人也觉得震耳欲聋。烟柱冒起时，第二架飞机又已投弹，这一次更靠近悬崖：另一道火光、另一声巨响。两架美军陆战队F/A-18跟进，又投掷两颗五百磅的炸弹。目标已经歼灭。

视线以外的地方，榴弹砲也响起。半分钟后，砲弹打中悬崖下半山腰，落石纷飞。目标校正后，更多砲弹纷射而至，造成更多烟火。然后砲击停止，陆战队员奉命出动。泰军担任前锋，小心谨慎地在迫击砲火力掩护下穿过树林和田野。他们抵达预先设定的射击阵地后，开动机关枪扫射。美军在几百公尺外的另一侧前进，也加入战斗。两辆装甲车挡住他们前进，陆战队员把AT-4反坦克火箭筒架上肩膀。两枚火箭命中目标，陆战队员经过起火的车身，往终极目标挺进。任务完成！后方山头上，各级指挥官躲在观测站荫影下，还有冰冷的瓶装水享用，他们鼓掌庆贺地面上弟兄们的表现。

这场战斗只缺一样东西：敌人。没有人开火反击，悬崖那头并没有叛军，「装甲车」只是一对旧餐车。但是投掷的炸弹、打出的砲弹等等，全是可以夺人性命的真枪实弹。因为这是「联兵实弹演习」（Combined Arms Live Fire Exercise，简称CALFEX），陆战队把这个演练机会称之为「额头上的弹头」。根据定义，CALFEX是高度信任的展现。指挥官把弟兄们的性命交付到来自不同国家军队的飞行员和砲兵

手中。炸弹或砲弹落点稍有闪失，可能就会出人命。在泰国华富里府郊区这几个小时的演习，代表美、泰两国军方的紧密同盟。

这场联合打击操演是二○一二年「金色眼镜蛇」（Cobra Gold）演习的完结篇。金色眼镜蛇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七个国家派出九千多人参加：美国五千三百人、泰国三千六百人、南韩三百人。鉴于区域情势趋于紧张，东南亚国家不能不加强战备，虽然人数不多，马来西亚和印尼第一次正式参加演习。他们和新加坡、日本各派出约七十名部队。金色眼镜蛇始于一九八二年，原本是美、泰两国的联合演习，但是逐渐吸引了本地区内外其他国家来参加。二○一二年，远方的斯里兰卡和莫三比克都派观察员参与。中国解放军也接受邀请前来参观。美国人希望他们来，是有用意的。

金色眼镜蛇分成三部分：一是类似CALFEX的地面训练；一是高阶军官的「指挥所演习」（Command Post Exercise，简称CPX）；最后是争取当地社区认同的「贡献」。金色眼镜蛇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不显眼。每年数千名美军来到泰国某地区，与盟国及伙伴练习作战技能，炸了不少东西，可是却没有人眨眼。媒体会採访每年的抢滩演习，会拍摄陆战队员在丛林受训时喝蛇血的照片。美国大使馆发布新闻稿，宣布心战部队新盖或整修了几所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然后大家都打道回府，等候明年二月再相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CPX在不显眼的城市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市郊的军营苏雷娜丽（Camp Suranaree）舒适得多的环境中举行，离实弹射击靶场有一百五十公里远。我心理上有准备要吃点苦头，不料却发现这些战士以电脑和电话作战，住在旅馆里，吃在餐厅里。共同语言是英语，意即人人可以社交话家常；而且在经过一整天的兵棋推演之后，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继续玩下去。有些老鸟把金色眼镜蛇演习嚯称为「高尔夫眼镜蛇」（Cobra Golf）不是没有道理：陆军基地里有一座球场，邻近的空军基地还有另一座球场。

CPX在白色的两层楼的军官俱乐部进行。楼下的演讲厅改成「作战指挥中心」（Combat Operation Center），配置一百多个工作站：白色的塑胶椅和摺叠桌，摆上桌上型电脑，而电脑连接上支撑整个作业的「综合作战广域网路」（Combined Operations Wide Area Network）。所有的军事演习都会有想定，而金色眼镜蛇的想定最繁复。演习假设发生在太平洋中央的一个想像的岛屿上──与美国西海岸同样大小与形状。城镇的地点相同、甚至名字也相同。这个虚构的太平洋岛屿北起西雅图北方、南迄圣地牙哥南方，往内陆延伸至盐湖城和阿布奎基（Albuquerque）。差别在于这个太平洋岛屿分为北方的坏人国阿凯迪亚（Arcadia，即红军）和南方的好人国库希斯坦（Kuhistan，蓝

军），还有另四个小国：太阳岛（Isla del Sol）、莫哈威（Mojave）、索诺拉（Sonora）和黄金国（Tierra del Oro）。让情势更加复杂的是，库希斯坦里住了不少阿凯迪亚族裔，再加上本地区其他一些问题。

每年的想定都不一样。二○一二年，阿凯迪亚进攻库希斯坦，多国部队要把前者赶走。以CPX副参谋长、美国陆军上校戴夫．派克（Dave Parker）的话来说，「这是一场高端作战想定—维持和平」。派克的谈吐和他的小平头一样干净俐落。我拿中国记者已经问过的问题再追问：演习是不是针对中国？他说：「当他们来到联合作战中心，看到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并肩而坐，旁边还有泰国人、印尼人、韩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当然会关心—他们会担心我们大家交情不错，我们有能力组成一支多国部队—或许他们是应该担心。但是我认为，我们能把这么多国家凑在一起、组成一支多国部队，这就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了。」

金色眼镜蛇的指挥部演习未必都是和战争有关。二○一一年是有关人道援助和灾变急救，二○一三年也是。但是诚如派克的解释，想定几乎不重要。「我们依据一套标准作业程序来运作，一套在太平洋所发展出来的多国部队标准作业程序。维持这套标准作业程序的组织—多国规划扩编小组（Multinational Planning Augmentation Team）□□就设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简称PACOM），该小组负责协调参与这个组织套的三十四个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而且持续不断。」这套多国部队标准作业程序能够管理指挥团队之内不同单元之间的资讯分享方式，以及它要如何传递到现场指挥官—从电脑系统的设计到会议举行的程序无所不包。派克上校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工作是负责演习与训练，因此他十分娴熟这套程序。

金色眼镜蛇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本区域各个不同国家的军队，在太平洋司令部带领之下使用「多国部队标准作业程式」，练习如何以单一团体的方式处理共同的目标。他们学到的知识已经多次运用到现实情况：最明显的是二○○四年发生在印度洋周遭的南亚大海啸、二○一一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以及二○一三年菲律宾的海燕飓风。根据派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美军经由联合演习与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的关系。假设美军必须应对发生在印尼的一个灾害。那么，曾经参与过金色眼镜蛇演习的几个关键人物，因曾在这里与我们建立关系，如此就可以协助我们更迅速启动救援程式。」诚如派克所说的，想定并不重要—这些交情在未来的冲突局势和天灾中都会起重大作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其实非常特殊。它和美军分管全世界其他区域的司令部不同，自从西贡沦陷以来，在它的辖区内几乎就没有发生过战事。事实上，派克也费了一番劲才想起来它最后一次涉及的实质军事行动：一九九九年温和地介入东帝汶乱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投入不少时

间和努力在人道救援上面。派克说：「你也看见，在这个地区发生过多次地震、海啸。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绝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救灾机构。它花了极大部分时间准备万一和北朝鲜，或愈来愈有可能和中国所发生的灾祸性的对抗。救灾和作战是它任务的两大方面，却不是分别开来的功能；它们是太平洋司令部任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好面对冲突的准备，以吓阻冲突之发生。这套战略立基在三个支柱上：「建立紧密的关系」、「维持在本地区确定驻军」，以及「有效地传达意向和决心」。金色眼镜蛇吻合这三大支柱。这也是为什么要邀请中国参观。二○一四年，中国甚至正式参加演习——不过只参加人道救援行动、不参加其他作战课目。

这套作法就是二○一二年一月发表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重心。它把「作战介入」界定为「有能力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将军事力量投送到作战地区以完成任务」。这个概念的第一页开宗明义就说，击败中国战术性杀手锏的战争提前许多年即已开始：

作战介入的挑战大多在战斗开始前即已存在。因此，战斗的成功经常取决于事先塑造有利的介入条件，这需要跨部门协调一致。联合部队将透过下列种种安全与接触行动预先在冲突之前塑造你的作战地区，如多国联合演习、介入及支援协定、建立及改善海外基地、预先补给，以及部队的前进部署。

换句话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做的一切——从演习和舰队有好访问、到救援行动、学术研讨会，甚至高尔夫球赛——都是反制任何企图对美军封锁海洋的战略之一部分。它就是预先「塑造战场」，而一切关键就在建立关系。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海上也采取同样的作法。一九九五年，它发起「海上战备及训练合作」（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简称CARAT）计划，现在与东协十个会员国当中的七国每年进行海军演习。只有内陆国家寮国、原本孤立的缅甸和戒心十足的越南还未参加。但是现在越南经常接待美国军舰访问，也开始参加分析家所称之为「类CARAT」的活动。慢慢地，越南加深了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交往。二○一二年六月，美国国防部长潘内达（Leon Panetta）在参加完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后直接飞到越南，于正在利用天然港金兰湾修船设施的美国后勤补给舰「李查．布莱德号」（USNS *Richard E. Byrd*）上发表演讲。金兰湾的许多设施是美国工兵在越战期间兴建，当时金兰湾是美国巨大的运补中心。潘内达在演讲中

诚挚希望美、越两国未来更加合作。註306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不需要大型基地来开始塑造战场；它只需要能进出基地即可。美军指挥官尝尽苦头才学懂，派驻大量军事人员于亚洲社会会有许多麻烦。美军陆战队在冲绳普天间（Futenma）航空基地制造的噪音引起地方民众强烈反弹，迄今仍是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二○○二年美军装甲车在韩国压死两名女学童造成全面抗仪。驻菲律宾美军对待当地妇女的方式是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被迫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股记忆深铸人心。二○一三年十月，菲律宾巴拉望岛牡蛎湾（Oyster Bay）一座即将提供美国海军使用的新基地兴建计划公佈后，基地周边五个村长中有四个立刻跳出来反对，理由即是担心当地娼妓会增加。有些社区只要看到穿军服的老美出现，反美情绪就大为上升。军人「足迹」减少有助于意外事件降低，同时也可以省下好几十亿美元。

即使美军会设置基地，它们也将是不同型态的驻军。作为美军「再平衡」的关键元素，同时也是CARAT年度演习重要枢纽的新加坡，是太平洋司令部底下的西太平洋后勤群（Logistics Group, Western Pacific）的驻地。该单位设置在三巴旺港（Sembawang）民用货柜码头，一处由纽西兰部队依据「五国防务协议」所管辖的管制区内。只有一百五十名军职和同样数目的民间委外人员常驻在这里。註307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军港是美国两艘新一代LCS滨海作战舰（Littoral Combat Ships）在本区域的停靠港註308，意在彰显美国在东南亚海域的军事实力。即使这些官兵休假时是准许离开基地的，但平时他们只能睡在舰上的卧铺，而不能到营区内去留宿。美国可能再也不会在菲律宾设置主要基地，但是在「相互后勤支援协定」底下，菲国还是可以提供油料、补给、士兵外宿和交通等安排。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两千五百名美军陆战队因为是每六个月轮调，所以就不能称之为「常驻」。这个基地不会建设如过去在菲律宾，或今天仍在日本、韩国和关岛基地般长久进驻的居住设施。不过，一旦出现危机，军舰、飞机、弹药、补给和人员将经由这些地点移动，俾便美军把兵力直接投射到区域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介入」十分重要。

东南亚各国政府欢迎美军在本区域此一轻微的「足迹」。它大到足以展示华府持续的政治承诺，但又小到足可降低政治尴尬的风险。后勤基地比起军事基地比较不会吸引注意，也比较不会刺激外国的批评或国内的反对运动。但是轻微驻军也造成心理压力。数十年来，东南亚国家依赖美国维持周边海上安全。菲律宾明显依赖美国，其他国家则是隐性依赖美国—即使越南，在苏联解体后，也悄悄靠向美国。鉴于华府削减军事预算，东南亚各国政府明白再也不能期许美国海军像以前那样做。他们必须做好备案—这代表军火制造商可以大发利市。

香格里拉对话

当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一九三三年发表那喜马拉雅山上的人间仙境小说时，一定料想不到它会成为亚洲军事工业复合体大拜拜的名称。但是在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首次介绍给我们那个碧茵的室外桃源六十九年之后，追寻文明之路的将领和外交官们，首次举行了「香格里拉对话」论坛。

自从希尔顿从他的喜马拉雅山山区旅行首创出这个名字以来，香格里拉已经走过一段岁月。它要从一九六○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华人郭鹤年（Robert　Kuok）在全球糖业市场上大发利市说起。在马来西亚的反华意识上升之下，郭鹤年亟思把部分资产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遂来到邻近的新加坡购买不动产。一九七一年，香格里拉首次以钢筋水泥结构出现，它不是西藏的喇嘛教寺庙、而是一栋二十四层楼高的豪华大酒店。现在全亚洲已有七十二座香格里拉大酒店：商务之旅可以兼顾灵性昇华。

香格里拉转型的下一步出自于英国安全事务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和新加坡政府的一场讨论。他们觉得亚洲需要有个场合，让各国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下━譬如香格里拉大酒店━讨论战争与和平。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邀请来宾，新加坡政府负责保安事务，贊助人支付一切费用。新加坡政府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能赢得面子；部长们有几分钟在镁光灯下；而贊助人有许多机会建立人脉关系。

因此，自从二○○二年以来，每年六月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隆重举行。它的作风非常细腻。没有啸啸而过的警笛或数十辆汽车的车队，也几乎不会封路、要求交通改道。唯一会让人察觉国际会议正在进行的迹象是，人孔盖和邮筒用塑胶包上━以防有心人在旅馆的一个街廓之内把炸弹偷塞进去。酒店里的保安也十分低调。一通过金属侦测器之后，宾客可以自由地与穿西装的部长们、穿军装的将领们自由攀谈。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眼睛锐利的廓尔喀人（Gurkhas）註309保安人员穿着褐色西装混在人群之中。只有他们手持的公事包会洩漏他们的身分，这些公事包大小刚好可容他们的轻机关枪：这是保护绅士们的安全措施。这是二十一世纪的香格里拉，由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保安人员负责紧密的保护。

如果想要找大枪大砲二○一二年的对话可有不少，这要感谢以下贊助人：波音公司（它的产品有阿帕契直升机、F/A-18战斗机、C-17运输机和鱼叉反舰飞弹等等）、EADS（它的产品有美洲虎直升机、飈风式欧洲战斗机、A400M运输机和飞鱼反舰飞弹）、三菱（在日本政府放宽全面禁止军品输出的禁令之后五个月抢着来参加）、新加坡的新科工程

公司（生产骏马全地形履带车、斗牛士反装甲飞弹和无畏级巡逻艇等军品），以及另两个与国防工业无关的贊助人：日本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和财力雄厚的约翰暨凯萨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鉴于六个贊助人平均分摊一切公关费用，而麦克阿瑟基金会宣布它的贊助达二十五万美元，我们合理假设为期两天的这场盛会整体预算超过一百五十万美元。有个圈内人认为它可能接近四百万美元。

波音公司一定觉得它的贊助相当值得，因为这是它连续第十一年贊助。我们不难看出来为什么。聚集这么多关键人物住在同一家酒店里，这是攀亲带故、拓展人脉的天赐良机。二○一二年的对话期间，波音防务、太空及安全部门（Boeing Defense, Space & Security）负责人丹尼斯．缪连保（Dennis Muilenburg）安排了和十三位国防部长会谈：全都是潜在客户。对他的公司而言，每场谈话都价值连城。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海外业务现在占其部门营收的四分之一。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削减国防支出，亚洲成为重要市场。二○一二年六月，波音防务在东南亚只有一位顾客：新加坡。但是在本地区所有国家日趋富有，且益加担心国家的安危之下，威胁就意味着发达的机会。

这也正是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人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原因。公开的焦点或许是政军领袖的演讲，但是有个加拿大代表团团员在电梯里说熘了嘴，双边谈话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没有太多人来参加二○一二年对话是为了听印度国防部长谈论亚洲战略思想的典范转移，也没有人关心柬埔寨国防部长在演说区域安全时，只花了六十个字谈到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纠纷（二○一一年两国差点为此兵戎相见）。不，就大多数出席者而言，香格里拉对话的重头戏全在私底下进行。

美国国防部长里昂．潘内达的演讲快要结束时的一幕就是最好的写照。这场演讲人人都想要听。房里高朋满座，五百张座位座无虚席，四周还站满了人，大家都注意听他解释美国「转轴」到亚洲的意思。它将是各方都关心的头条新闻。但是就在他即将讲完之前，两组身穿军服的听众起身、退场。德国和越南代表团事先已排订时间要进行双边会谈，以讨论军事合作—这可比听潘内达先生最后几分钟的结论更加重要。他们带队退出，要去进行不做纪录的双边秘密会谈。根据越南代表团某个团员的说法，这只是越南人那个週末安排的十二场正式双边会谈中的一场。

二○一二年对东亚各国军方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近年来首度破天荒，它们的预算超过了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国。註310主要是因为欧洲削减国防支出，另外也因亚洲国家花在武装部队上的经费较二○一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点八：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总数高

达三千零一十亿美元。中国就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日本、南韩和台湾合计又占了百分之三十三。比较而言，较小、较穷的东南亚经济体花在本身防务上的费用不大。对南海提出主权主张的五个东南亚国家—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合计军事预算仅占东亚总数的百分之六，即一百八十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土耳其的国防支出。

本区域最先进的新加坡和泰国这两支军队，大约就占了其他全部余额。但是各国的支出快速增长。二○一二年，越南增长百分之二十、菲律宾百分之十、印尼百分之十六、新加坡百分之五。马来西亚和汶莱略有降低，但那是因为它们二○一一年的基期数字较高的缘故。对于寻求弥补北约组织欧洲会员国二○○六年以来已削减百分之十一经费的军火商而言，这里是值得开发的市场。

晚间在香格里拉的酒吧间里，军火商的代表在聊天时开玩笑地说要向中国领导人敬酒，因为能够达成销售业绩全靠他们帮忙。如果说美国对于介入的关切刺激了中国对安全的关切，那么，中国力求巩固自身的安全，却导致人人都感到不安全。

一九九二年底，中国通过领土法主张对南海岛礁拥有主权，也批准克瑞史东在越南外海海域探勘权之后不久（详见本书第五章），印尼大张旗鼓地一口气买下三十九艘前东德海军遗留下来巡防舰、两栖舰和扫雷舰等约佔后者原实力三分之一的船舰。註311这些军舰现在都老旧了，而且它最大的六艘军舰是高龄六十岁的前荷兰巡防舰。印尼海军愈来愈没有能力保护国土安全，而中国船只又频频侵入其水域。印尼唯一称得上现代化的军舰是四艘荷兰制小型护卫舰（corvette）和五艘南韩制两栖登陆舰，剩下的就是约五十艘巡逻艇和四艘小型飞弹快艇。以一个由一万三千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国家而言，印尼似乎没有太重视它的海上部队。印尼没有空中预警系统，由于缺乏空中加油能力，也无从延长军机做海上巡逻，只有最基本的指挥及管制系统。註312它之所以能够拥有一套岸置及舰载雷达所组成的「整合式海域观察监视系统」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美国人负责支付维持费用，美国国务院端出来的表面理由是对付「海盗、非法捕鱼、走私和恐怖主义」。註313

印尼军方是出了名的贪污腐败，它的武器採购需求与预估可能面对的挑战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二○一三年八月，它同意出价五亿美元向波音公司购买八架阿帕契攻击直升机。二○一二年，它向德国买进一百零三辆封存的主战车，外界搞不清楚这两套武器系统对印尼的作用究竟何在，它们肯定无法在主张海上权利事帮上忙。大型的现代化海军建设计划，一再因预算困难遭到拖延或中止。印尼曾有意购买全新的俄罗斯建造的潜舰，但被迫改买较为便宜的南韩潜艇。本书截稿时已有三艘正

在建造中，同时也讨论再购买几艘的可能。但原规划向俄罗斯购买一艘退役驱逐舰，及汶莱购买三艘近海巡逻舰（OPV）的计划业已取消。然而，惧于中国对海洋的野心，终于驱使印尼政府开始购买一些小型的船舰，它们诸如EADS的「飞鱼」、俄国「宝石」，以及相当讽刺的由中国设计却在印尼获得授权本国制造的C-802等反舰飞弹。

菲律宾现在又旧调重弹说要现代化它的军队，就像过去每几年都爱叫一叫，然后才发现钱已经被乱花掉了。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现况比起一九九五年时还更糟，当时参议院国防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奥兰多．梅卡多（Orlando Mercado）告诉《远东经济评论》说：「我们有空军，但是不能飞；我们也有海军，但是不能出海。」註314菲国海军两艘排水量最大的军舰是从美国海岸防卫队退役的巡逻舰移交过去的，排在后面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下的老古董，其他船只大多是英国或南韩除役的小型巡逻船。对于是否採购两栖作战船舰和巡防舰的辩论已经持续多年，迄本书截稿之际尚无定论。日本借款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给菲律宾购买十艘新的海巡舰，但它们是执法船只，并非海军军舰。菲律宾空军有几架直升机和运输机，最后一架喷射战斗机已在二○○五年除役。菲国空军宣佈计划斥资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向南韩购买十二架新的FA-50喷射战斗机，但是飞行员要能飞利用这些飞机执行作战任务，恐怕还需要等上好几年。南韩在二○一四年五月宣佈将捐赠一艘船龄三十年的小型护卫舰给菲律宾，以做为交易成功的赠品。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就懂得策略性地规划预算，以为海巡和海军分别建立一支巡逻艇队，和购入大型军舰。马国海军现在有两艘法制潜舰，驻在婆罗洲的沙巴亚庇市的海军基地，靠近马国外海的油田。二○一三年十月，当中国海军在曾母暗沙附近进行大型海上操演之后的七个月，马来西亚宣佈将在离潜舰基地不远的民都鲁（Bintulu）□□离曾母暗沙最近的港口──派驻一支陆战队。这支部队需要新装备，如至少一艘新的两栖作战舰、登陆载具和直升机等。马来西亚在本区域还面临另一个潜在威胁：苏禄苏丹（Sultan of Sulu）后裔还咬定对沙巴拥有领土主权，他们在二○一三年初发动一场迷你入侵，杀害十五名马来西亚人，但这跟马国购买潜水艇并没有任何关系。

越南投下的军事花费没有马来西亚多，但是集中在越南版的「杀手锏」上：价钱较低的装备，却拥有足以对相当强大的对手构成伤害的潜力。二○一四年初，越南接收了它向俄国购买的六艘新潜舰中的第一艘。它也採购了两连俄制岸基反舰飞弹系统，和以色列制射程一百五十公里的弹道飞弹，同时也将在当地生产俄制的「天王星」（Uran）反舰飞弹。盖瑞．李的观点认为，倘若在争议地区发生战事的话，越南将处在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海军赢不了。太危险了。如果他们派一支舰

队经过越南外海，基本上那是个活靶场。越南人已经有了全新的K-300P反舰飞弹、基洛级潜舰以及小型的攻击船只。如果越南船舰受损，它们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返航。如果中国船舰受伤，它可是离家一千英里；解放军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大型海军基地。」註315

东南亚相对小规模的武器采购称不上「军备竞赛」。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支出都不可能和中国竞争。但是它们显然都设法透过取得可以伤害强大舰队的武器来吓阻不受欢迎的海军活动。东南亚各国想在南海对具备联合作战能力的解放军海军实施对抗的话，这些国家的能力是不足的。但是在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先开火的情况下，光是部署足以威胁的军力，或许就可以打翻掉中国海监船在「U形线」内阻止钻油船作业的均势。当然有一个未知的因素，我们不清楚中国海监船受到挑战时，中国海军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很可能是导致双方从对峙状态快速演变成公开冲突的起火点。

美国官方对领土争议不持任何立场。它认同英国参谋首长一九五○年对这些岛屿的看法。「南沙群岛没有丝毫的战略价值……只要我们维持住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敌人在战争中占领它们也不会是严重的战略威胁。」註316一旦发生冲突，孤零零的营舍会成为从远处发射的导引飞弹的活靶子。美国的问题是它还能有多久「维持住对南中国海的控制」。目前尽管对中国兵力增长讨论沸沸扬扬，美国的阵脚似仍稳定。然而，总有一天，中国的能力将羽翼渐丰，届时北京领导人将会希望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它的后院，就和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把英国赶出加勒比海一模一样。

在此同时，冲突倒是比较可能是由于中国和其中一个邻国，因为主权争议事件中的误判情势而爆发。中国当局会对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汶莱和菲律宾外海钻油和捕鱼行动採以实质的军事力量去制止吗？这些国家会动用武力维护他们的权利主张吗？中国政府和百姓打从小学起就被灌输认为九段线是中国不容争议的国土疆界线，言论上已被锁定誓死保卫国土，他们会觉得别无选择、必须开火吗？东南亚国家会试图拉美国下水吗？美国会认为情势发展已威胁到它的「航行自由」而介入吗？各国仍然有许多选择，但是南中国海的战场已经形成。

註280：Quoted in J.M. Van Dyke, ‘Military Ships and Planes Operating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Another Country’, *Marine Policy*, vol. 28 (2004), 29–39, esp. 36.

註281：Dennis Mandsager, ‘The 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 Policy, Procedure,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72, 1998, 113–27.

註282：‘Short Term Energy Outlook’,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8 Octo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ia.gov/forecasts/steo/outlook.cfm＞.

註283：见《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註28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17 January 2012. 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註285：Jason E. Bruzdzinski, ‘Demystifying Shashoujian: China’s “Assassin’s Mace” Concept’,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Civil- 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Elites, Institutions, and Idea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issued by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309–64. Available at ＜http://www.mitre.org/publications/technical-papers/demystifying-shashoujian-chinas-assassins-mace-concept＞.

註286：Nan L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 in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2011), 109–40.

註287：Wendell Minnick, ‘PACAF Concludes 2nd Pacific Vision Exercise’, *Defense News*, 17 November 2008.

註288：译注：已定于二○一五年退休。

註289：Greg Jaffe, ‘U.S. Model for a Future War Fans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Inside Pentagon’, *Washington Post*, 1 August 2012.

註290：个人电话採访。29 October 2013.

註291：Information from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released 15 Apr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註292：‘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y 2014.

註293：US Naval Vessel Register. https://www.nvr.navy.mil/

註294：译注：IHS Maritime与世界知名的《詹氏防务週刊》同属一家母公司。

註295：译注：美国海军旗下一种配备了神盾战斗系统和SPY-1 3D相位阵列雷达（SPY-1D multi-function Pass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radar）的多功能驱逐舰，是当今世界上性能最强大的驱逐舰。第一艘勃克级驱逐舰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下水。

註296：个人採访。Beijing 8 November 2013.

註297：Wendell Minnick, ‘Chinese Media Takes Aim at J- 15 Fighter’, Defense News, 28 September 2013.

註298：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China, ‘Military Forces in Urgent Need of Standardization’, PLA Daily, 10 Dec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2-10/0330753805.html＞, translation available at ＜http://chinascope.org/main/content/view/5995/105/＞.

註299：Roy Kamphausen, Andrew Scobell and Travis Tanner (eds), *The ‘People’ in the PLA: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Military* (report issued by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8). Available at ＜https://press.armywarcolleg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13&context=articles_editorials＞.

註300：‘PLA Chief of General Staff Stresses on Cultivating [sic] High- quality Military Personnel’, *People’s Daily Online*, 31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86/8265768.html＞.

註301：个人电话採访。31 October 2013.

註302：Barry D. Watts, ‘Precision Strike: An Evolu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2 November 2013.

註303：David A. Fulghum, ‘USAF: Slash and Burn Defense Cuts Will Cost Missions, Capabilities’, *Aerospace Daily & Defense Report*, 30 September 2011, 6.

註304：Jeff Stein, ‘CIA Helped Saudis Secret Chinese Missile Deal’, *Newsweek*, 29 Januar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week.com/exclusive-cia-helped-saudis-secret-chinese-missile-deal-227283.

註305：Jeff Himmelman, ‘A Game of Shark and Minnow’,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3.

註30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dia Availability with Secretary Panetta in Cam Ranh Bay, Vietnam’, News Transcript, 3 June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2012/06/03/media_availability_with_secretary_panetta_281564.html＞.

註307：‘SECNAV Visits Logistics Group Western Pacific and Navy Region Center Singapore’, Naval News Service, 8 August 2012; Ian Store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014.

註308：译注：目前只有固定一艘，最快要到二○一八年会到四艘。

註309：译注：来自尼泊尔、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民族。

註310：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Balance 2013 Press Statement’, 14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iss.org/en/about%20us/press%20room/press%20releases/press%20releases/archive/2013-61eb/march-c5a4/military-balance2013-press-statement-61a2＞.

註311：Michael Richardson, ‘Indonesia to Acquire One- Third of Navy of Former East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5 February 1993.

註312：Benjamin Schreer, ‘Moving beyond Ambitions? Indonesia’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moving-beyond-ambitions-indonesias-military-modernisation/Strategy_Moving_beyond_ambitions.pdf＞.

註313：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oD- funded Integrated Maritime Surveillance System’, *Fact Sheet*, 18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11/177382.htm＞.

註314：Rodney Tasker, ‘Ways and Means: Manila plans an expensive military upgra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1 May 1995, 28.

註315：个人採访。Beijing 8 November 2013.

註316：Stein Tø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1–57.

第九章　合作与对抗：如何解决纷争？

鲔鱼的国界

据说「布鸟」（Sarimanok）註317会应许信徒的愿望，但是这趟航行牠并没有太照料艾瑞克．帕洛邦（Eric　Palobon）。通常运气好的话，他的渔船可以捕获三十只鲔鱼，最大的有一百公斤重。这次他只捕获六只，最大的只有六十公斤重。船首画的这只神鸟帮不了忙，无法让海上苦缺的鲔鱼增多。艾瑞克是南岛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传人，他的渔船充其量只是一艘高舷的独木舟，两侧伸出长竹竿支架以求在南中国海的怒涛保持平衡。轮机房看来可容三个人，但是艾瑞克说，过去两星期船上共有十二人，大家靠些米饭和捕来的鱼勉强餬口。头顶上一根船桅撑起帆布，而帆布可以降下、像个大帐篷遮蔽整艘破船遮蔽烈日、挡风遮雨。但是船只缓缓开进马尼拉湾时，船员已收起帆布，挂上了洗过的衣裤。

船慢慢滑靠向码头，已经有几个小男孩跳进污水中希望能帮忙卸货赚几文小费。鱼贩也凑上来，预备讨价还价。船员往岸上抛出一条缆绳，慢慢地把鲔鱼往岸上送。小男孩们帮忙把巨大的黄鱼往纳沃塔斯（Navotas）渔港的大堂送进去。马尼拉都会区一千两百万居民所吃的鱼，有百分之八十来自这个鱼市汤。这是这个以鱼为主食之一的国家最大的渔港。註318艾瑞克预期他捕到的每条六十公斤重的鲔鱼，每公斤可卖到两、三百披索：换句话说，十二个人忙了两星期一共可赚到一千六百至两千美元左右，平分下来每人每天所得十美元。不错了──大约是全国平均所得的两倍。

菲律宾是捕捉黄鱼、鲔鱼的好地方。牠们每年六月至八月，从南中国海游入苏禄海，然后在八月至十月又从岛链的一些相当狭窄的空间穿过。美国超级市场货架上的鲔鱼有四分之一来自菲律宾。註319这个渔港的确常有大鱼贩售。离开艾瑞克的破船不远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鲔鱼事业。「洛札达湖号」（*Lake　Lozada*）比它大了许多，现在却无法出海。我们看得出来，它的船身原本是蓝色，但是现在已经全锈蚀了。就在吃水线上方，锈蚀甚至已经在金属上穿了大洞。从船首的鱼叉平台判断，这艘船原本是日本人的捕鲸船，但是现在看来什么鱼也打不到了。据它的船员说，洛札达湖号曾经有过光辉的一页歷史，它曾经出海一年，每天可捕到三百至五百只鲔鱼。顺利的时候，还曾经高达两千只！每隔一天，接运船开来和它会合，载走渔获、送到岸上的罐装工厂，以免阻滞它的捕鱼作业。

没有人晓得南中国鲔鱼存量的确切状况，因为周边国家一直不能取得协议进行适当的调查。在他们眼里，允许别的国家共同管理鱼存量，会有增强对手声张主权的风险。在此同时，危机却迫在眼前。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er）这个跨政府组织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宗旨正是试图解决这类问题，它提出了最可靠的估计。它只能计算渔获，没办法估算海里还有多少鱼。二○○一年，本地区渔民捕获鲔鱼的总数量是八十七万吨。到了二○○八年，数字激增到一百九十万吨。这代表东南亚整体渔获量的百分之十四。註320但是到了二○一○年，鲔鱼渔源渐枯，渔获量降到一百六十万吨。

不仅是鲔鱼渔获量降低，其他鱼种也都一样。南中国海沿岸有五亿人口，当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变得更加富裕之下，他们对鱼的需求急剧攀升。愈来愈多鱼从海中捕获之后，要再捕仍在海中的鱼却愈来愈难。一九八○年，菲律宾註册登记的捕鱼业者有五十八万四千人，到了二○○二年，增加为一百八十万人。同一时期，小型内河渔民平均渔获量从二十公斤降低至二公斤—勉强仅堪餬口。註321中国的国民所得从一九七○年往二○一○年一路攀升，每人每年吃的鱼增为五倍，达到二十五公斤。国家日益富裕，鱼的消费数量有增无已：印尼是三十五公斤、台湾是四十五公斤、日本更高达六十五公斤。令问题更加恶化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成为主要的渔产出口国。虽然中国供应的鱼百分之七十是水产养殖，它的海洋渔获量却增为四倍，从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万吨增加至一九九八年的一千二百万吨，而根据中国官方统计自后即维持在此一水平。註322数字会持平，加上每年渔获量吻合宣布的目标，令一些专家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特别是二○○八年国家海洋局一份报告估计可永续的渔获量只有八百万吨。渔获量增加，存量当然该下降。

新加坡拉加惹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张洪洲（Zhang Hongzhou，音译）对这个问题的发展有研究。他发现官方试图透过立法与补贴来降低中国渔船船队的规模，却告失败。现在不仅船只的数量比一九九八年政策实施时来得多，它们还更大型、更有力。一九八八年时，中国九成的渔船在内河捕鱼。到了二○○二年，比例已降到百分之六十四，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渔船出海捕鱼。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到了二○○六年，广东省六成渔获来自外海。根据官方统计，整体来讲，中国的渔获总量没有增加—但是中国从远洋的渔获量增为三倍。当中国渔船愈来愈往远洋捕鱼，他们愈来愈会遭遇到其他国家的海巡船只和船员。中国传媒在过去二十年报导数千起中国渔船遭到骚扰的案例。註323

其他国家的渔民情况也一样。自从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国为了让鱼群能休养生息，规定在南沙群岛以北地区（即北纬十二度以北）每年五

月至八月禁止捕鱼十个星期。固然禁令本身吻合保育意识，由于它是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导致其他国家无意配合，因为他们担心默认会被解释成承认中国的主权权利。结果是每年有许多越南和菲律宾渔民闯入禁区捕鱼，中国海事当局决定基于主权及保育鱼群而要执行规定，以致冲突日益增多。中国当局大声宣传这套禁令对本国渔民冲击甚大。根据官方传媒报导，二○一三年它影响到海南省註册登记的九千艘渔船和广东省註册登记的一万四千艘渔船。遵守规定留在港内不出海作业的渔船，因为损失收入，政府发给补偿金；当然其他国家渔民没有份。註324

可是，禁令并不适用于取得官方特许可以在南沙有争议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这个讯息很清楚——开到有争议的地区去，升起国旗，尽情捕猎鲔鱼吧！中国渔民若是将渔船升级，可以走得更远、开到南沙群岛，他们将得到政府补助款——引擎愈大、补助金愈多——而且船东每到南沙群岛作业，还另有补助。註325二○一二年八月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一则报导形容中国官员如何到海南岛的潭门港鼓励渔民前进南沙群岛。註326二○一二年禁渔期间，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一支规模空前的渔船队到南沙群岛：共有三十艘船，其中之一是三千吨重的补给船。记者们获准随队採访，俾便把消息报导出去。二○一三年禁渔期间，又有三十艘船组队浩浩荡荡而下，渔业厅长黄文辉告诉新华通讯社说：最终目标是「找出方法有系统地开发公海资源」。南沙群岛周边因捕鱼而起冲突，是在中国沿海地区渔捕过度的结果，何况又有刻意开发新供应来源的政策。

然而，这个政策忽视了一个明显的现实，那就是其他国家渔船队为了餵饱本国日益增加的人口，在南沙群岛已经过度渔捕。早在一九九四年，研究人员发现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海岸外某些岛礁，已经很难捕到成熟的大鱼。註327即使渔获量稳定的地区，捕鱼花费的劲道比以前要更多。一九九五年至二○○五年之间，沙巴外海的鱼存量下降百分之七十。暹罗湾已经发出警讯。早在一九九○年，经过二十年的过度渔捕之后，渔民们已经说他们捕的鱼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废物鱼」。在本国海域无法赚到可靠的收入，泰国渔民开始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出名的越境捕鱼者，每年有数千人闯入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捕鱼而遭到逮捕。註328南中国海正在走向同样的命运，有五亿人口的粮食供应会受到威胁。宏观规模的统计模式显示，一九六○年至二○○○年之间，大型鱼的存量下降超过一半。以前除了在非常深的地区，南中国海到处都是鱼。现在大片大片地区已经无法进行商业性打捞。本区域唯一渔源仍丰富的地区是在汶莱外海——这里有许多钻油平台，阻止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捕鱼作业。我们能做些什么？海上争议能先解决，以免鱼群绝种吗？

约翰．麦克马努斯（John McManus）教授研究南中国海水族生物

已有二十年之久，现任迈阿密大学全国珊瑚礁研究中心主任。麦克马努斯相信繫争诸岛扮演极重要角色让整个南中国海还活着。鱼群在这里下卵，然后洋流把牠们的幼苗送到各地方。他告诉我说：「南沙群岛的珊瑚礁地区有全世界最多样化的各种鱼类。周遭的海岸线已经高度的过分渔捕，很可能某些鱼类没有灭绝是因为从南沙群岛和从南中国海其他偏远岛礁偶有幼鱼涌入的缘故。」多年来麦克马努斯教授力主为了全区域福祉，应该把南沙群岛划为海洋生态保护公园。如果能打造一个巨型的「鱼类復育场」，这个「和平公园」可以提供足够鱼苗，帮助其他地区的鱼类復育，前提当然是其他地区必须「永续性质」的捕鱼，不过度捕捞。

近年曾有人试图建立类似的东西。二○○一年三月，南中国海全体主张国家同意搁置争议，共同参加耗资三千二百万美元、由联合国环境计划（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领导的「扭转南中国海及暹罗湾环境恶化趋势」（Revers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re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ulf of Thailand）计划。这个计划由二○○二年持续到二○○八年，做出相当成绩。可是它的最后评估却很哀伤地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让中国和马来西亚参加需要多边协定的议题，尤其是跨国界的鱼存量问题。」註329麦克马努斯证实这件事。他告诉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使得南沙群岛的问题不会在这项计划中正式提起。」联合国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发展出涉及一国以上的计划项目，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更是一事无成。原本计画的目标──在海上建立「避难区」以保护鱼群下卵、繁殖──功败垂成。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表决贊同「和平公园」的构想，而依照麦克马努斯的说法：「在所有主张国家有许多科学家和环保人士非常支持，尤其是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问题在于官方层面。虽然菲律宾总统罗慕斯曾经一度表示支持，但是只有台湾政府正式贊成。麦克马努斯叹息说：「大部分政治领袖不愿意就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对话。地底下可能有石油也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不过大家也都晓得沿南中国海大陆棚地区的石油，比起在南沙群岛深水地区的石油更丰富，要取得的代价也更便宜。」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很难乐观各国会合作以防止南中国海鱼群完全灭绝。

理论上，鱼群存量应该比石油和天然气更容易管理，理由有二：牠们可以生生不息，而且牠们会移动。一个国家没有道理去想要管控会移动的鱼群。全世界各地区都有成立区域性质的渔业管理组织，以便各国合作监督大家都依赖的鱼群存量。在东南亚地区，有最优秀的研究及保护鱼群存量的记录之组织是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中国很容易可以加入，但是它选择不加入。鉴于它过去不愿加入类似的区域倡议，在未来

它似乎也不太可能参加。北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渔业协定。它在一九九七年与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在二○○○年亦分别与南韩、越南签署渔业协定。二○○五年，它在「菲、中渔业共同委员会」中也举行一轮谈判，但是后来没了下文。註330重点在于涉及南中国海的任何议题，中国都不愿进行多边谈判。越、中协定只适用于东京湾，因为这一水域的争执只涉及中、越两国。但是鲔鱼哪里懂得尊重国际疆界？因此双边协定解决不了问题。南中国海周边所有国家都靠价廉物美的鱼鲜来餵养人民。没有任何协定来保护鱼存量，大家又争相进行短期渔捕，使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有陷入爆发重大粮食危机之虞，穷人更会饿肚子。如果中国及其邻国没办法就避免老百姓饿肚子的必要之举取得协议，又怎能期待他们就主权和领土等大问题取得协议呢？

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

南海周边各国若能就主权与领土达成持久性的协议，可以解决本区域许多争执，受惠者可不只是菲律宾。亨利．班苏托（Henry Bensurto）身为海上及海洋事务委员会（Commission on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秘书长，是菲律宾对南中国争议政策背后的主脑。他的文质彬彬和黑色眼珠掩盖了其坚强的决心。他努力争取、好不容易说服菲律宾当局修订吻合国际法规则的海上权利主张，然后在无数次的国际论坛为这些主张辩护，已经使他原本一头乌黑的头髮隐现斑白。班苏托对国际法有信心：他认为它可以恢復南中国海和平的机会。在他的引导下，马尼拉把它的领土主张的根据改了，捨弃原来说是菲律宾承继托玛士．柯洛马「发现」岛礁（见本书第三章）的前提，改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二○○九年，他促使菲律宾订定一部新的「基线法」（Baseline Law），终结菲律宾对柯洛马巨大的多边形「卡拉扬岛群」的主张，回归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二○一一年，班苏托提出一个新希望，倡议成立「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

这一倡议的精髓是各个主张国先澄清哪一部分海域有争议、哪一部分没争议，然后才设法解决争议。争议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领土争议」──即南中国海每一陆地地貌合法「所有权」的问题。第二种是「海上疆界争议」──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地貌能产生多大的「区域」。如果国际法院裁定某个岛屿可以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它可以取得最高两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法院裁定它只是「岩块」，不能支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那它只能有十二海里的领海、不能有专属经济区；如果该地貌依其自然状况，在涨潮时被淹没在水下，它就根本不能有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班苏托和前人不一样，他决定先处理第二个问题。他提议先把有争议地区「圈围」起来，也就是先确认哪个地貌或

许可能产生十二海里的领海，然后围着它们划出相关疆界。接下来他试图划出可能的专属经济区界线。援用国际法院二○一二年就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之间岛屿争议做出裁判的先例，他假定法院非常不可能给予繫争岛屿「向外」的专属经济区—换句话说，朝向周围国家的海岸。这会把「争议地区」缩小到仅限于岛礁附近的海域。它就可以「圈围」起来—等候日后讨论—因此菲律宾和所有其他岛礁国家就可以先开发他们外海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繫争国家稍后可以就「圈围」起来的地区试图达成某种解决或合作方案。假如法院裁定任何岛屿可有完整的专属经济区，那它就吞下大部分的圈围地区。

从表面上看，「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的方案提出了一条十分合理、理性的路可供依循。唯一的问题出在—它是由菲律宾所倡议的。贝尼格诺．艾奎诺出任总统之后，菲、中关系逐渐生变，二○一二年中，为了黄岩岛事件而撕破了脸，到了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马尼拉宣布它要把班苏托的计划提到国际法庭，更是沉到谷底。菲律宾已要求常设仲裁法庭就班苏托计划的重要部分做裁示：「九段线」是否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占领的八个地貌之中的五个，应否被认为淹没在水底，因此就不能产生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中国占领的另三个地貌是否只是岩块，因此不能主张有专属经济区；以及不问外海存在其他被占领的地貌，菲律宾是否享有完整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

中国拒绝参加仲裁，但是法庭还是展开法律程序，而且可望在二○一五年做出裁判。然而，法院没有力量执行其裁定。代表菲律宾的美国华府律师保罗．芮克勒（Paul Reichler）也很清楚这一点。一九八六年，他代表尼加拉瓜政府在国际法院告赢美国。国际法院裁定，美国支持尼加拉瓜游击队（Contra）叛军和左翼政府作战，并且在其港湾布放反舰水雷，是非法行为。美国根本不理会这项裁定。它资助右翼政治联盟在一九九○年赢得尼加拉瓜大选、重掌政权，两年后，右翼政府取消对美国的求偿。菲律宾在这个案子上若是赢了，恐怕也是空欢喜一场，只不过班苏托将来和中方代表谈判时，至少还有一把新剑可以挥舞。然而，就在菲律宾方面试图透过法院澄清其国际法理情势之同时，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头，中国思想家也在设法改变问题。

U形线的意义

在海南岛海口市东方，车程约半个小时的一座红砖大楼园区里，有人正在为南海问题伤神。园区既像一所大学、又像是海滨度假村；事实上它距离南中国海海岸一些真正的海滨度假村也不远。它的周遭环境或许可以用来隐喻中国对南海的态度。处女地经过丈量、开发，变成渴望发达致富的新贵的华厦。豪华公寓、有钱阔佬的度假别墅，从沙丘和水

田中冒出。就在这片国家推动的房地产开发荣景中，中国南海研究院矗立其中，院长吴士存就在两栋大楼之一办公。

近年来，吴士存博士已经成为中国南海外交的代表人物。他那整齐的髪式、灿烂的笑容，是华府的工作坊、新加坡的研讨会会场一景。他提出坚定的路线来护卫中国在南海「不容争议的」主权，但是他的言谈也透露官方思维中的细腻含意。他有无懈可击的政治背景担任这份工作。他从南京大学共青团副书记出身，后转调海南省党委，担任海南省外事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逐步晋升。他显然获得充分授权，可把党的官方观点介绍给海外访客。一九九六年，海南省成立新组织「海南南海研究中心」，吴士存出任主任。二○○四年，北京的外交部决定善用吴博士的技能，提拨额外经费及官方贊助，把这个单位升格为国家级智库南海研究院。二○一一年，它从海口市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迁入海滨的新园区。

南海研究院并不是中国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的唯一机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主管中国海警局的国家海洋局之下辖单位）也钻研中国主权主张的法律与歷史依据，以及更广泛的海上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归属国家安全部管辖）则专注其他国家对南海议题的作法。不过，这两个单位都比较不为人知。南海研究院则十分好客。它宽敞的园区致力于以舒适的环境向外界传达中国的讯息。它有一个可容两百人的大礼堂、一个可容一百人的会议室，加上几间小型研讨室、教室、贵宾室、接待室和一间出版室、几间展示室。顶楼是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供来访的学人及作家使用。另一座副楼有大、小餐厅，十三间来宾卧室（配备液晶电视、浴袍和高档的卫浴用具），而它的顶楼是国宾套房，有自己的出入口供正室或情妇进出。研究院的四十名研究人员则在三间大办公室上班，每天有接驳巴士接送上下班。

吴士存的办公室位于四楼，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忌讳「四」和「死」同音、认为「六」代表「禄」比较吉利，因此大楼没有四楼、五楼，吴博士是在六楼办公。这个迷信的共产党员享有半独立的地位。他受外交部重视，可是他不是外交部官员。实质上，他得到特许可以测试新点子，或寻找能够化解纷争、却不须北京政府做出任何承诺的新方案。他的意见可能只是各家争鸣中的一个声音，却能让我们理解到北京领导人考量的一些选项。吴士存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坚定的意义大过乐观。他坦率表示：「在近期的未来，不可能解决主权问题。」—承认其他国家不为中国的歷史说或法律说所动。

二○○九年五月七日，中国在提交给联合国大陆棚划界委员会的文件，把「U形线」地图做为附件之后，即承受各方压力要它澄清「U形线」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国不同的机关对它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二○一

一年四月，中国外交部递交给联合国的另一封官方信函，只提中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及其邻近海域有不容争议的主权」。它没有提到「U形线」。可是，原先的中国海监总队和中国渔政指挥中心（它们在二○一三年合併为中国海警局），二○一一年、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的行为，以及中海油二○一二年六月在越南外海批给开探权的决定，都表示这些机关把「U形线」解释为对整个区域具有领土主张。

中国其他机关的公开声明使得情势益加难以解决：「U形线」益发受到中国人重视。譬如，在中国印制的每一份地图都必须经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核定。即使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想要标出它在中国哪个地方工作，除非印出「U形线」，否则它的地图也不准印行。註331二○一二年四月起，中国发放的每一份护照都印上「U形线」。虽然「U形线」的确切意义未经公开澄清，许多中国人就是认定它描述的是领土主张。若是从这个立场退却，必会激起国内强烈批评。然而，南海研究院似乎想要测试外国组织和政府的水温，看看海外对不同方式会有什么反应。目前的起点是坚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字、声明中国的主张，有如亨利．班苏托在菲律宾的作法一样。吴士存博士说：「依我的看法，九段线应该是代表在这条线之内所有地貌及邻近水域所有权的一条线。我在国际会议上也说明过，中国从来没有主张在线内的整个南中国海都是它自古以来的水域。」

外国观察家一直关切，认为中国决策者可能达成一个结论：如果中国不能在国际法的规范中成功保卫它的权利主张，它可能会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中国决策者也不敢贸然破坏游戏规则。它会摧毁数十年来以「和平崛起」论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审慎外交。南海研究院似乎与国家协调一致的作为同步，试图把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摆在国际法框架内。它是吴士存博士现在公开讲话时的言论。这是很艰难的一项工作，目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菲律宾向常设仲裁法庭的投诉成功，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裁示其主张权利极小或不存在，它的策略会完全毁掉。

因此南海研究院开始研究更细緻、但也更深奥复杂的法律备案。二○一三年十月，南海研究院召开一项国际会议，调查中国是否可以即使不提出主权主张，就利用「歷史权利」（historic rights）的法律概念来主张九段线内的资源。吴士存博士承认这里头仍有争议。「它还有争议。很难就这个问题得出共识。有些学者说，歷史权利只是在这些地区捕鱼活动的权利。它需要再进一步研究，这个地区的捕鱼权、航行权和天然资源的开发。中国应该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且也以累积的基础享有歷史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本没提到「歷史权利」。这

个概念被刻意排除在公约条文之外。为了强化它的论述，中国政府必须在国际法中另闢蹊径。

在这方面努力的并不只有南海研究院。二○一三年一月，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他也是国际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the Law of the Sea〕法官）和清华大学国际法教授贾兵兵发表一篇冗长的学术论文，主张「U形线」在国际法上的确有基础。註332他们不像南海研究院的研究集中在「歷史权利」（historic rights）上，改用不同的论据主张中国对此一水域有「歷史性权源」（historic title）註333。用两位作者的话来说：「九段线并不牴触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担的责任；它反而补足了公约的规定。」—换句话说，即使「U形线」被裁决不吻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仍然在国际法的其他方面有根据。北京有位法学专家不愿被提名道姓，他对此做出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言表明，公约无意包罗网尽。习惯法和国家实务仍然必须被参考。」对于菲律宾提出的案子，这可能就会有问题了。「菲律宾案子的前提是国际海洋法只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不论对岛屿是怎么下定义，总是先有权源（title）的问题。」这位专家的观点是，常设仲裁法庭在它能就地貌的地位做裁决之前，需要决定是否需要另一个法庭裁示主权的问题。这会完全打乱亨利．班苏托的策略。

这些论述其实还是有争议。它们还是依据对歷史的了解，而且基于民族主义的感情更甚于歷史的证据。例如，高之国的文章有一段话：「南中国海自从远古以来即为中国渔民和航海家所知。」可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可是，中国会做出努力，就足证中国政府十分努力，固然要留在现有的国际法框架里，但同时也要审慎思考如何保卫国家在南中国海的权益。

广泛地讲，中国的权益可分为四大部分：一种对南中国海「歷史性权源」的意识、又加上民族荣耀的需求；需要有「战略纵深」以保护中国沿海城市；渴望战略进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公海有保障；以及希望取得南中国海的资源—尤其是鱼群及碳氢化合物。这四大议题在中国国内各有不同的权力山头在背后撑腰。例如，尽管中国外交部或许愿意承认反对中方主张的法律论述的力量，但解放军、国家海洋局、中海油和有大型渔业的各省很有可能不同意。在中国政治体系内，外交部地位并不高。有位专家评断，在五十个最重要的国家机构中，外交部只名列第四十位。註334就实务上而言，外交部在北京最高层的决策机关中，其影响力明显小于它的官僚对手。

这些部会和国家机关透过持续的游说行动，不论是争取国家经费、赚取更多的利益，或是促进地方就业，拼命维持他们在中国政治体系内

的权力。他们全都善于编纂他们的论述以赢取中央领导人的青睐。要把他们的主张契合中国争取南中国海资源的「迫切性」，一点都不难。当中海油二○一二年五月启用它极度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HS981）时，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宣称它是「中国移动国土的一部分，也是推动国家外海石油产业发展的战略武器」。註335他没有提到这个钻井平台将近八亿四千万美元成本，国家补贴了多少，也没有提到它对公司获利可能的影响—其实对他来讲，这恐怕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中国的政策往往不是经过审慎的理性讨论后的总结，而是各方势力游说之后难以预测的结果。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利益团体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不论是基于民族主义、安全、利益或工作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意见都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能取得南中国海的资源。在他们本身的沿海地区，不论是鱼群或是碳氢化合物，都已经被彻底开发，因此国内游说力量坚持往更远处看。中国领导人很早就很务实地理解到，这会引起仇视和反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提议」歷四分之一个世纪都没有改变。用吴士存博士的话说，「合理、务实的方法就是共同开发。」

自从邓小平一九八○年代最先向本区域其他领导人提出之后，中国在这一点的政策持续不变，国务院总理李鹏一九九○年八月十三日在新加坡也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准备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发南沙群岛，暂时搁置主权问题。」（见本书第五章）註336可是，多年来，此一政策仍只是空口白话。例如，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二○○三年在菲律宾提出来，二○○五年在马来西亚又重弹此调。同年，胡锦涛在汶莱再度倡议。在菲律宾，这个提议产生「海洋地震联合作业」，不幸却以政治丑闻画下句点，断送了开发工作的一切机会。其他国家都没有再接受这个提议，这个主意也就沉寂下去。但是在二○一一年九月，或许是因为当年发生多起「切断缆线」事件，引起国际批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邓小平对共同开发的指示。註337二○一二年十二月，国立南海研究院也助予一臂之力，就这个主题召开一项国际会议。此后，北京比以前更加努力推动，其中显然有公共外交的意味。

二○一三年十月，中国传媒大肆宣扬汶莱和越南已同意合作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社论也力促「其他国家」—想必是指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也要「拿起魔杖」。註338但是如此大肆宣扬的协定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和汶莱的协议实际上只是中海油和汶莱国家石油公司提供油田服务的商业合资合约。它和分享南中国争议地区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八竿子打不着边。註339中国和越南的协议更不具体。它只是成立研究海上合作的工作小组，可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已经把它形容为「突破」。註340同一篇报导引述吴士存博士的话说，这项协议「毫无疑问向其他主张国发出清晰的信息，搁置主权争议、坐上桌子商讨共同开

发是务实的选择」。

共同开发的确听起来很合理，就在东南亚地区即有许多可行的案例。但是南中国海的棘手处永远是要决定在哪里进行。吴士存博士和我谈话时强调只有两个地区：「菲律宾所主张的礼乐滩地区，以及越南人声称他们管辖的万安滩。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看，整个南沙地区都可能共同开发。某些外国学者甚至建议西沙或黄岩岛地区也是另一个共同开发的可能性。」礼乐滩和万安滩近年都经过勘察，也都被认为有能开发的石油或天然气田，但两者都离中国很远，而菲律宾或越南似乎都不愿放弃对其资源的主权权利。我问吴士存博士，在南沙群岛之北、争议较小，共同开发是否可能比较容易。「我不确定南沙以北地区是否有丰富的石油。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商业或技术的问题。」这是他冷峻的答覆。虽然或许有人原则上支持共同开发，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接受中国的提议。要跳探戈总得有两个人才行，而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舞伴。

共同开发的阻碍

厄尼．鲍尔和那些可能接纳中国提议的人士熟得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他是华府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舒米特洛讲座的主任（Sumitro Chai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政府官员经常为美国政策向他请教，企业界也透过他个人的顾问公司「鲍尔亚洲集团」（Bower Group Asia）登门求教。他的研究使他得到马来西亚国王和菲律宾总统的褒扬，也得到在南中国海有直接利益的重要人物的赞许。舒米特洛讲座的顾问委员会名流云集，包括理查．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前任副国务卿、现任康纳可菲力浦石油公司董事）、威廉．柯恩（William Cohen，前任国防部长，现在主持自己的防务顾问公司）、哈辛姆．狄卓卓哈迪古索莫（Hashim Djojohadikusomo，印尼国家石油天然气矿业公司〔PT Pertamina〕前任董事长）、海军上将提摩太．基亭（Timothy Keating，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米洛迪．梅耶（Melody Meyer，雪佛龙石油公司亚太区总裁）、爱德华．托托里希（Edward Tortorici，第一太平公司〔First Pacific Corporation〕副董事长──第一太平公司拥有论坛能源公司的控股权，它就是想在礼乐滩开发天然气的业者）、詹姆斯．布莱克维尔（James Blackwell，雪佛龙石油公司执行副总裁）、史基普．波伊士（Skip Boyce，波音公司东南亚业务总裁），以及乔治．大卫（George David，太空工程业者联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前任董事长）。

鲍尔和太多关键人物交换过意见，因此他有关解决南海争议的观点，说不定反映着华府决策圈最新的共识。他说：「美国对于要怎么促

成一个安定的亚太的理解，其要旨是，除非中国觉得在能源、水源和粮食方面安全无虞，你不会有稳定与安全可言。无论我们如何在文字游戏上下功夫，但是本质上就是，除非中国和它的邻国找出方法，或是在美国鼓励下找出方法，共同开发南海，否则不会有稳定、安全的亚洲可言。到头来，终究非得如此不可。」这实属难能可贵，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这是一条走出争端的路子。可是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除了吴士存在海口苦思对策之外，西方智库也在研究解决之道。譬如，约翰暨凯萨琳．麦克阿瑟基金会贊助一项为期三年、由「全国亚洲研究局」主持的计划，註341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也在研究可能的法律架构。所有研究人员一般都得到相同的结论：唯有在领土及海洋权利主张上得到共识，才有可能展开共同开发。但这不就又回到原点了吗？对于中国来讲很讽刺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唯有在将权利主张正式化后才可能—偏偏这就是它要避免的，因为这将在国家官僚不同部门之间产生内部争议。

印尼外交官哈斯金．狄加拉（Hasjim Djalal）亲歷这些辩论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他采取鸭子划水的方式，耐心地设法协助立场互异的各方找到共同点。他是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得以拟订的谈判代表之一，曾经担任印尼驻联合国大使。一九八八年当他听到赤瓜礁战役（详见本书第三章）消息时，他很明白这对东南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南海在中国、美国、日本、东协国家，甚至印度和俄罗斯的眼里，继续获得更大的战略注意时，我感到相当的不安。」註342狄加拉认为最重要的是，该区域应该自行解决争议，不要让外界大国介入。他担心在各国竞逐海洋资源下，区域内的紧张和敌对会阻碍经济成长的可能性。

他得到的结论是，正式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即使是中程结果也不可能，另外，繫争各国不希望外人介入调停。他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看到机会，尤其是公约中有关密闭与半密闭海洋周边国家有义务合作的规定。狄加拉曾经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渔业专案小组（Fisheries Taskforce of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主要成员，这个组织成功地把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和拉丁美洲太平洋滨国家集合在一起，完成原先官方倡议做不到的事。一九八九年初，狄加拉参加一项有关共同开发东南亚石油资源的研讨会时，结识了加拿大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法学教授伊安．汤生—高尔特（Ian Townsend-Gault）。两人发现彼此英雄所见略同：南海也需要一个非正式的场合来培养实务上的合作。汤生—高尔特向加拿大外交部提案、推销这个观念，争取到它同意贊助经费以五年期限推动此一构想。註343

一九八九年底，狄加拉说服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派他和汤生─高尔特遍访东协各国使领馆和部会首长。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大家都希望拿出办法来化解争议，且非正式的方法是上策，此外，东协国家应该先协调好立场、再找别人扩大参与。狄加拉和汤生─高尔特给自己订下两个目标：一是藉由找出一个人人可以合作的地区以妥善管理潜在的冲突；二是培养可以帮助冲突各方互相信任的机制。印尼手上有两张王牌：它在争议地区之内没有对任何地貌提出权利主张；而且它在宁静的海滨有许多豪华度假胜地，可供各国代表幽静地集会、对话。第一届「管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不久之后即在一九九○年一月于峇里岛召开，当时东协六个会员国都派出代表与会。次年，其他国家也获邀出席。由于是非官方性质，许多棘手问题可以迴避：譬如，中国和台湾都可以出席，领土议题可以列入议程，政策选项可以拿出来讨论。根据狄加拉的说法，由于不愿让议题「区域化」，中国起先不愿参加，但是后来勉强出席。

起初讨论相当顺利。某些想法甚至直接被筛选进入正式领域，促成东协各国一九九二年签订南海「马尼拉宣言」（它本身也是为了回应中国在前几个月所宣布的领海法）。这一年的非正式研讨会同意成立「技术工作小组」研究特定议题。这些议题后来包括了资源、科学研究、环境保护、航行安全及其他法律事项。进展很慢，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他们批准了两项科学研究项目：一是海平面的改变，一是有关数据分享。加拿大也同意继续贊助五年的经费。可是据狄加拉说，此时问题开始浮现：「中国只希望由国家机关来执行」，不希望由区域体制来做。譬如，一九九八年，北京反对印尼提议研究碳氢化合物，以及泰国提议研究渔群存量，甚至连成立地质学的区域资料库的计划也遭反对。註344

一九九三年，狄加拉建议划出一块地区进行真正的初步共同开发。地点刻意秘而不宣，以防民众负面反应。大多数国家支持这个构想，但也有人有所保留，但有一个国家「根本不想谈论划出一区」这件事。这个构想就这么拖着，直到一九九八年狄加拉提出修订方案。研讨会成立「合作区研究小组」推动构想。小组提出四个必须先克服的问题：要在什么地点开发、要开发什么资源、用什么样的组织来管理开发，以及哪些国家参加。各国一讨论就又拖了三年，但是达不成具体结论。虽然讨论的本身就是建立信心的措施，但是到头来南海研讨会唯一一个实作的项目是二○○二年三月共同组队调查生物多样性，而连进行的地区都挑在没有争议的印尼阿南巴斯群岛（Anambas）附近。这时候加拿大政府已决定不再贊助，研讨会就逐渐沉寂了。

在狄加拉看来，这是北京的胜利，因为「中国似乎觉得整个过程走

得太超前、太快，也讨论了太多题目。因此它似乎希望研讨会的步调慢下来」。回顾这十年讨论共同开发的点点滴滴，狄加拉说：「显然中国所谓的共同开发，指的是中国要在其他国家和中国都主张有权利的地区，共同地、双边地与其他主张国开发南海的资源。」註345换句话说，除非是在其他国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中国没兴趣搞共同开发。

直到今天这仍是阻碍共同开发的根本争议。当吴士存提到共同开发时，他公开表示这只适用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之内的地区，不是中国的地区。华府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厄尼．鲍尔说，其他国家没有人会参加这样的倡议。「关键在于除了中国之外，每个国家都不会接受奉中国为本地区的老大，并由它来界定条件所进行的共同开发。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何时才会有足够的信心，以关键伙伴的身分与他国共同针对合作条件进行沟通，而不是由它独断独行。」

二○一一年十一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峇里岛举行的东协─中国峰会（ASEAN-China Summit）上宣布，启动人民币三十亿元的「中国─东协上合作基金」（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Fund）。此后中国高级官员在许多场合鼓吹这个基金。二○一三年九月，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在东协─中国博览会开幕式宣称：「我们正在研究推动一系列的合作项目，优先重视建设渔业基地、海上生态的环境保护、海产的生产和贸易、航行安全及搜寻与救援，以及海上交通的便捷。」这些几乎就是北京在狄加拉的研讨会上所否决的合作项目。李克强说：「我们期许东协国家的积极参与。」註346但是东协国家不肯参与──他们认定背后一定有政治圈套，会危害到他们的领土主张。本书截稿时，还没有任何一块钱投入涉及到东协的项目。只有一个项目被大肆渲染──而它的受益人是中国国有企业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它将在二○一四年买下马来西亚关丹（Kuantan）港股权，然后将其设施升级。它看起来很像是国家政策和中国国企利益又一次的一拍即合。註347

从「圣约翰殖民王国」到「南沙群岛特许区」

伦敦有一间公寓俯瞰着泰晤士河，它位于理查．史普瑞特利船长出生地上游几英里、位于他埋骨之处下游几公里。在这栋公寓里，正在酝酿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这是一间相当富丽堂皇的公寓，位于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Whitehall）的核心，室内装饰着来自东南亚各地的艺术品、骨董和奇珍异宝。它经常接待跨大西洋、穿梭往来于新、旧英格兰的菁英，它也是自认为可以解决南中国争议的一个组织之总部。「圣约翰殖民王国」（Kingdom of the Colonia of Saint John）或许让人听来像是小说中的奇幻王国，但是它的支持者声称它是菲律宾「海军上将」托玛士．柯洛马帝国、以及柯洛马对南中国海权利主张的继承人。这项

权利主张的管理人化名汤玛士．狄．列斯（Thomas de Leys）：他是个银行家，从前追随过马可仕家族，也一度担任过蒋夫人宋美龄的财务顾问。

狄．列斯出示一份文件「自由邦最高国务会议敕令」给我看，它显然是由托玛士．柯洛马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所签署；敕令中，自由邦更名为「殖民王国」，托玛士．柯洛马辞去国家元首职位，转让予美国不动产开发商约翰．贝尔纳斯（John Barnes）□□此人后来改名为约翰．狄．马利维勒斯（John de Mariveles）。文件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托玛士的弟弟费勒蒙．柯洛马，一个是贝尔纳斯的部属，海军潜艇艇长退役的艾瑞克．施洛卡（Eric Sroka）。它后来并由马尼拉律师鲁飞诺．桑尼克（Rufino A. Sanic）公证。根据狄．列斯的说法，知情人士向托玛士．柯洛马警告，指称马可仕总统即将强迫他把权利转交给菲律宾政府，因此他试图耍过他们。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柯洛马被关坐牢近两个月、不得不签署文件让渡给政府时，他的遣词用字「无论他们从那群叫做自由邦的岛屿获取的任何权利或利益」已暗示事实上已经不剩任何权益，只是马可仕不察而已。

汤玛士．狄．列斯的论据基本上如下：根据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日本国放弃它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因此，用法律术语来讲，它们成为「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因此柯洛马可以合法地主张它们归属于他。读者诸君如果从头读到这里，就会晓得，法国自一九三三年起就对六个岛屿提出权利主张，后来又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重申权利主张，而中华民国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也主张太平岛归其所有。但是，依据狄．列斯的说法，托玛士．柯洛马已经避免掉这些问题。「为示尊重法国的权利主张，柯洛马割出包括南威岛在内的西南角，它的作用让柯洛马可对目前多角形的地区提出主张。至于中华民国的主张，可以视为『消灭』，因为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上可谓已不是『国家』。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迄今除了所谓的『九段线』之外，中国还未提议或澄清。越南的主张是以它是法国主张的继承者这个论据做基础，可是法国对此有异议。」

长年以来有许多人士曾经企图建立自己的国家，譬如，布洛克家族就管治过砂劳越。然而，大部分人的诚信颇有疑问。美国当局处理过许多件骗案，这些骗子号称代表某些岛礁国家，希望在国际金融体系开户、往来。其中就有好几件涉及南中国海。一九七一年，有个老美莫顿．佛瑞德里克．米德斯（Morton Frederick Meads）自称是「米德斯群岛」的「莫拉克—宋贺拉蒂—米德斯人道共和王国」（Kingdom of Humanity- Republic of Morac-Songhrati- Meads）统治者，一度把马来西亚政府唬住。对于这个共和王国不幸的是，它的支持者据说在一九七

二年六月一场飓风中溺死。一九七四年，有个法国骗子宣布建立「自由邦公国」（Principality of Freedomland），但与托玛士．柯洛马并没有关联。二○○四年，号称首都设在南通礁（Louisa Reef）的「陶马士吉共和国」（Republic of Thaumaturgy）企图出售政府公债给易受骗的投资人。事实上，国际间是有一群团体和个人的次文化，号称代表岛礁小国、骑士团，或已经下台的王室贵族。

然而，圣约翰殖民王国显然不一样。它有真实的地址，有真正的主事者，也有真实的文件支持它的权利主张。更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接触一些权贵要人，也有真正的资金在幕后支持它。汤玛士．狄．列斯是美国东岸某一世家子弟，家族靠在亚洲兴建发电厂致富，后来还出了一个美国财政部长，也捐建几栋新大楼给耶鲁大学。汤玛士．狄．列斯的好友有许多人熟悉政坛生态──从大肆掠夺的资本家，到大牌律师都有。

维琴妮雅．葛瑞曼（Virginia Greiman）擅长为陈年老问题设计新解决方案。她是波士顿庞大的地下隧道系统之律师，现在任教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她替圣约翰殖民王国提出的辩护，正好吻合高之国和贾兵兵论文的论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涵盖一切，一个国家可以对领土提出「歷史性权源」，因此圣约翰殖民王国可以主张它是自由邦领土权利主张的继承人。她和我在伦敦吃午饭时说明她提议的开发模式，即根据她在巨型计划方面的经验所研拟出的「混合机构」（hybrid institution）。她的方法试图解答狄加拉和汤生─高尔特提出的四个问题，但是要透过民间部门，而不是跨政府的模式。她提议由全体主张国成立「共同研究小组」（Joint Study Group），发展对话架构及谈判协定。这个协定将界定一个「南沙群岛特许区」（Spratly Island Concession Area），并分配区内的资产。它对所有的主张国开放，争议交给区内自己的仲裁法庭处理。特许区要设置自己的管理当局，它可以批准开採资源的特许权。註348

她认为：「它可以做为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桥梁。关键在于确保它为民间部门，且不让各国走上国际法庭。」她深信中国和菲律宾都可以从这项安排中受惠。那么圣约翰殖民王国呢？根据南沙群岛特许区模式，圣约翰殖民王国将分配到一部分收入，至于收入要怎么花，要由其「统治者」决定。她说，一部分收入会拨入公益事业。「殖民王国希望为世界福利而分享资源，因此它和教会等组织可能成立信託，以帮助消灭贫穷或其他善事。」对于这项宏伟计划最明显的挑战是，一般都相当怀疑任何一个主张国会拿殖民王国当真吗？其次是，主张国在葛瑞曼的「共同研究小组」中，就会比目前已有的非正式研讨会和国际仲裁的架构，更容易达成协议吗？它或许有点疯狂，但是它会比期待中国放弃它对南中国海「不容争议的权利主张」更不切实际吗？

台湾是化解纷争的关键

读者读到这里恐怕也累了，说不定还希望出现重大气候变迁，让海平面上升，把南中国海这些地貌统统淹到水底下算了。确实，即使保守预测到二一○○年，全球海平面只会上升三十九公分至五十八公分之间，也会使某些地貌淹没到水底下。遗憾的是，它不太可能缓和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另一波紧张不安。拟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未来的海平面上升并不是关切的重点，因此公约并没有明白指示应该如何处理它。假设性的论证已经开始了，有学者主张要不就是修正对国际法的诠释，维持陆地地貌在一九八二年即已存在的地位，要不就是国界可以移动。即使它们都已淹没在水底下，各国可能还是会继续主张主权。日本已花费巨额经费试图防止远在太平洋中的岛礁冲之鸟岛（Okinotorishima）被海水侵蚀，以便维护它的礁是个岛屿，因此应有完整的专属经济区。

既然「解决」不可得，那么还有什么有可能？二○○九年五月，好消息、坏消息一起出现。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名向联合国大陆棚界线委员会提报时，他们只从他们的大陆量起，而不是从任何一个争议岛礁量起。註349但是中国也因此在几天后发表「U形线」地图—显然变更了论据的条件。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逐渐把他们的主张大体调整到吻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了。东南亚国家或许不承认其他各国权利主张的有效性，但是他们已开始同意解决其歧异的基础。慢慢地，南中国海的某些争议正在解套。

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解决三国海床接壤地区的权利主张，三国也正在协商划定各专属经济区的界线限制。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推动于重叠地区共同开发。马来西亚和汶莱之间的国界，早期由英国殖民政府在一九五八年解决，后来经二○○九年三月十六日双边协定延长其效期。对于汶莱延伸的大陆棚（它延伸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共同开发区）仍有潜在的争议，但是它似乎不会引爆冲突。迄至本书截稿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还未釐清他们对大陆棚的全部权利主张。

东协各会员国内部之间最大的问题是，菲律宾持续对马来西亚的沙巴提出权利主张—源自于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于一八七八年和苏禄苏丹所签的协定究竟是割让、还是租赁（确切的翻译攸关此一争议）。二○一三年二月，支持苏丹的人士「入侵」沙巴，此举证明这一权利主张还是非常敏感的议题。虽然苏丹于二○一三年十月去世，他的遗言是要后人坚持其权利主张。註350因此，菲律宾甚至连同意和马来西亚从哪里开始划定界线都无从谈起，因为有一方得先承认另一方对沙巴主张的合法性。当菲律宾的亨利．班苏托于二○一一年十二月向马来西亚政府的海事研究院提出「和平自由友好合作区」的构想时，他用的一张幻灯片

显示菲律宾的国界始自马来西亚和汶莱之间的边界。这或许不是最合宜外交的方式去提出他的计划。难怪马来西亚不肯支持其提案。

法律大概不可能彻底解决争议。即使常设仲裁法庭裁决有利于菲律宾，又有哪个国际警察来执行裁决？然而，假设中国试图限制美军进出南中国海，我们可以肯定国际法会被用来正当化美国的回应。与此同时，威胁动用武力会有反效果。菲律宾政府声称，如果它可以开发礼乐滩的碳氢化合物，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之生活水准将大为改善。把这个论述反转过来说，或许也可以声称，正因为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开发这些资源，才使得菲律宾的营养不足水平及婴儿夭折率高居不下：人民濒于死亡，是因为南中国海争议无法解决。如果论坛能源公司或其他公司没有取得北京同意，企图在礼乐滩勘察或钻油，中国船只会挡住它。长期而言，马尼拉或许可以建立充分的海军力量以保护石油钻探平台，但是恐怕还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菲律宾没有军事力量能确保国防安全，因此它除了延迟开发，就得屈服于中国的要求。马尼拉会走投无路，只好急着和中国协议吗？中国会在常设仲裁法庭做出裁决之前或之后同意和菲律宾有某种安排吗？

除了在南中国海继续吵之外，并没有容易的替代方案。没有一方希望擦枪走火，但也没有人愿意退让一步来降低紧张。每一个岛礁现在不是被占领、就是被控制，压力已转移到它们之间的空间，以及底下不知道有没有的资源上。不幸的是，有相当多的机会导致冲突的出现和升高。领土争议，再加上美、中之间为进出南中国及安全议题而角力，只会使情势更加危险。鉴于各国政府连在粮食供应这种性命交关的议题上都不肯合作，我们很难想像区域合作会有任何进展。共同开发似乎是个好主意，但是在中国澄清其立场之前，恐怕并不实际。这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歷史性的领土主张这个问题上了。

中国官员私底下承认中国政府对曾母暗沙这样位于海平面之下、又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之内的地方主张主权，法理上相当荒谬。印尼的纳土纳群岛虽然有一部分位于「U形线」之内，据报导说，中国外交官向印尼担保，北京对此一海域不会提出主权主张。但是同样的官员说，基于政治理由，他们无法正式调整「U形线」—国内的反弹会太大—因此他们必须继续维持主张。这里头有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盘算：刻意渲染它在国内承受重大压力，以强化政府在国外的立场。但是这些风险真确存在也是事实。从中国目前的立场弃守会干犯众怒。中国老百姓要怎么被说服接受对南中国海不同的歷史解读呢？

或许解答落在台湾。在台湾，更加自由地辩论中国歷史的机会，要比在大陆大得多。台湾已经有一些持异议见解的学者在重新思考二十世纪歷史的各个面向。台湾也是中华民国政府档案储存之所在，而最先划

出「U形线」者正是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彻底检视当年草率划出「U形线」的过程，或许可以说服意见领袖重新检视某些早被宣布为真理的民族主义迷思。此外，从台湾着手的最坚强理由或许是，北京当局深怕他们若有些许让步，会被台北方面痛加挞伐。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解释说：「很简单嘛，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力。」如果台湾的统治者，亦即国民党或国民党政府，愿意降低南海史料编纂的冲突，北京政府才方便跟进。唯有诚实、批判性地检视过去的歷史，才是未来和平之锁钥。

註317：译注：菲律宾民答那峨岛马拉瑙（Maranao）人传说中的神鸟。

註318：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hilippines, Fishery Country Profile’, November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fishery/docs/DOCUMENT/fcp/en/FI_CP_PH.pdf＞.

註319：Statemen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er to the Ninth Regular Session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6–14 August 2013, Pohnpei, Micronesia.

註320：Ibid.

註321：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hilippines, Fishery Country Profile’, November 2005. Available at ＜ftp://ftp.fao.org/FI/DOCUMENT/fcp/ en/ FI_CP_PH.pdf＞.

註322：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ureau of Fisheries, *China Fishery Statistics Yearbook 2011* (Beijing, 2011), quoted in Zhang Hongzhou, ‘China’s Evolving Fishing Industry: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Maritime Security’, *RSIS Working Papers*, no. 246 (Singapore, August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437708_China%27s_Evolving_Fishing_Industry_Implications_for_Regional_and_Global_Maritime_Security＞.

註323：Zhang Hongzhou, ‘China’s Evolving Fishing Industry: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Maritime Security’, RSIS Working Papers, no. 246 (Singapore, August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437708_China%27s_Evolving_Fishing_Industry_Implications_for_Regional_and_Global_Maritime_Security＞.

註324：‘China Starts Annual South China Sea Fishing Ban’, *Xinhua*, 16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882/8246589.html＞.

註325：Kor Kian Beng, ‘Fishing for Trouble in South China Sea’, *Straits Times*, 31 August 2012.

註326：Ibid.

註327：John McManus, ‘The Spratly Islands: A Marine Park?’, *Ambio*, vol. 23 (1994), 181–6.

註328：Daniel Coulter,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Countdown to Calam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7 (1996), 371–88.

註329：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Terminal Evaluation’, Revers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re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ulf of Thailand, 22 May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400/Terminal_evaluation_of_the_UNEP_GEF_project_Reversing_environmental_degradation_trends_in_the_Sou
sequence＝1&isAllowed＝y＞.

註330：Rommel C. Banlaoi, *Philippine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Emerging Concerns* (Manila, 2012).

註331：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http://www.gov.cn/banshi/2005-06/10/

content_5635.htm

註332：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 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2013), 98–124.

註333：译注：一般来说，title指财产权或拥有权的基础，故译为权源。国家对于领土，有了权源的基础，才衍生出主权（sovereignty）；有了主权的基础，才更进一步衍生出其他权利（rights）。在南海主权争议中，各方为支持自己对岛礁的主权主张，各自提出源于不同基础的权源。

註334：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irring up the South China Sea (I)', *Asia Report*, No. 223, 23 April 2012, 14.

註335：'China's CNOOC Starts Deepwater Drilling', *UPI*, 10 May 2012

註336：Nayan Chanda and Tai Ming Cheung, 'Reef Knots: China Seeks ASEAN Support for Spratly Pl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90, 11.

註337：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White Paper o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6 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node_7126562.htm＞.

註338：'Commentary: Tur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to China–Vietnam Cooperation Bonanza', *Xinhua*, 13 October 2013.

註339：Carl Thayer, 'China–ASEAN Joint Development Overshadowed by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25 October 2013.

註340：'News Analysis: "Breakthrough" Helps China, Vietnam Build Trust, Boost Cooperation', *Xinhua*, 15 October 2013.

註341：Clive Schofield (ed.), *Maritime Energy Resources in Asia: Legal Regimes and Cooper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pecial Report, no. 37, February 2012.

註342：Hasjim Djalal,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Lessons Learned* (Jakarta, 2002), 57.

註343：Hasjim Djalal and Ian Townsend- Gault,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formal Diplomacy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in Chester A. Crocker, Fen Osler Hampson and Pamela Aall (eds), *Herding Cats: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Washington, 1999), 107–33.

註344：Hasjim Djalal,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Lessons Learned* (Jakarta, 2002).

註345：Ibid., 78.

註346：'Premier Li Keqiang's Keynote Speech at 10th China–ASEAN Expo', *Xinhua*, 4 Sept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08525.shtml＞.

註347：Kristine Kwok,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Linking Southeast Asia Faces a Rocky Bir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October 2013.

註348：Virginia A. Greiman, 'Resolving the Turbul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ragmatic Paradigm for Joint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wenty Second Annual World Business Congress, 25–29 June 2013,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註349：Joint Submission dated 6 May 2009 by Malays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through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UNCLOS.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vnm_33_2009.htm＞.

註350：Marion Ramos, 'Sulu Sultan Dies; Sabah Claim Lives on', *Philippines Inquirer*, 21 Octo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newsinfo.inquirer.net/510943/sulu-sultan-dies-sabah-

claim-lives-on>.

尾声

二○一四年三月，紧接着马航MH370班机失踪之后，越南、中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泰国和美国船舰纷纷出动，在部分南海海域搜寻生还者。这是史无前例的海上合作范例。然而，如果推定的坠机地点再偏向南边或东边，全世界可能就会出现一场国际争议：中国会坚持它必须领导在「九段线」之内的任何搜索、救援行动，其他国家则拒绝配合，深怕会让中国的主权主张合法化。好在在这片领土主张大多已解决的海域，各国都可以和谐地合作。

乐观者或许会希望这事件能导致在南中国海新的共存共荣时代：一个互信互赖的良性循环。实务上的合作永远值得欢迎，也是正确的努力方向，但是只要根本的争议得不到解决，领土问题还是会继续威胁到和平。马航MH370班机失踪之后不到两个月，合作转变成冲突，越南针对中国试图在西沙群岛钻探石油展开抗争。南海地区似乎再度山雨欲来风满楼。威胁来自两种可能性：一是某一主张国可能动用武力将另一个主张国从遥远的岛礁驱离；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拉锯可能产生摩擦，引爆预料不到的火焰。一个领域的大火之后果会迅速延烧到另一个领域，把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

如果南中国海没有岛礁，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既不会有陆地领土要占领，也不会有这块陆地属于谁的问题，大家将失去对大片水域提出权利主张的依据，也不会有封锁重要国际航线的潜在危机，或引爆对战略要道之通行权利的争执。然而，过去的争议与当代的海上区域都是因为这些小岛而生，今天各国也纷纷为了它们而明争暗斗。国际社会，以及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民众，都睁大眼睛在看。国家的荣辱、政治人物的声望。将由这场竞赛来一决高下。我们已进入一个世界，心理因素和感受远比拥有这些海上地貌的实际效益和代价来得重要。

有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只是在一场战略牌局中的巨大咋唬，目的在于让中国坐上牌桌、吸引各方注目。我认为问题没有这么单纯。从小学到中央政治局，「九段线」已成为神圣的宗教。这个神话根源在于中国从帝制过渡到共和国的复杂歷程，很难被澄清。远方岛礁的命运可以做为领导人在国内分散人民注意力的利器，政府愈是在言谈上唱高调，他们就愈难找到下台阶以达成妥协。「九段线」将会继续危害东南亚关系的和谐发展。过去一个世纪来被民族主义绘图师为了政治目的而绘制的地图，已经威胁到「亚洲世纪」的机遇，而它是可以为数十亿人带来繁荣福祉的。

中国领导圈内明显也有人希望扭转争议的本质，改由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原则达成和解。但是更强大的游说势力，为了声誉或利益，坚持在权利主张上绝不让步。这些国内的利益，尤其是解放军、石油公司和少数沿海省份，追求的行动对东南亚的粮食、能源和政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些行动也威胁到北京所宣示的「和平崛起」政策的可信度，但是中央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克制部属的主张。就目前而言，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依赖这些游说力量的支持，远胜过依赖国外的贊同。可是，这些游说力量愈把中国政策推向此一方向，邻国的「中国威胁论」感受势必更加深刻，他们就会更希望採取反制措施━不论是透过全力建军、或与美国关系走得更亲近、或是双管齐下。中国的整体战略利益正受到它党国体制内某些次要角色的破坏。

一切都还有机会好转：中国可以和平崛起，东南亚可以不必心怀恐惧望向东北方，而美国和中国也可以就海上航行权达成妥协━只要中国可以放弃对「九段线」的完全要求。然而，如果解放军开始相信自己的宣传，企图在「九段线」内执行领土主权，结果将会是和美国正面冲突。就目前来讲，鉴于相对实力差距过大，中、美正面冲突还是高度不可能。但是要过多久，中国军方领导人会开始认为它可能有胜算呢？为了世界和平着想，南中国海的争议需要在那时之前解决。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还是相当新的演员。数十年来，它曾选择了孤立而非交往，它的外交政策也经常是国内权力斗争的延伸，而与国际社会的观念未必契合。可是，在邓小平领导下，这一切有了改变，让许多怀疑论者感到讶异的是，中国领导人自从一九八○年代以来能以从前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或至少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去和广大的世界交流互动。中国还在学习如何扮演这个新角色，而南中国海正是它必须在国内及国际优先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艰鉅抉择的地方。调整它视为固有权利的心态，以吻合现代规范，不会是轻松容易的事。

我之所以动笔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在南中国海周边某种冲突迫在眉睫。到了我研究的相当后期，我的看法变了。我变得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是发生战争，对他们有害无益，虽然它还是认为除了战争之外，一切都是有用的政策工具。我预期在未来数十年，三不五时小规模的冲突将会升高到外交和军事的危机，或许甚至爆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南中国海周遭正在出现一个新世界。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删减军费，而东南亚正在设法适应新现实。有许许多多的类比旨在描述此一新世界。特别是有许多人拿古代的地中海做比拟，当时的斯巴达逐渐式微而雅典正在兴起，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发生冲突。今天南中国海的新情势或许就是如此。

然而，南中国海歷史的下一阶段没有什么无可避免这一回事。尽管太平洋两岸众声喧嚣，大谈中国兵力日益强盛，但若冷静地从实际经验

分析中、美两国军队的相对力量，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还是占上风的大国。我要提出另一个地中海的类比：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地中海。这是一个半封闭的大海，分享着共同的歷史，也有休戚与共的现在，其整体大于每一个部分的加总。它将是根据普世原则议定疆界的海域，会依共同责任治理以求最明智地运用其资源，这片海域的渔群将由所有成员以全体利益为宗旨来管理，这里的石油开採和国际航线造成的污染将被减轻，搜索和救援任务也可以顺畅地进行。这一切都有可能——只要重新划定好疆界。

谢词与延伸阅读

本书试图探讨的事件横跨不同国家，涵盖数千公里的地域，贯穿四千五百年的歷史。我对其中不少主题只有相当概略的了解，并对那些有意或无意曾经帮助过我的、在各个领域都学有专精的教授、研究员、分析家，抱有诚挚的感恩。有不少专家的大名已经出现在正文中，然而，我必须对他们的作品做更正式的介绍，并为那些想要进一步了解南中国海的歷史与现况的读者提供更进一步的指引。

对南海的史前史有兴趣的人，应该参考：艾托尔．安德生（Atholl Anderson）、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特别是他与Ian Glover在二○○四年编的*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RoutledgeCurzon)，与威廉．索尔海姆（Wilhelm Solheim，特别是*Archaeology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Unraveling the Nusanta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06）。关于较晚时代的作品有：Kenneth Hall（尤其是*A History of Early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Trade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100-1500*,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Derek Hong的许多论文、皮耶─伊扶士．曼奎恩（Pierre-Yves Manguin）、Roderich Ptak、安琪拉．萧登汉默（Angela Schottenhammer）、Li Tana、Nicholas Tarling与韦德（Geoff Wade）都不容错过。在关于南海的宏观概述上，最杰出的依然是王赓武的*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该书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但之后再版多次；他在东南亚区域问题上的近期作品一样相当具有启发性。还有Anthony Reid的书（特别是两册*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1995与*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都是极佳的入门与参考。

关于雨果．格劳秀斯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参考马丁．朱利亚．范．伊特桑（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见*Profit and Principle: Hugo Grotius,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 1595-1615*,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还有彼得．博世伯格（Peter Borschberg，见*Hugo Grotius, the Portuguese, and Free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NUS Press, 2011）。关于约翰．薛尔登的地图，请参考罗伯特．巴齐乐（Robert Batchelor）与Timothy Brook的Batchelor in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与Brook的*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rofile Books, 2014)。关于南海在二十世纪的歷史，我推荐法朗索．沙维耶．波奈特（François-Xavier Bonnet）、攸里西斯．葛瑞纳多斯（Ulises Granados）、邹克渊与Stein Tønnesson的作品。

关于当代的事件发展，艾琳．巴维耶拉（Aileen Baviera）、David Brown、John W. Garver、Christian Le Miè re、李明江、Clive Schofield、伊安．史托瑞（Ian Storey）、卡尔．赛尔（Carl Thayer）与Mark Valencia的着作都是一时之选。在法律争议上，我仰赖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与Greg Austin的着作。本书第六章借重了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91）、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特别是*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安德鲁．查布（Andrew Chubb）、施蕴玲（Caroline Hau）、郭清水（Kuik Cheng-Chwee）、Tuong Vu与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思想。与Patricio Abinales、Ari Dy与Benedict Kerkvliet的切磋，帮助我釐清了我关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想法。

至于关于我个人的研究，我非常感谢那些帮助我进行旅行、研究，在思想上相互砥砺思索的人。在中国有吴士存博士、洪农博士、康霖博士与其他中国南海研究院既好客又胸襟开阔的人员。在北京，有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Yanmen Xie与Daniel Pinkston，北京与清华大学的安德鲁．查布与其他不愿被指名道姓但慷慨大方的研究同仁。

在菲律宾，Consuelo Garcia与Colin Steley对我关怀备至。Alma Anonas-Carpio在翻译上鼎力相助。维克多．帕兹（Victor Paz）、Lace Thornberg与菲律宾大学考古学系的职员为我打开史前史的大门。我非常感谢Rommel Banlaoi、Renato Cruz de Castro与《马尼拉快讯报》杰出的Myrna Velasco提供的宝贵协助与建议。

新加坡大学的许多专家也惠我良多，其中包括东亚研究所的王赓武、能源研究所的Hooman Peimani，还有东南亚研究所的学者，特别是伊安．史托瑞、鲁多夫．席维里诺（Rodolfo Severino）与John Miksic。在新加坡其他地方，我与Platts Energy的Yen Ling Song、潘美莉亚．李（Pamelia Lee）、NYK的Tsutomu Hidaka、IDC的Bryan Ma、Tri-Zen的汤尼．雷根（Tony Regan）、东南亚石油开发组织（SEAPEX）的Mark Harris，还有其他成员都有愉快且有深度的对话。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允许

我参与香格里拉对话，而海军上将Kazumine Akimoto欢迎我参加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cean Policy Research Foundation）主办的专家论坛。

尽管越南公共安全部（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不发给我签证（他们尚未原谅我上一本有关越南的书），但是，越南研究小组（Vietnam Studies Group）给了我宝贵的援助，我特别要感谢Balazs Szalontai、Shawn McHale、Alex Vuving与Brett Reilly。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越南语服务的Nga Pham、Ngoc Nguyen与其他伙伴也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的Ake Tangsupvattana与Wachiraporn Wongnakornsawang上校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时间与观点。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Evan Almaas中校与公共事务小组的其他成员的协助下，我有幸能够参与金色眼镜蛇演习。

其他功不可没的人有：托玛士．柯洛马（Tomas Cloma)的姪子Ramir Cloma、吉拉德．柯许（Gerald Kosh）的家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Vlado Vivoda、*Defense News* 的Wendell Minnick、《金边邮报》的Shane Worrell、Huy Duong、Kerry Brown、Nora Luttmer。在英国，Zhang Xiaoyang协助我翻译中文，而在台湾的翻译工作则由Pinnhueih Lee跨刀，Pinnhueih还帮助取得中华民国的报纸档案。谢谢你们大家。

我与香港海事博物馆（Maritime Museum）的前主任Stephen Davies、当代东南亚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 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的法朗索．沙维耶．波奈特、退休美国外交官David Brown、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的卡尔．赛尔透过电邮进行愉快的意见交换。他们、伊安．史托瑞、Stein Tønnesson都看过我的草稿，并提供剀切翔实的评论。我要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我那亲切又有耐心的编辑Heather McCallum始终提醒我要集中焦点、深入浅出，我希望我没有辜负她。谢谢。

我的太太Pamela Cox，与我们的两个子女Tess与Patrick无怨无悔地忍受我的长期不在家，还有屋子里堆积如山的文献。我对他们的爱无法用纸墨表达。

附录　中华民国内政部南海诸岛中英名称对照表

资料来源：内政部统计资料服务网之「南海诸岛礁名称」

东沙群岛 （**Pratas Islands**）

东沙岛 Pratas Island

北卫滩 N.Verker Bank

南卫滩 S.Verker Bank

西沙群岛 （**Paracel Islands**）

永乐群岛 Crescent Group

　甘泉岛 Robert Island

　珊瑚岛（八道罗岛） Pattle Island

　金银岛 Money Island

道干群岛 Duncan Islands

　琛航岛（灯擎岛） Duncan Island

　广金岛（掌岛） Palm Island

晋卿岛（杜林门岛） Drummond Island

森屏滩（测量滩） Observation Bank

羚羊礁 Antelope Reef

宣德群岛 Amphitrite Group

　西沙洲 West Sand

　赵述岛（树岛） Tree Island

　华光礁（发现礁） Discovery Reef

　玉琢礁（乌拉多礁） Vuladdore Reef

　盘石屿（巴苏奇岛） Passu Keah

　中建岛（土来塘岛） Triton Island

　北礁（北砂礁） North Reef

北岛 North Island

中岛 Middle Island

南岛 South Island

北沙洲 North Sand

中沙洲 Middle Sand

南沙洲 South Sand

永兴岛（林岛） Woody Island

石岛（小林岛） Rocky Island

银砾滩（亦尔剔斯滩） Iltis Bank

西渡滩（台图滩） Dido Bank

和五岛（东岛） Lincoln Island

高尖石 Pyramid Rocks

蓬勃礁 Bombay Reef

湛涵滩（则衡志儿滩） Jehangire Bank

滨湄滩（勃利门滩） Bremen Bank

中沙群岛 （**Macclesfield Bank**）

西门暗沙 Siamese Shoal

本固暗沙 Bankok Shoal

美滨暗沙 Magpie Shoal

鲁班暗沙 Carpenter Shoal

立夫暗沙 Oliver Shoal

比微暗沙 Pigmy Shoal

隐矶滩 Engeria Bank

武勇暗沙 Howard Shoal

济勐暗沙 Learmonth Shoal

海鸠暗沙 Plover Shoal

安定连礁 Addington Patch

美溪暗沙 Smith Shoal

布德暗沙 Bassett Shoal

波洑暗沙 Balfour Shoal

排波暗沙 Parry Shoal

果淀暗沙 Cawston Shoal

排洪滩 Penguin Bank

涛静暗沙 Tanered Shoal

控湃暗沙 Combe Shoal

华夏暗沙 Cathy Shoal

石塘连礁 Hardy Patches Reef

指掌暗沙 Hand Shoal

南扉暗沙 Margesson Shoal

漫步暗沙 Walker Shoal

乐西暗沙 Phillip's Shoal

屏南暗沙 Payne Shoal

黄岩岛（民主礁） Scarborough Shoal

宪法暗沙 Truro Shoal

一统暗沙 Helen Shoal

南沙群岛 （**Spratly Islands**）

双子礁群（北危岛） North Danger

北子礁 N.E.Cay

南子礁 S.W.Cay

永登暗沙 Trident Shoal

乐斯暗沙 Lys Shoal

中业群礁 Thi-Tu Reefs

中业岛 Thi-Tu Island

渚碧礁 Subi Reef

道明群礁 Loaita Bank & Reefs

杨信沙洲 Lankiam Cay

南钥岛 Loaita/South Island of Horsbung

郑和群礁（堤闸滩） Tizard Bank & Reefs

太平岛（长岛、大岛） Itu Aba Island
敦谦沙洲（北小岛） Sandy Cay
舶兰礁 Petley Reef
安达礁 Eldad Reef
鸿庥岛（南小岛） Namyit Island
南薰礁 Gaven Reefs
福禄寺礁 Western or Flora Temple Reef
大现礁（大发现礁） Discovery Great Reef
小现礁（小发现礁） Discovery Small Reef
永暑礁 Fiery Cross Reef
逍遥暗沙 Dhaull Shoal
尹庆群礁（零丁礁） London Reefs
中礁 Central Reef
西礁 West Reef
东礁 East Reef
华阳礁 Cuarteron Reef
南威岛（西鸟岛） Spratly/Storm Island
日积礁 Ladd Reef
奥援暗沙 Owen Shoal
南薇滩 Riflemen Bank
蓬勃堡 Bombay Castle
奥南暗沙 Orleana Shoal
金盾暗沙 Kingston Shoal
广雅滩 Prince of Wales Bank
人骏滩 Alexandra Bank
李准滩 Grainger Bank
西卫滩 Prince Consort Bank
万安滩 Vanguard Bank
安波沙洲（安波那岛） Amboyna Cay
隐遁暗沙 Stay Shoal

海马滩 Seahorse Bank

蓬勃暗沙 Bombay Shoal

舰长暗沙 Royal Captain Shoal

半月暗沙 Half Moon Shoal

保卫暗沙 Viper Shoal

安渡滩 Ardasier Bank

弹丸礁 Swallow Reef

皇路礁 Royal Charlotte Reef

南通礁 Louisa Reef

北康暗沙 North Luconia Shoals

盟谊暗沙 Friendship Shoal

南安礁 Sea-horse Breakers Reef

南屏礁 Hayes Reef

南康暗沙 South Luconia Shoals

海宁礁 Herald Reef

海安礁 Stigant Reef

澄平礁 Sterra Blanca Reef

曾母暗沙（詹姆沙） James Shoal

八仙暗沙 Parsons Shoal

立地暗沙 Lydis Shoal

礼乐滩 Reed Bank

忠孝滩 Templier Bank

神仙暗沙 Sandy Shoal

仙后滩 Fairie Queen

莪兰暗沙 Lord Aukland Shoal

红石暗沙 Carnatic Shoal

棕滩 Brown Bank

阳明礁 Pennsylvania N.Reef

东坡礁 Pennsylvania Reef

安塘岛 Amy Douglas Island

和平暗沙 3rd Thomas Shoal

费信岛（平 / 扁岛） Flat Island

马欢岛 Nanshan Island

西月岛（西约克岛） West York Island

北恆礁 Ganges N.Reef

恆礁 Ganges Reef

景宏岛（辛科威岛） Sin Cowe Island

伏波礁 Ganges Reef

汎爱暗沙 Fancy Wreck Shoal

孔明礁 Pennsylvania Reef

仙娥礁 Alicia Annie Reef

美济礁 Mischief Reef

仙滨暗吵 Sabina Shoal

信义暗沙 1st Thomas Shoal

仁爱暗沙 2nd Thomas Shoal

海口暗沙 Investigator N.E.Shoal

毕生岛 Pearson Island

南华礁 Cornwallis S. Reef

立威岛 Lizzie Weber Island

南海礁 Mariveles Reef

息波礁 Ardasier Breakers Reef

破浪礁 Gloucester Breakers Reef

玉诺岛 Cay Marino Island

榆亚暗沙 Investigator Shoal

金吾暗沙 S.W. Shoal

校尉暗沙 N.E. Shoal

南乐暗沙 Glasgow Shoal

司令礁 Commodore Reef

都护暗沙 North Vipor Shoal

指向礁 Director Reef